

毛泽东 眼中的美国

徐学初 编著
周永章



中国文史出版社

前 言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既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一位目光深邃、胸怀远大的国际战略大师。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同时，也密切而高瞻远瞩地观注着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这其中，与我们同处于北半球、隔太平洋而居的美国的动向以及中美关系一直是毛泽东观察与思考的重点。这是因为，中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居世界前列；美国——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首位。中美两国之间，对峙或者友好，都将直接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世界政治、军事、经济的战略格局。

有专家考证，早在1916年，青年毛泽东就在给友人信中表示了他对中美关系的早期见解。毛泽东反对美国的世界霸权主义，但主张美国应积极参与太平洋地区事务，以制裁野心勃勃的日本以及建立中美平等互助关系（参见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太平洋季风》一书有关章节）。以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毛泽东对美国的关注兴趣愈来愈浓，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研究认识愈来愈深刻全面，并且据此指导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美关系的正确处理。从1936年在陕北保安与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畅谈红军长征，到1944年在延安窑洞里考虑中美经济合作；由针对美国政府帮助国民党试图消灭共产党的阴谋撰写《别了，司徒雷登》和《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到五六十年代的志愿军入朝、援越抗美和炮轰金门岛，再到70年代初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来访……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的上述行动，不但反映了他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及其本质的高瞻远瞩以及洞幽入微的深刻认识，而且也是他留给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丰厚的精神财富，对于今天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认识美国，正确处理中美关系也很有裨益。

有鉴于此，我们不揣浅陋，编写了本书奉献给读者，并恳切希望能得到批评指正。

编者
1996年9月

毛泽东眼中的美国

第 1 章 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一生接触最多、最深的美国人是斯诺，而美国朝野各界早期知道和了解毛泽东是通过斯诺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人的交往中，斯诺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重要人物……

1.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记者

1936 年 7 月，中国陕北。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骄阳下，丘壑纵横的大西北黄土高原升腾散发着像火药般焦糊的热气。此刻，正是一天中最暑热难熬的时刻。蜿蜒曲折的黄土道路被烈日烤晒得滚烫焦干，行人们脚踏下去泛起一串串淡黄色而燥热的烟尘。道路两旁的白杨树，田野里的稼禾在炎热的炙烤下弯腰曲枝，显得元精打采。而在从延安到保安的崎岖山道上，一支 30 多人的红军小分队却冒着酷暑，汗流浹背地疾速行进。这是一支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派遣的辎重护送队。走在这支队伍前头的，是一位头戴羊肚子巾的陕北农民。他牵着一头毛驴。驴背上驮着行李卷、照相机、医药箱。后头紧紧地跟着两个黄头发、蓝眼珠的年轻的美国人。他们的脸上和衣襟上，落着陕北高原上的尘土，脸颊上流着汗水，跟着小分队翻山过沟地行进着。虽然十分疲劳，但精神抖擞地迈着大步。高原上起伏的山峦，弯弯曲曲的小溪，奇形怪状的地貌，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不时地发出惊叹和议论。

一个是尚不太知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另一位是年轻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

美国人的冒险精神，总是令人在一些极危险或未开发的地区见到他们的影子。1928 年，埃德加·斯诺远渡重洋，游历了印度之后到达中国。他很快对中国这个“天朝大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第二次在中国一留就是 10 多年。这 10 多年，他迷恋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他为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种种具有开创性的伟大实践所吸引，他对遥远但又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当时中国的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大多数外国人对此漠不关心。他凭着一个记者的敏锐眼光和对中国现状的深刻了解，认清了这场革命，并看到革命已经起来，即将成为历史上最不寻常、最具有深远意义的震撼世界的事件之一，于是，他决定前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和红色苏区探险。1933 年，美国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写信给埃德加·斯诺，建议他访问中国共产党人和红色根据地，撰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并且预付了 750 美金给埃德加·斯诺，从而促成了埃德加·斯诺的这次红色中国之行。

1935 年底，斯诺在北平的燕京大学认识了俞启威和共产党人徐冰。在俞、徐二人帮助下，埃德加·斯诺于 1936 年初南下，开始了他冒险的红色中国之旅。临行前，斯诺写信通知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说：“我明天将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旅行、拍照，写我喜欢写的东西。假如我达到目的，这将是世界大事。”

斯诺与马海德在 7 月初的一个清晨搭乘国民党的一辆美国道奇卡车离开西安，第二天抵达 100 英里远的延安。第三天早晨 7 点，一个向导接应他们穿过国民党防线到达苏区。又经过两天的山区小路跋涉，两个美国人才抵达百家坪。斯诺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周恩来，交谈了两天。

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是黄土高原上一座古老而偏僻的小山城。城市倚着炮楼山，坐落在两山对峙间的一条平川里。经过连年战乱，小城破败不堪，全城房屋不过百间，百姓不上千人。因此，当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来

到保安的县城时，立刻引起了轰动。居民们一边高呼口号：“欢迎美国记者访问中国苏区！”，一边瞪大惊奇的眼睛看着这两个金发碧眼的高鼻子洋人在红军战士的簇拥下，走进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那孔石砌的窑洞。

斯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的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接受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的欢迎。在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内地小城市，军号声冲破宁静山谷，我难以想象如此热烈的欢迎。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要我讲话，我也很难表达出我的激动心情。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这两位美国客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根据地采访，甚为重视。

毛泽东十分清楚：中国的革命应该而且必须为世人所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由一位持自由主义立场者向外宣扬，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是十分必要的和容易为人接受的。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美国，其朝野各界对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了解与认识的正确与否，对中国革命，对中国抗日战争不能说不具有强烈的影响。

1936年的国际国内形势大致是这样的：日本已占据东三省并虎视华北，全国上下的抗日呼声日渐高涨，中国共产党人在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在陕北安定下来，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向世界和中国各阶层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推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斯诺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到达延安的。

2. 毛泽东早期的美国观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美国从来都是各界人士观察、研究、分析、议论的重点。一个20世纪的政治家，不可能不对美国有一个完整明确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有时是幼稚的，有时是不完善的，但最终会成熟起来。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给朋友萧子升的信中，首次对中美关系问题发表意见。

在这封极不平凡的信中，毛泽东表示了他当时对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见解。他认为美国不应参加世界大战而在欧洲用兵，相反，应作好准备以待时机成熟之后，在太平洋用兵，与日本决一雌雄。他指出，日本是中国的仇敌，在日本问题上，中美可以携手建立联合战线，对日本共同用兵，使中美亲善。毛泽东当时的这种见解，对于美国的对外扩张政策及美国与日本的矛盾还缺乏本质认识，对于美国抱着美好的希望和幻想。不过他希望中美能友好相待的愿望却是那么真切直率。

早期毛泽东尊崇美国创新人物，不仅对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这样一些政治人物深感兴趣，抱有好感，而且对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爱迪生等也敬佩不已。对于那些备尝艰辛，依靠奋斗精神成长，具有开拓精神的英雄人物充满了崇敬之情，他认定世界是属于那些艰苦奋斗、勇于攀登的人。

1915—1920年，毛泽东接受了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影响，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美国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最有希望的新思潮，在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发生深刻影响以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传播，对于僵化、保守、脱离实际的旧思潮确实是一个有力打击，因而它能在中国思想界一时占据统治地位。

毛泽东当时关心美国、研究美国、学习美国，从美国的历史和精神中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他在向美国学习中表现出灵活性、选择性和改造精神。

毛泽东很快便对美国的政策持批判的态度。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对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使他打开了接受俄国革命的思想的闸门。毛泽东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是他走向马克思主义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表演，特别是对中国的大拍卖，暴露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敌视中国人民，勾结各国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真面目。毛泽东密切注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势态的发展。如果说，美国参战前，毛泽东对威尔逊的“和平政策”还抱有较大幻想，那么，毛泽东现在便看透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政府践踏中国主权的本质，他对威尔逊和美国政府表示极大的愤怒和抗议。

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揭露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争霸世界的战争，威尔逊的殖民政策不得人心，不仅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人民也起而反对。从威尔逊急切建立国际联盟的行动中，毛泽东对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有了初步认识，对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推行的政策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保持了一定警惕。对于帝国主义各国间的斗争看得更加清楚。他肯定，由帝国主义大国主宰世界人民的命运的“大国政治”时代，已经过去，以后将是各国人民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

1920年底，毛泽东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年年底，毛泽东坚决揭露由美国主导、美英日等国参加、中心议题是中国问题的“华盛顿会议”的反动实质。毛泽东认为，华盛顿会议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次值得高度注意的会议，这次会议所具有的作用是：首先，它是美国协调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来侵略中国的会议，因而它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危机。1923年4月13日，毛泽东指出：华盛顿会议使中国社会在目前及将来一个时期内，“政治将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何以知道必然是这样呢？你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是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他们的步骤以先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一番商量便协调了。”毛泽东指出，华盛顿会议即是帝国主义协调矛盾的会议，又是它们共同准备力量、休养生息的会议。其结果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益得到强化，而且它们必然要勾结中国各派军阀，支持它们的反动统治，把军阀的争夺进一步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争夺。“外国与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为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将越黑暗的原因。

其次，毛泽东指出，华盛顿会议明明是帝国主义勾结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共同侵略中国的会议，但是由于美国帝国主义最为狡猾阴险，它惯用冠冕堂皇的好听词句粉饰自己，欺骗中国人民，因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美国发生迷信，抱天真的幻想，“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毛泽东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界对美国的迷恋对中国现代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

对华盛顿会议的基本分析和认识，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分析和批判美国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个基本出发点出发，毛泽东抓住美国在华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进行分析批判。

从五四时期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侵华政策进行的早期批判，显示了他在中国众多领袖中，是对中美关系有最清醒认识的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红军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也不忘对

美国在华动向的注意和分析，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是高度警惕的。但是这一时期，由于繁重的军事指挥任务，由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畅，他对美国的了解比较一般，对美国侵华政策的分析批判与中共中央的认识大体一致。

3. 毛泽东第一次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1936年，面对新的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中国共产党人更为繁重的历史责任，毛泽东认为，作为中共领袖，自己很有必要进一步加深对美国的认识 and 了解，以便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中美关系提供依据。

同时，毛泽东也希望借助埃德加·斯诺的如椽之笔，向外部世界宣传介绍中国共产党、红军、苏维埃运动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介绍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已经清醒而高瞻远瞩地认识到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通过斯诺向全世界公开阐述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对美国的政策，这将有助于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

1936年7月16日，即斯诺和马海德到达保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在他的住处——炮楼山下石壁上凿进的一孔窑洞里，接见了这两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客人。

就在这个破窑洞里，毛泽东开始了他那举世闻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据“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记载：

毛泽东指出，今天中国人民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苏维埃的对外政策受到这个总目标的制约。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中国，同时也威胁到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本不仅是中国人民和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而且也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家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中国人民欢迎这种态度，并且愿意和他们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毛泽东指出，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在援助中国抗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样的援助要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当南京政府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同人民革命联合起来组织民主的国防政府时；这种援助才能对中华民族有益。否则，像过去一样，南京政府从美国、英国许多国家接受了援助，而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多数用于消灭红军。这样的援助只会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

当斯诺问道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国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时，毛泽东发表了对美国的详细的外交评论。他说：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

毛泽东肯定，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将使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关系。在未来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中国将遵守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对外开放的原则，发展中国与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维护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毛泽东与斯诺的上述谈话，不仅表明了中共现时对美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也表明了未来新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原则态度和立场。毛泽东在这

那个时候，已经确定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准则，这些基本原则和准则，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外交方针的基本组成部分。

夜深了，毛泽东的谈兴仍然很浓，毫无倦意。他对当前世界上的政治、军事，表现得惊人熟悉，使这两个美国人感到十分惊讶。他们感到毛泽东有磅礴的气度、宽广的胸怀和卓越和领导才能。

斯诺和毛泽东在以后的一次次的长谈中，加深了了解。他们几乎是无话不谈。在斯诺的书中记录着：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谈外交问题；

7月16日，谈日本帝国主义；

7月18日，谈内政问题；

7月19日，谈内政问题；

7月23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

在那些夜晚，毛泽东第一次向这个外国人敞开了自己的心扉，谈了许多过去多少年也没向别人说起过，甚至自己的妻子贺子珍也不知道的事。

毛泽东把自己的身世尽可能地告诉了斯诺。他谈到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和其他亲人，他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劳动、读书，以及他和父亲的争吵。

他又谈到了他后来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谈到了他最初参加革命时的一些真实想法……

不光斯诺听得津津有味，就连跟他一起生活并肩战斗了10年的妻子贺子珍，也在一边听得十分专注，十分入神。

毛泽东为什么把他的身世讲给斯诺，一个外国记者听，而不是中国记者呢？也许，他是想要把他想告诉世人的真实想法，交托给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公正的人，他选中的这个人却是个从美国来的记者。

毛泽东对这个有胆量闯过国民党封锁线来探求神秘的红军队伍的美国人看得很准。斯诺信守他的诺言，把在红军苏区听到和看到的，以及他个人感觉到的东西写进了一本书里。

这本名叫《西行漫记》的书，后来就成了很热门的书，一本了解中国红军和它的领导者的教科书。许多中国人和美国人从这本书中开始知道了一些共产党人的真实情况。

毛泽东是个不肯轻易相信别人的人。但他却和斯诺，一个美国记者达到了一种默契和信任。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4. 斯诺心目中的毛泽东

在以后的长达数月的采访中，斯诺先后又采访了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徐特立、贺龙、徐海东等一批著名的党务活动家和红军将领。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些骨干分子身上那种为理想和事业献身的常人难以理解的崇高品德和忘我精神。

四个月的苏区访问在斯诺心中引起共鸣。他很赞赏毛泽东领导下的红色苏区充满勃勃生机而简朴的农村环境，它迥然不同于北平的没落的贵族生活，也不同于上海追逐名利的疯狂竞争。在这里，埃德加·斯诺所憎恶的中国旧的、没落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消失了，红色舞台上农民和知识分子集合在一起，领导人不追求特权和个人物质利益。毛泽东在田里劳动。财政部长林伯渠是少数超过50岁的领导人之一，穿着褪色的军装，戴着旧军帽，耳

朵上套着一根权当眼镜腿的绳子。

斯诺认为，毛泽东在有些方面带有明显的美国人特点。他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从思想上讲，但像某个历史学者后来评论的一样，他“有人民意识和推动力，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他如何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民是毛泽东的政治力量源泉，他以罗曼蒂克思想美化农民的背景和生活方式。他有深刻的民族主义特色，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相信历史性的某些力量，这些力量像天上某些星座一样都必须首先被安排好它们固有的位置。

斯诺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他有林肯型特点，在以后的印象中斯诺也常将他与美国的形象作比较：他虽然受过教育，但和下属讲话时用他们的语言，而且似乎很有特色。他很坚决，工作很勤奋，在长征时和士兵们走得一样远。他可以和美国的英雄形象媲美。斯诺注意到，他每临绝境似乎总有神明助他似的从被俘或死亡线上获生。他虽然非常杰出，但并没有什么个人崇拜，他也没有要求有这种气氛。一次和斯诺谈话时，他解开裤带捉虱子。另一次斯诺和林彪谈话，他在一旁若无其事地脱掉长裤。他不像苏区流行的剪短发，而留着难看的长发，还不断抽烟。共产党人一般认为这些都是颓废的表现。他像一个好的平民或士兵。斯诺以为，毛泽东的敬礼是他见到的最差劲的一种。有一次拍照时，毛泽东没有军帽，斯诺将自己戴的借给他。斯诺感觉自己和毛泽东在很多方面相同，如饥似渴地读书，不讲究边幅，早年就信仰宗教，坚持自己的日程等。他们俩人都看重实际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

斯诺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中共对国民党分子的任何让步都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考察、讨论、决定和统一的。共产党没有放弃他们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共产党人也有其民主一面，他们要解决旧中国制度所带来的不平等。解决的唯一的办法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5. 斯诺的影响力

斯诺原想将四个月的苏区旅行一事再保密几天，这样可以有时间写出系列报道，同时将胶卷冲洗出来，避免国民党检查官的各种刁难。但此时出人意料地传来他已死去的消息，使他的保密计划落空。

斯诺回到北平的第三天，美联社发了一则电讯说：“斯诺已落人‘赤匪’之手，他利用笔记本报道他们的情况时，被捕并已枪决。”斯诺父亲在堪萨斯城读到这一消息，立即要求《堪萨斯城明星报》询问消息来源。斯诺在英国和美国的编辑也提出同样查询。当天早晨，美联社驻北平记者吉米·怀特打电话给斯诺。

过了几小时，斯诺在美国大使馆举行新闻发布会，证明他安然无恙。他讲话时借用了马克·吐温的警句说他的死讯还不成熟，也许是他人在中国内地被杀之误。他在旅行访问中很安全，红色分子待他很好。

国民党人认为斯诺的报道是个骗局。天津一张日本赞助的白俄法西斯报说：“斯诺受华尔街和莫斯科的双重补贴。”但绝大多数人对斯诺的报道采取严肃对待的态度。鲍威尔的《中国评论周报》登载斯诺和毛泽东的谈话，很多中国人都急切阅读这条新闻。燕京大学学生请斯诺讲演，并展示所摄的相片。记者们也纷纷来访。斯诺在北京饭店的讲话震动了全体听众，他的讲话也被登载在上海的晚报上。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高斯虽然认为斯诺亲共，但他相信“斯诺提供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情况是最全面、最权威和最新的，应

该引起领事馆的充分重视，也应引起美国大使馆的高度重视。”在约翰·塞维斯的家中集合着非正式的讨论会成员，他们聆听斯诺作的报告。塞维斯边听边想：“一个新的平衡因素突然出现在中国。虽然它还不十分肯定，但却蕴藏着巨大的潜在生命力。”

《伦敦每日先驱报》在以后的几周中用头版的篇幅发表斯诺的系列报道，同时配以评价和照片，报社提升斯诺为远东首席记者。美国的《纽约时报》和《纽约太阳报》为争夺独家发表斯诺的报道而争吵不休，斯诺不了解两家报纸争吵的细节，误以为他们想删节或不愿全文登载，因此他撤回了稿件。美国的《生活》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出人意料，杂志负责人亨利·鲁斯出 1000 美金使用斯诺拍摄的照片，连续两期用 11 页篇幅登了其中的 41 张。斯诺写的报道长文占有《亚洲》1937 年 1 期的一半篇幅。《新共和国》发表斯诺写的苏维埃中国的四部分文章。《亚美》登载斯诺和毛泽东的谈话摘要，并急于想得到斯诺的其他文章。《星期六晚邮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埃德加·斯诺先后在中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发表了 30 多篇通讯和 70 多幅照片，把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事迹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展现在世人面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光辉形象，也被斯诺栩栩如生地描述出来。

斯诺喜欢中国共产党人，他尽量以浪漫主义的想象描绘他们。在《西行漫记》里，他将读者带进生动的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中，有邓发将军的拥抱，有跨越国民党的封锁线的不安和恐怖，有和毛泽东在窑洞中促膝交谈的夜晚。书中描述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抢渡大渡河铁索桥的英勇场面，更使读者为他们潸然泪下。为了急于使美国人能接受《西行漫记》，斯诺用美国人的形象描绘中国共产党人。这样的写法显得有点轻率，但美国人能接受。

斯诺在贯穿全书的观点中明确指出，不管他本人如何敬佩中国共产党人，不管美国人怎样看待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总是革命者。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斯诺的延安之行，以及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友好交往、不仅使世界人民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为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留下了一段佳话。

1939 年秋，斯诺又到了延安。他又见到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

他们进行了两次正式的谈话，又进行了许多次朋友式的聊天。他们谈话的范围很广，涉及到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对策、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些情况，以及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欢迎斯诺的大会上，毛泽东讲了一段很有意味的话。他说道：“民国 25 年斯先生第一个首先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通过对斯诺的欢迎和期望，表达了发展中美人民亲密友谊的愿望。

斯诺的这次访问，大概是至 1944 年前最后一位美国人对毛泽东及延安的访问。国民党对陕北边区的严密封锁，使延安几乎又回到 1936 年前的铁桶似的状态。但共产党可通过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向外发布一些消息。这一阶段毛泽东和中共与美国的交往。还处在民间交往的阶段，但已为实现官方之间的接触准备了条件。

第 2 章 延安美军观察组

“中美利益是互相联系的，有共同的地方。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政治上、经济上合作共事。”

“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会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美国的援助。……我们不会冒险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因为我们关心的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1. 毛泽东心目中微妙的中美关系

1944年7月22日，陕北延安。

中午时分，烈日当空。戒备森严的延安飞机场上，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共领导人肃然仁立。他们不时手搭凉篷，抬头仰视着黄土之上的那片蓝天，睿智的眼睛中闪烁着焦虑和企盼。

“美国飞机怎么还不来？”

“听说两个小时前就从西安机场起飞了。”

“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七嘴八舌的小声议论传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那里，他不露声色地听着，坚毅的脸上依然保持着和蔼的微笑，心里却有些烦躁不安起来，要知道他们等待的这架飞机是第一架从国民党统治区公开飞往中共中央驻地延安的美军飞机，而飞机上的乘客，则是一批肩负着沟通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渠道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如果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后果可就……想到这里，周恩来心里有些沉甸甸的。他不禁回想起了在促成这架美军飞机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种种艰苦和困难。

埃德加·斯诺关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和《西行漫记》一书，震动了美国舆论，使美国官方和政府对于中共、红军和毛泽东不得不刮目相看。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斯诺是中美人民间活的桥梁》中指出，“《西行漫记》这本书，‘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饶有兴趣地看完此书，后来三次召见了斯诺，斯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罗斯福的言论进一步发生了变化。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对罗斯福的态度公开表示欢迎。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毛泽东呼吁，建立中美两国和其他各国反侵略、反战争、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已迫在眉睫，美国必须由口头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转变为实际行动，给予日本侵略者以应有的制裁。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形势变化急转直下，毛泽东经过慎密分析，肯定这是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其性质是掠夺性、非正义性和帝国主义性的。毛泽东在《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指出，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去了意义。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最后拒绝与人民妥协，拒绝与苏联妥协，并且奉行掠夺战争了。因此，应当按各国在战争中的性质来划分它们的阵线。这种划分只能是：（一）进行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之诸国家，以及实际赞助这种战争的诸

国家，这是第一类；（二）进行正义的非掠夺的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援助这种战争的国家，这是第二类。基于这种划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争取所谓英、美、法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同各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结成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现在唯一可能的，就是苏联同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同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一道，建立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现在应包括以下成份：（1）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2）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里的反帝力量，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3）苏联。”毛泽东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一次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改变了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他高度警惕美国的变化。他认为，在美国准备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美国实际上已排除于世界反侵略、反战争、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之外，罗斯福政府也正在走向法西斯化。虽然美国政府这时仍然宣布不放弃它的中立政策，但是这时的“中立”，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假中立”。这种中立是一个阴谋，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计划的一个部分。

尽管毛泽东和中共肯定美国已经不复可能参加反侵略、反战争、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不把美国看死，美日矛盾还应当利用，美国政府的某些政策对中国抗战还会有利。

1940年，“七·七”抗战三周年，在《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毛泽东与中共进一步估计到，美国正在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帝国主义战争有由欧战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帝国主义互相间的冲突没有完结。英美虽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从命，因而我们仍然可以利用美英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日益增长的矛盾，促进中国抗战。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美国对德国入侵苏联表示了谴责。毛泽东综观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果断地认为，时局又出现了新的转机。由于美国表示愿意站在被侵略者一方，因而与美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路线，又具有了现实的可能。6月23日，他在为中共中央所拟定的对党内指示中指出：现在，我们必须“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采取新的步骤。”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又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与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统一路线的立场上来。

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共同宣言《大西洋宪章》，表示了制止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决心。8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中指出：共同宣言“特别表明了美国对于参加反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已经下了决心。而美国的这种决心，即是表明了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阵线已经在政治上完成。”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告包括中美在内的民族反战争、反侵略、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业已完成。“全世界一

切民族划分为奉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奉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明朗化了。”

在争取美国等西方盟国的援助问题上，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要正确认识和努力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但是中国的抗战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

首先，美国对于中国抗战的援助，必须以平等待我为前提，法西斯对各国的侵略，目的是要实行“法西斯控制”，就是践踏各国应当具备的平等关系，如果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对等被侵略国家的援助，也以不平等为前提，那么这种援助其后果与法西斯侵略并没有两样，都是践踏别国的主权。因此这不是什么援助，而是侵略的另一种形式。中国接受美国的援助，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关系之上。毛泽东 1936 年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民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并同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

他强调要把美国政府的援助同美国人民的援助区分开来。他高度赞扬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肯定这是对中国抗战的巨大鼓舞。“许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正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同时他希望美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督促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政策，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美国人民自身的利益而奋斗。但他同时也指出，美国政府为着它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但还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实际的援助。

毛泽东和中共执行坚定而又灵活的对美政策，一方面继续寻求和推进与美国在抗战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对于英国与美国采取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政策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揭露，显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他根据中国抗战的实际需要，肯定联合英、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反对联合压倒一切的观念，主张要通过斗争去求联合。这就是必须与英、美一切不利于中国抗战的行为作斗争，特别是和它们妥协出卖中国利益的行为作斗争。愈是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反对态度，揭露它们的阴谋，便愈是能减少与它们妥协合流的可能，也就愈有利于实现中美反侵略的联合。1941 年底，毛泽东对美国的“远东慕尼黑”政策密切注视，肯定其阴谋如果实现，必将大大地危害中国。他在为中共中央拟定的党内通知中，一针见血地向全党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盟国关系建立，美国成为影响中国抗战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美盟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加速中国抗战的胜利。毛泽东根据中美关系变化的新特征，制定了中共的对美政策，概括起来就是：维护与美国作为盟国的友好关系，肯定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争取美国对中国和中共的抗战给予实际的援助，要求美国赞助中国的内部团结，制止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活动，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要求中美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发展。

随着抗战决战阶段的到来，中美合作关系更加密切。为了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与美国官方实现直接交流与合作，并把这种交流与合作看作有利于和美国政府建立正常关系、有利于争取中国和

平民主前途的重要工作。

1944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邀请，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这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份外交方针文件，称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准备从军事合作起步，而后再扩大与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往。

2. 两个年轻的外交官

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沟通与美国的联系相反，美国领导人却从来没有真正认识或接受中国革命的现实，华盛顿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总是在不感兴趣与充满敌意之间摆动，鲜有例外。要么无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要么把它看成是一个“全球性”阴谋的工具。这种倾向给中美关系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美国于1941年12月加入对日作战的时候，美国官员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几乎毫无联系。有几个新闻工作者和冒险家如埃德加·斯诺、T·A·比森、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伊万斯·卡尔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到过共产党的根据地，并以称赞的态度报道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但这些活动对公众舆论和政府的影响是有限的。

1941年以前，美国官方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不确定和敌视的混合物。政府中的共产党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会对亚洲农民产生号召力一事感到迷惑。虽然他们有时也把中国共产党称为一个“农业改革者”的党，但把所有的共产党运动都看成是处于苏联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看成是莫斯科的傀儡的。只是到了1944年夏天，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而中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面对当时中国战场的形势是：一方面，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在与日军的作战中一败涂地，数月之内，竟损兵百万，失地千里；另一方面，在敌后战场上，我解放区军民胜利地进行了一系列攻势作战，以生命和鲜血赢得了自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瞩目。美国政府于是指示驻中国的外交官，让他们提供关于中国局势的各种报告，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与此同时，美军统帅部，特别是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从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的目的出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于是想了解和联系中国共产党。

两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担当了这一任务，一位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约翰·戴维斯，另一位是三等秘书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是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他于1908年4月6日生在四川的嘉定(现四川省乐山市)。4年后，这个家庭迁往四川成都。成都离外部世界多少比嘉定近些。

青年时代的戴维斯就读于北平郊区的燕京大学。而他在那里读书时的校长就是后来当美国驻华大使的约翰·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毕业后，戴维斯回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毕业后，立即报考驻外外交官，并于1931年11月19日接到录取通知。

不久，戴维斯被国务院派到加拿大去锻炼，很快又被派遣到中国，并当上了美国驻云南府的领事。这是美国当时派驻在中国从哈尔滨到广州的十来个领事之一。较年轻的外交官每隔一个时期就要从这里调到那里。例如，接替戴维斯当云南府领事的是谢伟思。

1933年，戴维斯到北平去参加为期两年的语言学习。他新交上的朋友中有我们将在以后多次提到的约翰·费正清。戴维斯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老师们认为他讲的是四川调。他改变了口音，讲比较优雅的北京话。

这并不特别困难，因为他是天生的语言学家。他后来还掌握了俄文、德文和西班牙文。他的法文和日文也过得去。

1937 年中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戴维斯被调到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汉口。美国驻中国大使约翰逊当时也在汉口，还有一些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其中有周恩来、史迪威、陈纳德、卡尔森、史沫特莱和厄特利夫人。

厄特利夫人写的《中国记事》里有一章，标题是“共产党人怎样俘虏外交官”。在这一章中她描写了史沫特莱怎样对史迪威施加了影响，并且说戴维斯“成了国务院内推进中国共产党事业的最有效势力之一”。

戴维斯是一个难得的不说怪话的人。他在《揪住龙尾》这本书中忧郁他说：“问题的真相是，中国自从清帝国覆亡以后，一直玩弄一个有诱惑力的恶作剧。西方生意人、传教士和教育家试图使之现代化和基督化，但失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试图征服它，也失败了；美国政府试图使之民主化和统一，也失败了；苏联统治者试图暗中控制它，也失败了；蒋也失败了。”

谢伟思这个美国外交官，也是出生于中国的四川成都。他的父亲是一个传教士，中国名字叫谢安道。老传教士像大多数他们这一行的人一样，对于外交职业的人没有大多的好感。但是他的大儿子约翰却偏偏喜欢这一行。

出生在中国的谢伟思，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他来说，用英语和汉语表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后来的年头中，他以特有的自贬姿态说：“运用语言的能力，不幸大大下降了。”他退休后到伯克利定居，那里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也有相当多的中国饭馆，他成了大多数饭馆的忠实顾客。他的精湛熟练的中国话使饭馆侍应生感到惊讶。他认真地对话，问侍应生他能不能要一盘酒糟肉，或者来一盘冬菇炒竹笋。尽管谢伟思对自己的中文程度感到不满意，但是，长期以来吃力学这门语文的其他美国人，对谢伟思的中文非常钦佩。有一位教这门语文的美国人曾敬佩他说：“谢伟思简直是掌握两门语言的模范，他认为英文和中文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谢伟思少年时期就离开成都，去上海的沪美学堂读书，而后在一家建筑事务所当见习员。接着他只身去了美国，进了奥伯林学院。

约翰·谢伟思在 1932 年离开奥伯林时，决定报考驻外外交官。他通过了考试，华盛顿的一位内行建议他回中国，申请当驻外处的职员。政府对不需要报销路费的申请人给予优先考虑。于是他就回到中国，在上海银行当了一阵子月薪 50 美元的职员之后，获得了在驻云南府领事馆当职员的职务。

两年后，谢伟思终于被委任为驻外处官员。在通过语言考试后，被派到驻上海领事馆。他在那里的上司是高斯。高斯是典型的住在中国沿海一带的外国人，从来不费精力去学中文。因为住在通商口岸的人不太需要中文。后来，高斯当了大使，他似乎惊愕地了解到，在重庆的内地人都不会讲英语，他所掌握的当地语言只限于几句简单的话，如“开饭！”等。鉴于他在语言上的欠缺，他被年轻的谢伟思的流利中文大大吸引住了。

后来，高斯继任詹森当了美国驻华大使，便把谢伟思也带到当时的临时首都重庆。

当时高斯这个对汉语只能勉强他说说“吃饭”之类单词的驻华大使手下有三员得力助手。除了谢伟思，还有戴维斯和文森特。他经常把他们派出去，搜集各方面的情况。

他深入到中国的农村，搜集对他的制订政策的上级可能有用的情报。珍

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有一次出差，是被派到仰光去为使馆接收一辆新汽车，并且要在日本人切断陆路之前把车开回重庆。对谢伟思说来，有一辆车驾驶，即使是单程，已是一种不习惯的奢侈。他已习惯作为“黄鱼”到处旅行——即同卡车司机激烈讨价还价后搭车。谢伟思这些时候总是带着一个睡袋，在中国的小客栈借宿，与当地入一起挨臭虫咬；必要时还一起吃大蒜和馒头。因为有时只能买到这种食物。“约翰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能。”有一位经常观察他行动的资历较浅的外交官说，“他可以在中国一条街上随便走的时候，根据摊上出售的火柴或人们穿的衣服或烹煮的食物，分析当地的社会结构”。

1942年年中，谢伟思被派到西北甘肃省的兰州。美国外交没有到过那里，现在有直接考察的机会。当时，这个地区发现了石油，中国政府正在派一批工程师到西北去。蒋介石的政府认为能说服美国把一对批现代化炼油设备运去，因此，邀请美国大使馆派个人一起去。“黄鱼”谢伟思看来是合适的人选。他对石油产品了解并不多，但是可以了解到这个国家边远角落的政治情况。虽然黄河流经兰州，但兰州非常干旱。那里几乎没有什么树。由于缺乏树木，流出来的石油都流到在井下面挖出来的上蓄油池里。兰州的中国人谨慎而不肯透露他们的财富。带去的照相机被他们没收了，谢伟思用计算和默记步数，勾画出一幅相当准确的地图。

后来，谢伟思又向东旅行到河南省洛阳。那里正发生大饥荒。看到一片悲凉的场景，这个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十分震惊，因为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大员们却在花天酒地的享福取乐。美国对共产党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谁也没有注意柯乐布——另一位外交官10年前提出的看法。如果同共产党人交上朋友，除了有可能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长远计划外，肯定还能得到好处。他们可以提供日本军队的情报，他们还可以帮助可能跳伞落在他们地区的轰炸机的机组人员。高斯大使指定谢伟思想尽办法去了解共产党人。

在重庆，谢伟思可以经常有机会跟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们见面、谈话。他跟周恩来很谈得来。1942年11月从河南回来后，他忧心忡忡地把在河南看到的情况对周恩来说了。同座的还有文森特和林彪。

林彪是刚从延安到重庆来的。他带来了毛泽东希望与蒋介石和解、一致抗日的意愿。谢伟思跟两位中共领导人交谈以后，得出的结论是有些悲观的。因为他料到顽固不化的蒋介石决不会同意跟共产党和解的。

3. 影响中美关系的外交报告

不久，谢伟思被召回美国去，代表驻华使馆向国务院汇报中国情况。这是自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政府第一次直接听到来自中国的外交官对中国局势的分析判断。年轻的驻华使馆三等秘书对那些决定中国政策的首脑们说：

“人们现在已经不再想知道能不能避免内战，而是想知道能不能至少推迟到战胜日本之后……即使冲突避免了，这个国家本来已经紧张的经济状况仍将紧张下去或恶化下去，也许会导致经济崩溃。如果发生内战，这种经济崩溃的可能性当然就更大。

也有这样的可能，经济困难也许使疲于战争、征兵过度和抽税过度的农民成为共产党宣传的沃土，从而出现一场超越中国共产党人目前声称正在谋求的温和民主的革命。而且。即使美国没有在物质上或外交上支持国民党而招共产党人的仇怨，这个共产党政府也将比较倾向于同俄国友好合作，而不是同英国和美国。

由于这些原因，因此，作出努力不让中国国内局势恶化，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使局势有所改善，看来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共产党人认为，外国（显然是指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可能使局势改善的唯一力量。他们承认，外国对中国内部事务提出建议，不管提得多么圆滑婉转，要成功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认为，反映比较了解情况的外国人的意见，对国民党领导集团中比较有远见的人，如蒋委员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谢伟思认为，如果美国能说服蒋介石让美国观察员到毛泽东在延安的与外界隔绝的总部去，也许是有益的。直到那时，到过延安的美国人只是几个记者，但去过延安的记者大多都倾向于共产党。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他提出了具体建议：“我认为最适合于到共产党地区去的美国代表是懂得中文的外交官，可以派一两个人。他们要适当长期地住在延安或其附近，还要在游击区作相当广泛的旅行。重要的是不能要求他们根据一次在官方导游影响下的短暂访问写出报告。”他后面的一些话是有针对性的。

当时美国总统对中国的了解总是通过派特使的方法进行的。那时候，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史迪威将军，经常要接待一个又一个的总统特使。

1942年7月，罗斯福派来劳克林·柯里。到了10月间，又派来了一个特殊身份的特使——曾经跟罗斯福竞争总统位子的温德尔·威尔基。

威尔基这位失败了美国总统候选人从未来过中国，对中国除了新奇便再也不了解什么了。令他最高兴的是在双十节这天专门为他精心安排的一次游行活动，使他以为中国人便是那么充满激情的。

用谢伟思的同事文森特的话说，这位威尔基特使到中国访问唯一具体的成就，就是亲吻了几个中国婴儿。但他回国以后就写成了一本叫《世界一体》的书，在书中胡说什么“中国军队是统一的，其领导人是训练有素的能干将领。其新建的军队是由顽强善战的人组织起来的。他们知道为什么打仗和如何打仗……这是真正的人民战争。”他称蒋夫人的丈夫有学者风度，富有思想，沉着诚挚。这同有经验的驻外外交官报回国内的说法几乎恰恰相反。麻烦在于，国务院内有心思去阅读外交官的报告的人不多，但美国几乎每个人都读了威尔基的《世界一体》。

这样一本胡说八道的书居然在美国很畅销，这就使得在华的外交官心里十分愤怒和着急了。后来谢伟思调到了史迪威的总部去当政治顾问。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收集中共方面的情报，他的兴趣也在这里。史迪威很高兴像谢伟思、戴维斯这样一些有才干的年轻外交官到他手下工作，他喜欢读他们写的那些很有独到见地的报告。

比如谢伟思自桂林报告：

就中国人而言，国民党军方似乎非常乐意继续无限期地同日本人停火，因为他们控制着同敌占区的走私贸易，正在舒舒服服地发财。

约翰·谢伟思从重庆援引《大公报》一名编辑的话说：

为了继续同日本斗争和改善国内的条件，首先必须作出的真正努力，恢复统一战线，同共产党人合作，利用共产党动员群众的方法，再加上改进经济管制。但这是现政府领导人不可能逾越的障碍。

德鲁姆赖特从西安发出的报告，哀叹国民党军队似乎没有能力组织当地老百姓。他说：

中国共产党人却能够组织老百姓，因此他们继续在华北作战……没有迹

象表明，中国人能够或想要对华北的日本人发起反攻。中国的战略完全是防守性的，没有任何打进攻战的概念。在训练、装备、身体条件和医疗卫生方面，中国兵都严重不足，因此从进攻的角度看，是毫无价值的……日本人是第二敌人，共产党是第一敌人……中国的军官，甘愿让美国和英国来打败日本……戴维斯从重庆报告：

国民党和蒋介石认识到，共产党人由于有民众的支持，以及他们的行政改革和廉洁的声望，是对中央政府及其掠夺分赃制度的挑战。蒋委员长不能承认共产党提出的让他们的党合法化和实行民主的要求。这样做，意味着国民党及地方统治者的退让。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不接受中央政府要他们解散军队和加入国民政府的邀请。这样做无异于自招灭亡。

在重庆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观察家一致认为，如果中央政府试图消灭共产党人，这种僵局也许能够解决。可以预料，这种行动将造成一场内战，其结果将是冲突的两派中有一派取得支配地位……

蒋介石和他的副手们，完全认识到进攻共产党人的危险。他们说，他们不仅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内战作准备。而且还必须为同俄国的战争作准备。蒋和他的中央政府认识到，如果没有外援，他们不可能打败共产党人和苏联。这种援助自然要向美国，可能还要向英国谋求。

……我们可以预料，蒋介石会作出一切努力、用尽一切计策把我们拖进去积极支持中央政府。也许会对我们说，如果不给新的援助，那么整个中国，而且最终是整个亚洲将被共产党卷走。对我们来说，将很难拒绝这种呼吁，固为我们对战后继续援助中国，承担着道义上的义务。

因此，如果蒋介石试图消灭共产党，我们就会被拖进不仅是中国的内战，而且是同苏联的冲突，这是不可思议的。……

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谢伟思等人认为共产党在中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而国民党才是个腐朽、僵化的反动政权。他们向美国当局建议，美国应该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设立领事馆，主张派遣军事观察团来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他们还建议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附加条件，利用援华物资促成国民党的民主改革，防止内战的发生。

4. “迪克西使团”

谢伟思等人的报告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高度重视，因为从美国的立场考虑，美国不仅要拉住蒋介石，还要防止中共倒向苏联一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共产党的实力和政治动机就成了一个紧要的问题。另外，罗斯福还有自己的考虑、他并不认为美国当前应该一定全力支持共产党人，但是确实是需要了解共产党，即使是美国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无所作为，这一行动本身也会给蒋介石造成一定的压力，促使他坚定抗日的立场，和美国合作。

1944年1月，罗斯福总统同意了戴维斯提出“应当由总统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的报告，并于次月向蒋介石正式提出了允许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请求。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山姆大叔和共产党改善关系，所以他一方面对罗斯福的要求不置可否，想一直拖延下去，另一方面通过国民党在美国的关系打探美国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来龙去脉。当他得知以戴维斯和谢伟思为首的几个年轻外交官是这件事的积极推动者之后，非常恼火，以至于后来当袒护这几个年轻人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史迪威将军奉召回国，与国民党沆瀣一气

的赫尔利和魏德迈走马上任后，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戴维斯、谢伟思连同后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长包瑞德都被召回国内，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看到蒋介石迟迟不作答复，到了1944年6月，罗斯福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的机会，当面向蒋介石再度提出了这一要求。华莱士还积极主张国共加强合作。他直截了当地对蒋介石说：“罗斯福总统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应该让北方的力量（指中共）充分发挥用途。”

但是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强硬，他告诉副总统，他不能允许任何美国观察员到延安去，除非中共按照他的条件讲和。他说：“请不要施加压力，要知道共产党是打不过日本人的。”

那天晚上约翰·文森特给副总统出了个主意，让他对蒋说，美国不是对共产党感兴趣，而是关心对日战争，美国只是为了对日作战的目的才跟共产党去打交道。

第二天，华莱士用这种方式跟蒋谈，那位委员长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了。

上午会谈以后，华莱士又接到总统罗斯福的电报，再次强调派出美军观察团去延安的必要性。下午的会谈中，华莱士就又一次地要蒋作出保证，同意让观察团去延安。按着“约翰”们的想法，要是连续说两次，蒋就不好反悔了。不然等华莱士一走，那个中国“约翰”很可能会反悔的。（按：谢伟思、戴维斯的名字为“约翰”，而蒋介石的姓亦为“J”开头，故被戏称为“约翰”）。

几天后，华莱士给罗斯福发去了一份电报，主张国共双方建立统一战线。他认为：“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当前中国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或哪一个集团明显有力量接管政府。”

在美国政府的一再要求和压力下，蒋介石最后被迫同意了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考察的要求。于是，美军上校戴维·包瑞德接到命令，带领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从重庆乘机飞往延安。

这个小组不是由驻华使馆领导，而是归属于史迪威的军事司令部。它的首批成员有7名美国军官和1名士兵，再加上谢伟思。

“迪克西”，英文是Dixie，原意是指美国内战时期南方诸州的统称，当是指南方叛军的，有叛逆者的意思。

美国人喜欢给他们的行动计划取代号。在他们看来，中共是蒋介石的叛逆者，而且美国的这次行动意图对蒋的支持也稍有那么点叛逆意味，所以就有意把这次行动的代号叫成“迪克西”。

但是被视为“叛逆者”的中共却对美国人的到来表现出很热情的姿态。

从1942年以后，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希望美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设立联络机构。迪克西使团来了后，才开始有了联络和了解。

但是，在通常的观念上，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还是把它当作一个潜在的敌人，也一直认为中共总是毫无保留地跟它的苏联邻国结成共产党联盟，以对付西方国家。

其实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加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中国不能只限于和一个强国或一群强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只依赖苏联斥责美国是错误的。近几年重庆政府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反感、猜疑和实际上的不友好，这也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希望跟美国保持较多的接触，在这种过程中就可以逐渐消除

以前美国人和美国政府所存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那种偏见和误解。

对于美国观察团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决定，既要热情，又要节俭。共产党人对这些特殊的美国客人是安排照顾得很周到的。不光为他们提供食宿，还准备向他们提供缴获来的、相当新的日本报纸，还有一些日本俘虏。

“来了，来了。”机场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周恩来中断了思绪，抬头望去，只见一个黑点在天际出现，隆隆机声响起来。一架铁灰色美式大型军用运输机由远而近，开始盘旋下降。据包瑞德上校回忆说：

第一批成员是在晴天里起飞的。飞机在陕西省的西安作了短暂逗留，至此，一切都很顺利的。当我们接近延安机场时，我们清楚地看见了卡姆皮恩上尉曾说过的界标即附近小山上的宝塔。可以见到地面上那一大堆人了，他们聚集在一起，显然是来欢迎飞机的。虽然机场缺少导航装置，但这些人群给了我们信号，指明了我们要着陆的地方。

我们都松开了座位上的腰带。我们感到机轮着地了，然后开始在平整的地面上滑动。突然，飞机歪向左边，好像突然有人用木槌狠狠敲了驾驶舱左边一样，我们猛然地停了下来。

一解开腰带，几个靠门最近的人就下了飞机，我们立刻就看清了所发生的事情：飞机缓缓滑行时，左轮陷进了一座旧坟墓之中，地上看不见它的任何标志，这就引起了飞机的晃动和左倾，导致了转动着左螺旋桨与地面相撞。螺旋桨折断了，像一个轮子一样猛转着插进了驾驶舱，在铝壳上钻了一个大洞。我们陷进那个旧坟墓之后出现的大槌敲打似的声音，正是螺旋桨击中飞机左舷的声音。

我跑到飞机前面，发现卡姆皮恩上尉站在破洞旁边，似乎在轻轻发抖，不过他并没有受伤，幸运得很，螺旋桨插入飞机时，他正俯身向前关闭发动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可能就被碎片打死了。实际上，他只是左手受了一点轻微的擦伤。

我们刚刚相当危险地着陆，机场上便出现了一阵混乱，然而很快就平静了。周恩来连忙赶来欢迎我们。他向我们介绍了来到现场的另一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然后我们被请上了一辆卡车，我相信这东西是他们当时唯一的机动运输工具。我们坐车过了河，向我们的住所——著名的延安窑洞驶去。

迪克西使团到了，很幸运，所有的人都活着且没有受伤。周恩来副主席笑容满面地迎上前来，与从飞机座舱里走出来的大难不死的美国人紧紧握手。美军观察组的正式成员包括组长戴维·D·包瑞德上校、美国驻华使馆二秘兼战时司令部政治顾问约翰·S·谢伟思等9人。两周后，观察组的第二批成员共9人也乘飞机来到延安，他们由各兵种军事情报官和政治顾问两部分人组成。按照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指示，美军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有四项：监测整个华北地区气象变化；与中共军队总部取得联系；获得前方作战的情报；为美国空军对日军后方进行轰炸提供帮助。·这些美国客人被安排在延安的窑洞里，地板用灰砖铺成，室内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搪瓷盆架和一个毛巾架，每人一张木床，窗户上贴着白纸。虽然设施非常简陋，但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在欢迎这些美国客人的宴会上，朱总司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副主席也向客人们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他还向客人们赠送了带尖角的军帽和土布做的中山装，这些美国人就兴致勃勃地穿着这身装束去拍了一张照片。

谢伟思在中共领导人中间看到了他的一些四川老熟人，其中就有他父亲的学生陈毅。陈毅曾在成都的基督教青年会念过书，教他的正是谢伟思的父亲。陈毅称谢伟思是“我老师的儿子”，两人高高兴兴地合了影。

在延安，这些美国客人过得很自由自在，他们可以在休息时穿着本地人服装，挎着卡宾枪去山地里捕获飞禽。星期六晚上，他们还可以欣赏那些共产党人在空地里开舞会的热闹场景。他们饶有兴致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在舞场上各具特色的舞姿。

他们还在延安见着了那个著名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是最早和斯诺一起到红军苏区的，他以后就留在那里，成了一名共产主义国际战士。在那些美国军官玩他们喜欢玩的垒球时，马海德偶而也会投入到那种美国方式的体育活动中去。

5. 毛泽东准备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合作

参观和了解情况是美军观察组的主要使命。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交给他们两项任务：搜集敌伪军方面的情报；考察中共军事实力，并对中共军队在战争全局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潜力，盟军援助的价值和方法提出意见。

对于这些美国人来说，延安的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在黄华和陈家康这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的陪同下，观察团在延安及周围地区参观。他们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彭德怀、陈毅、叶剑英、聂荣臻介绍的情况，还听了林彪的演讲，见到了一些日军战俘，还乘车前往南泥湾，观看了著名的 359 旅进行的军事训练和其他部队的战术演习。然后他们还分成小组前往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中，他们历尽艰辛，走遍了根据地的各个角落，甚至深入到距北平、天津一二百公里的地方，掌握了根据地较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对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活动情况也进行了重点调查。

考虑到共产党的军队及其领导人可能也对美国陆军的训练方法感兴趣，包瑞德上校专门抽出时间就这一问题给中国军队的将领们上了课，还有的美国军事人员就经常使用的爆破器材的使用方法做了一次实物演示，八路军的 1000 多名官兵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美国军人的演示，中国共产党人友好而热情地接待着这些异国的客人，他们经常为美国人举行宴会，请他们观看文艺演出和参加舞会，甚至还邀请他们和中国人一起扭秧歌。

对于这次美军观察组来参观访问；周恩来副主席是这样评价的：“现在门已经扫开了一条缝，使通过一条缓慢而又谨慎的路途向有限的合作方向发展成为可能。”

毛泽东主席对美军观察组的来访也表示了积极和重视的态度。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下发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

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做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做是我们在国际统一战线上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第一，对观察组的接待工作，要根据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的政策方针，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在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

则地让步。第二，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他们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

除了向美军观察组介绍情况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还亲自和观察组的成员会谈。

1971年，观察组主要成员之一的谢伟思重新来到了阔别多年的中国，见到了当年那些曾经住在窑洞里的共产党人，就像当年一样受到了热情接待。回国后，谢伟思写了一篇题为《他目光远大》的文章，回忆了自己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对比了新旧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在延安总共停留了4个半月，”谢伟思回忆说：“在各种场合见到他（毛泽东）共50次，每周必有二至三次。”

1944年8月23日，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和谢伟思进行了一场长达8个小时的谈话。

这是毛泽东一生同所有美国政府官员进行过的会谈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次会谈。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跟美国年轻的外交官开诚布公地谈了他对于国内国际上许多问题的看法和立场。毛泽东这样说：

很明显，国民党必须整顿，其政府必须改组。像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能指望进行有效的战争的。要是美国替它打赢这场战争，胜利后也肯定要发生动乱……

共产党接受国民党在1936—1937年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的条件，因为来自日本的外部危险威胁着国家，我们首先是中国人……

蒋介石很顽固。他基本上是个匪徒。要同他打交道，必须了解这一点。我们是从经验中知道这一点的。

对他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能屈服于他的威胁和恫吓。

美国很不善于对付蒋介石。它让他的讹诈得逞——例如谈论抵抗不下去了，只好讲和了，他施展手腕得到了5亿美元的贷款，现在又……要求提供布匹。布匹！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打日本人？难道布匹比子弹还重要……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和美国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合作的设想。

首先是关于进行政治合作。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一方面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促成国民党的改选和国民党政府的重组。毛泽东认为，改选国民党，重新组建国家政府是无可质疑的事，应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邀请各团体代表参加。这些代表中应该“包括共产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新闻界、学生界、自由职业者、合作社中的主要组织、劳动者和其他群众的团体。”

“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各占有二分之一。由于实际存在的政治原因，不得不事先同意确定蒋介石为临时总统。”毛泽东还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作用进行了设想，他说：“在宪法制定之前，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有重新组建政府、制定法律的充分权力。国家政府对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它的职能、权力类似于英国的下院。”毛泽东说：“国家政权的基础必须扩大，应吸收主要人民团体参加。我们并不要求充分的、立即实行的、代表制的民主政体，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所谓民主，只不过是空洞的骗局。”

毛泽东告诉美国客人：“国民党也许下了改革政治的诺言，但言而无信。”所以“美国舆论界批评国民党是件好事。”他希望谢伟思等人回到重庆后向

美国驻华大使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利用它的影响使国民党采纳上述建议？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实行这一建议并给予实际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希望与美国进行政治合作的另一个方面是共同制止内战。毛泽东指出，在目前的状态下，国民党要想取得这场战争的（指内战）胜利是毫无希望的。“即使是由于美国的援助，国民党能赢得战争，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混乱。”他说：“倘若国民党继续维持目前的领导状态，他们挑动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是要求美国奉行力图使国民党实现自身改革的政策，这是第一步，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一步，如果这一步成功了，内战的危险将不复存在。”接着，毛泽东表明了在内战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我们共产党人从过去的经历中知道内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它将是长期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中国对稳定远东局势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一切都会被影响、筵误。不仅中国人民，所有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将受到影响。那样，中国的问题就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问题，这与美国也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反对内战……决不首先发动战争。虽然我们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仍要尽力避免内战。”

在阐述美国可能起到的作用时，毛泽东说：“制止中国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问题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和远东，美国日益增长的巨大实力使它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今天的国民党对美国只能唯命是从。”毛泽东还希望美国对国民党宣传民主政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每一位遇到中国官员的人，都可以谈一谈民主政治。”

这次谈话中还提到了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会主动挑起与美国的冲突。谢伟思不愧是个外交官，并没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圆滑地说：“如果公开承认一个政府，又支持它的反对党，是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显然是不应当的。”毛泽东放声大笑，然后他对谢伟思说：“美国已经干涉那些驻有美国军队、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的内政了。这种干涉也可能是盲目、间接的，然而确是不可否认的。”他看到谢伟思有些狼狈，于是又说：“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了美国的影响。对于美国来说，向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提供援助并不是干涉内政。仅仅援助国民党才是干涉内政，因为这样会使国民党继续与人民为敌。有益于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干涉’并不是干涉，它将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毛泽东还宽宏大量他说：“我们现在并不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援助，这对当前的抗日没有益处。”

在军事合作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军事合作就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在谈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的解放区港口登陆这一敏感问题时说：“国民党为美军扩大在中国的影响而忧虑，他们惧怕美国登陆仅次于惧怕苏联参战。我们认为美军一定要在中国登陆，当然这要取决于日本的军力和战争的进展情况。不过日军的主力是在长江流域、华北和东北。”“如果美军登陆，那么美国将会与中国的两种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我们现在包围了汉口、上海、南京和其它一些大城市。我们是在内线，国民党则继续撤退。”毛泽东还告诉客人：如果美国要和国民党、共产党实行合作，重要的是要允许共产党独立作战。因为国民党十分害怕共产党的存在。根本无法和共产党合作共事，国民党唯一的目的是要搞垮共产党。毛泽东充满信心

他说：“在我们独立活动时，美军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广大的民众，英勇善战，这和国民党是不同的。”

尽管是在抗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可是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首次谈到了中美间经济合作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表明了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的良好愿望。毛泽东说：“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通过中国自由实业家和外资的援助，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中美利益是相互联系的，有共同的地方。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政治上、经济上合作共享。”“美国感到，与国民党比较而言，共产党是更容易合作的……我们对垄断官僚资本主义没有兴趣，它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能使部分人荣华富贵。我们感兴趣的是最高速度发展国家经济的可能性，首先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后是发展国防工业。我们关心的是中国人民的幸福。”毛泽东在谈及中国和苏联的合作前景时说：“苏联当前的战争任务艰巨，战后将忙于重建家园，我们不寄希望于他们的援助。”至于中、美、苏的三边关系如何处理，毛泽东说：“如果苏联要建设国家，实行民主，他们就不会反对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这里不存在冲突的可能。苏联只需要一个友好、民主的中国。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对各方面来讲，都将是有益的。”

长达8个多小时的谈话终于结束了，在告别时，毛泽东披上一件夹衣将客人送到门外，然后握着谢伟思的手说：“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会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美国的援助。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美国的计划、打算的重要性所在，我们不会冒险与美国发生冲突的。”

毛泽东的这个重要讲话直到20多年后的1969年才得以公开发表。此后国际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也证明了毛泽东在陕北那个小窑洞里谈论的这些问题是很有远见和洞察力的。

但是，作为谢伟思的上司的史迪威，以及美国其他的一些对中国问题有决策权的人物却没有能与之相等的理解力和洞察力。他们没能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向他们发出这个友好的信号时，及时地抓住机会，迅速调整以前那种错误和无效有害的决定，致使美国的政策仍然是摇摇摆摆，直到彻底失败。

毛泽东和谢伟思还进行了多次谈话，谢伟思在写给美方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这些谈话的主要内容。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和美国共同合作抗日的想法，希望美国代表能在延安常驻，并积极鼓励美方到延安进行投资。对与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表示“不使关系恶化”，但国民党必须要进行民主改革。这个民主改革包括建立由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认为，美国在约束国民党，使其不发动内战方面显得很重要。但美国唯独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是错误的。

毛泽东表示，他希望知道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十分关心促进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而“并不指望俄国的帮助”，因为那样会造成中国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战后一个进步的中国将成为亚洲的稳定因素，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广阔的经济区。

毛泽东的谈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合作的诚意，他希望美国不仅在中国抗战上尽力，而且在民主建设和国内和平方面显示作用。

6. 在延安的美国人的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军观察组对延安的考察充满惊奇和新鲜感。在陕甘宁边区，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延安民众与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

如一校园，青春活泼。”与重庆比是“另一世界”。他们感到共产党政权获得了当地农民的支持。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减低赋税、鼓励私人投资等“比之国民党地区，高下至明，无待赘言。”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呆得越久，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就越多，也就对以前听说的那些有关中共的宣传和传言越不相信了。他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边区人民那种绝不同于蒋介石统治区的对于战胜日本人的自信心和决一死战的勇气，尤其是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领导人既朴实，又那么有知识，有能力，那么富于个人的魅力。这些美国人都不由自主地对共产党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好感和信任。谢伟思，这个美国驻华的外交官和在华美军总部司令的政治顾问，在延安的3个月中，几乎一天也没停，不断地向他的上司写报告。他写下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种种新奇景象的感触、分析和判断。他在报告中写道：

这里似乎没有蠢笨、软弱或懒惰的人。这种朝气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理性上的……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尤其是在中国，主要是一种理性事业。它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了没有完全受一个或一种信条统治的时期。谢伟思看到共产党人是充满自豪感的，是坚强、坦率、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统一、廉洁、民主的。他写道：

有人会说，共产党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何有一个“事业”。他们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样一些有直接吸引力的行动，唤起底层民众的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找到了当年曾推动太平天国运动或义和团运动的那种热情。事实上，从未听到有人提出过这种论点。连国民党也不屑于提出这种论点。

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是站得住脚的：农民支援、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同他们一道作战，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共产党使农民得到了一些明显的好处，因而，确立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好处应当是改善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

不管这种改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它应当是趋向民主的，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10月9日，谢伟思还向他的上司们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事实证明是很有预见性的论断：

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它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时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凡年年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对于美方的这次来访，中国共产党给予了积极的配合，给美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的成就几乎是尽善尽美的。”在写给上司的报告中，包瑞德上校由衷地说。

1944年11月11日，彼德金等人来到河北阜平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军区副司令员程子华将军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参观了当地的部队、机关学校、医院和制药厂，彼德金还为军区的90多名干部作了一次题为“步兵团武器装备及组织”的讲座。他还亲眼见到了被日军击落的、后来由群众保护并辗转送到抗日根据地的美国飞行员。

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获取了大量事实根据，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从而为美国政府的现实主义对华政策提供了佐证。可以说罗斯福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提出的，指挥包括共产党

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并授权他以“调节盟军在华资力之全权”，就包括了援助延安的可能性。也正是这一点使蒋介石感到犹如“灭顶之灾”降临。他当然知道如果美国这样做的后果，所以蒋介石以“此次之事涉及立国主义，国家主权和个人人格，不能迁就”的态度，坚决要求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

罗斯福在要么蒋介石，要么史迪威的两难选择中，最终还是召回了史迪威，与蒋介石达成了妥协。从罗斯福的考虑，是为了继续支持蒋介石，延续其政权的存在，一方面抗击日本，另一方面有利于扶植一个亲美的政权，在亚洲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罗斯福的考虑是现实的，然而却是不明智的，他终于还是忽视了中国千千万万民众的意愿，帮助一个实际上已经奄奄一息的腐朽政权苟延残喘，最后仍然没能使这个反动政府逃脱覆灭的命运。

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虽然没有能改变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这次行动毕竟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在很大程度上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根据地真实情况，使人们得以了解真相。

第3章 美国特使赫尔利

如果美国放弃我们，我们将万分的遗憾，但是这不损害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

任何时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将怀着感谢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将不附加任何条件。……

1. 罗斯福的私人代表

1944年11月7日，重庆又有飞机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中共非常重视和美国的的关系，所以每次飞机降落时，事必躬亲的周恩来副主席总是和美国人一起在机场迎候，这次自然也不例外，他正微笑着和包瑞德等人交谈。飞机平稳地降落了，从打开的舱门里出现了一位美国军人。只见他高高的个子，灰白的头发，军人风度十足。他穿着一套精工缝制的美军将军制服，上面的勋章多如繁星。

包瑞德一眼就认出了此人，他就是美国陆军少将帕特里克·J·赫尔利——罗斯福总统派往中国的特使。赫尔利的这次来访事先没有向中共或美军观察组通知，可谓是“不速之客”了。赫尔利的军人风度和精制服装显然打动了周恩来。他马上问道，这位贵宾是谁？包瑞德于是告诉了周恩来赫尔利的身份。包瑞德说：“这是赫尔利将军，美国总统派到中国来的特使。”

“请您先在这里陪他，我去请毛主席。”说完，周恩来就匆匆离去。不一会儿功夫，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主席乘坐一辆旧汽车来到了机场，后边还跟着一队战士组成的仪仗队。赫尔利检阅了仪仗队后，向仪仗队的指挥官敬礼致意。然后这位将军挺起胸膛，仿效美国印第安人马斯科洛部落高声呼喊起他们的战争口号。也许他想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敬意，可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尖声吼叫也确实太过难听了些，甚至令人毛骨悚然，以至于在场的一些美国人都皱起了眉头。

当时在延安的会中文的是戴维斯，他就成了赫尔利的当然翻译。

兴高采烈的美国特使告诉戴维斯说，他带来了一份协议草案，并预料共产党人会在这上面签字，然后他把这份协议带回重庆去，也能让国民党在这上面签字。

不知深浅的戴维斯冒昧地谈到，共产党可能不会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打交道。这话使正处于兴奋状态的赫尔利很不高兴，当场就让戴维斯离开延安去重庆。

但是约翰·戴维斯这天没能离去。这使得他还有时机把自己的主要想法对美国特使直言相告，他觉得这是他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美国外交官必须做的事。

戴维斯给这位总统特使留下了一份备忘录。上面写道：

美国是中共最大的希望所在。他们意识到，他们要是得到美国的援助，哪怕是与蒋介石平分秋色也罢，他们也很快就能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控制中国的大部，乃至全部。因为，蒋介石的军人和官僚们大多是些机会主义者。要是共产党显得比国民党强大，他们就会抛弃委员长。

共产党最担心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向蒋介石提供的单方面援助越多，他加紧发动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大，共产党要统一中国所花的时间就越长，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因此共产党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我们。要是我们继续不理睬他们，支持蒋介石，他们就会逐渐地将我们视为敌人。但是，他们还是愿

同我们做朋友的。这不光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而且他们意识到，我们使中国实现强大、独立和民主的战略目标，是能够同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一致起来的……

只要蒋介石能够争取到外国像支持他抵抗日本入侵中国那样规模的干预，他就能粉碎共产党。但是，外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干预，看来是不可能的。委员长靠那支士气不振、无精打采的军队，那腐朽的官僚体制，那毫无用处的政治道德观，以及他得到外国小心翼翼的支持，有可能把中国推向内战的深渊。

然而，在日本人下决心进行了7年多的努力都没有免遭失败的地方，他是不会成功的。共产党已经强大到对付不了的地步了。内战的结局也许是双方都拼个精疲力竭，陷入僵局。中国将至少分为两个阵营，蒋介石降到一个地方军阀的地位。共产党在内战中，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控制全中国的可能性，是不能忽视的……要是委员长既不发动内战，又不同共产党达成谅解，那他面临的仍然是失败。蒋介石的封建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充满生气的现代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不知道赫尔利是否认真地看过戴维斯留给他的这一份很有见地的备忘录。估计他是不会看，或者即使看过也不会看得很仔细很认真的。

赫尔利是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人，律师出身，仪表堂堂，善于交际，爱说大话是出了名的。1928年他全力支持胡佛竞选，后在胡佛政府中担任过陆军部长助理、陆军部长。罗斯福执政后，他是罗斯福新政的积极支持者。

他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是在1931年，因为对中国情况一无所知，闹了个大笑话，把蒋介石夫人写成了“石夫人”。

1944年8月，蒋介石提出了一个看似很合理的要求，让罗斯福派一个“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权代表”来华，与他合作，同时调整他和史迪威之间无法弥合的关系。

蒋的想法通过他的内舅、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跟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说得十分明白了。蒋希望罗斯福派来的人，是有权向史迪威发号施令的。蒋介石的这着棋明摆着要利用罗斯福的特使来左右不肯买他账的史迪威。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电令国民党政府驻美代表孔祥熙，去向罗斯福总统解释中国军队不同于美国军队的特点。要孔对美国总统说，在中国军队里，学问和能力是次要的，关系和派系是更重要的；这支军队只能由他个人控制才行，别人来指挥，任凭你天大的本领也是统帅不了的。

罗斯福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派出一个总统特使去了中国。

他派了他认为可以担当此任的赫尔利将军去中国。临行时罗斯福嘱咐道，去中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国的崩溃，并促使中国军队继续参战。具体的事情便是让赫尔利协调好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以便于后者指挥归其指挥的中国军队”。

但就是这好出风头的赫尔利，把中国的事情搞得一团糟。赫尔利属于那种不时出现的、有趣的怪人之列。他是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他在重庆时很不幸，因为，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他却口若悬河，又使别人很难开导他。蒋介石对此却不以为意。委员长宁愿要这样的美国人，而不要那种能讲能看中文、又在中国人中间生活过很多时间的美国人。

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人员把赫尔利看作疯子。他提出的一项计划，被

当作“滑天下之大稽的歇斯底里之作”而束之高阁。赫尔利则感到，国务院受到宣扬三种异端邪说哲学的人控制。这三种哲学就是：拥护帝国主义、拥护共产主义和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在重庆以说大话著称的赫尔利终于在延安也出了名。毛泽东和朱德称他是“小丑”。恰成对照的是，蒋介石对罗斯福说，他把赫尔利看作是一个“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

究竟罗斯福为什么这样宽容赫尔利，人们很难揣度。尽管罗斯福轻蔑地称赫尔利是“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但却派遣他去执行一个又一个大出风头的使命。

快到1944年年底时，罗斯福决定，要为这个说大话的人赫尔利再找一件事做。要知道，即使是他没有完成交给他的任务，罗斯福在国内政治中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失。赫尔利是个彻头彻尾的共和党人。史汀生和马歇尔建议派他去中国。“说大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要求任命他为大使，但却遭到了婉言拒绝。

2. 蒋介石似乎准备与美国人决裂

1944年8月18日，罗斯福指示赫尔利：“从现在起，你被任命为我派到蒋介石委员长那里去的私人代表，你要直接向我汇报。你的主要使命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9月6日，赫尔利到了重庆。陪同他的有奉罗斯福之命前去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纳尔逊。在9月7日赫尔利同蒋介石第一次会晤时，委员长告诉他，史迪威还是可以指挥中国一切军队的，这使赫尔利感到很高兴。但是，当蒋介石看到史迪威提出的改组方案时，他又很快地缩回去，不照他的这一承诺去做了。9月19日，又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信息传到了重庆，这是从加拿大的魁北克传来的，当时罗斯福和马歇尔正在那里同邱吉尔会谈。“鉴于罗斯福公开表示愿同共产党和解，鉴于在不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其他地区内出现的不同政见活动”，罗斯福已经发现“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这封加拿大来信，本应由在重庆的史迪威面交蒋介石。信中，罗斯福尖锐地批评了蒋介石，对他说：“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作出的努力，否则就会招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信中还要求给史迪威以“不受限制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以避免那种灾难的发生。这封信一到重庆，赫尔利就看到了，他反对递交这封信。他清楚地意识到，首先，这个“不受限制”就会使蒋介石勃然大怒。要知道，那样一来，他的“委员长”头衔就成问题了。

但是，史迪威一直同蒋介石有矛盾。史迪威看到此信后，高兴极了。他正想找个机会好好地刺刺那位委员长呢，就令立即把此信译成中文。他亲手当着蒋介石的亲密助手们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及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们的面，把这封信交给了蒋介石。

史迪威看到蒋介石读完此信后面色极难看，不由得很开心，当晚就在日记里写下了一首诗，把蒋介石那副恼羞成怒的神态，和自己的高兴情绪抒发一通。这位有勇无谋的将军却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封信，使他失去了再呆在中国指挥作战的权力，并且迅速地被调回美国，从此未能再有出头之日。

蒋介石首先是被这封从未有过的措词强烈、类似于最后通牒的信激怒了。而后他就认定这是史迪威去告状，并且这封信也肯定是这个可恶的美国

佬起草的。他在当天与赫尔利共进晚餐时向美国特使表示，与史迪威决裂的时刻已经到了。只要史迪威还留在中国，他就难以再跟美国合作下去。

蒋介石把一肚子怨气都发泄在史迪威身上，声称：“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同我合作，而且他还自以为是受命来指挥我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暴怒中的蒋介石甚至认定，史迪威派“迪克西使团”去延安，目的“是伙同共产党来推翻中国政府的”。

蒋介石由此而下了决心，通过赫尔利，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及美国军方正式提出要求，把史迪威召回，另派他人担任中美联军前敌司令。

赫尔利不改本意，即给罗斯福起草了一份复电文，并说：“威信、政治上的考虑和个性，所有这一切与中国日益恶化的局势相比，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我最强烈地敦促您立即重新考虑您在这一问题上的决定。”

赫尔利让罗斯福签发这份电文。

这样，罗斯福就面临着抉择了。要么改变他本人的决定，吞下美国的傲气，向蒋介石让步，召回史迪威；要么继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促使蒋收回成命。

从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有了两个目标：短期的军事目标是使中国继续作战，长远的政治目标是在战后谋求一个统一、稳定、亲美的中国，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亲密的盟国，以对付这一地区的其他大国，尤其是苏联。

在目前战争情况下，蒋介石的军队还是有一些军事作用的，少了他不行。再说，罗斯福本人对于蒋介石个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要不他也不会把蒋介石拉到大国的位置上去。罗斯福认为，蒋介石不仅是战时中国的领袖，而且也将是战后中国的唯一领袖。

在过去的一些年中，罗斯福已经跟蒋建立起了一种个人的亲密关系。美国已经为支持蒋介石作出了许多努力，蒋介石对此也一再地向罗斯福表示过谢意，并多次保证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与美国站在一起，并且对于战后美国的在华利益也必然会放在一个特别优先的位置上。

在这种僵局面前，罗斯福不得不向蒋作出让步。他作出这种让步先是通过非正式的途径传出去的。罗斯福让他的亲信顾问霍普金斯在与孔祥熙用餐时告诉他，总统表示，愿意接受蒋的要求，但是只同意解除史迪威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但还保留在北缅战场的指挥权力，让他继续指挥在北缅的中国军队。

蒋介石此时已经摸着罗斯福的心理，美国现在不敢把他怎么样的，对史迪威非得一除到底，把他打发回家去不可。他对这种退半步的做法坚决不答应。而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的赫尔利居然也帮着蒋说了许多史迪威的坏话。两人一起把豫湘桂作战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了史迪威身上，说是他指挥失当造成的。

10月10日，蒋介石正式答复罗斯福，坚决要求召回史迪威。

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的赫尔利还在这则蒋介石给罗斯福的回电中加了一段按语。他说：

我在这里研究形势后确信，没有一个中国领袖能像蒋介石那样提供如此之好的与您合作的基础，在我所知的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蒋介石那么多的担任领导职务的素质。

……蒋介石和史迪威是水火不相容的。如今您面临着蒋与史迪威之间

的抉择问题。您与蒋介石之间没有任何别的争端，蒋介石同意您提出的除了任命史迪威以外的任何要求、任何建议。

如果您在这场争论中支持史迪威，那您就会失去蒋介石，而且可能同他一起失去中国。

赫尔利的话显然是说中了罗斯福所一直担心的问题。所以他的回电很快就来了，要赫尔利提出接替史迪威的人选。

10月1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宣布召回史迪威，由魏德迈接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官职务，由索尔拿任驻缅印美军司令。

10月21日，被撤去职务的史迪威离开了重庆，在他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作了短暂停留后，于10月28日飞回美国。

一个美国四星将军被从一个盟国逐走，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

3. 自信得几乎愚蠢

桀骜不驯的史迪威走了，来的是圆通的、与蒋介石合作得很好的魏德迈。至于赫尔利，则已经在驱逐史迪威的事件中，跟蒋介石结成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盟友。在那位被赫尔利撇在一边、而后自动辞职的驻华大使高斯飞回美国以后，在蒋介石的要求下，赫尔利接任美国驻华大使。

1944年11月7日，即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美国总统。同一天，赫尔利将军乘坐信使班机到了延安。他的这次行动事先没有通知延安方面的任何人。

只是在此之前他曾对罗斯福提起过一句，说他要去看一趟延安。罗斯福以为这位好说大话的“将军大使”、也许是要他觉得，对方是在扮演一个真正的无畏将军的角色呢。

促使他心血来潮去延安的是谢伟思的报告，和他们的一次一个小时的谈话。

在10月底这个深秋时节里，重庆的美国人都有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因为有太多的调动，史迪威将军走了，听说驻华大使高斯的日子也不会久了。在延安呆了三个多月的谢伟思被调回重庆，马上就要让他回华盛顿去作汇报……

在谢伟思去美国之前，那位即将接替高斯充任大使的赫尔利把谢伟思叫去谈话。因为他读了谢伟思写的那份“双十节报告”。

在那份报告中谢伟思提到了美国总统特使会亲自到延安去谋求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和解，他当时有点惶惶不安、以为自己可能要被这位喜怒无常的总统特使臭骂一顿。

但是，他并没有挨骂，而是在那一个小时的谈话中，当了足足57分钟的听众，听激动不已的总统特使对国共两党的看法，还有他本人对于去做一个调解人的十分自信的独白。

赫尔利曾经描绘过共产党的正式邀请，那时他傲慢地说，他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是不能去共产党的地盘。可是这时候，他感到，蒋介石的势力和毛泽东的力量，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合在一起去打日本军队。

他朝着谢伟思大声地叫嚷着：“见鬼，谢伟思，我一定要让共产党也得到一些武器！”

谢伟思当时还想，这可太好了，他早就这么想了，一切需要武器扫击敌人的军队都应该得到武器。这次谈话；谢伟思对于赫尔利的印象并不好。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听说了有关史迪威被免职的一些内部流言。但此时他对

赫尔利愿意去延安直接跟共产党谈，充作调解人，还是有些高兴的。这至少比原先那些高级官员不敢或不想去冒这个险要好些。

赫尔利将军和他的秘书——一个名叫史密斯的美国陆军中士，都被安置在窑洞里。这种住所及其不全的卫生设施，均与迪克西使团使用的一样，不过他倒没有吭声。

赫尔利过于自信，甚至可以说是个自大狂。他以为此番来延安十拿九稳是会成功的。他在坐上飞去延安的信使飞机之前，就用一种难以抑制的得意心情给远在地球那一边的罗斯福拍去电报，说：“今天我要进入共产党控制区了！”

赫尔利这次来华的任务有两个，除了解决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还有协调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她在来华之前曾去过苏联。因为他对于中国情况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不清楚，所以就向苏联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试探口气。

莫洛托夫对他说：“中国有些人自称为共产主义，但他们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这只是对他们的经济状况不满的表达方式。当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时，他们就会忘却这种政治倾向。”

从苏联人那里听出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不友好，苏联当时的态度是积极地跟国民党政府拉关系，希望改善关系。莫洛托夫还表示支持美国帮助中国实现联合的努力。

赫尔利并不懂得苏联人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他因为对于共产党人并不是很了解，就相信了苏联外交上的这样一种说法。后来他跟罗斯福说此事时，还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比作了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关系。

他以为，“中共与俄克拉荷马州（赫尔利故乡）共和党的唯一区别是后者没有武装。”

他对于这次调处中国的国共两党关系表现出很大的兴致和热情，从来华的最初就开始着手干了。先是和宋子文、何应钦和蒋介石本人一起搞了个 10 条建议，而后跟在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进行了 3 次会谈。

赫尔利表示他是受罗斯福总统所托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的，希望中国团结。中共代表也向他谈了中共方面的态度和主张，那时就提出请他访问延安。

就在 10 月 28 日，史迪威将军离开中国的那天，已经在调解史迪威问题上帮了蒋介石大忙的赫尔利得意洋洋地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杰作。他向蒋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

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解放中国；

二、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采取各种政策，将促进政府民主程度的进步和发展；

四、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将给予合法政党地位；

五、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支军队，中共军队与政府军队官兵将依其阶阶享受同等待遇，各部队在军火和给养的分配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这个协议草案内容大都是原先搞的 10 条中的一些东西，但是蒋介石对此也还是不满意。因为他觉得这个方案中实际上承认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平等地

位，于是就授意张治中、王世杰修改。

最后把第二条改动为“中共军队服从和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即蒋介石常说的“政令军令统一”。别的一些方面也改动了，把蒋介石想通过谈判，吞吃掉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用心表达得更明白了。

4. 毛泽东和赫尔利的会谈

赫尔利就是带着这么一个方案到延安去的。他真是想得大天真了，以为中国共产党会高兴地接受这样一个完全代表蒋介石意志的方案。

结果当然是一开始他就碰了鼻子。中共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44年，中国》一书第666页开始，收录了赫尔利将军与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共产党领袖在延安会谈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的来源显然出自赫尔利将军的秘书史密斯中士的手笔。在与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领袖于1944年11月8日上午首次会谈时，赫尔利的开场白似乎倾向于对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人均持中立态度。他着重指出，美国无意于干涉中国的内政，而只是打算做那些可能有助于最后打败日本人的事情。他进一步指出，他本人深信，委员长和毛主席都是渴望实现祖国统一与和平的真诚的中国爱国志士。然后，赫尔利将军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一份文件。他说，这份文件表明了委员长打算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的各项条款。

这份前文提到的协议中某些语言虽然带有明显的美国腔，特别是关于“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及“旨在促进政府民主进程进步和发展的各项政策”等部分。

这些不同寻常的措词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光，因为条款一经读毕他便马上询问，这五条代表了何人的思想。赫尔利将军答道，这些观点是他自己的思想，“不过是我们大家制订出来的”。除开他本人以外，也许还指委员长及其顾问。这位将军继续说，我觉得，这些条款似乎是公正的；它们并不是作为一种“可取亦可弃”的建议，而是为了开诚布公地与毛主席和其他共产党领袖讨论而提出来的。依据史密斯中士的会议报告，毛泽东是想知道委员长本人是否同意所有被提出的观点。赫尔利说，委员长已经同意了。

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

赫尔利将军和共产党领袖之间的第二次会议在同一天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主要由赫尔利将军说明他的观点。他表达了美国政府把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的愿望。这样做是为了全面抗日，而不是因为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愿望所致。第二次会谈中，议程开始不久就沿着与上午不同的路线进展了。因为第一次会谈时赫尔利将军已经扮演了主要角色，第二次会谈时毛主席便占据了主导地位。

说了几句彬彬有礼的挖苦话以后，毛主席便着手抨击蒋介石委员长及国民党政策。在诸多指控中，毛泽东尖锐而坦率地指出，事实上国民党正在反对中国人民的联合，因为它顽固地拒绝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他宣称，中国必须有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为此而改组政府是必要的。毛泽东强调，推迟这一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以后，这就是委员长的决心所在。如果这竟然发生的话，将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崩溃。

毛泽东坦率地宣称，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因为它的195万军队有77.9万被用于监视共产党，而余下的则在近来与敌人的所有战斗中落荒而逃。另一方面，他指出共产党人已经将其所有的力量都投入了对日作

战，从而拖住了侵华日军的大部。

至于共产党部队应该得到与国民政府部队相同的薪水和津贴这一建议，毛泽东宣称，国民党部队一名列兵的薪水仅仅够买一盒中国香烟，而共产党的士兵吃得好，穿得暖，身体健康。蒋介石的士兵饥寒交迫，许多人体弱多病，以至于不可能作短途行军。

赫尔利将军对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责难作出了迅速的反映。他说，国民政府的军队最近在缅甸北部及怒江一带取得了几次重大胜利。为了在这几仗中取胜，他们不得不从华中战区抽调兵力和军用物资，而这使他们在该战区遭到了日本人的攻击。赫尔利接着说，他觉得毛泽东主席关于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言论，听上去似乎是中国之敌的声音，或者说似乎是希望见到中国自我分裂的局面继续下去的声音。

赫尔利将军对于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攻击的回答，显然使毛泽东怔了一下。但他仅仅犹豫了片刻便有力地反驳道：“将军，我刚才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说法，罗斯福总统、邱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早就说过了，难道您认为他们都是中国的敌人？”

毛泽东在会谈时强调说：中国需要团结，但是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打得很不像话。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否则，就无法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

对于方案中的第四条，毛泽东用讥讽的语气说：“这一条恐怕是蒋介石自己写的吧？”接着又尖锐地指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比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

赫尔利觉得就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指责合理与否继续争辩毫无益处。可能因为认识到这位共产党领袖答辩有力，赫尔利采取了新的方针。他宣称自己误解了毛主席言论的主旨，进而就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内部确实存在着某些贪污腐化的事实。

赫尔利明确承认，毛泽东是真诚希望争取中国内部和平及继续有效打击日本的。这在相当程度上使会谈的气氛显得融洽了。赫尔利将军接着说，蒋介石打算在全国军事委员会这个中国全部武装部队的指挥机构里给中共一个席位，以证明他希望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反应冷淡，他明确指出此举毫无意义。赫尔利将军再三强调，这样至少能够让共产党人的一条腿迈进大门之内。毛泽东却反驳道，如果一个人双手被缚，即使他的一条腿迈进了大门也无济于事。赫尔利又申明，共产党人若在全国军事委员会里有一个席位，便能全面参与一切重大的军事计划和作战行动。毛泽东对这一观点依然付之一笑。他强调说，军事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不仅被封锁了关于该委员会活动的一切消息，而且连这一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也有许久未曾召开了。

于是，赫尔利采取了另一个行动。他说：“主席，如果您认为委员长邀请您参加联合政府的各项条款不够公平，那么您依哪些合适的条件才乐意参加呢？”

毛泽东就此回答说，他希望有点考虑的时间，他还需要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商量他说这次会议召开不久他就说明过，在停止任何分裂抗日根据地力量

的行动并坚持民主原则的前提下，中同共产党就乐意与国民党就种种分歧举行谈判。此刻他提出在第二天下午召开下一次会议，届时他将提出自己关于协议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经过研究后，提出了一个五点方案。赫尔利看了看，问道：“你们这个方案是否还与蒋介石合作，是否还让蒋介石当政府主席？”

毛泽东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

赫尔利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太少了，他想共产党要求的只是结束一党专制的落后制度，以后共产党在政府中享有民主权利，这样不仅不会损失国民党的利益，而且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加强国民党，蒋介石也不会不同意的。

这位美国总统特使以为用他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办法解决国共矛盾是最能体现美国所持原则的，便觉得接受共产党的五点方案是行得通的。

中共提出的五点方案是这样的：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达成协议后，毛泽东托赫尔利带给罗斯福总统一封信，其中说。

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和同情。

不用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于能达成这项协定是十分高兴的。赫尔利特别开心。因为他相信星期五是他的吉日。他的生日是星期五，他结婚是星期五，第一个孩子生于星期五，获第一枚勋章也在星期五！

所以他在这个吉利的星期五就决定马上坐飞机赶回重庆去。这样也就算他这回又大获全胜而归。

11月10日上午剩下的会议时间大都花在联欢上了。每个与会者都兴高采烈。听上去刺耳的，只有迪克西使团的包瑞德上校说的一句话——现在要完成的，就是劝导蒋委员长接受这些条款了。

联欢花了很长的时间，以致于到准备动身赴机场时才结束，连午饭也来不及吃了。当赫尔利一行人离开会议室，站在屋外美丽而明亮的秋日阳光下，赫尔利将军最后提了一个建议。他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我在这些条款上

签字吧。我认为这是适宜的，它表明我们经过考虑认可了这些条款的合理性。”条款的文本放在一块高度适中的石板上，他们签字了。在场的包瑞德上校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不是盖的图章，而是像美国人签署支票一样在两份文本上签了名。文本仔细地留了一块空白，下面用打字机打下了蒋介石在此签名的字样，以便让委员长表示自己对这些条款的赞同——如果他有此愿望的话。

当他和毛泽东准备签字时，他又说：“毛主席，您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此刻周恩来插话了。大意是，这些条款首先必须径直交给委员长，而不能让宋子文或任何别的国府官员先着它们，周恩来的话是一个聪明的警告。

毛主席拒绝了赫尔利要他乘飞机去重庆和委员长讨论条款的建议。但周恩来和他的秘书陈家廉将与赫尔利、包瑞德同机飞往重庆。

在飞机上，周恩来和姜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挨着坐。在他们愉快的交谈过程中，包瑞德上校向他提了一个含蓄的问题。包瑞德说：“将军（虽然他根本没有军衔，但美国人习惯于这样称他），您认为苏联和美国谁更民主呢？”

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政府的谈判中急于求得美国的支持，看来周恩来不可能冒险和得罪一个美国官员。虽然官阶不高，但对于未来军援的联系来说，这个官员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然而另一方面，人人都知道共产党人当时是极其崇拜苏联的。周恩来稍加思索之后回答：“包上校，我们认为苏联在世界上是最民主的。”包瑞德上校认为他的回答很诚实，并尊敬他的毫不含糊的回答。不过他又接着补充道：“但是上校，”他继续说：“我们知道，也许还要过一百年我们才能获得这样的民主。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享受你们在美国所享受的民主，我们也将十分高兴”。

得意洋洋回到重庆的赫尔利，才下飞机不久，就被蒋介石泼了一瓢凉水。

5. 赫尔利见风使舵

陪同赫尔利回到重庆的周恩来曾给他打了一下预防针，要他回去后不要把此五点方案给宋子文看，而要直接给蒋介石看，直接对蒋做工作。。

但是不知有意或是无意赫尔利却还是把它交给了宋子文。

结果，所有的国民党首脑们都向他开火，认为他带回来的共产党五点方案绝对不能接受。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恼怒地对赫尔利说：

“共产党把一张货单卖给你了，国民政府决不会同意共产党的要求的！”

蒋介石则说，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等于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了。

赫尔利可没想到会招致如此尖刻的指责，他摇晃着脑袋说：蒋的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又说如果认为“联合政府”这个叫法不好，那就另外再换一个叫法好了，就叫“两党政府、多党政府或党派政府”都可以。

赫尔利劝蒋介石气度大一点，让共产党“插进一只脚趾”算了。

蒋介石气呼呼地说：“插进一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的！”

被众多的国民党首脑围攻着，赫年利觉得好不沮丧。他很想发一通美国老爷的脾气，可是还是忍住了。在这时候他得想一想该怎么办了。

在把握时机与看风使舵方面，赫尔利是有过许多年的丰富经验的。他的律师出身和专门搞竞选等活动，已经在成败得失的转折关头该如何办、如何改变战略和方式方面积下了许多经验。

在这种时候，他这样的政客人物，就跟史迪威那样的军人风格完全不同了。赫尔利在此时等于是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向蒋介石继续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让步；或是向蒋介石让步，把自己的面子削下一点。

能屈能伸的赫尔利选择了后者。

对于赫尔利说来，目前他要办好的是如何把蒋介石哄住，让这个中国军队的委员长能把中国军队拉出去打日本人。这是罗斯福要他做的，也是他一心想做好的。史迪威因为跟蒋介石闹别扭，想压着蒋介石跟日本人打仗，结果蒋介石没被压服，自己先被逐回去了。那才是几天前的事。

毫无疑问，现在罗斯福的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把对日本人的这一仗打下去。为了这一点，堂堂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竟也会自吞苦果，断送一个美国高级军官的前程，损一回美国军队的骄傲，那么，如果他赫尔利再对蒋介石发脾气，难保罗斯福不会把他这个总统特使也“就地正法”了。

据华盛顿那边的可靠消息，他已经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这可是他非常想得到的位子。而眼下他必须办好的是一件首先必须让蒋介石能够满意的事，所以他在劝说了几句后，眼见着无法挽回了，便放弃原先跟中共领导人谈妥签定的五点方案，回过头来劝说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方案。

11月19日，王世杰奉命向赫尔利提出三点反建议，其主要内容是：

一、中共军队整编为正规国军，军饷补给与其他部队同等待遇，国民政府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府；

二、中共对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人民自由。

这个方案闭口不提联合政府，一味强调中共服从国民政府，交出军队，表明蒋介石根本无意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而只要这种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任何保障人民自由的许诺便都是欺人之谈。

11月21日，赫尔利把这个三点方案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一看，这个方案明摆着是要中国共产党缴枪投降，受“招安”嘛。他当时就表示对这样的反方案中共是无法接受的。

周恩来气愤地说：“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有实权，而且从来不开会。蒋介石一切以命令行事，中共不能参加决策，这参加与不参加又有什么区别？”

周恩来反问赫尔利，联合政府的提出是赫尔利自己赞成的，为什么在这个方案中一个字也看不到？赫尔利无言以对。周恩来又问：“是不是仍然同意我们为实现中国团结必须以组织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

赫尔利在此时也不得不表示，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适当的，也是体现了民主原则的。“但我不便使用同意的字眼，因为我不是谈判的当事人。我只是见证人。”

此时的赫尔利真是尴尬极了。因为他明知道自己是在强词夺理，但是又不得不这么坚持说下去。他已经背弃了他自己同意并签了名的协定，可是现在又要把那些说出的话、做下的事全推翻不认帐，这也真是难为他了。

无理之中，他想着还有一条物质上的诱惑，便拼命劝周恩来把这份协定签下来，说只要签下了协定，国共达成了和解，那么美国准备着的成百架飞

机的物资就等着运送到中共这边了。

在这时候，赫尔利使用了他在帮着竞选总统时拉选票的嘴皮子，喋喋不休地向周恩来一再地劝说，“参加政府也只是一个空名嘛，也不一定会有多少实权，倒不如现在从美国手里得一些实惠。事情也只能一步一步地干，咬东西也不能一口咬掉，要一口一口才能咬掉。现在有机会，就先赶紧参加政府，以后再一点点地把权力抓过来。”

又说：“看我们美国不也这样吗？事在人为，比如我们议会的议员，有的能控制国会，有的不过是坐食而已。”

说得兴致上来了，他又想出了一个高招，“依我看最好设一个来自同盟国的统帅。你们不愿受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也不肯听你们的指挥，那就让盟军的统帅来统一指挥。我就愿意来充任这样的一个盟军统帅。怎么样？”

在以后几次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赫尔利仍然一厢情愿地劝说中共接受这个二点方案。他用一种拍拍棒棒的方法，想让周恩来同意他的建议。他说：“国民党已经僵化了，失去了弹性，你们进来，就可以大有作为了。你们是在同我，同我们美国合作。只要我们能很好合作下去就可以逐步改组政府……”

而后，赫尔利又拉新任的美军驻华司令官魏德迈未约见周恩来，对周又是那一套物质上的诱惑。他们一再地许诺，只要中共答应参加国民党政府，他们马上就可以把大量的美国军事援助，包括弹药、武器、医药用品，甚至粮食都供给中共。美国还能派出美国军官来帮助训练中共军队，还可以协同作战。

说来说去，赫尔利要共产党答应下来的就是一条：参加政府，取得国民党政府的承认。

但是周恩来仍然不肯改口。他坚决回答道：“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现在让我们参加政府，却不能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良心上也过不去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作出了一点改良的姿态，把他的政府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任命陈诚接替了何应钦为军政部长，俞鸿钧接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朱家骅接替陈立夫为教育部长，王世杰接替梁寒操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

蒋介石作出这种改良的姿态是给美国人看的。因为这新上去的几个人都是美国比较欣赏的。如陈诚就被认为是军队中积极推行改革的，另外王世杰在与中共谈判中；也被认为是思想比较开放的，他当宣传部长可能会对新闻检查放松一点。

但是蒋介石玩的这种小花样，也只能哄哄美国人。对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早已领教过了。在过去二十几年的对立抗争中。蒋介石玩这种花样还不够多吗？

6. “我们将不再让步！”

1944年12月8日，周恩来和美国观察小组组长包瑞德同机返回延安。毛泽东随即与包瑞德进行了一次言词激烈的交谈。

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的赫尔利的表现实在是太拙劣了。他在这期间自食其言，翻云覆雨，一张舌头两边翻，使得原来对此事抱有很大信心的中共领导人非常失望、对赫尔利本人已经不相信了，对于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偏护和怂恿，则表示非常难以理解和接受。

毛泽东在这次与包瑞德的会见中大发雷霆。包瑞德多年以后回想起此事；都还感到记忆犹新地说：和两位共产党领袖的会谈，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经历。我一离开毛主席的房子，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这一切的时候，就把刚才会谈的内容仔细地记录下来。我把我的报告呈交给魏德迈将军，因为我在他的领导之下而没有权力和赫尔利大使直接通信。

这份报告全部收在《美国外交关系，1944年，中国》第227页。全文如下：

延安 1944年12月10日

题目：同毛泽东主席的会谈

1. 1944年12月8日，我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会谈开始时，我首先发言。我说，我已得知周恩来将军不打算返回重庆。毛主席回答说，周将军在那里无事可做。然后，我们就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进行了充分而坦率的讨论。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谈话的要点概述如下：

由委员长向我们提出的三点建议的首要之点是，共产党的军队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改编。这就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委员长的控制之下，其结果将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那时，我们将任凭其摆布。

与这种相当于完全投降的交换条件相应的是，总共才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名额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当年的重要将领冯玉祥、李济深二位将军也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们对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毫无影响。事实上，整个全国军事委员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会了。

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这个席位，那么我们将得到所有的军事报告，从而我们将知道政府的行动，并且我们将处在影响政府决策的地位上。我们难于接受赫尔利将军的意见。我们明确地告诉他，虽然有一位共产党人参与全国军事委员会，但是他对该会工作的了解绝不会比局外人多，而且他在该会也不会比局外人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们是清楚我们说的那种情况的。

赫尔利将军还说，接受了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席位，将使我们的‘一只脚踏进大门’，并以此作为能够扩大我们地位重要性的起点，从而逐渐使我们的影响增加到这样一个程度，即最后我们将控制政府。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错误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使赫尔利将军确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所能说的一切乃是，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踏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赫尔利将军、魏德迈将军以及麦克卢尔将军曾对周恩来将军说，美国愿意和我们进行军事合作，但是在给予这一我们非常乐于接受的合作之前，我们必须接受委员长的条件。然而，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却完全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我们安全的保证。我们感到，我们不能适当地向美国要求任何这种保证。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相信美国能够对我们的安全提供保证，即使他或许真诚地愿意这样做。我们也不能相信委员长的良好诚意。凡是不带偏见地研究过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关系史的人，都能通情达理地想到我们不会寄任何希望于他。

我们发现，美国的态度有些让人迷惑不解。赫尔利将军来延安，问及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我们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的基本点是建立联合

政府。赫尔利将军也同意这些显然是公平的条件，而且事实上，五点建议的大部分内容，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提出来的。委员长已经拒绝了这些建议。现在美国又来认真地要求我们接受需要牺牲我们自己的反建议，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们被告之，要我们牺牲自己以拯救局势是高尚的事情。我们看不出，把我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境地，能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

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们同委员长达成协议，他就能给我们武器，并能派出美军军官训练我们，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衷心地欢迎这种帮助，但是不能指望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即我们在接受这种帮助时，要由委员长批准。我们认为，美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事实，即如果我们屈从于委员长所能强加给我们的种种限制，如果放弃我们仅有的自卫手段（这种自卫手段就是我们的军队），那么，我们不会，或根本不会有舒适合作的手段了。毫无疑问，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愿意参加政府。而事实上，向我们提出的条件却使我们没有机会参加政府。我们再重复一遍，如果双手被反绑着，那一只脚跨进大门也是没有意义的。

要求我们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而对目前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委员长却可以不作出什么牺牲，这时我们是大不公平了。承认我们党的合法性没有牺牲可言。我们不认为，给我们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是一种牺牲。

也许魏德迈将军真诚地渴望帮助我们，但如果我们接受了委员长的条件，他就不能帮肋我们了。我们希望在抗日战争中同美国合作，在当前的危机形势下，我们也希望有所帮助，这全部的事情却被委员长阻碍了。我们已经提出了一项解决问题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我们得到美国的帮助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忤逆的建议却被委员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并且他还企图把责任推在我们身上。

美国认为，蒋介石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他的执政地位。我们不反对这一政策，只要他同日本作战，我们就完全愿意委员长继续执政，然而，我们并不准备放弃在全国军事委员会取得一个席位这一自我维护的权力。

如果鉴于蒋介石的历史，美国希望继续支撑这一腐朽架子——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然而，我们相信，尽管美国能够做他所要做的一切，但蒋介石注定要失败。难道魏德迈将军认为，在实现他的各项建议中，蒋介石会给予全心全意的合作吗？当然他办不到。史迪威将军已经十分了解，在军事行动中蒋介石的依靠程度应有多大。让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直到他把昆明、贵阳、重庆、西安、成都等都失掉，那时，也许美国将会明白，支持蒋介石是如此的无用。

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地行走。

我们承认，委员长虽有着如此之多的短处。但他总还没有和日本人讲和，为此我们非常感谢他。而另一方面。只有王八蛋才拒绝对日作战。

根据五点建议，我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能够挽救目前的局势作出一定的贡献。我们愿意在对日作战中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我们相信魏德迈将军知道，如果我们得到允许的话，我们能提供怎样的帮助，但是，我们不能被反绑着双手去战斗。我们完全愿意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政府的

指挥，如果我们在这个政府中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席位根本不会有我们的发言权。

如果美国放弃我们，我们将万分的遗憾，但是这不会损害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任何时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将怀着感谢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将不附带任何条件，在美国将军指挥下尽心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如果你们在中国海岸登陆的，我们将在那里同你们会合，并且将听从你们的指挥。

我们已经迎来了美国陆军观察组，而且我们已经尽力同它合作。如果这个组继续留在延安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它撤离，我们将感到遗憾。如果它撤离以后又回来，我们将再度表示欢迎。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一支枪或一发子弹，我们仍将继续和日本人战斗，而且我们还是美国的朋友。

没有任何外部的帮助，我们已经同日本人打了7年，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如果美国不帮助我们，还有英国和苏联（包瑞德注：我说，依我个人意见，他们不可能指望从英国得到多少帮助。对此，他们没有回答。关于苏联，我没有说什么。）。

包瑞德上校说，我们使赫尔利将军明白了，那“五点建议”是我们的最后答复。他说，他相信赫尔利将军把那“五点建议”看成是我们的“讨价”了。而那“五点建议”是我们的最后条件，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在同意委员长作为领导上作了让步，在同意我们的军队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上作了让步，在美援物资方面我们也作了让步（除去我们应该得到的公平的一份外，我们毫无所求）。我们不再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了。

我们完全理解，赫尔利将军不能保证委员长接受“五点建议”。我们知道他仅仅能说，这些条款是公平的，他将尽力使委员长接受这些条款。但是，在蒋介石拒绝这些公平的条款之后，我们不希望赫尔利将军反过来强迫我们同意需要我们去牺牲自己的反建议。

如果美国不能理解，假如我们接受了蒋介石的绝对控制，我们将使自己处于我们所提出的那种境地，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重庆时，周恩来将军尽了最大努力向赫尔利将军阐明了这一点。如果赫尔利将军现在还不理解这一点，那么他将永远不会理解，即使周恩来将军再去重庆，把所有的事情对赫尔利将军重说一遍，他还是不会理解的。

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心不再让步，我们已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但是我们并不指望得到这种承认。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周恩来将军在重庆时，没有把组成联合委员会的打算告诉赫尔利将军。这一步骤是经过长期考虑的，但直到周恩来将军返回延安，他才得知这一步骤被最后确定下来了。

包瑞德上校说，我们现在的立场是把谈判的大门关住了。我们已经关住了大门，但是窗户还敞开着。那‘五点建议’就是窗户。我们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回到联合政府中去。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失守以后，我们就不会按照我们早先提出的条件去参加了。

2.在整个会谈中，毛主席的态度极其强硬。他未对我失礼，但是有几次他大发雷霆，他不断高喊：“我们将不再让步！”“蒋介石那个王八蛋！”“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一顿。”我说，我认为依委员长的看法，“五点建议”是逼地下台的手段。这句话特别激怒了毛主席，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道：“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周将军从不动怒，他异常冷静，以平静的话语支持毛主席所说的每一个问题。会谈结束时，我感到，对于两位聪明、无情、坚定的领袖，我所谈的都是白费唇舌，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地位所具有的力量。

在会谈过程中，我努力提出一些我个人的意见，去影响共产党领袖们的不妥协的立场，兹将我的意见与他们的回答综述如下：

（1）意见：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政府的做法，将给蒋介石一个绝好的机会。借此，他会宣称，他历来的关于共产党人是叛乱分子的说法，已被毋庸争辩地证实了。

回答：他一直叫嚷我们是叛乱分子，叫嚷的时间太长，以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高兴怎么说，就让他去怎么说吧。

（2）意见：你们将给委员长一个说你们已经同日本人相勾结的机会的。

回答：他早就这样多次诬蔑我们了。我们继续抗击日本将证实我们并非同日本人相勾结。

（3）意见：谈判已经失败及你们将同国民政府破裂的消息会使日本人高兴。

回答：无论我们做什么，日本人总是歪曲事实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我们所能做的这些，即使他们高兴也无关系。

（4）意见：如果你们和国民党破裂，不仅蒋介石，而且美国的大部分舆论或许都要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

回答：对于美国人民，时间将证实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5）意见：在这次危机中，你们未能入政府，或许会在美国引起非常不利的反应。

回答：等真相为人所知（真相终将为人所知）时，美国人民将会赞同我们的行动。

（6）意见：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贵阳被国民党和美国军队击退，你们将十分难堪。

回答：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将比任何人都要高兴地欢呼。

（7）意见：如果委员长被打败；而你们又不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他，那么美自或许要从中国报走他的全部军队。

回答：美国不可能放弃中国。

戴维·包瑞德

激烈会谈结束时，毛主席记大大地冷静下来。但是，在他房子的外间，他又重重地刺激了包瑞德一下。他用极为冷静但又相当强硬的口吻说：“上校，您大概记得，11月10日赫尔利将军离开延安之前，他和我在我们起草的、并由他建议作了某些修改的条款上签了字。在那份条款上，我们愿意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我们在那份条款上签字，是他建议的，以此作为我们认为条款公平的证据。或许在某些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份有着签字的文件公布给中外的报纸，虽然我们并不喜欢这样做。

同时，中国共产党为正视听，毅然决定通知美方，把五点方案公诸于众，

让世界和全体中国人民来评说此理。这一下赫尔利可就受不了了。公布五点方案，这不是等于公开地在公众舆论上揭露他自食其言、出尔反尔的行径，让他这个美国大使在世界公众面前出丑吗？那样的话，他这个大使还怎么当下去？

他赶紧要求中共方面不要公布五点方案，说五点方案和三点方案都不是谈判双方的最后意见，而是谈判过程中的步骤。谈判没有结束。

毛泽东电告重庆方面：可以暂不公布五点方案，但是“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在赫尔利的一再电请下，中共为了揭穿蒋介石假民主的骗局，并以公开谈判来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决定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

1945年1月11日，周恩来重返重庆。赫尔利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在与周恩来共乘一车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向周恩来讨好说：“我几次见过蒋介石，也多次批评他不对。如果这回国共谈判不成，责任不在中共，而应该在国民党。”

他还信誓旦旦地对周说，这次国民党已经准备答应中共的一切条件了。

但是第二天，赫尔利拿出的却是他和蒋介石、宋子文一起商量定下的四点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内容是：

- 一、在行政院下设战时内阁；
- 二、成立整编委员会，由美国军官一人，国共两方各一人组成；
- 三、由一名美国军官作中国军队总司令，国共两方各任命一人为副司令；
- 四、整编委员会成立以后，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这个方案正式提出了由美国人来指挥中国军队的设想。这也反映了美国政府的一种意向。

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在给罗斯福的关于国共谈判的备忘录中就提到，如果国共两党不能达成解决办法，“另一种选择就是，由一名美国军官指挥所有的中国军队。”

他以为这样一种折衷方案双方都会同意。而这样美国实际上就做到了一石双鸟的效果，既把国共两派拉在了一起，又可以防止苏联把中共拉过来。另外这位美国国务卿还有种种对于美国有利的远景目标。

但是这样一种方案，中国共产党是决不会同意的。用毛泽东的话说，赫尔利的新建议是“将中国军队尤其是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同，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不能同意”。

谈判又一次宣告破裂。周恩来飞回延安。

对于赫尔利来说，与共产党谈判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和巩固蒋介石政权。这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所以他在谈判中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好话，可以假惺惺地骂蒋介石几句不民主、政府腐败，为的是把中国共产党拉进他设想好的假民主的场子里去，为他笼络蒋介石服务，并成全他个人的功劳。

他并不是真正地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和立场去想，去调处国共关系。他的立场是带有很大偏向的。

就在谈判期间，在一次酒会上，这个作调解人的美国大使还毫不掩饰地对蒋介石说：“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

赫尔利鼓动起来的国共谈判，时间一直拖了5个月，结果以失败告终。

第4章 罗斯福默认了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1. 反叛的外交官

赫尔利一手撮合的国共谈判流产后，他离开中国，回国呆了一段时间。

赫尔利这时觉得，要单枪匹马解开中国那几乎是解不开的、复杂的政治、思想和经济的疙瘩是不可能的。不论你的动机如何，你的行动却常常使你与之打交道的人失望。

同中共的谈判失败，赫尔利迅速地倒向了蒋介石。

据戴维斯说：

我记得，到1944年12月，赫尔利将军并未得到华盛顿方面的证实便开始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和蒋委员长。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项政策对于美国利益来说，是充满危险的。赫尔利将军不过把一种已被默认了的看法，明白他讲了出来而已。他是在迅速变化着的现实局势发生问题的时候宣布了这一政策的。

其实，这政策究竟是什么，谁也并不确切地知道。1944年5月发表的一份美国国务院文件宣称：“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

1945年1月，华盛顿方面告诉魏德迈将军：“在中国的一个长期目标，是帮助建立一个统一的、实行进步的民主制度的、具有合作精神的中国。这样一个中国是能对远东的安全和繁荣作出贡献的……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但是，就短期目标而言，蒋介石是能带来统一希望的唯一领导人。否则……便可能出现动乱。”

赫尔利后来改变了立场。部下的报告，他照转照送，不过要加上一个说明，表示与他无关。他在林沃尔特和史密斯合编的一份备忘录上加的附录，就很有代表性。他们两人觉得有义务让华盛顿知道：根据可靠的憎报，国共两党已经有6个师的兵力在交战。他们所认识的中国人，对于美国继续给蒋介石以“无限支持”，以此实现国内和平，全都感到悲观。赫尔利不相信这一点，他的附录是这样写的：“至于我这方面，这场共产党的争端是可以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咖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对此，副国务卿格鲁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们感兴趣地读了你的电报……认为你和你手下的工作人员提供的情况，对于我们估计中国的事态是有帮助的。”

另一方面赫尔利对那些对中国了解得很透、懂得太多、对于眼下时局很有见地的年轻外交官们已心存芥蒂了。

现在，在重庆的那些年轻的美国职业外交官们却变得好像是无事可干了。

他让那些人留在使馆内，或者对其中早已看不顺眼的就把他一脚踢走。

1945年2月28日，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的一幢公寓楼里，发生了一桩事。这件事后来就被叫作“外交官反叛事件”。

此时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军驻华司令官魏德迈都回美国华盛顿述职去了。驻华使馆的那些中下层外交人员都住在同一公寓楼里，他们的生活单调

无趣，无事可干，到了晚上，要么打桥牌，要么猜字谜，以此消磨时光。

而那些年轻的外交官们不想就这么无聊地泡日子，就把全部心事放在他们一直关心、却无权过问的中国局势上。此时，赫尔利硬拉死拖的国共谈判明摆着是要进入彻底破裂了，那些有见地的年轻外交官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认为宝贵时光正在飞快地流失，应该赶紧调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要不然，过去美国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会付诸东流。

这大几个年轻的外交人员在一个房间里谈论中国局势，谈到后来，就有人提议，我们光是这么说说也不行，应该马上给国务院写一封信，如实地把我们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向那些决策者作汇报。

于是，他们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请约翰·谢伟思执笔写的。信中他们谈了对于目前中国局势的忧虑，而国务院和赫尔利根本听不到对现状的客观看法，信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向总统提出一条建议：

总统以明确的语言告诉委员长，军事上需要求我们向共产党人及其他能援助对日作战的适当的集团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我们将为此采取直接的步骤……我们相信，这将在中国产生深远的有利的政治影响。

这是个大胆的建议，要是它能被采纳，就无异于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通牒。

由于这封信很重要，这些下级外交人员就去找当赫尔利不在时临时代管馆务的参赞艾奇逊。艾奇逊把信看了一遍后便说：“此信不能发。”

他是很有头脑的人，这封信如果让赫尔利知道的话，肯定会气得暴跳如雷。因此他又对那些激动的年轻外交人员说：“这封信是决不会起作用的。他们会说我们全是叛徒，说我们是老猫不在，耗子翻天。”

但谢伟思他们一再地说，他们实在是忍不住了，不说出这些话，就会觉得对不起良心，对不起作为一个外交人员的最起码的公德。

艾奇逊想了想，想出一个可以避免被说成是违反纪律的办法。那就是在信的里面再加上一个要求，即在采取任何行动前，都要同赫尔利和魏德迈两个商量。于是在信中加了一句：“现在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都在华盛顿，这是讨论这一问题的良好机会。”

2月28日下午1时，艾奇逊从重庆发出了这封信。它按时寄到了华盛顿，并被送进了白宫。

外交官们的意见在国务院中国科引起了共鸣。中国科在3月1日和2日，给代理国务卿格鲁的备忘录中一再地重申他们的主张。那就是，从当前来说，与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包括中共军队）合作，向他们提供武器；从长远来说，对蒋介石采取灵活政策，不要无条件地承担义务。

这时任中国科科长的就是当初在中国使馆当过一等秘书和参事的约翰·文森特。他对中国的局势很了解，也很关切，对于谢伟思他们的看法也很赞赏，所以就不顾风险，把从中国来的这封“请谏书”当作一份重要文件往上送了。他还在备忘录里特别强调，要对驻华使馆人员的电报“予以最严重的注意”。

代理国务卿格鲁感到这场对华政策的争论事关重大，即于3月2日就把从中国来的电报呈送白宫了。

3月4日，赫尔利在美国国务院文森特的办公桌上看到了这封从重庆发出的信后，当即气得要命，先是责怪文森特不该收下它，然后就大声咒骂写这封信的那些人。

他吼叫道：“我知道是谁起草的，是谢伟思。我豁出命天也要干掉这个狗娘养的！哪怕这是我干的最后一件事！”

第二天，赫尔利又向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兰坦提出了抗议。他说：“发这份电报是部下对我不忠的行动。它把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挑了起来。它使承认共产党为武装交战一方的问题又重新复活了，而史迪威将军正是因为这个问题被召回的。”

赫尔利在此后的连续几天内，都去国务院跟国务院的官员们论战，最后这桩争论又进入白宫，由罗斯福作出了最终判决。赫尔利赢了。罗斯福再次支持了他的意见。

2. 罗斯福在想什么

罗斯福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支持赫尔利的中国政策？

至此，我们不能不谈到罗斯福，谈到他的对华政策了。我们请读者再跟我们一道简略回顾一个历史进程的发展。

1937年以前，罗斯福虽想按美国的意志改革中国，随后把它纳入世界秩序之中发挥一个大国应有的作用，但他更愿意满足于对中国采取一种被动的、冷眼旁观的、不干涉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确信这个苦难深重的东方古国是那么神秘莫测，一切都充满了未知数，对一个就美国人的经历而言如此陌生、如此遥远、又如此广大的地区，美国人是力不从心的，何况美国正处于多事之秋，有着那么多事情急待解决，无法腾出更多的精力关心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1937年以后，罗斯福对中国改革的长远期望被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威胁中国独立、意欲全面统治中国这一无情的现实所取代。此刻他更为迫切关心的问题不是致力于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跻身世界大国之列，乃是如何解救中国于濒临灭亡的生死攸关之命运，在他的思想深处，他认为一个独立的未经他人染指的中国，总比一个受日本统治的中国、对美国敌对的中国要好。

从1937年到1941年，罗斯福则行走在一条狭窄而矛盾的小径上：一方面他仍然全力阻止或推迟同日本直接冲突和直战，另一方面则尽其所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前怕狼后怕虎、自相矛盾的窘境一旦被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事件彻底打破后，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就开始织进同盟国的军事战略与他关于战后世界的总体考虑之中了。

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谈到美国在大战期间的对华政策时曾回顾说：对中国，美国有两个既定政策，第一是短期政策，即帮助中国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维持中国继续参战”。美国军方认为中国继续参战从军事上可以把“相当数量的已军牵制在中国战场”，从而减轻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所受到的巨大压力。第二是中长期政策，即为了准备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即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世界主要大国。

在这个时期里，罗斯福先前那种对中国被动的、不干涉的对华政策转变成成为某种积极的、介入的政策。这样做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基础是基于以下的逻辑和考虑的：罗斯福和他的助手认为，战争将以德、意、日的失败和同盟国的辉煌胜利而告终。战后、美国无疑将在世界居于领导地位，而在它的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里，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属是不可缺少的，它将作为美国最密切的盟国，共同抗衡太平洋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其他大国，特别是俄国、英国以及东山再起的日本。因此，此时的罗斯福认为，

“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策的紧密合作为基础”。那么谁能充当战后中国的领袖呢？首先，这样一个中国不应是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因为一个共产党政权是不可能支持美国的“世界领导”的地位的；其次，美国看不到在国民党内有谁是比蒋介石更有能力、更有威信、更坚强有力的人了，因此，罗斯福认为蒋介石即是能“在战后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唯一领袖”。这样，美国政策就把美国战后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与支持蒋介石政权结合起来。

二战初期，中国的作用显得很重要，因而罗斯福很着重蒋介石的军队。但由于在战事上蒋介石的军队一再证明其松懈无能，甚至未能牵制日本的进攻，中国早期的重要性就逐渐减弱了。尽管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削弱，罗斯福也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还停留在18世纪，但他仍然固执地追求把中国当成一个大国的幻想。罗斯福曾向斯大林和邱吉尔说：中国应取得战后世界的“四大警察”之一的地位，在亚洲大陆发挥和平维护者的重要作用。

从1942年末起至1944年夏，蒋介石巧妙而成功地利用罗斯福的这一观点来抵制史迪威。蒋介石心里很明白，罗斯福希望利用中国，使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保护国，成为一支取代日本和欧洲殖民帝国的、在地区安全方面起稳定作用的势力，并且为日后抗衡红色苏联的影响提供有价值的砝码。这样看来，从长远来分析，蒋介石料定罗斯福是不会采取行动来破坏这个由他亲自推举作为“四大警察”之一的国民党政府的。为了日益依赖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的支持，蒋介石拟定了一项建设性的军事战略：他选中了前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司令克莱尔·陈纳德作为对付史迪威的人。

对于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尽管有人提出不予理睬，但罗斯福还是决定迁就蒋介石，转而支持陈纳德，因为罗斯福认为这样做是一种换取未来美中亲善的明智投资。1943年3月，罗斯福对马歇尔将军说，蒋介石不应在威胁之下才被迫实行改革。蒋介石在中国造就了“我们花了几个世纪才得到的东西”，威吓他只会适得其反。他，甚至明确说蒋介石是“四亿中国人民无可置疑的领袖”，他也不可能像“摩洛哥的苏丹”那样听从美国人的旨意行事的。

1943年9月，罗斯福在与副国务卿韦尔斯的谈话中再次谈到，“尽管蒋介石委员长的军事眼光可能有局限，他的军队仗打得不好，但他是使中国能在战场上打日本人的唯一领袖。只要有蒋介石在，中国与日本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就不会出现”。

从以上事实看来，既然支持、扶植蒋介石与美国战时和战后利益关系如此密切，罗斯福在史迪威事件中最后对蒋的让步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任何一个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光靠飞机就可以战胜日本，然而蒋介石却是那样虔诚地寄希望于陈纳德。罗斯福对蒋介石采取支持的种种行动清楚地表明：美国政治领导人在脱离现实方面走得很远。历史上，不少哲人、大师、政治家，他们在某些领域，对很多重大的问题都可以有高深渊博的分析和论述，然而他们却对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中国，从来没有深刻的认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罗斯福也是这样。尽管他对欧洲的争斗和政治有精辟的见地，相比之下，他和他左右的大部分人对中国情况的理解却是极为肤浅和模糊的。他们没有看出，迁就蒋介石并不能解决中国更深一层的政治危机。此外，他们还漫无边际地相信：中国会有光荣的未来，因此推迟向蒋介石算帐的日子是应该的。他们没有想到，

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国民党得以无所顾忌地拒行改革，反而加速了它的垮台。

1944年春夏两季，中国战场出现的数次灾难性军事事件，使罗斯福总统受到极大的震动。在无能的蒋介石军队的溃退下；日本军队节节进攻，屡战屡胜，最终宣告了蒋介石和陈纳德战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彻底破产。面对巨大的投资付诸东流，理想的泡沫相继爆裂，此时的罗斯福已对蒋介石怒火中烧了，可他毕竟心存侥幸，又能以大局为重，只好暂且把心头怒火压抑起来。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又向美国提出了追加10亿美元的援助以及额外武器的请求。经过反复权衡利弊，美国被迫同意。但蒋介石仍拒绝发动“缅甸战役”。在事实面前，罗斯福终于有所悔悟，决定拒绝给国民党政府新的经济援助以警告蒋介石。

到了1944年5月时，日本仍处于攻势，国民党仍节节败退。蒋介石总以“防范共产党”为由，设法把大部分兵力留作后备。至1944年6月，罗斯福已相信只有积极强迫蒋介石投入对日作战，美国的战时战略和战后战略才不致化于一堆泡影。事情越来越清楚，要中国发挥牵制、拖住日本的作用，必须使中国团结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希望就是重新恢复中国国内统一战线的生气，这样才能去掉蒋介石的所谓“防范共产党”的任何借口，还能使美国对华北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加以利用。更进一步讲，如果国共两党这种战时的“团结”能在日本投降后继续维持下去，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内战的爆发。心存此念，罗斯福决定于1944年6月派他的私人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命他迫使蒋介石寻求与共产党人达成一项谈判协议，并暗示美国愿意在两党谈判中间调停。

与此同时，罗斯福还坚持取得让一个“美国观察组”能获准自由进出共产党人的首府延安的特权。罗斯福的这种“脚踏两只船”的良苦用心实际上想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如果美国在中国调停成功，蒋介石就无法再以共产党的威胁为由拖延对日作战；另一方面，美国是想让蒋介石明白地认识到，美国在中国还有别的选择，并不是把赌注全押在他蒋介石一个人身上。

但实际上美国领导人从来没有真正认识或接受中国革命的现实。华盛顿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总是在“不感兴趣”与“充满敌意”之间左右摇摆。或者说，要么美国无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要么则把它看成一个“全球性”的阴谋工具。历史证明，美国这种错误的认识归根结蒂给中美关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至1945年2月，罗斯福开始认识到，他希冀实现的所谓培植一个“强大、统一、亲美的中国”的梦想正在迅速变成一个黄粱梦。中国的统一，也许充其量只能依靠国共两党结成脆弱的联盟来达到。而这种联盟在中国并没有稳固的基础，两党的恩怨是难以消失的。看看目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就不难预测出，内战有可能爆发，这将引起远东长期不稳的前景，并成为可能诱使苏联渗入的真空地带。为了增加保全一个国民党中国的机会，罗斯福最后只好做出向约瑟夫·斯大林寻求积极合作的决定。

美国认为：苏联虽标榜“支持世界上一切革命运动”，但在这个革命口号的外衣下，其实斯大林只支持那些俯首听从他个人指挥或他认为符合苏联最高利益的事业效劳的“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一项十分好恶相克的政策。他心里明白，虽然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深得人心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革命运动，但毛泽东他们却是不会把斯大林作为主人或把苏联作为中国的样板的。一个与俄国接壤的强

大、独立的中国的前景，是斯大林所不愿看到的。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领导人在位于苏联境内的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了磋商。在这次会议上，苏联特别提出，苏联必须获得参与管辖满洲境内主要铁路和港口的特权。由于斯大林已经表明他将支持蒋介石政权，而不理会中国共产党人，罗斯福对苏联的要求破例异乎寻常地做出了让步，主要原因是因为罗斯福认为舍弃一个满洲以换取保全国民党中国、减少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是一笔合算的交易。

3. 美国最终选择了蒋介石

1945年3月8日，赫尔利和魏德迈两人一起去见罗斯福。此时这位已连任三届美国总统的老人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他不光是无法独立行走，就连一些很简单的日常事都不能做，需要别人一刻不离身地照顾着。

他躺在病床上，无力地听着两个来自中国的属下讲着他从未去过的那个神秘的东方大邦。对于那个国家，他很难说有多么喜欢它。但是他却知道，为了这个世界安定和平，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万万不行的。

他现在一心想的是如何把日本及早地打败，所以对于中国的局势，他关心的也还是能不能抗得住日军的反攻。所以他对属下要交待的也仍是以前说过的这些话：要把这些东方的头头拉到一起来，直到他们看到，他们必须把各自的力量合在一起抗日，否则就会被各个击破。

他对中国的那些领导人物，比较熟悉的也仅仅是一个蒋介石。他对那个人印象并不坏。所以在听两个属下谈论时，他偶然也问一下那个蒋介石个人的情况。因为罗斯福此时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即将召开的美苏英三大国首脑会面商谈全球大事的雅尔塔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他将中国问题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他想了解一个蒋介石此人的各种情况，以便作出一个较为正确的判断。

除此之外，他不想多说什么了。就是魏德迈说到，一旦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可能引起麻烦时，他也不作一个字的评说。恐怕这位老人已经意识到自己活不到那个时候了，不想管得太远。

3月24日，赫尔利再次去见罗斯福。这一次，罗斯福是要把美国和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秘密协议的文本给赫尔利看，并要他取道伦敦和莫斯科返回中国。让他使英苏两国更进一步理解美国对华政策，以取得那两个盟国的全力支持。

由此可见，罗斯福对赫尔利这个驻华大使是够信任的。要知道，那时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文本是锁在总统专用的保险柜里的，就连出席这会议的国务卿纽斯还无幸看到。

3月27日，赫尔利、魏德迈等又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起讨论了中国的军事形势。他们一致认为，只要对蒋介石的中央政策给予一定的援助，就可把中国的叛乱镇压下去。

罗斯福的接见、雅尔塔的秘密协定显然进一步壮了赫尔利的胆，使他更大步地走向他所认定的扶蒋反共的目标。

4月2日，赫尔利在离开华盛顿前夕，特意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得意洋洋地宣告：“中国的军事机构、美国的军事机构、中国国民政府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现在是一支队伍。”

他在这次讲话中始终把中共与封建军阀相提并论。他口口声声他说，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

党。他对蒋介石作了不遗余力的吹捧。

他说：“在中国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蒋运用了他所有的权力；然而他不是个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赫尔利这番话，正好说明了他的一种倾向性。赫尔利个人的立场已经改变了许多。这是在美国政府左右摇摆的对华政策中渐渐占了主流地位的一次宣言。

至此，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可以说基本形成。

4. 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三个主要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受到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一是美国因素。战后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出现，野心很大，但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毕竟有限，同其野心不相称；美国人民渴望和平；美国国内不同派别的政策主张，包括民主党政府内部的分歧，共和党控制国会、院外援华集团、正直的有现实眼光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的看法，等等。特别是从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国政策产生制约作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卞年代末美国与国民党政权互相卷入对方内政之深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

二是中国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所谓“中间力量”，等等。

三是国际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美苏“冷战”。美苏关系对美国对华政策从两个相反方向起作用，一方面促使美国积极干预中国内战，反对中国革命，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程度，与美苏妥协的余地恰成反比；另一方面，又制约美国行动不超过一定限度，因为它不想与苏联直接冲突，因此它对国内战的干涉以不引起苏联干预为度。尤其是亚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令美国的右翼反共势力惶恐不安。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人所看到的亚洲，是苏联对满洲的浓厚兴趣，以及如同燎原烈火一般的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崛起。美国人忧心忡忡，既怕苏联控制中国，又怕中国共产党获得江山。美国当时极有影响的对外事务发言人、以后成为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是其中一员积极为维持国民党的意见而上蹿下跳、竭力辩护的战将。1945年初，他对外宣称，美国对华政策的要旨是“决心不让四亿中国人被某个外国的掠夺计划所利用”。于此同时，蒋介石在美国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和施加压力之下，也已做出选择，他明确提倡全国将“依赖基督教民主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根本支持”。

在杜鲁门总统的顾问圈中，最善长辞令和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要数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哈里曼认为，由于中国是国际共运据以向美国挑战的战争爆发点之一，如果美国放弃它支持蒋介石的责任，则“美国最后将不得不面对只要克里姆林，宫一声令下，数亿人就会挥戈进军美国的事实”，哈里曼生动的想象证实，美国最高领导层已开始将中国共产党人看成是与美国全面敌对的苏联的代理人。至1945年7月，美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已采取了反苏、反共的姿态。美国领导人不再把苏联看成一个忠实的反德盟友和一个未来的反日盟友，在他们眼中，苏联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威胁世界和平的新敌手。到1945年7月末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人与美国人的分歧已越来越大乃至到崩溃的边缘。

其实，在对华政策上，斯大林并非像美国人所想象的那样联合中共，在全球推行赤化。虽然斯大林希望控制满洲部分地区和夺取日本人在那里建立

的工业，但当时并不准备全心全意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的崛起，8月14日，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几个小时，斯大林和宋子文为履行《雅尔塔协定》，签订了一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明文规定，日本投降后，苏联得到在满洲全部的铁路、港口特权；作为交换，苏联人保证他们“在道义上、物质上、军事上支持中国”，并且“唯一地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但美国政府的主要对外政策顾问敌视苏联的程度，远较总统本人为甚。他们将苏联的安全要求和惩办德国的要求，以及斯大林坚持在东欧建立亲苏政权的主张，都看作是共产主义运动向全球蔓延和扩张的前奏。

与此同时，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所在地，正在进行着决定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作为留在美军驻华司令部的最后一名政治顾问，谢伟思最后一次被派到延安去了解中共的七大会议情况。他一到延安就发觉，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表示难以理解，对蒋介石也更加厌恶了。

3月13日，毛泽东邀请谢伟思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对于罗斯福对中国问题如此举棋不定，出尔反尔，感到很迷惑不解。

毛泽东极为遗憾地谈到，自1944年12月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改变了以往促成中国国共两党妥协的方针。赫尔利的敌对行动一定会使美国一直为之奋斗的希望完全落空。毛泽东强调美国援助的巨大意义，并直截了当地说：“有人说什么美国不应干涉中国的内政（指调解国共冲突——编者注），没有那么回事！你们是作为中国最伟大的盟友到这里来了。你们能呆在延安，就很了不起。”

此时中共的这位主席还想着，希望跟罗斯福总统面对面地讨论所有这一切问题。

但是毛泽东哪里知道，当时已经是罗斯福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月了。

4月1日，谢伟思匆匆离开延安。

就在前一天，他接到了要他立即返回美国的命令。命令不用说是赫尔利下达的。

在谢伟思动身之前，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朱德一起和他作了最后一次会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谢伟思说，他的这次召回，是祸是福还难说，如果是好事，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得到美国的援助；若是坏事，那么可能就意味着走向另一个极端。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人不怕打仗。如果真要发生了内战，只要美国采取不插手政策，我们就满意了。谢伟思在解释毛泽东的讲话时说：

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民主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但是，不管美国采取什么行动，不管中共能否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枝枪、一粒子弹，中共都将继续愿意以他们所能做到的方式实行合作。

凡是他们能够做到的（诸如情报、气象报告或营救空军人员），中共都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因为它有助于盟军的作战，能加速日本的战败。要是美军在中共管辖区登陆或开进中共管辖区，他们会看到，那里的军队和人民已彻底组织起来，并渴望同敌人作战……

当然，美国是否同中共合作，这个问题只能由美国决定。但是，中共认为，这种合作对美国是有利无害的，它能促使战争尽快打赢，能帮助中国的统一和民主的事业，能在解决土地问题基础上，通过实行工业化实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能博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农民和自由派人士的友谊。

1945年4月4日，谢伟思最后一次离开延安。他在重庆停了一下。在4月12日，即罗斯福逝世的那天，他回到了华盛顿。

在此期间，不知疲倦的赫尔利也回到了华盛顿，并同总统进行了磋商，他说服罗斯福同意了对蒋介石的最高权力的看法。

1945年3月，赫尔利和魏德迈在华盛顿宣称：“只要美国提供更多的援助，蒋介石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中国共产党这个力量单薄且不得人心的敌对团体。”此时罗斯福总统已经病入膏肓，生命垂危，而且几星期后就离开人世，因此他无力也无心指责赫尔利，而且事实上还对赫尔利在过去几个月的行为表示出明显的赞许。这在客观上促成了美国反华反共政策的成型和出台。1945年4月2日，美国反共政策得到了正式批准。当天在华盛顿，赫尔利晋见了罗斯福，之后马上出席了一个公开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宣布中国共产党对妨碍中国实现和平一事负有极大的责任。此举似是在向世人昭示，现在甚至连罗斯福也抛弃了不偏不倚的政策。

至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几乎丧失了所有影响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希望和努力。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就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发表了演讲。他高瞻远瞩、一针见血地警告国人说，美国和国民党正在共同策划一个大阴谋：一俟日本投降，就进攻共产党。6月份，谢伟思被以所谓“间谍罪”的罪名被逮捕的消息传到延安，更证实了华盛顿日益反共的政策。

第5章 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

毛泽东说：“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这两次试验，现在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的了。”

1. 马歇尔感到很为难

1946年1月。

午后的重庆，蒙蒙灰雾变得稀薄了，呈现出淡淡的乳白色，依着山势修筑的街道，像一条条曲折迂回的飘带，时而沿江蜿蜒，时而飞上山岭。楼台房舍随山坡起伏，层层密布，高低参差，显露着膝陇的立体感。其中，牛角蛇的那幢小楼格外引人注目。

这幢小楼名叫抬园，有青松、懈树环护，两扇房屋铁门紧紧地关闭着，门前荷枪站立着美国士兵，楼内住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乔治·马歇尔。

此刻，刚刚午睡了片刻的马歇尔正仁立在客厅的阳台上，双臂交叉，环抱于胸前，目光茫然地注视着那些灰苍苍的雾霭在密密的松针间流连悬挂，心里却费劲地琢磨着这次意外的中国之行。

马歇尔是个身材高大、头发银白的标准的美国军人。虽然已经66岁了，身板还挺得笔直，一身草绿色的咋叽布军装，整洁熨贴，胸前缀着五星上将的勋标。翘起的鼻子，浓重的眉毛，深深的一对眼窝里射出两道自信的目光，微闭的嘴角时常挂着成功者特有的那种笑容。

乔治·马歇尔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尤宁敦，小时候是个公认的智力迟钝的学生，可日后却变得出众，而且形成了一种无论于什么，只要认为可行，就坚韧不拔地为之奋斗的性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出任美国联合参谋总部的陆军参谋长，为盟国的历次重大决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被授予在美国只有寥寥几人才得到的五星上将军衔，成为功勋卓著的二战英雄战争结束后的第6天，马歇尔就慨然请求退休，但他获准后刚刚到达里斯堡自己新买的多多纳庄园，就接到杜鲁门总统的电话：“将军，你愿意替我去趟中国吗？”

“什么？中国！”马歇尔吃惊地反问了一句。

“是的，将军。”杜鲁门总统那浑浊而沉厚的大嗓门透过银线从千里之外的白宫传来，“我想请你去中国走一趟，以取代‘炮筒子’赫尔利将军的国共调解人之职”。

“哦，让我考虑之后再答复您，总统先生。”马歇尔放下听筒后，一边在客厅里踱步，一边抽着粗大的黑色雪前烟，沉思了起来。

马歇尔知道，赴华调解国共冲突，是一件很棘手难办的事。因为自从1944年10月赫尔利少将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开始，美国在华积极推行着一种扶蒋反共的缺乏明智的政策，把局势弄得一团糟糕。赫尔利来华伊始就很不明智地介入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在中共的多次邀请下，赫尔利于11月7日前往延安，并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五点协议”上签了字。此时，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和赫尔利寄予很大的期望，中共的合作政策，为美国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与余地来选择、决定战后的对华政策。但是遗憾得很，美国的决策者们并未能深刻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把与中共的交往只是作为权宜之计。随着跳岛战役与原子弹试验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在1944年10月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苏联表示愿意出兵东北，这时在美国人心目中，中

国战场的作用骤然下降，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在中国登陆的计划被取消。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便指使赫尔利放弃了由他签字担保的“五点协议”，反过来和国民党一起演出一场逼迫中共交出军队、放弃根据地政权的双簧戏。

在当时的罗斯福政府内部，有关对华政策争论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怎样才能有效地介入中国的国内政治，减少中国内战爆发的危险，促使中国更加团结一致地对日作战。尽管美国的军人和外交官们在对华政策的问题上从来都是莫衷一是，众说纷坛，特别是在支持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较一致的意见，但他们都普遍认为华盛顿能够而且必须通过介入中国政治来增进自身的利益。

从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仅是中国两次国内战争的一个插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战争时期扩大了美国的在华利益，也为中国的党派提供了一个寻求美国支持的机会。围绕着中国政治权力之争，各派力量都在不断地进行互相竞争以确保他们与美的联系。作为占主导地位、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在获取美国的金钱、军事援助、技术援助和政治支持方面当然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蒋介石成功地阻止了史迪威要把他拉下马的企图，但从这场争吵中，双方都醒悟到，那种以为双方利益恰好吻合的看法毕竟只是一种幻想，双方同时都为对方对待自己的态度而深感失望。

尽管中共的处境要不利得多，但他们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也渴望国际社会的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曾一再申明，愿以对日作战中实行多方合作的保证来换取美国的援助。但不幸的是，那些肯于听毛泽东意见的美国人，或是职位过低，或是远离权力中心而无能为力，或是无法影响美国政策的决策人。当时毛泽东最大的希望就是把信息直接送给罗斯福总统本人，但他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特别是赫尔利的反共行动，彻底打破了中共领导人对美国寄予的最后一点希望。他不但中断了与中共的军事合作，清除使馆内部的反对派，而且回国去争取总统的支持，将美国对华政策纳入“扶蒋反共”的轨道。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公开宣称：“美国政府一定要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不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转载了赫尔利的讲话；同时在评论中给予批驳。这样，中共和美国的矛盾公开化了。

2. 马歇尔觉得自己赢了第一个回合

马歇尔对于自己所担负的工作似乎是充满信心的。但他在临出发之前却与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文森特发生了意见分歧。文森特作为一个“中国通”，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在马歇尔去做国共两党调停人之际，不宜让美国军事力量投入，帮国民党军队运兵。但马歇尔却同意美国军方的意见，在调停期间，不停止帮蒋介石运兵。

杜鲁门总统同意了马歇尔的这一立场。实际上，这一着也为马歇尔最后的失败落下了头一个败笔。

1945年12月15日，马歇尔即将登程前，杜鲁门总统就马歇尔的使华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国共双方应该实行停火，并尽快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解决纷争，实现联合；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它是“一党政府”，应当扩大政府基础，实行民主改革，随着政府的改组，中共军队应

整编入中国的国民军队；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受降和遣返日军，但这种支持将不扩展为影响中国内政的军事干涉，等等。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联合下达了一份给魏德迈将军的命令。命令中称，美国将继续对“蒋介石反对中国内部持不同政见势力的活动”提供“至少是间接的支持”。杜鲁门和马歇尔一致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拒绝作出“合理的让步”，美国就将帮助蒋介石调动兵力前往那些国共双方有争议的地区。美国不能容忍“一个分割的中国”或“俄国在满洲再度行使权力”。为了实现这一点，马歇尔叹息道，华盛顿将“不得不抑制它的自尊心和它的大部分对外政策”，并不得不继续援助国民党。

而在事实上，即使美国政府希望阻止中国内战，美国领导人仍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他们眼里，中国的社会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是同苏联的扩张一脉相承的，国共两党的相互残杀是华盛顿与莫斯科对抗中各方的代理人。因此，杜鲁门和马歇尔相信，作为遏制苏联的一种方式，在中国保持“秩序”和“稳定”是极为重要的。1945年以后，美国在中国的目标便与阻止苏联全球性的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极为愤怒，但他们仍对于美国政府在赫尔利辞职后，派马歇尔来中国作调停人，抱着欢迎态度的。认为这有利于当前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毛泽东还希望美国能真的改变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从当时的情况考虑，拖延内战的爆发要比立即与装备较好、人数较多的国民党军队摊牌要好。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于1945年12月率领一个代表团重返重庆，准备与蒋介石和马歇尔进行谈判。但是，当代表团的飞机刚刚降下跑道，机场上便发生了国民党警察“动手将中共代表逐出机场”的事件，这似乎确定了这次谈判的基调。后来幸亏美国外交官的出面干涉，中共代表团才得以解围。

12月21日，马歇尔第一次会见蒋介石。他在首次谈话中对蒋施加了一些压力，他说，美国人民不愿采取任何可能被解释为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动。美国人民现在十分希望看到中国结束敌对行动。而总统的行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公众制约的。如果不能证明中国内部争论已经解决，人民将不会允许总统对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此时蒋介石还摸不透马歇尔的底细，加上马歇尔来华前，杜鲁门命令财政部、商业部、进出口银行等几个部门，暂停一切对华财经联络，暂停各种援助，所有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均随马歇尔特使的进展情况而定。在这种压力下，他才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作了一点让步。

马歇尔到重庆后，中共代表周恩来与之进行了会谈。

周恩来向马歇尔陈述了中共方面的观点，即中共主张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筹建国民大会，使中国成为一个宪法国家。

在马歇尔的努力调停下，12月27日，国共两党举行了第一次会谈。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由马歇尔和国共双方代表各一人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参加三人小组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张群，中共方面的是周恩来。

三人小组的职责是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采取三人一致协议的原则，每方面都有否决权。三人小组所做的一切均应送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才生效。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随后建立的由三人小组领导的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及其属下一切部门机构。

在关于停战问题的讨论中，国共双方最关注的是两件事：国民党军队开

人东北接收主权和国民党要求中共交出赤峰和多伦这两个战略要地的问题。

最后国共两党各作出了让步。周恩来承认东北问题的特殊性，容许国民党接受东北主权，美国可以协助国民党政府运兵去东北，由国民党直接与苏联办理交接，中共不参与其事。至于赤峰和多伦，当时已由中共接收，经马歇尔说服，蒋介石答应放弃要求。

1月10日，三人小组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拟在马歇尔的官哪里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签字仪式。

这一天，天色灰暗，淫雨纷飞。一团团阴沉而灰黑色的冬云在天空中沉重而徐缓地移动，凛冽的寒风挟裹着潮湿的雨雾穿过窗根，在宽阔而古典的客厅里徘徊。在客厅中等待客人的马歇尔感到寒冷难耐。为了驱赶浓浓的寒意，他在充当签字仪式处的客厅内走了一圈又一圈，不时地跟美国驻中国代表饶伯森和美军军官白鲁德上校说几句话，有时又停下脚步，用踌躇满志的目光扫视着客厅内的布置。那边墙上，挂着圣玛丽亚怀抱天使的油画，下面摆放着一对中国的景泰蓝。另一边是长条桌，座位后面的木台上，有一束黄色的鲜花，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赠送的圣诞礼物。

此刻，马歇尔的心里很得意。有人说我根本不应该承担来华的使命，有人断言我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统统见鬼去吧！我这不是解决了吗？周恩来和张群很快就要来举行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虽然仅仅是开端，可毕竟是个良好的开端。

两辆黑色“雪弗莱”汽车几乎同时驶到怡园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分别走出张群和周恩来。下车之后，他们礼貌地伸出了手：“岳军先生好！”“恩来先生好！”然后通过哨兵身旁，向院内走去。

48岁的周恩来，穿一身中山装，英姿潇洒，脚步轻捷，不卑不亢，完全是一位老练机敏的谈判家的风度。他12岁离开出生地淮安，随伯父前往沈阳求学，15岁时考入天津南开学校，第二年就成为学生领袖，以后又东渡日本，西去巴黎，参与领导黄埔军校，组织南昌起义，后又长征万里，到了延安。从抗日战争开始，他就代表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奔走。

比周恩来大11岁的张群，虽然西装革履，但仍然遮不住老态。他和蒋介石是保定军校时期的同班同学，先后当过上海市长、湖北省主席、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可谓久经风浪的“得意政客”。但和周恩来谈判，他总觉得自己稍逊一筹。平时都是蒋介石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有人说：“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之为蒋之使女而不能称为如夫人。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群只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他自己也说过：“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他自认为不是周恩来的对手。在3个月前的国共谈判中，他就领略过周恩来的机智和多谋。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步到底走过来了，下一步怎么办，该张治中的了。

听到汽车的声音，马歇尔走到门口迎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他边和来人握手，边大笑着说：

“Mr.Zhou, good afternoon!”（周先生，下午好！）

“Mr.Zhang, good afternoon!”（张先生，下午好！）

“将军下午好！”周恩来说。

“元帅下午好！”张群说。

张群这样称呼，并非完全是为了讨好。在英语中，“马歇尔”和元帅谐音，而五星上将往往被视为相当于元帅的军衔。

寒暄完毕，三人神情严肃地坐到长条桌前。马歇尔居中，张在右边，周在左边。

下午3时10分，签字仪式按预定时间正式开始。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共有4个文件：一、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二、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命令的了解事项；三、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四、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

第一个签字的是张群。本来，和共产党谈判的代表是张治中，可张治中当时远在新疆。蒋介石发电报催促，张治中迟迟不回。无奈，蒋介石只好先派张群作为代表参加停战谈判。4天前，张治中回到重庆，张群立即要求交班，张治中却不同意，执意等张群先把停战问题谈妥了再说。张群在文件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心想，这下可以交差了。

看着放到自己面前的文件，周恩来的脑海中出现了3个月前的那一幕。去年10月，在桂园（张治中的住处，毛泽东当时就住在那里）经过40多天谈判，达成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上面签字的也有张群，还有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中共的代表是他和王若飞。

那次谈判刚开始不久，国民党19军军长史泽便指挥17000多兵力，向上党地区发动了进攻。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电报，请示对策。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是担心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毛泽东看了电报说：“告诉他们，要打，狠狠地打！他们打得越好，我在这里越安全。”刘邓于9月10日发起攻击，开始了上党战役。

按时间计算，他在纪要上签字的那天，上党战役正在激烈进行。签字后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又发出“围剿”共产党军队的密电，中共中央也发出指示，要求解放区军民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次重开和谈，协议停战；本是人心所向，党心所向。党中央早在抗战结束后就提出了无条件停止内战的问题，毛泽东也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檄文中提出“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而且对党内指示：“国内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蒋介石却虚与委蛇，一门心思放在抢地盘搞独裁上。他虽然嘴里也说和平，心里却想借此机会溶化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如今他走向谈判桌，实属另有所图。而美国人之所以积极敦促，其中自然另有一层微妙因素。周恩来心里明白，这一次的军事调处，实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斗争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是国共两党以及美国对华基本政策在外交斗争上的折射……周恩来怀着复杂的心情，挥笔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最后签字的是马歇尔。他动作很快，立即写上了“George Catlett Marshall”的英文签名。这颇像一个商人谈妥了一笔买卖，害怕对方再反悔，急于签了字使其具有法律的效力。当然，他心里也明白，签了字的协议也未必有多大作用。但不管怎么说，有协定总比没有协定好，它对于对立情绪如此之大的两个党派，总有点约束力吧。

马歇尔放下手中的笔，轻轻出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这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美军参谋长时所用的心思和精力，一点儿也不少啊！

为了监督停战令的执行，张群和周恩来还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协议规定由国民党、中共和美国三方各派一人，在北平成立军事

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为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郑介民，美方代表为饶伯森。

签字仪式顺利地进行完了，满满的三杯红色葡萄酒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又增添了一道鲜艳的光环。

3. 谁破坏了政协达成的协议

在达成停战令的当日，政协会议开幕。

政协会议能够开成，与马歇尔将军使华有很大关系。马歇尔是个中国通。1923年至1926年他曾在美军驻天津的步兵第15团服役三年。所以，杜鲁门总统选中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给马歇尔的信中规定了特使的基本任务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得中国的统一，同时实行停战，特别是在华北要实行停战。”杜鲁门要马歇尔“以最坦白的态度和蒋介石及其他中国领袖谈话。尤其是涉及中国在经济方面希望得到贷款与技术援助，以及在军事方面的援助时（我的意思是已经提出了的美国军事顾问团，我在原则上已经同意），你可以表明：一个不统一的和为内战所分裂的中国，事实上不能被认为是个适当的地区，按既定方针而得到美国的援助。”在此之前杜鲁门答应了给蒋介石政府20亿美元的贷款。他把这个胡萝卜给了马歇尔。蒋介石如呼招呼就给，不听招呼就不给。杜鲁门接受了罗斯福和蒋介石打交道的教训，对付这位曾和史迪威闹翻过的东方君主光有措词严厉的电报是不行的。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1日到了南京，会见了在南京的蒋委员长和他的夫人，全面阐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他这次来华的使命。特使最后有礼貌地说：“假如蒋委员长未做出合理的让步，使取得政治统一的努力都归于破灭，而美国又放弃对蒋委员长的继续支持，那么接着将发生这样的悲剧性后果：一个分裂的中国；俄国可能再度在满洲取得权力；其结果就会使我们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归于失败或遭到损失。”

不看佛面看金面，蒋介石表示遵从杜鲁门总统的意见。下达了停战令并答应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上午10时，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各党派代表明人参加。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亲自主持开幕式。他在讲话中作了保障人民自由的四项诺言：

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

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政协会议开了20天。1月31日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五项议案。蒋介石致闭幕词，对于各项协议，这位国民政府主席表示：“我敢代表政府先声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但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

关于在政协会议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中共对斯大林有所请教。1月17日，苏联大使向周恩来转达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的意见：“由于情况不了解不能提具体意见，但中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军队和空军会压下来，要对美国有足够的

估计。”周恩来及时把这一信息电告延安的毛泽东。

2月25日，中共中央授权周恩来同张治中、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到年底全国军队应为108个师，每师人数不得超过14000人，其中中共部队编成18个师，占军队总数的六分之一。在1947年8月以前，政府军应缩编为50个师，中共军缩编为10个师，合计为60个师。

3月4日，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到延安。毛泽东对马歇尔表示：“东北问题内政和外交应分开，外交目前应由政府与苏联直接商办。内政应停止冲突后整军，改组政委会及省政府，实行民选县长。”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亦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我不会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愉快地答道：“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毛泽东和张治中对国共合作前景的乐观态度都是真诚的。

在共产党人作了重大让步，准备履行政协协议和裁军协定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吵翻了天。3月1日至3月17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第一天，蒋介石以总裁身份致开幕词。第二天，吴铁城作党务报告。下午检讨党务报告时，谷正纲在会上大喊：“救国必先救党，应以革命精神，反对反革命势力。”有人指名道姓，要求开除冯玉祥、邵力子、王世杰、张群诸人的党籍，后三人都是与中共和谈的代表，右派指责他们“对党不忠心”，“将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对其他政党大妥协了”。中央社发消息对于此种攻击大声赞场，称之为“热烈情绪为历届大会所罕见”。

3日，军政部次长林蔚代陈诚作军事复员报告，对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军事三人小组签署的“军队整编基本方案”只字未提，但在报告复员数字和保留军队数字时，完全推翻三人小组的方案。按三人小组方案，国民党军队至年底应保留150万人，林蔚报告是保留347万；至1947年8月，三人小组方案国民党军队应减至84万，林蔚报告是减至280万人。黄埔系军人坚决反对裁军。北平《益世报》3月10日称，以何应钦为首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抗战军人大同盟”，提出四项主张：一、反对政协会议；二、武力接收东北；三、反对裁军；四、继续剿匪。

5日下午至6日上午，在讨论王世杰的外交报告时，反苏声浪甚高，白崇禧等发言主张对苏联“诉诸武力”。

7日、8日全会讨论孙科之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内战叫嚣达于高潮。有人竟说接受政协决议是“党国自杀”，不断咆哮“宪法修正原则必须纠正”，“中国应采用五院制、总统制”，“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蒋介石的态度是：“就其大端，安筹补救”。经过顽固派一番补救，好比行家里手在棋盘上移动几个重要的“子”，代议制、内阁制的民主政体的格局就变成了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格局。

政协《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规定：

立法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

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

总统经行政院决议，得依法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

这里的要害是相当于议会的立法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相当于总理的行政院长的任免，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坚决反对这一条，作出决议：“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坚持1936年5月5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根据“五五宪草”制定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在这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每个委员，按照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定，又必须宣誓“誓以至诚服从总裁命令，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要坚持的“国家根本大法”，就是这样一个领袖至上的独裁体系：全国人民都要“依法律”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要服从主席蒋介石，主席蒋介石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个委员又都要誓以至诚服从总裁。蒋介石主持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正案，蒋介石又主持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正。《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社论《出尔反尔》指出：“实质上，国民党内反动派所反对的是代议制民主政府，是多党内阁制，是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制衡；他们主张的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连不同意权和不信任权也没有的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一党独裁个人独裁的政治。”

3月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发表宣言，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协议，而且一字不提国民党将执行整军方案。

3月1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持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此点望你们即与民盟人士商量，并在适当时机告知国民党。”

同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党全军发出了《中央关于蒋介石反革命方针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坚持斗争的指示》，提出“我们反对分裂、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些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立于主动地位。”

从此，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再不提“和平民主新阶段”，虽仍不放弃“和平”的旗帜，只是作为揭露对手内战部署的策略运用，专心致志地转入对长期战争的运筹谋划了。

谁破坏了政协决议？谁破坏抗战胜利后中国这个唯一的化干戈为玉帛的转机？国民党和蒋委员长本人。这是《马歇尔使华报告书》得出来的客观结论。马歇尔说：“在1月、2月和3月初这一段时期，在达成了有关停战、成立联合政府和整编军队的协定的时候，没有理由怀疑共产党的诚意。”“对履行政协决议唯一的反对来自一些国民党内重要而有势力的人物，这似乎是无疑义的。但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在较小的程度上）坚持说，蒋委员长本人就居于通过一部独裁主义宪法的运动的幕后，他希望建立一个装门面联合政府，以影响美国舆论，以此为他获得美国财政经济援助铺平道路。”

马歇尔的调处到此时应该说是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为此，中共对他的调

停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时说：“马歇尔特使促进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

周恩来一再地向马歇尔转达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他的致意，感谢他对中国民主进程作出的努力。

4. 马歇尔玩不过蒋介石

3月4日，三人小组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在背后屡屡地发泄对马歇尔的不满。

自从协定达成之日起，蒋就决意要推翻它了。政协会议还在进行之中，国民党顽固派就演出了沧白堂事件，辱骂、殴打政协委员。1月30日政协会议行将闭幕时，国民党右派谷正纲、张道藩等大闹中央党部。蒋介石听之任之，私下对人说：“我对宪法草案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息通过，将来再说……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

而实际，他还没能忍到国民大会，就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政协会议。马歇尔却因为调处工作有了初步成果，准备于3月11日回国述职。在临走之前因急于在东北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他向蒋介石发出一份备忘录，要求派执行小组去东北，而蒋则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5个十分苛刻的条件。

马歇尔竟置中共方面提出的抗议于不顾，把蒋介石的这一方案提交三人小组讨论。这是马歇尔在调处中第一次偏袒国民党。这个草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共方面的反对。

马歇尔回国后，由吉伦中将作为他的代表参加三人小组工作。在马歇尔的一再催促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军调部执行小组三方人员去东北。但是国民党方面却对执行小组的工作一再地制造障碍。

4月，国民党方面以5个军11个师的兵力，南向本溪，北向四平发动猛攻。此时马歇尔返回中国，立即着手调处东北内战。他向蒋介石抱怨，“政府过去的行为是致命的挑衅，而且有时是不可原谅的愚蠢”。

蒋介石却向他埋怨美国对其支持不够，并称由于苏联支持中共，东北局势已难收拾，政府军有被全歼的危险，也可能撤退，要求马歇尔答应再运两个军去东北。

马歇尔不顾中共方面的警告，采取了两项自相矛盾的措施：帮国民党运两个军到东北，同时提出一项东北停战令草案。

这样当然是无法停下战事的。于是得到了更多部队的蒋介石加紧进攻中共所占地方，强行夺去了四平、长春等城市。

5月上旬，杜鲁门总统给马歇尔一封信，要求他在1946年7月左右继贝尔纳斯任国务卿。马歇尔接受了这一任命，但表示他不能在9月之前离开，希望国共双方能在这时限之前达成协议。

5月12日，马歇尔提出一项新的命令草案：

一、国民政府和中共方面的军事和行政官员皆不得阻滞执行小组的行动；

二、执行小组如对调查地区和步骤产生意见分歧，作为小组主席的美方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

周恩来认为此提案破坏三人协商一致的原则，拒绝签字。

而在此谈判紧要关头，蒋介石竟提出要去东北，马歇尔相信蒋介石占领长春即停火的承诺，还把自己的座机供蒋使用。周恩来表示，蒋介石此时跑

到东北去，表明他仍企图以武力解决东北问题，要求派执行小组去东北，但遭到了拒绝。

蒋介石到东北后，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又由宋美龄出面致函马歇尔，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停战要求。其目的还在于让马歇尔暂时不要进行调处。

马歇尔对蒋介石的行为表示不满和忧虑，要求他“立即下令在24小时内停止前进、攻击及追击”，并以一个战略家的分析判断，警告蒋介石孤军深入的危险性。

其时国民党中王世杰和宋子文等都劝说蒋介石，要他顾全马歇尔的面子，不能断然拒绝马歇尔的建议。

6月3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在马歇尔和中共方面的坚决要求下，他只得同意派执行小组去长春，并于6月6日发布东北停战令，宣布休战15天。中共方面也作了同样的声明。

在接下去的谈判中，蒋介石仗着在东北有军事优势，提出一个十分苛刻的整军条件，要中共撤出热河、察哈尔，山东的烟台、威海卫，苏北和东北的哈尔滨、牡丹江等城市，作为补充办法。马歇尔在6月18日与徐永昌和俞大维的会谈中指出，蒋介石的这些条件太苛刻了。如果中共同意这种建议，无疑将完全被政府的军队控制住。中共是决不会答应的，希望蒋介石撤回此方案。马歇尔将此方案给周恩来看。周即愤怒他说，蒋介石真是逼人太甚，简直无法谈判下去了。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致函蒋介石，指出内战大火有一发不可收之势，要求三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

在中共代表和马歇尔的要求下，蒋介石于21日宣布停战至6月30日，但他又提出两个附加条件：

一、胶济铁路沿线中共军队于8月1日前撤退到铁路两侧30公里以外地区；

二、6月30日前修改三人小组和军调部达成三方一致的原则，给予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

中共为了推迟内战爆发，对此作出了让步。6月24日的三人小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终止东北冲突、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的指令及解决军调部及执行小组中某些争执的条款。

但是由于蒋介石一再提出无理要求，致使东北休战期间的谈判毫无结果。

6月26日，国民党大举进攻鄂东、豫南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7月12日，国民党50万大军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长达数百里的战线上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蒋介石作好了全面内战的准备以后，就跑到庐山上去了。

虽然马歇尔于1946年7月29日下令禁止武器输入中国并催促美国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但是，这些对国民党的约束只是表面上的和名义上的。其实美国暗地里总在设法再度为蒋介石提供武器援助。例如，一项关于剩余物资移交的特殊协定就使国民党受益匪浅，它使国民党得到了那些早先已运入中国的大量的美国军事装备的库存。

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对战后中国局势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按照美国的利益来解决国共之间的纷争。美国虽然把“扶蒋反共”确定为对华政策的原则，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的国内状况，仍然试图在中国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他们所设计的解决国共冲突的方案实质，是在美国出面

调停之下使国共成立某种“联合政府”之后，让国民党让出部分权力给共产党，同时着手所谓“民主改革”以换取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独立的政府，把共产党联合、统一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中去，从而达到不战而降服共产党的目的。这正是 1946 年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的任务。这一使命一方面谋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国内战，另一方面又坚持单方面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

为了在同马歇尔打交道的时候占据有利的地位，为了加强美蒋的特殊关系特别是能得到更多的美国援助，蒋介石与马歇尔谈判时打了“苏联牌”。例如，蒋介石一再夸大苏联对中共的政治影响及苏联在华事务中的作用，其目的和企图在于以苏联因素为借口来刺激、要挟美国。当时正是美苏冷战加剧、欧洲局势紧张的时候，华盛顿面临其雄心勃勃的全球战略同其有限力量之间的矛盾。随着 1946 年春季美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中国的份量在苏美对抗中日益显得重要。为了不让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美国不得不支持蒋。1946 年马歇尔的使华，与其说是一种调停国共冲突的努力，还不如说它是为了阻止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进而也就阻止了苏联在中国的胜利。在马歇尔使华期间，苏联军队已开始从满洲撤离，然而大战结束一年多了，美国仍有大约 2 万名军人驻留在中国。当时的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向内阁其他成员解释说，这是因为如果美国军队撤退，接踵而来的将是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动乱和灾祸”。艾奇逊进一步说，“我们不干涉中国人的事，但是我们将通过我们明确无误的存在，通过我们的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去阻止）某些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在冷战时期，美国人形成了一个信条，即不论世界何地，如果共产党取得胜利，都将自然地使苏联受益而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杜鲁门政府不惜让美国承担起了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义务。

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以及随着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不断升级，蒋介石的“苏联牌”起了作用，马歇尔不得不一步步向蒋介石退让、靠拢。事实上，就在马歇尔以“中立”身份调停国共冲突期间，美国对南京政府的援助，不仅一再延长租借援助，而且就其数量、范围、程度而言，都大大超过了对日作战时期。其主要援助项目包括：（1）美国海军陆战队数万人留驻华北，替国民党控制区的要害部门作警备；（2）迄 1946 年 6 月止，美国帮助蒋介石共运送和调动了 54 万国民党军队去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内战前线；（3）到 1946 年 6 月底，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总额已高达 78100 万美元，超过了“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抗战期间帮助国民党发展现代化武装力量的数额。（4）将原值 8 亿多美元的西太平洋战时剩余物资，以 17500 万美元的廉价转让给南京政府。美国的援助不但大大增强了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而且坚定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蒋介石坚信，在国共冲突中，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始终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政府，决不会或不能抛弃他，即使国民党处于危险之时，美国也会给予有效的援助。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美国援蒋的政策，美国军界和国会内外也有一部分“亲蒋势力”大力鼓吹加强对蒋援助，美国国内也有一部分有识之士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首先，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全球战略安排应是“先欧后亚”，中国在对美国国家安全重要性的次序上只列为第十四位（见《美中关系白皮书》）；其次，面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统治危机，国民党虽在军力上占一定优势，但失败似乎是迟早的结局，除非美国接管中国整个政治、经济及军事的责任，否则国民党失败的局势是无法挽救的。而让美国接管中国这显

然是一种不现实的“天方夜谭”。因此美国不应把其有限的力量去对国民党提供大规模援助，不应把自己缚在没有胜利希望的国民党的战车上。但可惜的是，这些明智的意见没有得到官方足够的重视。出于美国全球战略考虑和反苏反共的需要，美国国务院决策者决定，虽然美国不希望看到国民党的败落，但美国不应放弃“扶蒋反共”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对华策略只能是维持对国民党政府的有限度、有条件的援助，尽量发挥美国在中国事务中更多的影响力。1947年1月，杜鲁门召回了马歇尔担任国务卿。

5. 毛泽东对马歇尔彻底丧失了信心

中国共产党早已看透了美国的险恶用心，并看清了美国对于苏联以及对几乎所有的亚、欧革命运动所持的敌对态度，因此不再对美国报以任何希望，再不相信马歇尔能够“一碗水端平”了。

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的长篇宣言中严厉指责美国“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下，企图代替日本的位置，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取消对华租借法案，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立即自动撤退一切在华陆海空军。

这是从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声明发表半年多以来，中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公开的严厉批评。翌日，周恩来将宣言转交给马歇尔，并指出，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美国有必要作出明确的选择。

7月11日，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先是提魏德迈，但中共坚决反对，马歇尔不想让他的调处工作更加困难，就选换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传教士家庭，长期从事教会教育，当时已经做了许多年的燕京大学教务长，堪称是个“中国通”，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与国民党和共产党高层领导人都有良好关系。这正是马歇尔所需要的。

司徒雷登在8月1日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建议组织一个5人特别小组，包括国共双方代表，由司徒雷登任主席，讨论政府改组问题，获蒋同意。但是又提出要中共出让更多的地区，以作为停火、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

8月6日，司徒雷登把这些条件向周恩来转达，周表示中共决难答应。司徒雷登问有没有商量余地，周恩来断然他说：“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

司徒雷登出师不利，与马歇尔发表联合声明，称国共双方无法就制止冲突问题达成协议，实际上是承认了调处失败。

马歇尔不甘心就这样失败，想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迫使其接受调处。他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自8月起对国民党政府暂时实行武器禁运。但因为蒋介石早已有较充分的武器装备，并不吃他这一招。其次，马歇尔又代杜鲁门起草了一封信，并由杜鲁门发给蒋介石。信中称如果在短期内中国国内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就有必要对美国人民作重新说明和解释，并希望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但蒋介石根本没把司徒雷登、马歇尔的声明和杜鲁门的信放在眼里，在他写给杜鲁门的一封回信中，只是一味地指责中共，为其僵硬蛮横立场辩解。

杜鲁门没有等来蒋介石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对蒋却也无可奈何，他给蒋再次写信，重新提起1945年12月15日的声明，却没敢说，如果中国内战不停止，美国对华援助就中止。

蒋介石对杜鲁门的这封信根本就不予置理，而杜鲁门也无对策了。

9月15日，周恩来向马歇尔送交备忘录，抗议美国援助蒋介石。

9月29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说：“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对马歇尔调处第一次进行了公开的严厉批评。毛泽东愤怒地说：“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

从7月18日到9月中旬，马歇尔风尘仆仆，八上庐山，反复向蒋介石说明，国民党军事首脑认为可以打垮中共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坚持这样做，一场长期而残酷的内战将不可避免。但是蒋介石还是置之不顾，一味地进攻中共地区。

在此情况下，无可奈何的马歇尔特使只好使出最后一招，说如果蒋再不停止向中共方面进攻，他就建议杜鲁门总统将其召回。蒋介石见此情，才答应停止进攻5天，同时又提出两个对中共十分苛刻的条件。中共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此后虽然马歇尔一再地提出一些调处方案，却是以蒋介石已经占领原属中共的地区为谈判点，就等于承认蒋介石的进攻是合法的了，所以被中共方面拒绝了。

而后蒋介石又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为了给这个大会披上一件和平外衣，蒋介石发布了“停战令”。马歇尔明知这种停战令“含有以重开战事来强制推行一个政治决议的明显的威胁”，但他仍向周恩来游说，让中共参加“国民大会”。

中共坚决拒绝，并立即由周恩来率部分代表飞返延安。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通过这个条约在华获得了如下主要权益：（1）中国向美国开放全部领土，美国在中国“领土全境内”享有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利。（2）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支配和使用等，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3）美国拥有变相的领事裁判权，中国的法律不能施用于美国商人，（4）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一切口岸、地方和领水自由通航，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遇到任何“危机”时，可以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5）对美国输入中国或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6）双方在任何时期内，对同一第三国或数国敌对行动，侨民可以承担军事训练和服兵役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曾于1947年2月1日发表声明，代表中国人民表示坚决反对和不承认这个掠夺性条约。

1946年11月20日，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损害中国领空主权的《中美空中运输协定》。

12月18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企图为美国援蒋内战的对华政策作辩解，借以蒙蔽美国国内及世界各国的舆论。他竟然颠倒是非，把国共谈判破裂的责任归之于中共，并表示将继续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

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暴行案，引起全国学生

的抗议美军暴行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爱国运动。

至此，马歇尔的调处完全失败。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沮丧地离开中国，结束了他一年多毫无成效的调处。

在马歇尔结束调处前夕，蒋介石还一再地希望马歇尔留下来做他的顾问。但马歇尔深知蒋介石并不是需要他的见解，留下他是为了更多的美援。此时他已经被一年多的调处折腾得心力交瘁，对蒋更是没什么好感，就一口回绝了。

1947年1月10日，周恩来就马歇尔离华声明发表广播演讲指出：“一年前，全中国人民都在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对华声明和马歇尔将军的来华调解。但是为时不久，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已原形毕露，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外交也暴露无遗。”他要求美国不要“继续过去的错误，停止援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不再干涉中国内政，重新调整中美关系，那一定会大有助于中国人民对于和平民主与独立的努力，也更有助于远东与国际合作”。

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坚定明确的，态度是诚恳的，政策主张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然而，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的错误政策却越陷越深，越来越采取更为公开的扶蒋反共政策。

中美两个民族在以往的一个世纪里所遭受的截然不同的经历，特别是美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举行的对华政策，使得双方不仅在战争年代难以相互理解，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无法建立起圆满的关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革命”的认识，作为影响政治和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美国人和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美国人把革命看作一个十恶不赦的怪物，他们认为革命就是要打翻一切正常秩序，引起无政府状态，或是引起暴政；革命还势必导致对私人财产的蓄意毁坏或非法占据，而且革命还在国际范围内纵容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但是，革命对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来说，却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唯一途径。

第6章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当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的苹果树下，说了一句带着浓重湖南腔调的英语：“纸老虎”“拍拍——太根儿”（paper—Tiger）。这句话顷刻间成了名言。

1. 毛泽东知道美国最近发生的许多事

当美国用原子裂变的火球将人类带入核时代，在中国西北角黄土高原的窑洞里，一双明察一切的眼睛正在煤油灯下注视着世界。

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对原子弹这东西有那么深刻、那么精确的见解，有那么大气，那么从容的心胸。

1945年8月13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才一个星期，毛泽东就谈到了原子弹。毛泽东说：“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

“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

一年后，毛泽东又以他特有的气魄和幽默，给“神乎其神”的美国原子弹取了个很形象也很别致的名字——纸老虎。

1946年7月1日，美国在南太平洋比基尼岛附近放了一大堆陈旧的军舰和绵羊、猪、鼠等试验品，进行了一次代号“十字路口行动”的核试验。一架B-29轰炸机投下了地球上第四颗原子弹。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进行的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据专家们说：“这一试验在纯军事方面的效果是不大的，可是在心理上的收效却很大。”与此同时，从1946年6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反动派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在他的高级将领会议上狂妄叫嚣：“不消灭共匪，死不瞑目”，并要在“3个月消灭共军”。气焰十分嚣张，不可一世。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进步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她于1885年生于美国中西部，197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她生命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故乡美国度过的，另外的三分之一是在被她称为“理想的归宿地”的红色中国度过的。

从1925年首次来华起，她总共6次来到中国，她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的黎明》等著作，使中国人民在世界范围内找到了更多的知音，使中国革命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和理解。

斯特朗是 1946 年 7 月 6 日从美国飞抵上海，然后又到达北平，同月 31 日搭乘美军观察小组飞机飞往延安。8 月 6 日，斯特朗在担任翻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和马海德大夫陪同下，乘大卡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家。

卡车在泥泞不堪的河堤上滑动，从砾石中择路行进，越过深谷，爬上了另一边的杨家岭。在陆定一和马海德的陪同下，安娜·路易斯登上了一段陡峭的小路，路两旁是玉米杆子和薯类作物。过了陡坡，她发现自己已经到达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窑洞门前了。

毛泽东正在等候着这批客人，他坐在窑洞前的黄土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思考着问题。他的小女儿紧缠着他要移动的那条腿。他穿着深蓝色制服，膝盖部位有大块补钉片。安娜·路易斯的第一个印象是，毛泽东是“一位高大的男子汉，具有中西部农民那种不急不忙、魁伟厚实、举止大方的特点”和一种“由深遂而机灵的理智所引导的自然生命力”。毛泽东迎接他的客人时是那样谦逊质朴，使得安娜·路易斯原来的紧张心情顿时消除了一大半。在黄土平台上的一棵苹果树下，宾主四人围坐在四条矮凳上。窑洞后面，一座小山陡然壁立又陡然下陷，形成一个小山谷。谷底有块土地，毛泽东在上面种了烟草，为他自己提供卷纸烟用的烟丝。

斯特朗在她的回忆中写道：

“我们坐在土坪的一棵苹果树下，整个下午直到日落，远处的山都历历在目。他的小女儿穿着一身花布衣裳，围着她父亲玩耍，有时伏到父亲的怀里，受到她父亲的爱抚……”

“我们谈话不久，我就注意到在毛主席的窑洞上方大约 20 米的草丛里有响动。不久以前胡宗南的飞机曾经在离毛主席住的窑洞不远的地方丢了一个小炸弹，所以这时我就猜想大概那里有警卫员在警卫主席的家。我问：‘那儿有谁？’”

“‘是另外一家。’毛主席说，‘他家的孩子对我的外国客人发生了好奇心’。这给我上了一课：人类的好奇心是相对的。原来引起山上的人注目的倒是我自己。在他们看来，毛主席是同他们合种山上一个菜园的邻居。”

“我们谈话毫不拘束。翻译又是那样流利，毛主席自己的态度又是那样富于表达力，因而我并不感觉到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他的思路广阔无垠，考虑到古今中外的事情。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因为我是几星期前才离开美国的，而他 20 年来同国外连通讯的关系也没有。他安排情报工作就同搞军事战略一样用心。清凉山上那些监听新闻的小接收机为他所收集的情报是惊人地完整。他还曾一度通过军调部的飞机从世界各地运进书刊。许多美国新书已经为他全文或摘要翻译成中文。当外国客人来延安访问时，他也向他们打听各个国家的情况。”

2. Paper-Tiger

斯特朗尽力之所及回答了毛泽东关于美国的问题后，才提出了关于发生美苏战争的危险的问题，从而开始了现在已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内的那次谈话。

斯特朗问：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希望没有？

毛答：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態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问：如果美国除了它所已经给的以外不再帮助了，那末蒋介石还可以打多久？

答：一年以上。

问：蒋介石在经济上可能支持那样久吗？

答：可以的。

问：如果美国说明此后不再给蒋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

答：在现时还没有什么征象，表示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有任何在短时期内停止战争的愿望。

问：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答：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问：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怎样回答呢？

答：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问：你对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如何看法？答：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你知道，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经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现在美国反动派的做法，也正是这样。

美国反动派要掀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他们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美国人民应当起来抵抗美国反动派的进攻。我相信他们是会这样做的。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反动派不想进攻苏联。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地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的。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毛泽东把茶杯和小白酒杯摆在桌子上，表示“美国人民”将“美国帝国主义者”同战争隔开，而美国和苏联之间还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个地带的国家没有愿意卷入战争的。毛泽东把火柴盒和香烟放在这个地带，打趣地说哪一样东西代表哪一个国家。他说：“各国人民的合作，如果搞得不好，就可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否则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发生。”斯特朗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但她又问道：“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

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对“纸老虎”这个词特别感兴趣，他停下来看看这位美国记者是否领会了它的确切涵义。陆定一最初把它译成 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陆停下来，要斯特朗解释 Scarecrow 是什么意思。

斯特朗说：是“稻草人”，农民把它竖到田里吓唬乌鸦。

毛泽东说：这样译不好，这不是我的意思。纸老虎不是呆在田里赶鸟用的，而是吓唬小孩子的。它的样子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见水就软。

马海德在一旁听出了二者的不同，插话道：“不是 Scarecrow（稻草人）而是 Paper-Tiger（纸老虎）”

毛泽东点头笑了，用带着浓重湖南腔调的英语说：

“拍拍——太根儿（Paper-Tiger）！”

说完他就对自己的发音笑了起来。

这句话，以后成了毛泽东最喜欢说的一句英语，成了一句世界性的历史名言。

毛泽东说：“一些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又举例证明他的观点，他说：“在 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停了一下，毛泽东又用英语说道：“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

斯特朗问：“请等一下，我是一个记者，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毛泽东说：不要只那么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利益，那么他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

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就会被雨冲跑。“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世界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大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黄昏渐近，山岗上的吵闹声惊动了安娜·路易斯。邻近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来看这位高大的外国女人。毛请她跟他换座位，好让孩子们更清楚地观察她。她照办了，并对马海德说了句诙谐话：在延安，一位西方记者比主席本人还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当他们重新开始他们的谈话时，毛的年轻妻子江青出来泡茶并邀请客人共进晚餐。饭菜在枣园准备，枣园从毛的住处沿河而上约五公里，靠近朱德住处。毛泽东建议他们到那儿再继续谈。

晚餐是西红柿等青菜和特制甜点心——八宝饭。由于延安财政拮据，八宝饭只有四样配料：李子、核桃、枣子、花生。这甜点心是为表示对安娜·路易斯的敬意特别准备的，因为所有大米都必须从长江一带的解放区辗转运进延安。当他们谈到延安近些年来情况时，毛泽东说：“12年前，我们南方人刚到这里时，感到北方这种小米饭很难咽下去。”

安娜·路易斯又回到原子弹问题上来：“美国人可以轰炸俄国任何一个城市。”毛大笑着说：“苏联是个大国。比基尼岛的核试验还不能杀死所有的猪呢。真正有力量的是共产党人。我们是小米加步枪。这小米加步枪比大炮或飞机炸弹还要强些。”安娜·路易斯懂得，毛绝不是对新武器的威力无知。他晓得，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那时都相信美国手中炸弹的威力完全改变了历史进程，而且给了反动派一种无敌的力量。斯大林本人当时就在劝告中国共产党人缓和与他们与国民党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因为他怕美国把原子弹使用到中国乃至苏联国土上来。毛泽东想要在中国消除这种失败主义。而更加重要的是，他要向斯大林表明，中国党不但不同意而且绝不可能按他的建议去制止向长江进军的任何行动。

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毛泽东和安娜·路易斯约定几周后再见面，并且建议她到处走走看看。灿烂的群星照耀着荒野上难以征服的丘陵，毛泽东陪同安娜·路易斯走了一段路，然后送她上马，由人带领她翻越山岭找到了等候着她的大卡车。

3. 毛泽东的回答使她感到意外

在延安，安娜·路易斯感到无比愉快，这是她忆想所及的最快乐的时光。这里有着稳定不变的工作秩序，但是没有不可逾越的专横权力。除了国民党飞机偶尔“光临”轰炸时，安娜·路易斯会跑出去看一看以外，几乎再没有任何东西能扰乱她了。她平静下来，轻松自在，注意力集中。“在延安没有紧迫感，然而有着时代感，有着对时间和空间的感受。这里感受到大地上一年的四季的缓慢循环，这里感受到中国耕地扩展的极端困难。大地上空，太阳照常旋转，带来了播种与收获……因此，延安不管战事如何……（都是）……一个和平安全都有保障的地方。”

安娜·路易斯在延安县境内到处旅行。她到南泥湾同农垦工人交谈。农

场是从荒山坡上开辟出来的。她跟医生、护士们谈话；跟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的教师们深谈；又跟延安文艺演出学校的男女演员们交谈。延安有管弦乐音乐会，也有演出曹禹、鲁迅以及其他著名剧作家作品的话剧，还有讲演会和定期讨论会。一家中文日报和一家英文周报，使得人人能及时了解当地和国际上的新闻。斯特朗感到：共产党人不仅是住在延安，而且把这个落后的中国城镇改造成为一座综合性的、繁荣昌盛的文化城。安娜·路易斯一生梦寐以求的居住地就是像延安这样的地方。

她在延安或是对组织机构采访调查；或是访问党的领导人，谈论中国的共产主义。陆定一用3天多时间，向她介绍中国共产党长期而复杂的历史。他特别强调了这个党的中国特性，最后说道：“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的特殊斗争中来。他的政策从来不是照抄照搬某些书本，也从来不是单纯以个人经验为基础。……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是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狭隘的经验主义。他主张研究理论，也提倡这句格言：没有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在同刘少奇的谈话中，刘又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特殊性问题。安娜·路易斯认为他是仅次于毛泽东的最卓越的党的理论家。刘对她说，毛引导农民参加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式的转变成亚洲式的”。为了举例说明，刘指着给他们端来花生的“小鬼”——人们是这样称呼当通讯员的孩子们的。“他晓得花生只是招待宾客或生日集会时才吃的。他从来不会要求这些东西或是任何工资……但他意识到自己是同志们当中的一员，也在为中国有较好前途而战斗，因此他就感到愉快。我们中国还没能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产业工人队伍，但是我们有千百万像这个小鬼一样的小家伙，他们比产业工人更有纪律性和献身精神……他们的阶级觉悟是很高的。这样的人，还从来没有被马克思发现。”

在即将离开延安去其他解放区考察前，斯特朗又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这次谈话安排在她就要离开延安的前一大晚上，杨家岭戏院举行晚会，先演节目，然后毛主席接见。看节目时，安娜·路易斯被安排在第一排席位上，就坐在党的领导人身旁。那天天气寒冷，大家虽然穿上一层又一层衣服，还是冷得直打哆嗦，幸好在舞台与第一排之间放置了许多炭火盆。演出结束后，安娜·路易斯同周和毛一起走进一座窑洞——那时洞内的人们都已转移，随便进哪个窑洞都一样安静。周给了她一本小册子——《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详细记载了毛泽东对党20多年斗争历史的总结。在他们首次谈话以后，美国又向蒋提供了价值近10亿美元的军需品。毛泽东对此坦率地表示出愤怒与失望。安娜·路易斯问他，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因此而担忧。他回答说“未必如此。在你停留延安的这个月里，我们就已消灭了国民党14个旅。……现在是从美国那里向蒋进行大输血，但同时这又是从蒋那里向我们再输血，蒋从美国取得供应，而我们要靠他取得这些供应。我们有人伤亡，但是蒋的士兵能及时取代补充。”这时，毛泽东以讽刺挖苦的口气笑着说道：“蒋的士兵今天被俘交了枪，明天就能站在我们一边去打仗。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十分严肃地继续说道：“这个战争很奇怪，20年来我们的一切东西都要靠敌人来供应。”

安娜·路易斯问及共产党人现在是否还有可能被打败，她以为回答一定是否定的。毛泽东的回答却使他感到意外。“这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妥善处理土地问题。如果千百万农民分到了土地，而且急切热情地保卫他们的土地……”他的语调从低到高，最后放声说道，“目前我们可能失去承德、哈

尔滨以及山东省的沿海港口乃至张家口。但是，农村土地问题将起最后的决定作用。”

接着，毛泽东又回到了他们初次会见时谈话的中心上来。他说，美国决定增强蒋介石的实力，这标志着“帝国主义者已有他们自己的决策，那就是要通过蒋介石，把我们国家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毛泽东也感到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一旦蒋介石对美国人的要求交不了差，美国人就可能直接介入。但是那样做，“对美帝国主义将是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已日益陷入维持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困境中去。摩天大厦倒很高，根基却较小”。毛泽东认为：“原子弹诞生之日，就使美帝国主义开始面临末日……因为帝国主义依靠原子弹而不是依靠人民……谁依靠人民，谁才需要维护和平。”他分析了技术、工具的不可靠性，继续说道：“谁依靠原子弹，谁就需要战争。这样，帝国主义与人民之间的对抗就日益加剧。原子弹消灭不了人民。唯一的结局只能是，人民消灭了原子弹。”

接着，毛泽东又给了斯特朗一本《关于边区的经济与财政报告》，它详尽地阐明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毛泽东希望她设法使这两份文件为全世界的共产党组织所知晓，并且特别期望她能把这些文件交给美国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毛又补充说，他并不认为她有必要把这些文件带到莫斯科去。毛欢迎她重返中国，“时间大约要两年以后，那时我们将会重新接触全世界”。

突然间，毛不再像是接见外宾了。毛开始下达指示，教她如何最妥善地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传播出去。如果有人提出所谓暴行问题，他说道：“就要力求使他们相信，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具有纪律的部队。当然，会有些违反纪律的事例。但是，更常见的是，报导者怀有偏见。”如果安娜·路易斯是同各国的共产党人谈话，就“请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是可以打败的”。毛一再强调这一点说：“这点很重要。许多人认为我们不能取胜，他们说战争会旷日持久地打下去而难分胜负。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你是向共产党组织谈论这一点，就说这是毛泽东讲的话。如果你跟其他人谈话，就说这是你自己的看法。”

“告诉美国人民，”他说道，“民主团体的力量并不是渺小的……他们能够打败反动派。告诉英国人民，不要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的力量。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对待他们的对手，往往存在着心理上的弱点。在欧洲大陆，不存在这种心理上的弱点”。他就原子弹问题作出结论说：“事情已过去了。蠢人们还在谈论它，但它绝不会再被人使用了。它在日本的爆炸，就已经消灭了它自己，因为全世界都起来反对它。原子能将会移交民用，而原子弹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说法，依仗美国原子弹撑腰的国民党反动派终于没斗过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第 7 章 《别了，司徒雷登》

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共产党同美国围绕着外交承认和防止外国武装干涉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新的较量。这场较量主要是通过司徒雷登进行的。

较量的结果是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毛泽东笑着说：“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1. 新任驻华大使

赫尔利辞职后，杜鲁门于 1946 年 7 月任命司徒雷登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生下来就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司徒雷登 1876 年生于中国杭州，其父是在华传教士。1896 年在美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899 年又进入神学院深造，获神学学士学位，后为牧师，1904 年婚后来华传教，1908 年任中国金陵神学院新约希腊文教授，1919 年任燕京大学校长，1929 年任校务长。日本侵华时期，曾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在这一点上颇得中国人好感。杜鲁门认为，司徒雷登在中国关系多，了解中国的情况，能够得到中共的认可，便于在国共间居中调停，因此在抗战胜利后，挑选他与马歇尔一道充当国共冲突的调解人。许多后人替他惋惜：如果他在战后不与马歇尔一起调停国共内战，如果他不在中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就任美国驻华大使，那么他仍然能保持教育家的美名，而不至于成为失败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遭到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辛辣的讽刺与批判。

惋惜代替不了现实。

1946 年 11 月 4 日，蒋介石派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驻天津总领事施麦斯，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

这个条约早在 1945 年年初，就已由美国国务院拟订出草案，在马歇尔使华期间，正式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提出，后来由司徒雷登着手谈判，并于 1946 年 11 月 30 日双方政府换文生效。

司徒雷登在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中美商约》过程中，正是中国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之时。这一商约，在文字措词上，表面上多系“互惠”、“平等”，但实际上，由于当时中美在各个方面力量极为悬殊，所谓的互惠不过是对美国一方的优惠。很明显，这个条约将中国完全置于美国的掠夺之下，成了美国的事实上的殖民地，受到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谴责。明眼人都清楚，蒋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签署这一条约，主要目的就是从其美国后台老板的腰包里得到更多的美援、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贷款，以供他打内战之需，消灭共产党，巩固他的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发言人陈家康尖锐地指出：

4 日签订的《中美商约》，乃不平等条约废除后首度签订的最不平等条约。请问南京政府，中国有什么能力去美国开办实业？要有，那也不过是一两家官僚资本集团。为了他们资金的安全，逃避到金元国家点缀而已……南京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为取得酝酿已久的 50 亿美元的商业借款及获得更大的借数与投资，以便加强统治与扩大内战。

此时的蒋介石，一味想的是在“5 个月内打垮中共军队”，为了换取打内战所需要的武器弹药，又相继与美国签订了《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中美同意美军驻华换文》、《中美海军协定》

等等丧权辱国的条约。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

“中国国民政府的这些措施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已经使并继续使中国陷于内战、反动、丧权辱国、殖民地化、混乱与崩溃的危机之中。本党为了挽救祖国的危机，维护国家的权益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尊严，兹特郑重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协定、谅解与今后来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司徒雷登一上任就遇上 一个令他非常头痛的问题。而他不得不——不论他是主动还是被动，卷入了国共中美间那些深刻而捉摸不定的政治游戏中去。司徒雷登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但他在观察中国问题时，还是带着一个外国人常有的隔膜感。他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及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认识远不及谢伟思及戴维斯等人。他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尽心竭力地维护美国在华利益，但他对中国的未来存在着十分明显的轻视。他孜孜不倦地劝导国民政府进行改革，希望通过剧烈的改革来挽救国民党政权，但对于这样一个专制腐败的政权，民主改革只会起促其分崩离析的作用。

美国问题研究者陈广相先生指出：作为大使，司徒雷登不可能不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但他不是被动的执行者，他对扶蒋反共倾注了个人感情，十分积极主动，在某些方面比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得更远。他把蒋介石与中国人民等同起来，对蒋介石推崇备至。又把蒋的意图与他自己的想法等同起来，以为蒋能显示出实行民主领导的能力。他盲目相信美国的影响力，相信他本人的影响力，因此在中国大陆解放后还企图对新政权施加影响。他总是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思想和行为常常处于矛盾之中，结果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也成了他自己幻想的牺牲品。1948年6月14日，司徒雷登大使就中国形势向美国国务卿提交报告时，他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大地上，“反美情绪广泛扩展”。6月30日，他又在报告中指出：“照这个速度演变下去，很难设想局势还能维持多久。”“如果没有持续不懈的美国指点，军事形势不可能改善，这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了。然而，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提醒我们，假如不顾其他因素给予支援，其结果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

2. 司徒雷登的如意算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华的影响已在西方列强中独家称雄。仅以中国海关统计，1946年美国在中国的进口贸易总额中已占有57.16%，居各国对华贸易之首。此外，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将势力渗透到中国的领海、领空与内河。当时，美国挟华以遏苏，蒋介石靠美以反共，双方利益可谓互利和互补。但经过“三大战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全中国范围内的胜利已成定局。这时在对华政策上，华盛顿面对着一个新的局面和一系列新的难题。美国的反共政策思想一时出现混乱：既想弃蒋又要反禁，既想维持门户开放又不愿陷入“泥潭”。

1948年岁尾的几个星期，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军事胜利。11月，刚刚取得了辽沈战役胜利的解放军又马不停蹄地向关内挺进，开始威胁华北平原的两大城市——天津和北平。次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将这两个城市占领。与此同时，在华东的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歼灭敌军50多万人，直逼国民党的首都南京。

在这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中,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49年1月1日向中国人民发表新年献词(这篇新年献词写于1948年12月30日——编者注),宣布:“中国的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现已认识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因此,他们越来越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即“利用现存的国民政府进行(他们的)‘和平’阴谋”。但是,毛泽东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面目已看得十分清楚。他接着宣布:“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

1949年4月23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城,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号中,美国并不打算马上放弃其在中国的全部传统利益。1949年初,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巴特沃思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不可低估的事实是,共产党将控制自满洲到长江中下游的人口密集的地区。这些地区集中了美国的许多利益,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也多居住在那里。因此,美国必须与这一大片土地的当政者保持接触,以便维护美国的利益。”

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一份代号34/1的文件(MSC34/1),将美国在华新目标表达为“让中国人自己发展一个对美友好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中国”。然而,该文件清楚地意识到,任何一个中国集团都不大可能被指望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编者注)难以指望还能生存多久,共产党又持不友好态度。鉴于此,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短期目标应该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在准备NSC34/1文件时,美苏之间的冷战已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柏林墙也全力修建达数月之久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明确指出美国应采取怎样的行动来避免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但却建议美国政府制定有关计划,以准备利用一切可能出现的机会,使美国政策“保持灵活性,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一个派别身上”。在如何认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方面,该委员会在34/1文件中规定了一条重要的限制性条款,即:“把中国排在另一些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更加直接攸关,与美国为之花费的财力更为相称。”

同月,恰逢艾奇逊接替因病辞职的原国务卿马歇尔继任美国国务卿。由于艾奇逊主张“与新中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与苏联分手”,因此司徒雷登便利用艾奇逊换任的机会和他的主张,同时凭借他本人既是美国官方代表、又是中国“友好人士”的身份,想通过与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关系、“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但这一时期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国务院的评介和政策设计,尤其是受“欧洲方位”政策设计者的代表人物乔治·凯南影响的1949年前后这一期间的政策设计,已不再强调中国的全面重要性,因而反对来自美国国防部的关于继续援蒋的建议,反对美国继续卷入中国内战。凯

南等人认为，就美国在东亚的利益而言，日本远较中国重要。因此美国应集中力量重建日本和菲律宾，构成一道亲美的、反苏扩张的“防波堤”。凯南提出，在中国，即使是共产党取胜，都不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也不会对美国遏制苏联有何裨益。在他看来，冷战的中心仍在欧洲，亚洲大陆不过是冷战的边缘。尽管凯南也接受了当时美国国内甚为流行的观点，即中国共产党或多或少是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但凯南却仍然设想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民族主义”因素有抵制苏联影响的可能。这意味着要求华盛顿在与中国未来的共产党政权打交道时，要采取灵活的战术。

1949年1月19日，在外交使团的一次会议上，司徒雷登与他的外国同行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各自向自己的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广州，每一个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再随行一些其他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人要在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

一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司徒雷登和其他国家驻南京使团的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使团随行。可司徒雷登对此已经不感兴趣了。他有足够的理由婉拒昔日盟友的邀请。

4月中旬，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已进入了关键阶段。司徒雷登考虑到谈判有可能破裂，届时国民党政府势必将会正式邀请外交使团南迁广州。为了促使国务院作出留驻南京的决定，他于12日主动给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份建议电，提出了3种可能的行动方案：

- 一、接受李宗仁的请求，随李氏飞往广州；
- 二、置李南撤于不顾，美国使团与其他使团按兵不动；
- 三、在李请求南撤而南京尚未被占领之前，华盛顿将我召回述职。

对于这三种方案，司徒雷登自己是倾向于第二种的，并用很长一段文字写下了留在南京的重要性。

司徒雷登一直坚持留在南京的用心，是想寻找机会跟中共领导人会面，借以宣传美国的主张，表明美国的态度。司徒雷登相信他在中国的个人关系具有特殊价值，所以他认为，如果他能够和共产党领导人谈谈，他就能对他们施加影响。

早在3月10日，他给迪安·艾奇逊国务卿发去一份长篇急电，建议美国政府授权他“不仅以美国政府官方代表的资格，而且以个人资格”和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作为个人”，他“不仅长期居住在中国，而且还由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而闻名：一方面坚定地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一方面坚决主张首先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密切中美关系”。

司徒雷登还希望，无论共产党会怎样把他和“好战的帝国主义”相等同，他以前的活动以及和许多共产党人的关系，都“不会被完全漠视”。

司徒雷登也承认。“指望通过我或其他什么人的影响使中共采取更宽容的政策，是天真幼稚的，但考虑到时局的致命危险性”，他又确信，“影响中共的努力是完全值得一试的”。

从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看，他之所以认为自己能对共产党施加影响，是因为他相信，共产党的反美情绪不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信念和对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憎恨，而且也由于对非共产党国家的过份怀疑和对美国意图的深切误解。他写道，如果这种误解“能被消除，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少，就能求得在中国的继续存在”。司徒雷登建议，要减少共产党的恐惧和误解，就得“在友好的商谈中”使他们的领导人知道，美国过去一直是中国的朋友，

并坚定地支持中国的独立，承认中国人民选择自己政体的权力；若能在此基础上消除相互间的疑虑，并为共同利益合作，那么，对中美两国来说都将是有利的。

司徒雷登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自以为有一些特殊的理由。他出生在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的上层领域有着广泛的经历和交往。另外，作为当过几十年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自诩从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有50%的人在共产党阵营里。他可以对许多中共的领导人以师生相称。

他曾多次对别人说：“师生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基本概念，我作为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

司徒雷登真诚地希望找到与中共建立工作关系的途径，对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加以怀疑；但是，这位老师也随时准备对他先前的学生加以责罚或与之断绝师生关系，如果他们被证明是不顺从或是不如老师之意的话。这样，他就要警告那些他要与之谈话的共产党领导人，首先提醒对方美国对中国一向以仁爱为怀，给予许多援助，希望不要以怨报德；其次，美国承认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中国也不得建立共产党制度，否则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就会“感到有义务去援助任何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并“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在向国务卿提出这一建议后，他似乎觉得有些不妥，便强调说，他不会将这一警告作为官方信息转达，“更不会作为带有任何最后通牒性质或威胁性质”的信息转达。

在仔细考虑了司徒雷登大使的建议电报后，美国国务院于4月6日回电司徒雷登，指示他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建立稳固的政权为止，届时再回华盛顿磋商；并授权他与“高级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以当面向他们陈述他建议中的要点，但不要带有威胁和最后通牒的色彩，尤其不要讲美国在某种情况下会“援助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或“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一类的话。在国务院看来，这类的话，即便是由非官方的形式讲出来，他会被理解为一种威胁，而且，“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无力承担对（国民党）中国进行全面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义务”，还建议司徒雷登不要把话说绝，注意保密，以免走漏风声，引起国会反对派的反对。

对华盛顿的决定，司徒雷登本人感到满意，他在4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务院消息。答复了我们大使馆的电报，批准了先前我留在南京的建议——我非常高兴。”

4月20日，解放军渡江部队开始挺进江南。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国民党军队狼狈逃窜。在南京城内，虽然解放军尚未进城，但在城里的国民党政府人员都已急急地逃离了。

22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用过早餐，国民党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便急急地来拜访了。他是代表李宗仁代总统正式邀请美国大使馆移驻广州的。

但是司徒雷登仍然不想离开南京。叶公超见他态度坚决，也就只好悻悻地走了。

拒绝了叶公超，司徒雷登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今兵临城下，难免人心浮动，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会不会改变初衷，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去呢？前些天，他向国务卿艾奇逊打过包票，说如果美国使馆坚持留在南京，那北约组织国家的使团都将会与我们协调一致的。这时他想万一那些国家的使节说话不算数，突然变卦可就难办了。

想到这里，他赶紧打了一通电话，与各国使团联络，建议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些国家的使节好不容易才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由司徒雷登主持的会议。司徒雷登把原先定的留在南京的想法又强调了一次，再次得到了各国使团的赞同。特别是北大西洋集团各国的大使，都表示向美国看齐，安心留在南京。

司徒雷登大使的日记记载了南京解放前后的情况：

4月22日，星期五。早晨……叶公超（代理中国外交部长）来访，正式地劝我迁移广州。……

11时——就迁往广州问题会见外交使团——一致表示不迁——都观望美国。

4月23日，星期六。中共昨夜占领下关——警察消失——有秩序地移交。中共报道有30万兵力渡过长江——到处都是背叛。

使馆人员举行长时间的会议——为我们自己的安全打算……处在包围之中。

到处都是抢掠。

4月24日，星期日。昨晚——一整夜都是火光、射击、爆炸……

中共在今天早晨开进——从容地叫当地人民观看——有秩序——有条理。

3. 黄华——司徒雷登会谈

在南京刚解放的几天里，司徒雷登静静地呆在家中，其实内心是很不平静的，几天来他密切关注着城里的一切，他看到的是解放军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秋毫无犯。相比国民党军队那种贪婪和腐败，他不得不为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所叹服。

但是司徒雷登却忧心忡忡，不能安宁。原来，共产党进城之后便宣布，中共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侨民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并主张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司徒雷登作为一个普通的外国侨民，就没有过去那种特别权利了。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傅泾波给他带来了一个他认为显然是很有利的消息：中共方面已经派了黄华为南京外侨事务处主任，听说黄华此来是专门与留在南京的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当时除苏联驻华大使带使馆部分官员随同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外，多数国家使节留在了南京为了接管蒋介石的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中共中央决定派黄华到南京从事外事工作。临行前，周恩来特地与黄华做了一次长谈，详细交代了有关与美国建立联系的原则。周恩来告诉他，美国驻“南京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已通过其他渠道向我党表示，只要中共保护美侨利益，建立通商关系，尊重国际条约，美国即与中国建立实际上的外交关系。因此，中央决定我方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听到黄华的名字，司徒雷登心里一动。他知道黄华是自己从前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并且和傅泾波还是同班同学。傅现在作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是他不可缺少的助手和朋友。“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司徒雷登对傅说，“假如与黄华的这一层关系能有其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得多了。”

为了尽快地与黄华取得联系，司徒雷登于5月6日先派傅泾波出面接洽。

在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生涯中，傅泾波扮演的角色，大概是美国外交史中绝无仅有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机会接近美国的秘密文件，但在大使馆给国务院的众多秘密报告中，有许多涉及中美关系的情报，就实质内容来说，都是他提供的，因为他和国共两党的官方均有交往。傅生活在司徒雷登的官邸，这一安排，首先至少会令安全官员反感至极。一如司徒雷登所说，甚至马歇尔上将也为之“瞠目吃惊”。但司徒雷登却不然，还在他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就把傅泾波作为自己的助手，并在其外交生涯中把傅看作是不可或缺的伴侣和知心朋友。他这样评述傅的贡献：“他经常替我拜会那些有必要保持接触的人，而这些拜会又不会完全受到应有的礼遇的约束。当我拜访中国官员的时候，几乎总是把他带在身边，而他从不泄漏秘密，这一切意味着，和正常的可能情况相比，我和中国各阶层的交际更广泛了，知己也更多了，毫无疑问，在大多数场合，他都能代表我。”

对于南京解放后，滞留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设法寻找机会与中共接触以探求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问题，中共中央作了认真的考虑。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打电报给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负责人。他指出，由于美国方面托人寻求与我接触，英国也想与我们做生意，中央认为如果美国包括英国如能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讨论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即“李涛声明”中，提出了新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中国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

与司徒雷登期望的正相反，黄华在和傅泾波及司徒雷登的会见中，不仅坚持毛主席在新年献词中重申的中国共产党的反美政策，而且坚持中共中央委员会制定的路线——“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 and 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 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这条为黄华所遵照执行的路线，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直至摧毁国民党政府，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

5月7日，黄华接见了傅泾波。会谈一开始，傅泾波先是替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期间的所作所为申辩，希望中共方面不要过分责备司徒雷登，接着又为司徒雷登表功说，国民党撤退以前，何应钦曾希望司徒雷登去广州，但他照会蒋介石政权，表示美国大使馆决定不随蒋介石政府南迁广州，各地美领馆及美新闻处皆作留驻准备。英、法等国看美未走，也没有走。而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就是希望与中共方面接触，目前这一计划并已获艾奇逊的首肯。司徒雷登甚盼与黄华会见，因现在正值美对华政策的改变时期，他本人希望能在其中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傅泾波还表示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可以修改。

黄华指出，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创痛极深，空言元补，目前需要的是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

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5月8日，黄华将与傅泾波会见的情况上报中央。1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致中共南京市委的复电，即《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央要求我方目前应做到少说多听，以更多了解美国政府的意向；在陈述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对于美方提出的修改商约的问题不要表示拒绝。

5月1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与司徒雷登进行了首次会晤。

望着风华正茂而又肩负处理南京外侨事务重任的黄华，司徒雷登不禁回想起4年前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时所说的一席话。当时，毛泽东对他说：“现在延安有许多你以前的学生。”司徒雷登不无得意地回答：“我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如今，眼前这位学生能为他这当老师的解忧排难吗？

想到这，司徒雷登一古脑儿他讲出了许久以来的想法。他谈到美国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对中共主张的马列主义的恐惧，他认为所谓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等于宣传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这都将给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威胁。他甚至还提出，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以此来威吓眼前这位学生。黄华当即作了驳斥。接着，司徒雷登话锋一转，以抚慰式的口气表示，希望在南京多留一段时间，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和平、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并在国际上表现友好的国家。他还提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但是，当黄华具体谈到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时，司徒雷登却闪烁其词，还列举出一系列所谓的标准与条件。

根据中央的指示，黄华首先向司徒雷登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希望美国承认新中国政府，表示新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即将成立的新政府。他还说，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府，纯粹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共产党尚未建立起任何意义上的国家政府。在建立起这一政府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除了等待中国的事态发展外，其他什么也不能做。他表示说，美国已经决定停止援蒋，不再参与中国内战。他还建议待上海解放后即将“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的粮食、棉花等援蒋物资移交中共方面，以支持上海恢复生产。

黄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司徒雷登指出，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

4. 司徒雷登秘密计划的北平之行

数周之后，经请示中央，黄华决定与司徒雷登进行第二次接触。他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办事处会晤。

6月6日，司徒雷登大使应黄华的邀请，以茶话会形式和黄进行了第二次会见。会见充满了师生及同学情谊。大使一方有傅泾波陪同，黄一方有另一位燕京同学冷轲一（译音）为助手。6月6日的会面一开始，黄华再次重申了中共中央的几点原则，即“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是：外国武装撤出中国；不能援助国民党政府；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司徒雷登却辩解道：“各国使节留驻南京，这已表明了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如国民党政府今后再由广州迁往他处，美国代表也不准备随往。在目前中国

尚无一个新政府的情况下，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

黄华说，“据我个人看，我军打下广州后，就可能召开政协会议，联合政府将由政协会议决定产生。因此，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蒋，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但现在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因此，中美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还无从谈起。”

司徒雷登回答说：“断绝与国民党关系是消极的作法，积极的作法应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我希望新政府应尽量多吸收一些开明的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

黄华当即表示：“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中国人民选择的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因为它更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政府要员的任命问题纯属内政问题，外人不得干涉。”

傅泾波插话道：“中国今后究竟是先实现工业化还是先共产化？”

黄华提醒他：“你这种提法是不对的。中国人民目前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存在是先工业化还是先共产化的问题。而且，这也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外人不得干涉。”

对黄华的话，司徒雷登无法进行反驳，只好转而谈起了“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他说：“中美关系问题不单是对华政策问题，而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现在世界局势动荡，美苏之间误会很多，美国担心世界革命可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中美关系能得到完美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都是一大贡献。如果中美关系能有第三者出来协助则更好。”

黄华马上反驳道：“我个人认为无需第三者参加。”

此次会面后仅隔了两天，傅泾波再次来见黄华。他向黄华转达意见，称司徒雷登考虑再三，认为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出正式表示，他想近期返回美国再作努力，但他希望知道中共现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份量。

傅吞吞吐吐地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系，能不能转达意见，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黄华已经看出意思，便说可以直说本意的。傅这才说出这次求见的真实意图：

美国现政府中马歇尔、艾奇逊和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很了解。司徒雷登还接到副国务卿雷登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

黄华将此事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鉴于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有所松动，认为司徒雷登来访不无益处，但考虑到与美国尚无外交关系，因此建议此事通过非官方联系比较好。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自己又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表示他长期担任燕大校长，每年6月都要回燕大过生日，故今年还想去北平，不知中共当局允许不？要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

中共中央决定由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

于是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给司徒雷登发出了一封邀请信，邀请司徒雷登到“燕京大学”访问，并暗示此次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有可能见到中共高层领导人。

由于当时司徒雷登和傅泾波正好去上海，等他们返回南京时，已是6月底。6月28日，根据中央的指示，黄华向司徒雷登转达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

意见，欢迎他去“燕京大学”过生日，同时他将在北平像一位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一样受到欢迎。黄华的邀请是1946年马歇尔使华时隔3年后中国共产党向美国作出的进行高层接触的一次重要表示。司徒雷登对于北平同意他去“燕京大学”并有可能与中共高层领导人会晤一事感到非常高兴，但考虑到美国国会将于7月底休会，而且当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决定请示艾奇逊。

司徒雷登、傅和黄之间的这些交谈，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授权，甚至当司徒雷登收到毛和周的邀请时，美国国务院也没有接到有关情况的汇报。而北平中共方面则从这些交谈中感到，司徒雷登将要来北平。司徒雷登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6月26日

周雨康（译音）从北平返回。……得知黄华是因为我而被派到这里来的——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请求——毛表示我可以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受到欢迎——没有瞒着美国人的东西，等等。

黄华显然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请求。

6月28日

傅拜访了黄华。告知收到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的一封信，同意我去北平访问。他说毛、周衷心地欢迎我去，但明显重申这一信息的是他下午来时带来的另一封电报——黄华来了，带着那封电报，呆了大约1个小时。

在向艾奇逊请示中，司徒雷登没有向华盛顿提什么建议，只是列举了北平之行的利与弊，并要求给予指示。在他看来，此行的基本好处是：他可以有一个机会直接向毛和周表明美国的观点，并把有助于“判断中共倾向的最权威的信息”带给华盛顿；另外，还会“表明美国富于想象和冒险的坦率态度，这一态度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政治倾向，或许还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产生有利的影响”。司徒雷登所说的不利后果是，北平之行将使由美国发起的南京外交使团的“联合战线”破裂，各使馆的头面人物将效仿司徒雷登纷纷前往北平。而且，“一个美国大使在这个时候前往北平，会在国内外大大地提高中共和毛本人的威望，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次要步骤（首要步骤是我留在南京）还会有助于使共产党政权得到承认”。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毛的一边倒，决不是什么新的姿态，也不是由于近几个月来事态发展的缘故。正像司徒雷登在拍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分析的那样，毛“只是形象地概括了他先前的著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细阐述的政治理论和在许多重要的中共声明中表述的与苏联的团结一致”。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就把联俄看作是“新的三民主义或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之一。“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

毛预言说，“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

在这种情况下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这件并不复杂的事情，结果变成了一道纷繁不堪的难题。弄得国务院也对此众说纷坛，意见不一。艾奇逊没办法，只好将这个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决定，杜鲁门总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电报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

当司徒雷登跃跃欲试准备前往北平时，华盛顿的决策人却表现得极为犹豫。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的助手、以头脑冷静著称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斯表示对这一邀请的保留态度。他提出司徒雷登如去北平，就必须教训中国共产党一通，其措辞之严厉应该比苏联更甚。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的电报指示：“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访问北平。”艾奇逊要求他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告诉他如果现在去北平会引起国内各方猜疑。

于是，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宣告夭折。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接触又一次失之交臂。

计划中的北平之行因杜鲁门总统的否定而落空了，司徒雷登对此懊恼不已。想想自己一心为美国的利益打算，到头来却得不到理解，他越想越觉得窝囊，可他并不服气。他又通过另一个中介人陈铭枢与中共领导人进行接触。司徒雷登告诉陈说：“美国人相信，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是可以相处的。”美国人“首先关心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他们选择的政体，前提是政府必须得到全体国民的支持，并愿意和能够继续遵守国家准则”。美国的态度“是等待和观察。无论如何，我和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首领（苏联除外）继续留在南京的事实是有一定意义的，相信中共一定意识到了这种意义”。

司徒雷登请陈铭枢向中共领导人转交4份长长的文件，并转达了这样5点意见：

（1）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2）对于即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和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第二，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3）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中美友好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4）在经济贸易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5）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从上述5点意见不难看出，司徒雷登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对中共的蔑视。

陈铭枢带着他的那些文件和五点意见走了。司徒雷登暗自有些得意，觉得自己为中共准备的这份“礼物”太好了，恩威并施，刚柔相济，非常得体。

十几天以后，陈铭枢从北平带过消息，事情办得很顺利，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完全令人满意”。陈还要求司徒雷登推迟回美国，以便他们在南京交换意见。

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北平之行虽然未能成功，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司徒雷登这么想起来，禁不住心里更明朗了。

7月9日，司徒雷登与由北平赶回南京的陈铭枢会面。陈将一份长长的

备忘录和两个附件交给司徒雷登。陈铭枢说，备忘录是他本人北平之行的成果，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综合整理而成的。而另外的两个附件，实质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对司徒雷登五点意见和4个文件的直接回答。在第一个附件中，中共领导人称道司徒雷登在中国从事了几十年教育，并对他在改革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中共领导人还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并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制定对华关系。如果美国今后能够如此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相应地采取友好态度。

关于中美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条件，毛泽东在附件中特别要求司徒雷登读一读他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和援助中国的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原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在第二个附件中，周恩来对司徒雷登提供那些文件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评论。针对司徒雷登所说的美国在历史上对待中国非常仁慈，中国从同美国的贸易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等论点，周恩来列举事实进行驳斥，指出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中美贸易的受惠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同时，周恩来还指出美国对中国犯下了两大罪行，即30年代向日本出售废铁等物资，抗战结束后又援助蒋介石打内战。

对于司徒雷登本人，周恩来再次赞扬了他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间所表现出的“个人品质”。

但是，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因而必须执行美国的既定政策。

司徒雷登反复地看这两个附件，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他感到很失望和沮丧。中共领导人给他的答复明摆着是不准备放弃原则和立场来跟他作交易。

5. 别了，司徒雷登

寄予厚望的北平之行未能获准，陈铭枢带来的消息又使他大为不满，一次次的机会都已失去，一次次的努力都已白费，原先雄心勃勃、想要扭转中国历史车轮的司徒雷登，终于感到回天乏术、无能为力了。

司徒雷登决定离开这个地方。他给艾奇逊打电报，并建议，“在我离开南京之前，不要向这里、华盛顿或广州的新闻界透露我的新旅行计划。”

司徒雷登之所以不愿透露其行踪，其中一个原因是，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指示，在离开南京后，他将访问广州。杜鲁门在几天前曾对艾奇逊说：“作为一个大使，在没有和所在国的政府脱离接触后便回国，是不会被美国公众所理解的。”

7月15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就听见无线电里传来蒋介石已经抵达广州的消息。“不行，广州去不得了。”一向举棋不定的司徒雷登，忽然间作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

为了取消广州之行，他给艾奇逊打电报，两次力陈不能去广州的理由。主要认为他这次若去广州，势必给中共造成很不良的印象，那将会在今后留下严重的阴影。因此，他认为，“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毕恭毕敬地去北平参见

毛泽东主席，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改变航程去拜见蒋委员长也是不明智的。”

7月25日，司徒雷登利用办离境手续的机会，又同黄华见了面。谈话间，他问黄华对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有何希望。黄华认为，现在谈不到希望美国做什么，因为首先美国应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它具有对中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但迄今美国仍支持反动派打内战，并组织“太平洋公约”，中国人民必将坚决反对这上帝国主义政策。

司徒雷登说，中国发生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美国政府至今对“太平洋公约”未表示任何赞成支持，所以是没有责任的。

两个又谈了一些其他的事，然后就简单地道了别。

司徒雷登敏感地意识到：在我拒绝去北平之后，马上访问广州并会见委员长（如果去了广州，这是不可避免的），肯定会被共产党认为是对他们的一种蓄意的侮辱，并为此而采取强烈的反应措施。……他们绝不会原谅我去广州见他们的头号敌人，因此，我将完全失去在中国共产党人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存在过的。司徒雷登后来回忆说，他自己是“带着一种狼狈的感觉”从这次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见中脱身的，黄的思想是“不能通过辩论或事实摸透的”。这位大使曾希通过讨论来改变共产党的见解，但到此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不相信“一个人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见解”。8月2日，司徒雷登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乘坐美国大使馆的一架运输机飞离南京回国，同机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等8人。

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第三天，美国国务院即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美国政府将这部以推卸其侵华政策失败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刚刚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还未到时发表，显然是有意而为的。这对于忠心耿耿为美国侵华政策服务的司徒雷登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美国的《白皮书》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中国掀起了斥责美国《白皮书》的热潮。从8月14日至9月16日仅1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就相继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5篇文章，剖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

8月14日，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尖锐地指出：

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毛泽东清醒地分析形势称：

“艾奇逊的白皮书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了。”

4天后，毛泽东又写下《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痛快淋漓地抒发中国人民赶走帝国主义者的愉快心情：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开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

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觉得‘茕茕子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8月28日，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讲了这场世界范围内大辩论的重大意义：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的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之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白皮书》教育了中国人民，增强了反美情绪，使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加速推进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司徒雷登此去就再也没能回到中国来。当他乘坐的那架小型运输机在南京上空作最后一圈盘旋时，司徒雷登俯身最后看了一眼古城南京，他知道此去便不可能再回来了，禁不住自语了几句：“无可奈何花落去……别了，南京，别了，中国……”别了，司徒雷登！

第 8 章 “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

糊涂透顶的美国佬不听中共领导人的善意暗示，拒绝承认新中国，逼得毛泽东不得不实行“一边倒”，“另起炉灶”，以便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 美国的砝码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他的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曾写了这些一段话：“给 40 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写一段悼文应该这样开始，即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彻底无知。他们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与国民党人的正式官方来往，以及为他们自身逻辑而进行的战事之中。他们感觉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但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至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知识更是一片空白。”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其雄浑的声音，庄严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洪亮的声音犹如晴空中的一声霹雳，震动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也引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恐慌。

毛泽东在建国典礼上发表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当天，周恩来外长向各国驻京前外交人员，包括美国的前外交人员柯乐布，送了这个公告，并随附公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必要的。”

美国的柯乐布当时注意到，商讨建国大计的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对美国的态度上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克制”，中国报刊则大大减少了对美国的抨击。他甚至觉察到“中共已调整了对于国际条约的立场”。

稍后，即将担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柯伯年在 1949 年 10 月《学习》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中苏团结并不排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所有与国民党断绝关系并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国家都将得到新中国的同等对待。

显然，中国当时在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问题上既坚持原则，又积极灵活，中美关系的前景取决于美国。可是，美国的态度却是僵硬的。

中国近代史专家陶文钊先生在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的一边倒决策”时指出：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的事态发展，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正相反的两股潮流。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9 世纪末以来，它力图在亚太地区扩张势力，但毕竟不如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那样在这里实力雄厚，它的扩张企图又受到日本的迎头阻击。因此，在 20 世纪的头 40 年中，美国的政策不是支配、统治亚洲。美国一再重申在华门户开放政策，就是为了打破别的大国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在中国为美国的投资和贸易争一席之地。及至二次大战结束，情况大不一样了。美国在远东扩张的主要对手日本被摧垮了，英法自顾不暇，其在华和在亚洲势力大大削弱，相反，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却称雄世界，无可匹敌。

由于美国实力的极度膨胀，美国统治者的扩张欲望也随之大大膨胀。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的“国家安全”已不再限于美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也不再限于美洲大陆，世界上任何地方有风吹草动，只要他们认为与美国“安全”有关，就可以进行干涉。在亚洲，美国当政者同样要建立“美国治下的

和平”，要在这里确立它的支配地位。早在大战期间，罗斯福就曾这样设想过，他把国民党掌权的中国作为制衡苏联势力的重要因素，把一个统一、亲美的中国作为美国治下的远东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二战结束以后，美、苏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演变成“冷战”，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出笼，美国决策者把“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作为外交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他们要把中国置于其控制之下，保持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在“冷战”中充当美国的伙伴。

但是，这毕竟只是美国政府的一厢情愿。

对于中国来讲，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中华民族的觉醒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令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也使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迅速发展壮大，正是这种觉醒的集中表现。中国人民打败日本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受制于另一个大国，充当它的附庸，而是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于是，矛盾产生了，美国要按照其意图来摆布中国，决定中国的走向，而中国人民偏偏不理这一套，要走自己的路。这两股正相反的潮流发生冲突乃是不可避免的。

美中敌对的格局已经定型。特别是司徒雷登离华返国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已由怀疑摸底开始转为公开敌视。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内，美国决策层对新中国的政策思想一度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以艾奇逊为首的一批“精英”、“智囊”认为，对美国来说，大体上有两种选择：一是对新中国进行破坏、颠覆，等待机会推翻它；另一种办法是试图使中国脱离“莫斯科仆从”的地位，让时间发生作用，施加有力的影响来改变它。艾奇逊认为后一种办法是明智的，杜鲁门对此也颇表赞同。

但艾奇逊所提出的“明智的”政策设想并没有变为明智的行动。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1949年2月3日，新任伊始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授权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在适当时机向中国共产党方面表示：中国新政府继承现存的中外条约义务是美国予以承认的前提。这是美国准备用承认问题施加压力的第一个迹象。

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杜鲁门政府强调的是，力图维护美国在华特权。在艾奇逊看来，中国共产党正在践踏国际义务，无视国际准则，在他看来，国际关系中的“法律和秩序”面临考验，美国不能承认一个“无法无天”的政权。

但事实上，承认问题不仅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维护在华“条约特权”只是美国政府的部分考虑，它更大的企图是：迫使中国共产党疏远苏联，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削弱中共的威望，鼓励中国国内的反共力量，在国际上孤立新中国，一句话，干涉中国革命。不仅如此，承认问题还和对华遏制密切相关，美国的承认将动摇中国的邻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抵抗“共产主义压力”的意志，而在它们不得不起而效仿的情况下，将为中共提供“渗透”和“颠覆”的机会。

为了对中国共产党施加最大压力，美国竭力拼凑不承认新中国的国际联合阵线。1949年4月底到5月初，司徒雷登两次上书国务卿，建议西方国家共同孤立新中国。他强调：决不应允许一些国家为“暂时的、表面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抢先承认新中国，以防中共“以夷制夷”。5月6日，美国国务卿指示驻英、法、意、比、荷、葡、澳和加拿大的美国使馆，立即向各驻在国政府施加影响，要他们和美国结成共同阵线，切勿采取导致承认的任

何主动行动。不久，美国国务院又向驻印、缅、泰、菲等国的使馆发出了类似的指示。一时间，从北大西洋沿岸到东南亚，美国外交官们鼓舌如簧，竭力要别国追随美国。

一位历史学家在评论美国曾长期拒不承认苏联时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行为在美国看来太不循规蹈矩，它的存在就会干脆被置之不理。”这种荒诞的悖理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得到了最强烈的表现。不承认新中国是美国政府1949年到1950年初对华政策的一部分。

大量史料表明，从1949年起，美国开始把反对、孤立和遏制新中国当做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的主要环节。美国政府不仅不承认新中国和竭力组织孤立新中国的国际阵线，而且拒绝了这年春夏之交中国共产党就未来中美关系同美国对话的试探，坚持以各种方式加剧新中国的经济困难，并且力图阻止台湾和西藏的解放，为此甚至考虑把台湾分离出中国和设想秘密支持谋求独立的西藏噶厦。此外，它还顽固地维持同蒋介石政权的关系，尽管这个政权已丧失了对中国绝大部分领土的控制和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

中美敌对与隔绝的主要根源在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中包括其不承认政策。

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关于外国承认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是合理的、正义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永远结束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不平等待遇的时代，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要在新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就必须停止敌视中国革命，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了这一原则。它既符合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民族独立事业的需要和现实，又符合国际法的根本准则，特别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准则，是天经地义的。由此派生而来的一些基本方针，包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外国驻华官方机构及其人员有合法地位的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鉴于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当时的实际态度，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不急于取得它们承认的方针。毛泽东就此强调：“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合法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同时，仍注意到策略的灵活性，这样做有利于防止美国军事干涉，在政治上打击国民党残余政权，分化美国竭力组织的敌视新中国的联合阵线，并为发展经济利用和争取利用美国资源。1949年6月15日，即中国共产党正在安排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事宜之际，毛泽东在新的政协筹备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并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我们就愿同它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1949年8月，杜鲁门批准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此时美国虽然已明白国民党政府是一个腐败的政府，美国为它所做的一切已均告失败，蒋的垮台是咎由自取，等等。但艾奇逊同时在这份报告里附了一份“卷首函”，宣称中国共产党人已舍弃他们独立自主的信仰，公开宣布他们附属听命于一个外国——俄国。冷战的舆论要求美国政府把中国的内战说成是“外国支配”下的和“苏俄帝国主义”的一个例证。

艾奇逊发表的这类危言耸听的言词，也是美国针对中国共产党于1949

年6月发表的中国将“一边倒”地支持社会主义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力量这一声明的反应。美国把这一声明看作是中共对美国采取全面敌意的一个声明。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在私下里，中国共产党的上层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曾做过多次努力谋求与美国重开谈判，探讨改善双方关系的可能性。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暗示，他们希望在政治、经济方面保留自由选择的余地，以免过分依赖苏联。乔治·凯南虽早就敦促过华盛顿对中国方面这类坚持独立自主的暗示做出灵活反应，尽管如此，国务卿艾奇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采取了相反的方式。他严格禁止美国驻华外交官对共产党的试探做出反应。艾奇逊有意将毛泽东对美的公开抨击渲染成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不共戴天的证明。

作为对这些谬论的答复和反击，毛泽东于1949年写了数篇文章，揭露美国政策欺骗人的实质。

从此，中美关系走进了互相敌视、针锋相对的“冷战时代”。

2. 孤立中国

1949年10月，美国国务院召集了关于对华政策的圆桌会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佩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客观存在的，承认他们，有什么可失去的呢？不承认，又有什么可得到的呢？已任国务院远东助理国务卿的巴特沃思却认为：我们不应该急于承认，事情并没有那么紧迫。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控制整个中国。他们更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要准备承担一个政府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

到了1949年底，艾奇逊亲自出面鼓动不承认新中国的联合行动。他对印度大使表示：“民主国家应当团结一致，在承认（中国）问题上实行国际性的延缓行动。”当英国准备与国民党政府正式断交并承认新中国时，艾奇逊又告诉英国大使：“我们不相信急急忙忙的承认会给承认的一方带来什么永久的好处。所以，不管别的国家怎么做，美国将不仓促行事。”艾奇逊在几次谈话中还再三强调要中国接受美方的“承认三条件”，即“占领全部领土，得到人民支持，履行国际义务”。显然，中国共产党领袖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承认条件”。

不可否认；华盛顿的决策人、献策人中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试图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愿望，但是在现实中美国推行的做法却是公开敌视。美国对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府已不抱多大希望，对新中国又怀有敌意。但是，在美苏“冷战”的大格局下，美国在欧洲与苏联剑拔弩张，在远东无所作为而听任苏联得势是不可能的，于是除了美国重新扶植日本外，华盛顿决策人的目光就集中到了中国领土台湾及其沿海岛屿上。这样，除了“承认”问题外，台湾问题形成了中美关系中的另一个重要症结。

1948年到1949年初，在华盛顿决策层中占主导地位的政策思想是“台湾及周围岛屿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美国不能让其落入共产党人的手中”。1948年11月2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结果是：如果能通过外交与经济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占领台湾将是最符合美国国家安全的。因台湾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将是日本通往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海上据点。军方人士认为美国应当让台湾当局主动邀请美国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

艾奇逊认为美国必须估计到靠外交与经济手段支持台湾当局可能失败，他主张努力扶植“台独”运动，只有这样，美国在正面干涉时才会得到国际

上的承认。他主张派遣一个得力的代表常驻台湾以便时刻观察其动向。艾奇逊作为杜鲁门授权的各部门政策意见的重要协调者，他的扶植“台独”的主张一时占了上风，但很快就证明这一计划与台湾局势的发展之间有很大差距。于是，美国开始全力扶植台湾当局，他们寄希望于孙立人，又对陈诚进行试探，但使他们失望的是，他们的幕后人仍是蒋介石。

通过对台湾当局的考察，美国驻台湾观测动向的官员麦钱特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说：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在福摩萨面对的局面是与一年前我们在大陆遇到的几乎完全相同的。现存的政权腐败无能。他们想牺牲美国的国家利益以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他建议美国和这个不得人心的政权拉开距离。此后，美国政府通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向蒋介石做过私下提醒。到了1950年初，这种私人提醒已变成了公开警告。杜鲁门和艾奇逊相继发表声明：美国无意在福摩萨拥有特权和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政府将不卷入中国内部的纷争。

但总统和国务院的表态却遭到国会与军方的强烈反对。国会中的共和党领袖告诉国民党驻美使馆：共和党人将在台湾问题上发起一场全面进攻，共和党的前途和1950年的国会选举都将依赖这一问题了。至朝鲜战争爆发前，已进入国务院担任外交政策顾问的共和党代表杜勒斯告诉顾维钧：美国国务院对福摩萨的态度近来已经缓和一些了，相信会重新考虑军事援助问题。

其实杜鲁门、艾奇逊等人穷于应付的是国内政治中的复杂局面。在不同意见司徒雷登去北平、不承认新中国等问题上，华盛顿政策考虑的重心往往不是对外，而是对内。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华盛顿的决策过程更加陷入僵局。

在当时条件下，各种政策此长彼消，但是没有一种可能取得持久的压倒的优势。至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另一方面，美国因台湾问题而与新中国形成了一个公开对抗的局面，同样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一局面的形成，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一个短暂的“真空”状态。各种相互矛盾的思想充斥与交织在一起，彼此相持或抵销。它又相当脆弱，经不起外界一些偶发性因素的刺激。很快，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打破了这个状态。

形成这一状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问题上，艾奇逊等人的看法虽比国会中的一些人更多一些现实的眼光，但他们只注重于对腐朽的国民党政府的认识，他们并不理解整个中国革命。而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苏联结盟的事实给予美国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使美国人茫然不知所措。由于美国人已一向习惯于将中国人看成是俯首听命于美国政府和采纳美国人的意见行事的，习惯于看到中国人仰慕美国的文化和宗教，依美国人的鼻息和眼色而战战兢兢地生存，而新中国却敢于拒绝美国的干涉，敢于挑战美国人在中国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1937年以前，美国政府在中国所起的作用相当小，美国卷入中国事务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传教士、商人和慈善团体来实现的。但1937年以后，罗斯福总统改变了这一政策，通过对国民党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使中国成了其战略的伙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政策的演变，到了40年代后期，维护美国人在华的利益同维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续执政便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在一般美国人的眼里，是他们创造了蒋介石及其政权，是他们创造了“真

正的中国”，而现在它却被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共产党所控制了。这样，他们自然认为一个不受蒋介石统治的中国，就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真正的中国”了。他们想用美国式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和要求新中国的一举一动，他们不明白与中国共产党人对话的基础只能是平等。最明显的例子是，1949年司徒雷登与黄华见面时双方各自得到的指示有着本质的矛盾。艾奇逊要司徒雷登让共产党领袖们明白，如果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被中国国内的事态发展所威胁，美国政府就要重新审视中国局势并采取行动。黄华得到的明确指示是：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显然，美国的训令和后来陆续提出的“承认三条件”等等与当时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完全格格不入。华盛顿的决策人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他们的对手不仅仅是一批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一批决心要洗刷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和耻辱的志士。当时的美国决策层和舆论界还有一个十分错误的看法，即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莫斯科的“仆从和工具”。

所以当新中国宣布将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政府大为震动和恼怒。透过西方有色眼镜，美国把中国共产党激烈反对美国的政策看作是新政权服从于苏联的旨意而完全沦为了苏联的爪牙。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便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在1951年的一次演说中，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是这样分析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和中国领导人的性质的：中国和平与安全的丧失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产物。在外国主子的驱使下，红色中国已对外进行侵略冒险，北平政府可能是俄国人的殖民政府，它不是中国的政府，它不是中国的。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邪恶的共产主义颠覆网在亚洲的延伸，它将不断扩大，直接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威胁到“自由世界”的生死存亡。美国在一个对它具有特殊利益的地区里遭到惨痛的失败，似乎证明必定有人从其内部出卖了美国利益。因此在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首先是试图剪除上述“叛国活动”，然后是尽最大的努力来控制所谓“红色中国”赤色的蔓延。

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几个内，美国的对华政策曾出现了一度摇摆，用艾奇逊的话来说，美国正在等待“尘埃落定”。但很快，美国就决定拒绝与新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而继续不顾事实地宁愿坚持认为蒋介石在台湾岛上的残渣余孽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当时，英国从维持中国大陆市场和香港等原因出发，倾向于承认新中国，这一态度令美国不安，因而加紧阻挠。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新中国，同时撤消对国民党政权的承认。英国的举动产生了重大影响。10天之内，锡兰（现改国名为“斯里兰卡”——作者）、挪威、丹麦、以色列、阿富汗、芬兰、瑞典和瑞士相继承认新中国，荷兰与印尼于3月底起而效仿。

美国孤立新中国的图谋遭到近于毁灭性的打击。12月30日，印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美国在亚洲的一次重大失败。

尽管美国力图孤立新中国，结果自己却面临被孤立的危险，但是，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是美国政府在此后20年中毫无保留的奉行的僵硬国策。与此同时，美国加强了其在本国的力量，强调日本防卫力量的重建和对左翼政治团体和工会的控制，以及其他加速日本复兴的措施。美国把日本看作为美国在亚洲施展影响的枢纽，而这一角色也曾提名由国民党中国来扮

演。

3. 新中国政府的“一边倒”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强大，美国极力主张限制所谓“红色中国”的蔓延。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曾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全面回顾。国务卿艾奇逊直言不讳地要求这一回顾应以美国决心防止在亚洲其他国家落入共产主义之手为大前提。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两个多月的1949年12月30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重要研究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48-2号报告）。这份研究报告不仅明确提出、而且使美国坚定地建立了美国应全力以赴地执行“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政策与方针。这份文件还特别建议“对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应予以特别的注意”。虽然杜鲁门政府在如何防范的措施上尚未具体化，但是，美国对反共和反华业已矢志不移。

不难看出，作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长期坚持扶蒋反共政策的必然反应，新中国的立国外交选择就必然是“一边倒”。

“一边倒”，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对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它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起，构成了建国初期的三大外交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一边倒”的方针是被美国逼出来的。

早在1944年，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对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谈话中都希望美国能运用其影响制止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希望美国帮助战后中国的重建。1944年秋冬到1945年春，1945年底到1946年，中共又欣然接受赫尔利、马歇尔的调处。

但是，由于美国政府认定必须支持蒋介石，因此中共为争取国内和平、避免内战所作的种种努力都付诸东流。伴随着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对抗的时期。面对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所强加于我们的对抗，中国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

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相关联的是，美苏从战时合作走向了战后对抗，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中，中国共产党最终失去了中立的可能。

冷战给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所怀有的良好愿望和接受赫尔利、马歇尔的调解，都有着中苏美自战时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这一国际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不仅赫尔利、马歇尔使华直接得到了苏联的配合与支持，而且友苏也是中共七大确定的一项基本方针，因此，当时不存在友苏必仇美或友美必仇苏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但如今美苏转向对抗，成为敌手，中国共产党是否还能在美苏间活动自如呢？毫无疑问，外交政策应该首先服务于内政的需要。当冷战乌云飘临世界时，尽管中国共产党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美苏对抗中保持中立，并不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意愿，关键还在于美苏的态度。实际上，由于美国公然采取扶蒋反共政策，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现实地接受国际形势所能容许的选择，放弃中立的打算，寻求苏联的援助。

“一边倒”的方针是在世界上存在两大阵营这样一种特定的国际条件下的抉择，它表明了新中国坚定不移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政治倾向性，而不是具体的外交政策，丝毫不意味着中共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也丝毫

不意味着新中国拒绝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和平共处的外交关系。

而紧接着的朝鲜战争更令中美关系雪上加霜，加速了两者的分道扬镳。

第9章 “美帝的手伸得太长了”

“这个美帝的手伸得太长了，别个国家的内战，他非要远渡重洋来干涉，硬是想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这是一个潮流，它美国怎么管得过来？”“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透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了不起的经验。”

1.毛泽东发现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的巨大影响 1950年6月25日凌晨，中国北京。

炎热的夏夜，一阵突然的狂风暴雨从西太平洋汹涌而来，遮天盖地般横扫了东亚地区。雷鸣夹着闪电，耀眼的蓝光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大雨如注，犹如一道道狂暴的金蛇鞭打着大地。天地间一片沉寂和黑暗，只有震耳的雷声和大雨滂沱的噪声。

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里，灯光明亮，值勤的警卫换过一班又一班，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仍然是彻夜不眠。书桌上的两个烟灰缸早已堆满了小山似的烟蒂，桌上毛泽东主席阅过的文件也是摞得高高的，上面密布圈圈点点的批注。偶尔毛泽东主席也站起身，伸展一下坐得麻木的腰，自己捶几下后背，聆听窗外的雨声，踱步思忖治国大计。雨越下越大，间或夹杂着隐隐的雷声。风卷着雨，重重地敲打着玻璃窗，把屋外的一片小竹林吹得哗啦作响，摇摆不止。天将破晓时，雨已经是倾盆而下了。毛泽东主席也终于阅读完所有的文件和书籍，拉过一块毛毯，盖在身上，和衣躺在沙发上，伴着雨声进入了梦乡。倾盆大雨依旧不停地下着，似乎在向世人警告，这个多灾多难的新生国家又将遭受到血与火的洗礼。

此刻，正是北京时间凌晨4点钟。与此同时，在朝鲜半岛上的北纬38度线一带，则是一片暴风雨过后的茫茫白雾。夜色正在渐渐褪去，金色而美丽的早晨即将来临。然而，与黎明一同降临朝鲜半岛的，却是一阵震天撼地的隆隆炮声。朝鲜战争爆发了。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间一次大规模的激烈的军事大碰撞。

这是一场历时3年的世界性战争，卷入的国家之多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正是这场战争，导致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急剧恶化，双方不但刀戟相见，而且还冷战敌视了20年之久。

在第二次大战即将结束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中四大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频频举行会谈。为了解除驻扎在朝鲜半岛的日军武装，朝鲜问题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参加会议的四国首脑含糊地同意，战后的朝鲜将成为一个在美、苏、英、中四国共同控制下的托管国。于是，美国“五角大楼”的陆军上校查尔斯·博尔斯蒂尔随意选定的“北纬38度线”，就将朝鲜和德国一样，一分为二。就这样，这条随意划定的界线具有了特定的含义。

起初，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预料到朝鲜会出现持久的分裂。然而，“冷战”的加剧导致了南、北朝鲜两个相互对立政权的产生。1949年，美国、苏联双方在两个朝鲜各自支持建立了分别由李承晚和金日成领导的政府和军

队。

美国对朝鲜半岛觊觎已久。这一点从日本投降后美国杜鲁门政府在南朝鲜推行的政策就可看出。1945年美军进驻汉城后，很长时间不解除日军武装，并且保留原日本“总督府”的体制和行政机构及其法令。与此同时，杜鲁门把李承晚扶植成“大韩民国”的总统，李承晚一上台就多次提出：“要解决南北分裂，就必须用战争来解决。”并且提出“北进统一”的口号。

当朝鲜战事刚刚发生，美国作出的反应之迅速，其程度之激烈，不但令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大跌眼镜，甚至也远远超出了美国国内朝野许多人士的预料。

仅在战争开始的第三大，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以下声明：

……（北朝鲜）对（南）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而且立即会使用武装的进攻与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且必要的职责的美国部队。

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集体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

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

杜鲁门的声明有了两点重大转变：一点是武装干预台湾局势，另一点是制造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看来，这分明是美国同时从朝鲜和台湾两个方向向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和挑衅。中美敌对已成事实。

朝鲜战争爆发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直在密切注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新华社将每天收到的欧美各大通讯社的电讯、世界各国的重要反应、朝鲜战场双方的态势和动向，源源不断地一件接一件地送到中南海，送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手里。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了北京以后，毛泽东一直处于高度亢奋状态。他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分析预测着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会对中届带来何种影响。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形势，依然是相当严峻的。由于长期战争破坏，整个中国几乎是一片废墟，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一切都需从头做起。

在经济方面，工农业水平相当落后，主要产品的年产量普遍低于历史最高水平。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国家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不稳定，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在政治方面，到1949年底，全国还有海南岛、台湾等大部沿海岛屿和大陆的西藏没有解放；大陆上还残留着200多万国民党小股部队和匪特武装，他们还在进行破坏活动；新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尚不巩固；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采取种种手段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此外，还有三四百万工人、知识分子失业等等。政治上还存在着许多动荡不安的因素。毛泽东此刻感到：内战留下的满目疮痍急待恢复，台湾和西藏问题还未解决，可偏偏在这时候，在我们的近邻——朝鲜就发生了战争，而且美国的反应又是那么迅速和那么强烈。

毛泽东彻夜不眠，反复研究桌上的那几份报纸：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6月26日美国就倡议召开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由于常任理事国苏联代表马立克缺席，而中国的席位仍被蒋介石的代表窃据着，此次会议完全被美国一手操纵了。利用苏联无法行使“否决权”的机会，安理会作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的决议。

27日，安理会又再次作出决议，要求“必须用紧急的军事措施来恢复国家和平与安全”，并成立了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比利时、泰国等23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使美国对朝鲜的干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另一份文件的标题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上面写道：

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7日已在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将全力干预朝鲜战争。杜鲁门已签署几项命令，下令美军全力以赴支援南朝鲜：一是任命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赴朝鲜战争参战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并命令其动用可以动用的全部武器装备供应李承晚部队，而美国在远东的空军和海军部队将给李承晚部队以必要的掩护和支援；二是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迅即开进台湾海峡，以准备“阻止并击退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三是命令立即撤退美军顾问团的家属。同时，杜鲁门和他的将军以及大大小小的智囊们还做出了一项具有“长远意义和军事战略意义”的“英明”计划，决定准备大幅度增加对法属印度支那军队的援助。在这份标号为“1950—00143R—K”并由杜鲁门总统亲笔签发的政府绝密文件的第一页第一段中开宗明义地明确写遗，美国必须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行动来支持中国邻国中与中国不友好的各个政权。在谈到该战略的理论根据时，该报告分析说，由于越南的抗法领袖胡志明不过是“共产党阴谋的傀儡”，所以只能利用和依靠中国周围的、亲西方的反共政权（如法国殖民者所控制的印度支那），通过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其提供保护来实现遏制中国、截断社会主义阵营联为一体的趋势。……

看到这份情报，毛泽东顿时陷入了沉思之中，手指间的香烟点燃后都忘记吸了，长长的烟灰像根刚被伐倒的“望天树”，轻飘飘地斜落在他的手背上。

我们该怎么办？

2.“这个美帝的手伸得太长了”

6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做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教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一天，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严正声明，指出：

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的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

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之实施而已。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民，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中国人民对于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朝鲜、越南、菲律宾和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并坚信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能把穷凶极恶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制造者，最后埋葬在伟大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怒火中。

美国政府根本没理会中国政府的抗议。在杜鲁门的眼里，中国是没有资格、也毫无能力与美国抗衡的，只能是嘴上抗议、虚张声势而已。于是，在五角大楼的沙盘桌上，一群受过最高等教育、有着丰富战争经验、满腹经纶、威风凛凛的星级将军们导演了一盘甲方必胜、乙方必败的“棋”。

到了7月底，就在双方在战场上拼死厮杀的关键时刻，朝鲜战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率领他的高级官员和将领，突然应蒋介石的邀请访问台湾。

这次访问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它向世界宣布了这样一个信息：无论发生何种情况，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决意防卫台湾。

在这次访问中，蒋介石向麦克阿瑟提出一项建议，主动要求派遣一支国民党精锐部队赴朝鲜参战，但遭到美国方面的婉言拒绝。

事情很明显，美国和台湾欲联手行动，妄图对我国形成一种南北对应的态势，即一旦朝鲜战局恶化，北部，蒋介石的部队和美国侵略军便从鸭绿江逼人东北；南部，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海空力量支援下，蒋可以反攻大陆。所有这些，使毛泽东和新中国的领导人警觉：反动势力试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3. “这场战争将如何发展，需要严密注视”

在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下，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于7月7日和7月10日，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保卫国防问题。

当时在京的中央军委主要成员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罗荣桓主任以及军队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林彪、肖华、肖劲光、刘亚楼、杨立三、李涛、许光达、滕代远、谭政、万毅、苏进、贺晋年、赵尔陆等高级将领出席了会议。根据两次国防会议的讨论，中央军委于7月13日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经过反复考虑，中央军委决定，抽调于1950年初确定为国家战略预备队的第13兵团及所辖的第38、第39、第40军和在齐齐哈尔地区从事农垦的第42军，以及炮兵第1、第2、第8师等部队，共2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保卫我国东北边防，并准备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第13兵团是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兵团。这支部队东北人多，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上打过仗，

对东北地理情况熟悉，对与东北相似的寒冷气候也完全能够适应。

1950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在北京开专门会，分析研究朝鲜局势，并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朝鲜战争有短打、长打、大打、原子弹打等几种可能。”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美国若打原子弹，我们没有，只好让他们打，这是我们不能决定的。但我们不怕。我们还是打手榴弹。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他要中央军委电告第13兵团，要邓华加紧准备，一定要在8月底，最迟不得超过9月底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最近金日成首相发布命令，要使8月份成为完全解放朝鲜领土的月份。”周恩来说，“而且，据报，人民军在几个点上已经胜利地突破了洛东江防线；不知他们有没有对敌人在后方登陆问题有所准备？”

“我看形势不容太乐观。”毛泽东又转向周恩来，“莫斯科方面不知对此怎么看？”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提出一个和平提案，要求停止朝鲜境内的敌对行动，同时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

“这个提案好，我们要表态支持；不过，杜鲁门是不会接受的。人民军打到了洛东江，如果一停火，外国军队一撤出，那不是把朝鲜交给了金日成吗？杜鲁门怎么会同意呢？可是，僵持下去，对朝鲜人民军不利，我看他们速战速决的时机已经失去了。恩来同志，你认为怎样？”

“美国为了维持它在西方世界的威信，一定会在朝鲜孤注一掷，目前正在加紧调兵遣将，战争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我们必须密切注意战局的发展变化，做好战局恶化的准备。”

“对待战争挑衅者，一是不怕，二是敢打；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真理在我们一边，在人民一边，真正大打起来，战争的结局决不会是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一厢情愿。”毛泽东停了片刻，呷了一口茶又说，“这个美帝的手伸得太长了，别个国家的内战，他非要远渡重洋来干涉，硬是想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这是一个潮流，它美国怎么管得过来？”

为了支持苏联代表在联合国的提案，8月7日《人民日报》以《拥护和平解放朝鲜问题的提议》为题发表社论。社论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愿与全世界一切正直的政府和正直的人士联合一致，共同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并使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从美国侵略者的魔掌下获得自由，使它回复其原来的和平保卫者的地位。”

8月20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安全理事会当月的主席、苏联代表马立克和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完全支持马立克先生代表苏联政府于8月4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全部提案。这提案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亚洲及世界人民愿望的。”

周恩来还在电报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坚决主张：安全理事会在解决朝鲜问题时，必须有47500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必须邀请朝鲜人民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并且在朝鲜应停止军事行动，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否则即不可能合理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但是，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抗议和谴责，也不理睬中国和苏联等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和主张，而继续扩大战争。

4. 中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个又一个清晨，每当局周恩来总理从短暂的睡眠中清醒之后，他的心情就一次又一次变得沉重而愤怒。摆在书桌上的军情通报，无数次地报告着美军飞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侦察、轰炸和扫射的消息。

8月27日和30日，周恩来总理曾两次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军的暴行。

另一方面，朝鲜半岛的战争局势却出现了急剧恶化的势头。从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9月上旬，朝鲜人民军曾在前线了得了重大胜利。除已解放了朝鲜南部90%以上的地区和占有92%以上的人民之外，还将美军压缩到了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的釜山地区。

9月中旬，乘朝鲜人民军主力全部集中在洛东江战线、后方空虚之际，麦克阿瑟调动75000人的美军地面部队、260多艘舰艇和500多架作战飞机，于9月15日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发起了一场精心策划的登陆战。是日凌晨5时，美军首先占领了面积0.6平方公里、位于仁川汇前方的月尾岛，它被看成是仁川的屏障。接着，在当天下午涨潮时分，美军登岛部队搭梯子爬上三米多高的防波堤，从仁川南部高地登陆。尔后主力部队突破人民军防线，扩大了登陆场，9月16日下午控制了整个仁川，将朝鲜人民军拦腰切断，然后迅速向北发动进攻。

被朝鲜人民军主力围困在釜山的美军第8集团军约10个师的兵力，也于9月16日凌晨，集中所有的炮火开始向北突围反攻。9月23日，一支美骑兵师也从洛东江沿江北进，从侧翼掩护向东南突击的美第7师，然后在水原附近汇合。9月28日，汉城失陷。而在10月初，大批美军已越过“三八线”，长驱直入。此时，朝鲜人民军已无招架之力，在各地受到围剿，人员损失巨大，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困境。

指挥美国军队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想尽一切办法公然表明美国在朝鲜的行动就是针对中国的。当美军于1950年9月在仁川登陆后，他又敦促华盛顿授权给他将战争延伸到北朝鲜境内、延伸至鸭绿江边中国门前的权力，对中国的和平建设和亚洲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严重威胁。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发展，鉴于美军仁川登陆后进抵三八线的形势，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曾对求见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阐明了中国的态度：“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来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循的。”这位大使说，记得1949年南京“陷落”的时候，麦克阿瑟曾对美联社记者托宾亲口说过：“给我500架飞机就可以摧毁他们。”麦克阿瑟所指的“他们”就是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此，聂荣臻元帅抱着藐视的态度回答说，“我们把原子弹看成是纸老虎，何况几百架飞机呢？”

这位大使借题发挥，看来是意有所指的，他的话是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正准备指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犯的时候说的。

然而，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既不害怕恫吓，也不乞求恩典。在美军攻占汉城，进逼三八线，以战略速决吞并全朝鲜，危及中国安全的紧急时刻，中国政府紧急发出声明。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更明确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并通过他及印度政府转告美国当局。

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在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

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努力。但是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

“尽管三外长会议中有了协议，不经联合国同意不得越过三八线，但是美国政府不一定受其约束。”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第一，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以扩大战争，我们要管，这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严重情况；第二，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略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尽管印度方面迅即向美国方面转达了中方的意思，但是美国始终不予理睬。对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愤怒和抗议，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的和平建议，杜鲁门政府也始终是冷若冰霜，毫不理会。美国政府“高层人士”居然把这一警告贬为“恫吓”而不屑一顾。美国观察中国的主要据点、香港总领事詹姆斯·威尔森说：“这是中国的战争叫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如果中国人打算参加扑克游戏的话，他们就应该比现在亮出更多的牌……我们不应对中国共产党的恫吓过分惊恐。”

5.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1950年10月1日，就在毛泽东刚刚参加国庆大典，从天安门回到中南海时，周恩来急忙送来一封金日成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的救援电报。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仔细地看了两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朝鲜人民向我们发出紧急求援的呼吁，怎能见死不救呢？朝鲜处境危机，同时中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日本侵略者曾经说：“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要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与台湾。”这是1927年田中奏折中说过的话。日本侵略者不但是这样说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自1895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按这一程式进行侵略的。1895年，日本侵略了朝鲜与台湾；1931年，日本完全占领中国的东北地区；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日本更发动了征服全亚洲的战争。美帝国主义1950年侵略朝鲜与台湾，正是在重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老路啊！

中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唇亡便齿寒。两国人民有着长期的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友谊。如今，朝鲜人民在受难，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大门口。中国各族人民纷纷要求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特别是与朝鲜一江之隔的我国东北地区的人民，还筹集了许多援助物资，抽调了许多医务人员等。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面临着重大的抉择！

历史的经验告诉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坚决抵抗才是出路，妥协退让只能换来帝国主义的更大的贪心和自己国家的更大的屈辱。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任帝国主义列强欺侮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6. “我看美帝国主义要打，饭也要吃”

10月的北京，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空气清新，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人们沉浸在欢庆人民共和国诞生一周年的喜悦中。可是，在中南海这块静谧的土地上，这几天的气氛是格外的紧张。党中央政治局正在这里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

10月1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

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毛泽东向斯大林发了电报，阐述了中国方面

的立场和主要考虑。

斯大林很快回了电报，对中国方面的观点和要求做了积极肯定的答复。

10月4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实际上是一次最高级军事会议。

会上，毛泽东主席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从国际、国内的大局着眼，从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抗美援朝的大计作全面的分析，对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

据《彭德怀自述》说，毛泽东主席在会上着重让大家摆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啊！”

会开得很晚了。这时毛泽东主席笑着对大家说：“我看美帝国主义要打，但饭也要吃，觉也要睡。”他宣布暂时休会，明天继续讨论。

金秋之夜的北京，华灯初上，行人熙攘，一片和平景象。在东西长安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都不知道，就在那个宁静的时刻，新中国领导人即将作出一项后来震动世界的重大决策。此时此刻，彭德怀站到北京饭店寓所的阳台上，透过夜幕向西北方天际眺望。他清楚地意识到，开完会后他已经不可能再乘那架伊尔—18飞回西安，实施他开发大西北的蓝图了。这天夜里他辗转反侧，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他在《彭德怀自述》中作了如下的记述：

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

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个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向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着想，也应当出兵。

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援助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啊！”我把毛主席的这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继续进行，彭德怀习惯地用手理了理自己的光头，开始发言了。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总是要吃人的。我看，不同美帝见个高低，要想建议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好！讲得好！”毛泽东兴奋地说，“可是，德怀同志，这件事情也确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说，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要解决问题。也就是说，

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敌人；二个，既然打起来，就要准备着美国同我们宣战，就要准备着他们至少要轰炸我们的大城市和工业基地，使用海军攻击我们沿海城市，甚至到处轰炸，一直到丢原子弹。”

“这个，我也考虑了。”彭总刚毅果断地说，“关键是是否能打胜，打胜了，风险就小，打不胜，风险就大。我想，最后无非是他们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里去，就当作我们晚解放几年！”

“还是你彭老总啊！”毛泽东赞许道。……

毛泽东主席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致电金日成首相，告知了上述决定，并请金日成即派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有关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诸问题。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完全进入了角色，开始了他极为繁忙的各项备战工作。就在任命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命令下达的当天，彭德怀便飞到沈阳，召开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在他的布置下，4个军的全体干部战士准备于10月中旬跨过鸭绿江。

11日凌晨，彭德怀已坐上了开往安东的火车。在他的军事地图上，已标注好了详尽的进军路线：由梁兴初将军率领的第38军从辑安渡江，向礼仓里、五老里地区运动；由吴信泉将军率领的第39军从长甸河过江，向龟城、泰川地区推进；由温玉成将军率领的第40军从安东过江，向宁边、球场、宁远地区运动；由吴瑞林将军率领的第42军将协同第38军一道行动。……

一天24小时，连晚上睡觉也在内，他都在计划着渡江和交战。但他没有想到，就在他到达安东的第三天晚上，当志愿军过江的一切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随时将发布渡江命令的紧要关头，彭德怀突然收到了毛泽东拍来的一份加急电报，使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电文如下：

彭高：（一）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这回京一谈。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箭已上弦，为何又不发？

大政方案已定，却为何又中途易辙变卦？

彭德怀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交代好下属，便和高岗一同匆匆返回北京去了。就在中国全力以赴准备赴朝参战的节骨眼上，斯大林却突然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说，苏联的空军还没准备好，必须暂缓出动。

7. 兵发朝鲜

就在彭德怀前往东北的同时，周恩来飞往莫斯科。

正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周恩来在莫斯科就苏联提供空军掩护和武器装备各项问题与斯大林进行的第一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自从周恩来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后，毛泽东的大脑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这件事。

接到周恩来报告的这天夜里，毛泽东在院子里又一次徘徊了，很久。他对各种情况以及后果均再次做了一次全面的判断和分析，终于作出了决定。回房之前，他第一次注意到今夜的星空是如此湛蓝，月光是如此洁白，如银泻地，如水柔软。仰望明月、星辰，谛听竹叶摇曳，直面深秋的晚风，他顿时感到头脑异常清醒和轻松，他主意已定：即使在没有苏联的支援下，也要

抗美援朝。毛泽东并且将这一决定，立刻电告了周恩来。

10月13日，当周恩来心情沉重地从斯大林那里回到住处时，接到了大使馆同志送来的电报。他迫不及待打开电报：

恩来同志：

……与政治局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地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

1950年10月13日

周恩来久久凝视着这份不同寻常的电文，情绪不禁为之一振，除了惊异之外，更多的是感到一种激动之情油然而生。他深深地钦佩毛泽东的胆魄。周恩来马上通知苏联外交部，请尽快安排与斯大林再次见面。

当天下午，当周恩来健步出现在斯大林面前时，斯大林不无诧异地问道：“这次紧急见面，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还是继续我们刚刚结束的会谈？”

周恩来朗朗地说：“无需再谈了。中共中央让我立即通报给苏共中央一件事：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刚刚拍来电报，我们已经再次作出决定，立即出兵朝鲜！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中国都要参战。”周恩来的声音，洪亮而清晰，久久回荡在斯大林宽敞的办公室。

当苏方翻译把周恩来的话译给斯大林后，斯大林半晌沉默不语。他不知说什么才好。此刻他的心情难以言表。他深知中共中央在做出这个决定时要具有多么大的勇气与魄力！它意味着中国人民将克服怎样的困难和付出什么样的牺牲！如果换了是苏联，让他站在毛泽东的位置上，他能有如此大的勇气和魄力做这样的决定吗？

“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斯大林喃喃着，像是对周恩来说，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同一天，毛泽东主席致电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令调第9兵团北上，直开东北；同时，也作了防备美国向中国宣战，至少以其空军轰炸我国的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我国沿海地带的部署。把我国仅有的几个航空兵师和几个高射炮兵团部署在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并有计划地将我国东北靠近朝鲜边境地区的工业设备和战略物资，向内地作了迁移。毛泽东指示华东局和中南局，加速完成剿匪和土地改革工作，以便集中力量防止美国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登陆进犯，指出：“华东一切工作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布置。”“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的统一单位。”

在福建和广东方向各部署了4个军，以防美国使用海军或指使蒋介石军队攻击我沿海地带或登陆进犯。同时，在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以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的“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抗美援朝总会”，运动全国人民支持抗美援朝。

援朝战争。

10月19日夜，冷雨霏霏，寒风扑面。残秋的寒风，裹着枯枝败叶从鸭绿江的波涛上刮过。忽然，在迷蒙的充满寒意的秋雨中，传来阵阵雄壮的激动人心的军号声以及轰隆震耳的军车、坦克的马达声，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入朝的4个军分三路齐头并进，雄赳赳、气昂昂地渡过了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汇成了一支气势磅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进军曲，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第 10 章 “愿意打多久，我们奉陪多久”

“杜鲁门的原子弹总没有中国的人多，他的原子弹总炸不完中国人，我们不用害怕”

“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

1. 朝鲜战局开始发生了转折

10月19日，在秋风冷雨的朝鲜前线，闻听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的消息，骄横的麦克阿瑟不由冷笑了一声，把电报扔在一旁。“中国人想把我已捕入笼子的猎物救走，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扬头一口干掉了一大杯威士忌，又为自己满满斟上了一杯。在他眼里，中国兵都是些玉米地里长出来的“红脖子”乡巴佬，使用的都是些老掉牙的土枪土炮，别说是来两三个军，就是再加倍，也打不过由20多个国家所组成的联合国军。不过，作为一个军事家，他也明白中国军队入朝对美国 and 朝鲜意味着什么。但不管怎么说，他是决不能让到手的猎物轻易飞走的。为了及早断绝中国人的念头，麦克阿瑟急令美军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在当天占领平壤。紧接着，在第二天，麦克阿瑟又派大批美军空降部队在肃川和顺川空降，以确保把自平壤北撤的金日成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切断。此时，入朝作战的美军和联合国军以及李承晚的兵力总数已达42万人，拥有飞机1100架，各种军舰300多艘。

正当麦克阿瑟草拟他在庆典会上的讲演稿时，前线告急的情报就像一桶刺骨的冰水浇在他头上。

10月25日，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

当天，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第40军与南朝鲜第6师相遇于鸭绿江边；11月1日，志愿军第39军又与美军王牌部队骑1师交上了火。

不管骄横的麦克阿瑟相信还是不相信，经过历时13个昼夜的艰苦作战，结果是中国人赢得了战役的伟大胜利。这次战役共使麦克阿瑟的联军一下子损失了1.5万余人，不仅使联军北上的进军势头受到了严重的遏制，而且迫使联军不得不退缩到清川江以南。

这次战役使朝鲜局势开始发生了转折。

1950年11月5日，纽约《先驱论坛报》载文，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首战获胜，引起全世界瞩目”，“这是美军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

“联合国军”总部以及美国的白宫都因此陷入了一片混乱，所有的机构都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所有的人都明白，是到了该正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问题的时候了。

联军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认为，志愿军参战的战略目的不外以下三种：一是为保护其边防安全和鸭绿江电力设施；二是为从战略上牵制和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消耗战；三是企图把“联合国军”完全赶出朝鲜半岛。因此，可以断定，从中国目前情况看，它是不敢和美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此次出兵只是为了保护边防。

前线指挥官麦克阿瑟的观点是：志愿军参战人员虽入朝不多，但大队人马和物资正从中国东北运过鸭绿江，有使联合国军全部被歼的危险，应立即

执行“轰炸满洲”的战略计划，将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

英国将军提出异议：中苏订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轰炸中国东北就有挑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应先在朝中边境划定缓冲地带。力争通过政治方式解决。

杜鲁门认为，既不能在没做好大战准备的情况下冒扩大战争的危险，但也不能放弃已经“胜利在望”、占领全朝鲜的大好时机。美国应继续坚持军事进攻、迅速占领朝鲜的既定计划。与此同时，在国内各个方面应做好进行大战的准备。

麦克阿瑟花了很长时间，再次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拟订了一份新的作战计划，称其为“总攻势”计划。其要点是继续坚持军事进攻，再次大举北侵，在鸭绿江冰封前抢占全朝鲜，力争在圣诞节前全面结束朝鲜战争。

为实施“总攻势”计划，麦克阿瑟在前线集结了5个军13个师3个旅和1个空降团，计22万余人，比第一次战役增加了9万余人，且主要增加的是美军，共有飞机1200余架、坦克1000余辆和火炮10000余门。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一面通过英国、瑞典向中国试探，图谋以所谓“保护中共利益”为诱饵，换取中国坐视其侵占整个朝鲜；一面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要志愿军立即“撤回”中国，否则“目前的冲突可能不限于朝鲜区域”，以此来要挟志愿军撤兵。

在志愿军取得入朝后第一次战役的初步胜利后，彭德怀司令员向毛泽东作了前线战情分析，指出目前的形势对我不利，战争形势尚未根本好转。

接到彭德怀的前线战情分析汇报后，毛泽东高瞻远瞩，明察秋毫，致电彭德怀要看到朝鲜战场总的形势正朝着中朝方面有利的方向发展。为了给“联合国军”以更大的打击，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敌明我暗的朝鲜战局，在现阶段应充分利用敌人恃强骄傲的心态和对志愿军入朝实力及意图判断上的错误，采取诱敌步步深入，避免正面冲突，寻机各个歼敌的方针，争取在11月至12月初的一个月内，抓住战机在东西两线再给敌人一至两个大的打击。尽量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

11月7日，志愿军开始采取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寻机歼敌”的方针，在“联合国军”试探性进攻的炮火下，先后主动放弃黄草岭、德川等地。在东线，朝鲜人民军部队负责在沿海地区节节阻击敌人，且战且退，逐渐把敌人诱向预定战场。

11月25日黄昏，当西线之敌被诱至清江以北预定地区时，志愿军发起猛烈的进攻，歼伪军两个师大部及美军一部并乘胜迫击南逃之敌。在东线的中朝人民军队，于11月27日在长津湖地区向敌展开猛攻，歼美军一部。

11月28日夜，被战局震惊得如同闻听晴天霹雳一般的麦克阿瑟，紧急召集了朝鲜西、东两线的美军指挥官及美国远东空军、海军司令等高级军事将领，在东京研究如何摆脱朝鲜战场的困境。在众议无法挽回败局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指示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为避免被从东面迂回包围”，于是“必要时自行撤退”，扼守平壤一线。第10军也火速撤入咸兴、兴南一线，以保全有生力量。

于是，麦克阿瑟的“大攻势”又变成了“美丽的梦想”。

2. 毛泽东对杜鲁门和原子弹不屑一顾

12月4日，毛泽东主席号召志愿军攻打平壤，“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挺进”。12月6日，志愿军第39、第40军各一部和新近开到前线的

朝鲜人民军一道，收复了被美军占领了47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同时，由游击队配合敌后人民军各部队，截歼、追击退却中的“联合国军”，并收复了元山、沙里院等重要城镇，进而向南追击。到12月24日圣诞前夕，志愿军除了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八线”以北的全部领土（除襄阳）以外，还一并收复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至延安半岛。整个战役歼敌36万多人，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

这次战役的胜利震惊了全世界。给帝国主义侵略者及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以沉重打击，它有力地论证了毛泽东所阐述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揭穿了美国的虚弱本质，极大地鼓舞了中朝军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胜利信心。毛泽东在转发这次战役第38军作战经验时指出：“志愿军的作战经验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

朝鲜战局的意外发展再次震惊了华盛顿美国最高决策当局。12月28日，华盛顿收到麦克阿瑟的紧急报告后，杜鲁门总统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和召开内阁会议，研究扭转败局的办法，但均苦于毫无良策可施。

同样也是在这一天，全世界的广播、电视、新闻媒介都播发了当日联合国安理会的情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约代表伍修权在联大安理会上的发言：

“……美国代表奥斯汀说什么：‘美国未曾侵略中国的领土’。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舰队现在是在哪里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就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的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美国的真实企图，正如麦克阿瑟所透露的，是要把台湾变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一个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的基地，一艘美国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伍修权慷慨激昂的演说句句像是一把把利刃，刺进杜鲁门的耳朵里、心脏里。

12月29日，杜鲁门又收到麦克阿瑟的一份急电，建议立刻调遣台湾蒋介石军队入朝参战。据说，蒋军在台湾已作好了出动准备。但此建议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阁紧急会议复议，最终被杜鲁门驳回，主要是担心会因此而激怒毛泽东和红色中国，把战争“扩大”到台湾和其他地区，弄得最后无法收场。

随着朝鲜战局危机日趋严重，杜鲁门则日益焦虑不安。不知多少次，他脑海里掠过同一个可怕的念头：使用原子弹。这个念头像磁石一样紧紧地吸着他，尤其是他感到极为烦躁、懊恼的时刻。开始，他还能扪心自问，理智地考虑多种后果，但不久，他的决策已下，一个以核恐吓来扭转战局的计划便问世了。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记者突然问道：“总统先生，麦克阿瑟将军曾强烈要求华盛顿授权他进攻满洲。这种行动是取决于您的意志，还是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

“当然取决于联合国，”杜鲁门答道，“谁都知道，麦克阿瑟指挥的是一支联合国的部队。”

“若联合国通过决议授权麦克阿瑟将军继续前进的话……”“那我们就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局势。”杜鲁门装腔作势地说。“请

问总统，”《纽约每日新闻》的一位记者敏感地接着问道。“您所讲的，‘一切必要的措施’，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当然包括，亦即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武器。”

几分钟以后，合众社就播出下列新闻：“杜鲁门总统今天说，美国已在考虑同朝鲜战争相联系的原子弹问题。”

美联社也播发了新闻：“杜鲁门总统于11月30日表示，美国政府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采取这一措施的话。”

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当然也立即传到了北京，传到了莫斯科，传到了全世界。但毛泽东对于杜鲁门的核威胁不屑一顾，他说，杜鲁门的原子弹总没有中国的人多，他的原子弹总炸不完中国人，我们不用害怕。结果，杜鲁门的原子弹，对中国丝毫不起什么影响。事实上，引起恐慌的却是西欧各国。尤其是伦敦，整个都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当时，当关于原子弹的消息传到下院时，工党的左翼立即散发了一份百人签名的请愿书，声称如果艾德礼对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意图给予支持的话，他们就要退党并决计使政府倒台。惊慌失措的艾德礼不得不立即飞往华盛顿，试图让杜鲁门保证，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时应事先得到英国的同意。

杜鲁门其实应该明白，在苏联同样也掌握了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只能是恐吓西方自己。原子弹的使用，只能意味着交战双方的共同毁灭，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意味着世界的毁灭。

3. 美国人看来顶不住了

针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退守“三八线”，美国当局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缓兵之策，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

目前美、英等国正在要求志愿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企图整军再战。因此，要志愿军克服一切困难，协同人民军过“三八线”。如果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我们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德怀关于部队过于疲劳，应稍做休整，速胜有害的建议固然正确，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超过“三八线”再打一位很有必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下决心发起第3次战役。在他的精心部署下，志愿军各路人马从1951年1月3日起经过连续七昼夜的艰苦奋战，以每小时前进1公里的进攻速度前进了80到110公里，毙敌、俘敌1.9万余人，占领了汉城，粹碎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据守“三八线”，整顿军队，准备再犯的企图。这次战役成为朝鲜战争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

“联合国军”经中朝人民军队连续3次战役的打击后，溃退到“三八线”以南，后又丢失了汉城，内部矛盾加剧，失败情绪严重。美国统治集团对朝鲜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争论也更加激烈。到底是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还是守住朝鲜一个地区？还是撤离朝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杜鲁门的态度是：既不愿冒扩大战争的危险，也不愿撤离朝鲜。他这种中庸或者叫“骑墙”的态度招致了很多人的不满。为此，他亲自写信给麦克阿瑟，说明这场伟大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提高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威望”，保障日本的“安全地位”，推动西方国家扩充军备，他要求麦克阿瑟为了这些目的而战，尽力在朝鲜据守一个重要地区，如不可能，则坚守朝鲜沿海岛屿，特别是济州岛。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在军事上被迫撤出朝鲜，也“不承认撤离的后果”，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

1951年3月20日，美国政府通知麦克阿瑟寻求与中朝方面谈，判。

可是麦克阿瑟不甘就此作罢，他只看到朝鲜地区的局部利益，拒绝和谈。他在3月24日狂妄地发表声明，威胁要轰炸中国沿海和内地。这使美国政府首脑和英法两国都大为愤慨。4月11日，杜鲁门突然宣布撤消麦克阿瑟的职务，由李奇微代替总司令之职。

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作出“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5月31日，美国国务卿顾问凯南私下拜会了苏联驻联合国负责人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者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并表示愿意“恢复战前状态”，愿意“讨论逐渐撤退外国军队”。6月初，美国又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多次透露愿意通过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意图。与此相联系，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在军事上也暂时放弃了全面进攻的战略，改为在“三八线”附近构筑阵地，转入战略防御。

停火谈判看来已迫在眉睫，若美国正式提出谈判，我们应采取什么策略呢？

这天，毛泽东走出书房，慢慢踱步在花园叶影斑驳、杨柳婆娑的林荫小道上，正当沉思着这件事时，忽见周恩来兴冲冲地走了过来，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喜悦。

“主席，杜鲁门已被我们打得终于同意坐下来谈判了。他已授权李奇微向我们发出声明，愿意与我们举行正式谈判。”说着，周恩来递给主席一封电报。

“好啊。好啊！”毛泽东喜出过望，连连叫好。他急忙接过文件，仔细地阅读起来。

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到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贵方对本方的答复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可以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李奇微

1951年6月30日

毛泽东笑了起来。“这两天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今天他就向我们提出来了，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怎么给他回话。”

毛泽东和周恩来走回到菊香书房，各自坐定，话题便又回到研究如何答复李奇微的问题上。

“恩来，你看这个谈判声明，是美国佬真的回心转意想与我们真心实意的谈，还是炒的‘老三样’、虚情假意地蒙骗我们？”

“主席，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是在欧洲，可这次却在朝鲜战争中动员了他们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还动用了英、法等20多个国家的军队，总人数由入朝时的42万增至69万。即使这样，它也仍然没有取胜的可能。目前，美国不愿也无力再向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并且担心再打下去，会被撵出朝鲜半岛。因此，为了避免他们的彻底覆灭，美国才急于与我们停火谈判的。另一方面，明年是美国大选年。杜鲁门为了民主党的竞选，不想当年在朝鲜停战，以免被共和党指责为承认失败。因此，我看这场谈判有可能拖上一段时间。不过，既然美方已提出妥协，我们就是明知道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也应照顾一

下他的面子，给他一个表演的机会嘛。”周恩来思维敏捷，侃侃而谈，主席赞许地点着头。

“看来，国际形势要求美国必须把战争限制在朝鲜，限制在现有的陆海空军力量，不会再派任何增援部队了。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尽可能稳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就算保全了体面。”

“是的，主席，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依我看，现在是到了与美国佬谈判的时候了。”

“这次看来美国是真的要与我们谈判了。好，我看可以谈。谈判时机已到，能早解决就早解决，这样我们都可以睡个好觉，休养生息，搞我们的国内建设。说实在的，经过五次战役，我们虽然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是与美军相比，我方技术装备仍处于非常悬殊的劣势，制空权、制海权也完全掌握在美国佬手里。虽然我们志愿军的步兵数量多、战斗力强，炮兵、坦克兵和后勤保障力也得到了加强，但他们没有白天行动的自由，部队机动和物资供应均受到很大限制，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利的。既然速胜是不可能的，那么当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时，我们应抓住这个时机。”毛泽东若有所思的停了停又继续说：“不过，从以往与他们打交道的经验看，我们还须多做两手准备，才能步步掌握主动。一方面与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准备打持久战。”

周恩来问道：“金日成发来电报，希望彭德怀代表志愿军出席谈判会议。”

“这不太好吧？彭德怀是中方统帅，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都不宜直接出面谈判，还是让副司令邓华和参谋长解方去谈判吧。”

“主席。我看还可以派李克农和乔冠华去朝鲜，充实谈判代表团的力量，他们俩精通外交，擅长谈判。”

“好，就这么定吧。”毛泽东肯定地说，“对了，你再给金日成和彭德怀发个电报，让他们尽快答复李奇微。”

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首相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彭德怀以声明的形式答复了李奇微：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已收到了。我们授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4. “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

从此，朝鲜战争结束了大规模运动战的时期，而代之以边打边谈，谈谈打打的僵持阶段，这个阶段前后延续了两年之久，双方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其间历经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防御战和反击战，包括最著名的上甘岭防御战和1953年夏季的金城反击战……

早在李克农、乔冠华等一行即将离国赴朝鲜谈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召集代表团团员开会，提出了我方谈判的策略。毛泽东指出：“当美国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我们应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谈判时，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以利于朝鲜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但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可以做一些妥协或者让步，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

应掌握这样的原则：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进机让。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

在谈判的战略战术方面，周恩来提出了谈判中要利用矛盾、掌握主动的思想。他认为在朝鲜战争和朝鲜停战谈判期间，存在着几种矛盾。第一，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区别对待。在朝鲜战场，和美国在一起的虽有 15 个国家，死心塌地追随美帝的国家毕竟是少数。美国与其主要盟国英国就有不少矛盾。英国虽也出兵朝鲜，赞同美国在联合国导演的一些提案，但是它反对美国扩大战争、把兵力陷在亚洲，反对美国企图动用蒋介石的武装参战，反对李承晚扣留大批中方被俘人员而危及停战谈判；并认为美国封锁中国是一种错误。美国领导人几次叫嚷在朝鲜掷原子弹，英国很紧张，极力劝阻。它担心美国同中国冲突的升级会损害大英帝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利益。因此，英国、法国都应作为“维持现状派”的代表，中国应充分利用这一情况，使英、法对美国起一定的牵制作用。第二，李承晚集团同美国之间也有矛盾。李承晚在停战谈判上从中作梗，以此向美国讨价还价，要挟美国增加对他的支持和援助。志愿军总部在这一点要把美国政府同李承晚区别开来，一方面痛打李承晚军队，另一方面在美方对执行停战协定作出保证后才同意签字。

美国的侵朝战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战争拖得越长，对美国越不利，但它又不甘心失败。因此，美国对谈判表示得既狂妄又虚弱，出尔反尔，能拖就拖，周恩来称之为“美国的慌乱与徘徊”。美国在谈判期间所表现的基本特点是“打时想谈，谈时想打”。他们一心想把持谈判，想让中国方面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达成停战协议，以取得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所以，美方在谈判过程中总是百般刁难，致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结果。

在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朝中方与美国进行了激烈的谈判，在“三八线”附近打了无数次的阵地争夺战，但最终美国不得不在协定上签字。

1953 年 7 月 27 日，是一个世人瞩目的日子：历时两年多的朝鲜停战协定终于签字了。这一天的板门店，天空晴朗，夏风宜人，发生在这里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在牵动着世界“神经”。上午 10 点整，签字大厅一片安静。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将军从大厅南门进入大厅，分别在会议桌前就座。

两位代表在本方助签人员协助下，在自己一方准备的 9 本停战协定上签字。

之后，由助签人员同时交换 9 本停战协定，再在对方交来的 9 本停战协定上正式签了字。

这些文本将由助签人员送往双方司令官签字。

到场的来自世界各地的 200 余名新闻记者，均有幸目睹和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并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头号新闻发布到世界各地。

同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汶山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同日，金日成元帅于平壤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次日，彭德怀司令员于开城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同日，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向朝中部队发布命令：自 1953 年 7 月 27 日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 12 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美国联军总司令克拉克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有没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

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场从“三八线”上爆发的战争，在历经3年多后，终于在“三八线”附近宣告结束。

5. 毛泽东触摸了一下老虎的屁股

而毛泽东则通过朝鲜战争大胆地触摸了一下美国这只“纸老虎”的屁股。在欢迎志愿军将领胜利回国的宴会上，毛泽东指出：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既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别国接受投降条件的停战谈判，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为瓜分殖民地、分得一杯羹汤而暂时妥协的停战谈判，而是帝国主义不得举行投降，承认失败，倍受羞辱的停战谈判。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就是一个妄图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耻下场。

在我们庆祝胜利的日子里，我们还必须提醒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帝国主义虽在战争和谈判中遭到失败，不得不低头服输，勉强接受停战，但帝国主义者及其反动派们对于这样的结局是决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的，也是不会对一个社会主义的、年轻的、新兴的人民民主国家俯首称臣的，他会无时无刻地力图翻案。很显然，朝鲜停战谈判后，我们还不能就此罢手，高枕无忧，更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要准备迎接一场更加尖锐的、复杂的军事与外交交织着的斗争。

毛泽东那洪钟般响亮的声音，久久地回荡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宴会厅里，也久久地回荡在人们的心上。

朝鲜战争把中美两国关系引入了尖锐而剑拔的冷战时代。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50年代初，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一时。“谁丢掉了中国？”成了攻击上至总统、国务卿，下至一般外交官、记者、学者的骂语。共和党人批评民主党政府将中国推入苏联的怀抱。

朝鲜战争引发了美国对中国长达若干年的敌视。美国仇恨共产主义的浪潮经久不衰，凡是与共产党、社会主义、中国、苏维埃相关的，全都被形容成红色。大学教授如果不高声臭骂“共产主义奴役”的邪恶，就会被校方解雇，反共的狂热分子的演讲能得到最高的报酬费，辛辛那提棒球红队因沾了“红”字而被迫改换名称，反共虐待狂的小说成为发行上千万册的畅销书，而连环漫画画的是赤色分子被绳子吊死，用手枪砸死，活埋，喂鱼或是吊在美国人的汽车保险杆上……，甚至连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他们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

由于“麦卡锡主义”这股狂热的反共思潮影响，并且由于美国曾在朝鲜战场上同中国打过仗，相当一个时期内美国一般人心目中与中国为敌。中国问题成为禁区，更谈不上重新审议对华政策的问题。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杜鲁门政府后期就已经开始受到迫害和排挤，到艾森豪威尔上台、杜勒斯任国务卿后就被清洗殆尽。政府以外的一批过去经常被咨询的造诣较深，并且有丰富切身经历的远东和中国问题专家被打入冷宫。于是，在整个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朝野对中国的称呼通常是“赤色中国”和“共产党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敌对的国家，谁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一想起来就害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危险”。

到60年代虽然麦卡锡时期的恐怖已经过去，虽然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开

始，但是对这两个国家的人们来讲，彼此敌对与戒备心理仍十分严重。一个在对日作战时曾在陈纳德的“飞虎队”中服务过的退役军人甚至断言：“我已经42岁了，我绝对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们会与中国打一次仗。”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中又强调指出：“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

毛泽东认为，中国和美国如果要对抗下去，我们不会害怕，当然如果能改善之机，我们也一定要争取。

第 11 章 台湾是个绞索

“我们向金门打炮也好，停止炮击也好，主要都是为了支持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守住台湾，而不被美国侵略和吞并。”

“美国宣布继续承认蒋介石台湾政府，这样，美国便继续把自己捆在 109 年来的历史上，中美之间的对抗将继续下去，历史的转机还需要等待。”

1. 炮轰金门背后的雄才大略

历史常常在一瞬间发生了变化。

正是 1950—1953 年的朝鲜战争，挽救了困守在孤岛台湾的蒋介石行将覆灭的命运。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晚上，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紧急会议，国防部长约翰逊第一个发言，他不谈朝鲜战争，却大谈台湾的战略地位如何。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雷德宣读了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艾奇逊当即建议出兵台湾。他说：“应当命令第七舰队进入福摩萨（指台湾——编者注），以防止战争扩大到该地区，应当命令第七舰队立即从四米地（位于菲律宾群岛，美国的一个海军基地）北上。我们应当发表一项声明：第七舰队将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而福摩萨也不得进攻大陆。”杜鲁门当即同意了艾奇逊的建议，并指示，第七舰队未到达指定地区以前，暂不发表声明。

6 月 27 日，美国第七舰队的 8 艘舰只，包括 6 艘驱逐舰之艘巡洋舰进入台湾海峡，并立即开始巡戈。同一天，杜鲁门正式发表声明，公然宣布他已命令远东美军参加对朝鲜人民军的作战。

同月 28 日，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了驳斥杜鲁门的声明，指出：“杜鲁门 27 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他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不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声明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正义的人们，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对东方的侵略。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美国置之不理，继续加强对台湾国民党的军事援助。7 月底，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到台湾，同蒋介石商讨“军援”的具体步骤。会议决定，组成联合部队，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美国除第七舰队外，增加第十三航空队控制台湾；美蒋成立“军事联络办事处”；美军可自由使用台湾空军基地；台湾国民党军队武器装备和一切作战物资均由美国供给。9 月 10 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宣布美国的新远东政策，正式放弃“弃台”政策，代之以武力保台的新方针。大量军事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往台湾，到 1953 年时，美国给台湾的军援物资已达 24600 万美元。

美国的支援，使国民党在台湾获得了喘息机会。

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对抗，也就以国民党出人出力、美国主要出钱出枪的方式展开了。

1954 年 7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正式宣布，解放台湾，挫败美国侵略、颠覆、分裂新中国的活动是中国人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解放台湾所面临的困难毛泽东是十分了解的，提出这一任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如果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有所作为，任美国肆意活动，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或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随时间的推移，给世界造成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既成印象，这是一生致力于祖国统一的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毛泽东看来，日内瓦会议采取了无法避免用维持现状的方式来解决印支和朝鲜问题，但他决不允许用同样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纯属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毛泽东甚至考虑到了为了维持国家主权，不惜再战的可能性。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建军节上发表讲话“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8月11日，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也重申，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外国干涉，号召“全国人民要为完成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的光荣任务而奋斗到底”。台湾海峡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帷幕揭开了。

毛泽东决定采用炮击大小金门和马祖岛这一特定的军事手段，以表明中国对在美国在亚洲推行侵略政策的严正立场。同时，制止国民党军队对东南沿海的袭扰，配合即将开始的浙东沿海岛屿的收复战。

1954年9月3日下午1时5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对大小金门、马祖岛开始炮击。顿时间，金门、马祖岛上硝烟滚滚，火光弥漫，“9.3”炮战摧毁国民党军炮兵阵地7个，击沉炮艇、拖轮各1艘，击伤猎潜舰3艘，击毁水上码头1个。从9月3日到9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19大猛烈炮击。

这一炮打懵了蒋介石，也打懵了艾森豪威尔，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小小的金门一下子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

同日，晚7时许，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安德森关于共军炮击金门的报告放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艾森豪威尔顿时一惊，感到台湾问题的麻烦终于来了，但他一时摸不清中共的真正意图，这是准备解放台湾的前奏，还是只为阻止美蒋签约。

这时，美国与蒋介石正就“共同防御”中是否包括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发生了龃龉。美国的军界、政界普遍认为台湾澎湖是必须保卫的，因为它是远东反共的重要基地和前哨，但他们对沿海的岛屿则始终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愿为蒋介石承担保卫的责任。

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呢？

军界、政界、外交界众说纷纭，使美国迟迟未作出明确决断。

美驻台大使兰金等官员倾向协助蒋介石保卫这些岛屿，但最好秘而不宣，让共产党捉摸不透美国的意图。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雷德代表军方多数派则主张采取强硬立场，派海军防卫这些岛，并出动空军轰炸大陆。

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反对美军介入，认为“从美国对福摩萨（台湾）的防务能力上说，这些岛屿在军事上并不重要；没有美国帮助，中国国民党人不可能守住它们”。

国防部长威尔逊也认为，要守住这些岛屿就必须打击大陆上的军事目标，使美国卷入中国内战，对西方盟国，美国无法解释为什么为了几个小岛而同中国开仗。

而国务卿杜勒斯则想出了一个的折中方案：

我建议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我们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意在获得一项维持原状和实现福摩萨海峡停火的指令，不管苏联否决同意这一计划，美国总有所得。

杜勒斯的建议是折中方案，同时也是一个十分狡猾阴险的方案。假如苏联在安理会否决这一提案，美国国内、盟国及世界的舆论就会对美国有利；假如苏联同意，美国也就不必再面对这些“该死的小小”岛屿了，从而使赤色中国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理亏的地位。

杜勒斯是利用联合国来达到既能取得停火，又不便美国卷入同中国的战争、更重要的是这些是以台湾国际地位未定为前提，为以后分裂中国准备了条件，这是一箭双雕。

艾森豪威尔立刻批准了杜勒斯这一方案，并指示杜勒斯尽快实施。

同年10月，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立即飞赴英国、新西兰，与两国政府进行了紧急磋商，达成美、英两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由菲律宾和新西兰向安理会提出杜勒斯这项提案，并为这项提案取名为“新西兰提案”，又称为“神谕提案”。但是，这个精心炮制的“神谕提案”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之前，还必须获得蒋介石的同意。

“神谕提案”在蒋介石那里碰壁了。

10月9日，负责远东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带着这项提案访台。尽管罗伯逊在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会谈中使出了他的全部招数，做出了种种的许诺，仍未打动蒋介石的心。蒋介石毫不客气地否决了杜勒斯的提案，强烈反对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他认为这个提案只能对共产党人有利，外岛停火和中立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台湾中立化，再下来中共进入联合国，最后台湾就要共产党接管了。蒋介石气愤地说：“如果台湾赞同这个建议，那么对国民党人，对我们的士兵，对生活在本岛的百姓，对海外侨胞及大陆的中国人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两个中国”问题表态。

杜勒斯策划的“神谕”提案，遭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词语有所不同却基本立场一致的强烈反对。毛泽东与蒋介石虽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对“神谕”方案所持的共同基本立场就是：反对“两个中国”。

“神谕”方案遭到抵制与拒绝，安理会只好决定无限期搁置讨论，也就不了了之。

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海峡两岸相互敌对的国共双方，尽管还在海边作战；但是，在涉及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上，第一次表现了惊人的一致。

2. “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

在以后的若干年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处理台湾问题上，更多地是考虑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对美国利用的企图十分注意，并给予坚决有力的反击。

1958年，是国际国内形势最动荡而变幻莫测的一年，也是毛泽东最精神振奋、情绪激扬的一年。

这一年的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八届二中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范围掀起名曰“大跃进”的经济建设高潮。

“超英赶美”是大跃进的奋斗目标之一。为了保证“大跃进”能顺利进

行，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要争取时间，最好十年不打仗……现在蒋介石台湾很小，但还很神气，常搞出飞机来撒传单，如果我有1亿5千万吨钢，那时只要吹口气，他就要走路了，现在打雷都不理。”这番话表明，毛泽东已有暂时放弃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

这时，中美会谈已经中断。中共中央认为，“前一段会谈分别提出的种种问题难以解决，今后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说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几个月后，毛泽东对这个“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加以进一步解释，他说：“要就全部拿过来，要不一个也不要，单是金马我们就不拿。”

为什么“单是金马我们就不拿”？因为仅占领金门、马祖这几个小岛，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并没有多少意义，只能使台湾地区孤悬海外，反而正中美国下怀，方便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让国民党占据金、马，可以使台湾当局保留一条与大陆联系的纽带，便于将来“一揽子”解决整个台湾问题。同时，金门和马祖属于福建省，从来不存在所谓“地位未定问题”。因此，美国想抛掉这两个包袱，而我们让国民党留在金门、马祖，就为美国宣传“台湾地位未定”和推行“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等阴谋增添了一道障碍。

为了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曾向美国政府建议，限期恢复双方大使级会谈，但美国方面置若罔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坚持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以所谓“战争边缘”论来对付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美国到处炫耀其优势海空力量，以战争吓唬人，但实际上并不想真打。换言之，即站在战争的“边缘”上，利用对方的畏战心理来谋求政治上的利益。美国对金马协防问题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也正是这种“战争边缘”政策的运用。

1958年7月15日，美军入侵黎巴嫩。17日，与美结盟的英军侵入约旦。于是，中东成为两个国际阵营冲突的焦点。

7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军委副主席和空军、海军负责人参加的军委联席会议，布置东南沿海的军事斗争任务。

毛泽东注意到：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亚洲地区的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三个热点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已经有了结果，虽然在日内瓦会议上未能达成任何政治解决的办法，但是，那里的形势已基本稳定下来。日内瓦会议的成功至少在近期内大大地减少了印度支那地区重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毛泽东认为不能只看到北面停了，南面也停了，好像天下就太平了，台湾问题目前仍是悬而未决，如果不在近期内有所作为，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舆论将会把台湾与大陆的分离看作既成事实，这必然要对日后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带来不利的影晌。至于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是无权加以干涉的，只有中国才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总之，决不能接受用解决印度支那、朝鲜问题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中东危机的发生给中国造成了一个最好时机：一来可以用实际行动声援中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二来可以借中东危机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

7月18日，毛泽东对参加军委联席会议的同志说：

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只限于道义上的支持。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行动的方向应该选在金门，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牵制他部署在

远东的兵力不能西调中东，以减轻美国对中东人民的压力。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防部长彭德怀当晚即向陆、海、空三军部署了炮击金门作战的具体事宜。

3.12 海里领海线

炮轰金门之后，台湾当局立刻向美国提出“协防”要求，美国继续采取“捉迷藏”政策既不想对中国共产党示弱，又害怕真的与中共甚至中苏作战，所以一方面向台湾海峡调动军舰，另一方面又拒绝对是否协防金马明确表态。

鉴于美国军舰直接参与对国民党台湾金马补给护航。毛泽东意识到领海权问题可以同美国做一做文章。

周恩来、乔冠华和有关方面仔细地研究了有关领海线的法律文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草拟了我国领海线的公报。

当时，世界各国确定领海线有几种情况，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大都是按照海牙公约的规定划定的领海线为 3 海里，而苏联没有执行海牙公约协定，确定了 12 海里领海线，有些拉丁美洲国家还规定了 200 海里领海线，但实际上这样做是为了建立自己的专属经济区。西方国家根据海牙协议，达成了 3 海里领海线，并要求世界各国遵行：其实这种 3 海里的领海线只利于有强大海上力量的国家，它们的舰船可以方便地到别国近海进行军事、经济活动。因此，世界也有些国家并不承认这种不公正的 3 海里领海线。从我国的经济、国防利益考虑，当然以领海线宽一些为好，但如果没有有效的军事力量来保障宣布的界线，领海线反而会被他人任意破坏，到头来只等于是空谈。另外，我国东部的海上邻国不少，提出过宽的领海线势必会引起严重的国际争端。研究和比较了各国领海线宽度的优劣，认为我国的领海线定为 12 海里较为合适。

毛泽东在仔细分析了外交部的研究报告后陷入深深的沉思中。

按理说一个国家提出自己的领海界线，完全是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正当行动，但是由于过去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有着一万多公里海疆的中国竟一直没有提出过自己的领海界线。结果，不仅外国舰船可以在中国近海横行，而且我国沿海渔业资源完全无法得到保护。

但是在这个时候提出国家的领海线问题是带有几分引发战争的危险性的。因为，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海军开进中国近海，并一直担任沿台湾海峡的巡逻，在事实上造成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军事对峙明朗化。美国以此向新中国施加军事压力，来实现台湾海峡的国际化，割断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

此外，领海线问题还涉及到与周围国家的关系。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为了保住自己在远东和亚洲的利益，建立了以日本为轴心、东南亚五国组成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为连线的亚洲反共同盟，虽然这些邻国与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如果领海线确定得不适当，势必会侵犯他国的经济利益而引起重大的国际争端，形成四面树敌。

面对这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地掂量即将付诸实施的方案，决定召开一次国际法专家的诸葛亮会，听取专家们的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正他的方案。

但是这次专家会议并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目的，因为与会的专家们大都拘泥于西方通行的国际法，主张中国也要实行 3 海里的领海线，认为领海

线定得太宽，搞得不好会引发战争。也许他们过分注意到战争的危險，而忽视了领海线问题的政治意义，那就是表明中国是不受制于任何人而独立存在的政治力量。

9月1日，毛泽东最后确定中国的领海线为12海里，并决定9月3日停止对金门的炮击。

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线为12海里，凡未经中国政府的允许进入12海里领海线的外国船只都将视为对中国领海的侵犯。

中国政府宣布领海线为12海里的声明震动了世界。

对中国政府的这一惊人之举，世界各国反响不一。

苏联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宣布其领海线为12海里的行动，表示理解和支持，并重申苏联政府的一贯立场，即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属于本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如众所周知，英国政府不承认超过3海里的领海线……”

日本外务省也发表声明称：“日本政府认为现行之3海里限度为国际所承认之唯一领海限度……”

美国政府也立刻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就在中国政府的声明发表后仅几小时，美国政府发言人就宣称：“美国政府认为，依照国际法领海界线为3海里，遵守3海里界线的国家依照国际法没有义务承认一个更大区域的主张。”

但毕竟12海里领海线确定了中美之间的鸿沟。

4. 台湾是个绞索

罗德岛，新港总统别墅。

艾森豪威尔总统坐在一个宽大的沙发里，神情疲惫，脸色憔悴。由于中共的炮兵部队自8月23日开始对金门国民党守军大规模连续炮击，使远东的形势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而且火药味越来越浓。这突如其来的炮击，使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中断他的休假。他要对这突发的形势作出反应。

坐在总统对面沙发上的是刚被艾森豪威尔总统从华盛顿紧急召来商讨对策的国务卿杜勒斯。

“约翰，条约国（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七个成员国）的态度如何？”总统问道。

“总统先生，我根据你的指示9月8日会见了英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七个条约组织成员国的使节，向他们通报了最近福摩萨地区的形势和我国政府对这一严峻形势的看法。七国使节在转达本国政府的看法时，一致表示抗议中共的这种战争挑衅行为，但他们不希望美国军事介入这一地区。”

“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呢？”总统又问道。

“他们认为目前中共在沿海一线集结了强大的陆、海、空三军的情况下，应将西太平洋的部分舰只和战术空军的部分作战飞机调往福摩萨地区，必要时派海军陆战队在福摩萨登陆。”

“中共目前的停火是长期的还是暂时性的？”

“我认为中共目前的停火是要观望一下我国政府的反应，现在我们对中共这种不宣而战的挑衅作出强硬的姿态，同时以强大的军事威慑，必要时

使用核武器迫使他们有所收敛。这样既可以遏制中共的进攻势头，又可以安抚和控制蒋介石。”

空气冻结了几分钟后，艾森豪威尔坚定地做了一个手势说：“约翰，你说得对，立刻以我的授权的名义发表一篇声明，要让中共明白美国政府对福摩萨发生的这一切不会熟视无睹，同时让我们的大使通知蒋介石，美国政府将为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支持性援助。”

9月4日，杜勒斯在艾森豪威尔授权下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声明，这就是历史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新港声明。

新港声明发表后在美国的盟国中和美国国内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美国最重要的西方盟国英国首先公开表示反对美国为金门、马祖而同中国作战，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基本上持与英国同样的态度，美国内也是一片反对声，在野的民主党人对新港声明的谴责最为激烈。前国务卿、民主党参议员艾奇逊公开指责“现任政府晕头转了向，不惜牺牲美国优秀士兵的生命去保卫一个被逐出中国大陆的独裁者的军阀政府”。

对于美国政府的战争讹诈，9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说：“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得多一点。”他又说：“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9月6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了台、澎、金、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军事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同时倡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恢复被美方单方面停止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毛泽东的讲话和周恩来的声明，显示出中国政府的此次军事行动，不同于1950年和1955年。那两次主要是打击台湾当局，而此次“炮打金门”，主要是针对美国，至于惩罚蒋军倒还是次要的考虑。

同时，周恩来的声明是要求美军从台、澎、金、马撤出；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是以金、马作为一个绞套，不怕美国钻进来。这可以说体现了中国政府对金马战局的两种准备，台、澎、金、马为一整体，美军要撤就全撤，中国欢送，要“协防”就全协防，中国也不怕。9月8日，毛泽东对此有更透彻的说明：“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到这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

同日，美国政府对周恩来总理的声明立刻作出了响应，表示欢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同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但另一方面，截止到9月6日，美国已在台湾海峡集结了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美国第46巡逻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及其他部队多批飞机，已分别调到台湾和菲律宾。美国第一批海军陆战队3800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还有部队将继续到达。杜勒斯后来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

同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致信艾森豪威尔警告说，如果美国发动对中国的核攻击，那么侵略者就将立即遭到应有的同类武器的攻击。

至此，从解放军暂停炮击金门的9月3日起，金门地区的炮声虽然一时沉寂，可是斗争却从金门扩大到了国际政治的大舞台上。政治谋略斗争取代

了军事行动，成为这一斗争的主戏。

5. 不打美舰只打蒋舰

在“8·23”炮战取得重大胜利后，福建前线指挥所根据毛泽东中央军委预定的封锁金门的计划，福建前线的陆海空三军部队开始着手对金门实行全面封锁。

大金门只是一个面积 120 平方公里的小岛，而小金门的面积 仅 10 平方公里，大担、二担面积更小。在这狭小的金门群岛上，8 万多国民党守军和 5 万居民的基本衣食及各种物资几乎都要依赖于台湾的供应。经过了近半个月的激烈的炮战后，金门海峡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但金门 10 万国民党守军自炮战开始以来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生活补给品和作战物资的补充，岛内原有的储备物资也快消耗殆尽，驻岛守军已开始出现粮荒，弹药消耗又得不到补充以至到了极度匮乏的境地。为此，金门守军要求运送大量生活补给品和各种作战物资的告急电频频发往台湾。

9 月 6 日，美国政府发言人和台湾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几乎在同时宣布：自 1958 年 9 月 7 日起恢复对金门岛国民党守军的海上运输，而且从即日起的海上运输均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驻台舰只护航。

虽然，美国政府同意为蒋军运输舰队护航，但护航的目的和任务范围一开始就严格限定了，即美海军参加护航的舰只只负责由始发港至金门岛外海 3 海里处的运输航程护航，不进入金门岛 3 海里内的海域，但这个划定的护航界线并没有事先通知蒋介石。因为艾森豪威尔并不想与解放军的强大炮兵发生直接的冲突，而让他的“英勇的牛仔”去替盟友作无谓的牺牲。他只是以虚声恫吓的武力威胁中共方式来安慰蒋介石，使他不觉得日渐被疏远，同时又不暴露美国的真实战略意图。

9 月 7 日，国民党海军副总司令黎玉玺和美国军事顾问团海军顾问率领一支 14 艘舰只组成的庞大的混合运输编队由台湾驶向金门海域，编队中包括国民党海军的之艘运输舰、5 艘作战舰，美军的 2 艘巡洋舰、5 艘驱逐舰。整个混合编成一字形排列，美舰配置在海上编队左、右两侧护航，把蒋军作战舰只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舰仅相距两海里。同日中午 12 时正，美蒋混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国民党海军的 2 艘运输舰单独驶向料罗湾码头，卸下货物，美国海军的护航舰只则有意停在中国领海范围以内，做出一副掩护的姿态。金门前线的解放军炮兵部队因未明确对这种美蒋混合编队的处理方针，因此未予射击。

就在美国军舰侵入中国领海的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严重警告。

然而，口头警告并不能使美国政府收敛其侵略气焰，重要的是要表现出实际行动。因此如何对付美蒋混合编队的运输舰队，一时成为中国政府在金门海域作战的关键问题。

9 月 8 日，毛泽东接到福建前线指挥部叶飞将军关于 9 月 7 日美海军舰只为国民党海军运输舰队护航的报告后，立即在中南海勤政殿的侧厅召开了有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和雷英夫参加的小范围的会议，研究金门海域的形势。会议讨论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如对美舰打不打？如果美舰开炮怎么办？这也是毛泽东不时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从 8 月 23 日大规模炮击金门后的国际形势来看，美国从持观望态度，幕后鼓噪，逐步地走向了前台，甚至向台湾海峡大量增派军舰和陆战兵力，

大有要履行美蒋防务协定之势，同时在舆论上也愈来愈强硬，特别是杜勒斯9月4日发表新港声明，现在又公开派军舰为国民党海军运输舰队护航，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但是，从远东的战略格局来看，虽然美国拼凑了一个个的军事条约性的集团和组织，在日本建立了远东战略桥头堡，但没有准备全面介入的迹象。因为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整个印度支那的局势形成了南北分割对峙的局面，这虽不是美国的最佳设计方案，但也基本上实现或暂时形成了所谓对共产主义势力南下的阻遏。按军事常规来说，处于动态之中的相对稳定不是采取军事手段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最佳时机。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战争疯子由于疯狂性的发作，不惜一切代价做出挺而走险的决断。

鉴于亚洲和远东形势的考虑，毛泽东作出了令人一时捉摸不透的决策，对美国的公开挑衅和咄咄逼人的态势，采取避其锋芒，放着美舰不打，专打蒋舰，继续实行对金门的封锁战略。同日，毛泽东明确指示金门前线指挥部：“对金门作战的下一步方针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首先向我开火，没有命令不许还击。”

9月8日，台湾国民党当局由于前一天靠美舰护航得以平安运输，又出动4艘登陆舰在美海军1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的护航下，再次向金门驶来。

这一天，前线解放军炮兵已经接到明确命令，并做好了打击蒋舰的准备。

上午11时，美蒋混合编队进入金门海域后，美舰依然停在金门海岸等待蒋舰卸货。

对于美舰再次侵犯中国领海的行径，前线指挥部奉命发出警告，但是美舰不予理睬。

12时43分，前线解放军以43个地面炮兵营又6个海岸炮兵连组成的强大炮群，对停泊在料罗湾的国民党军的舰艇和金门岛上的军事目标，实施了第三次大规模的炮击。在弹雨中，“美乐”号登陆舰当即被击中起火，继而爆炸沉没。“美珍”号登陆舰中弹累累后向外海逃窜，另外两艘登陆舰也在中弹起火后逃走。担任护航的美舰仓皇撤至料罗湾以南5—12海里处，徘徊观望，始终未发炮。

这次炮战，共持续了5个小时，解放军共发射炮弹2.17万余发。

9月11日，美舰巡洋舰1艘、驱逐舰3艘，根据台湾国民党与驻台美军防司令部拟定的名为“闪电”的运输补给计划，再次为国民党军的4艘运输舰、7艘作战舰组成的运输舰队护航、向金门海域进发。当日14时57分，解放军以40个地面炮兵营又6个海岸炮兵连的强大火力，对强行靠岸卸载的国民党军舰和金门诸岛的地面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了第4次大规模的炮击。这次的国民党军的运输舰吸取了前几天的教训，不再等待美舰的掩护，一遭打击就急忙向外海逃走，因而只有一艘被击伤。美舰仍采取9月8日的做法，炮击一开始即一炮未发迅速撤至外海。

此次炮击，共持续了3小时，共发射炮弹2.5万余发。

事后，叶飞才明白，毛主席所以下达那样的命令，目的是试探所谓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什么程度？

经过这次较量，毛泽东把美帝国主义的底全摸清楚了。所谓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不涉及美国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

9月8日和9月11日金门前线解放军炮兵两次对美军护航的蒋军运输舰

队大规模炮击，使艾森豪威尔总统感到十分震惊。中共的态度使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本来他接受杜勒斯对中共采取强硬路线的建议，目的是想通过军事威慑，迫使中共停止对金门的封锁，同时又可以加强对蒋介石的控制；因此他同意了国务院提出的护航方案。而现在的现实是，中共不但没有屈服于压力，反而更增加了对金门的封锁，这一切使艾森豪威尔相信金门地区的军事行动已不是一场局部的军事冲突，有战争升级的可能。

鉴于台湾国民党当局采取海空运输的失败，鉴于金门岌岌可危的形势，鉴于蒋介石不断请求的压力，9月11日艾森豪威尔就所谓日趋升级的金门封锁炮战及台湾地区的局势向美国全国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电视演说。宣称，美国愿通过与中共谈判谋求和平解决，但绝不“从事姑息，绝不在炮火威胁下退却”。但同时，艾森豪威尔又说：“我不会仅为金门而要求美国男儿作战”。

至此，艾森豪威尔的“猜不透”战略底牌已暴露无遗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是确保三点一线即以菲律宾、日本和台湾为轴心的远东一线战略防线的前提下采取守势，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从金门、马祖脱身保卫台湾，来实现台湾地位的国际化，蒋介石是千方百计拖美国下水，而毛泽东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力求避免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这样三方的形势就越加微妙了。

1958年10月，北京中南海。

这是中秋十月的一个宁静的深夜，北京城中的普通居民都早已进入了梦乡，而中南海丰泽园的一间普通的书房兼卧室里依旧是灯火通明，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烟草香味的烟雾，但是毛泽东仍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此时他正思考着下一步对金门的作战方针。

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就台湾海峡军事局势发生了重大矛盾。但最令中国领导人担心的还是美国力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如果让其得逞，则台湾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就很难驾驭了。

“现在看来决定炮击金门时确定的‘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战略已经收到了效果，美蒋之间为继续坚守还是从金门撤退的问题上频频出现了裂痕甚至是公开的分歧，这时我们发起渡海登岛作战，收复金门、马祖是非常容易的。这样做可以直接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威胁，对于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有利；对鼓舞全国人民和全军士气，有很大的好处。如果做到这一点，应该说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但是，把这个眼前的胜利与海峡两岸的长远利益相比，这个胜利就只能算作是一粒芝麻了，而把一个更大的西瓜丢掉了。”

想到这儿，毛泽东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起步来，当他走到他那张一侧堆满书的大板床旁时，将手中半节燃着的烟扔到床边的一个烟灰缸里，躺在床上闭目沉思起来。

“如果我暂时不收复金、马两岛而仍由蒋军占据，对眼前的经济利益是有损失的，但这样就可以把金、马作为一条绞索套在艾森豪威尔的脖子上，使他欲脱不能，欲动不行。这样也可以使蒋介石有更多的口实去向美国讨价还价……”

10月5日上午8时，毛泽东决定暂停炮击，并为此指示福建前线指挥部：“10月6、7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10月6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

书》，并将原定的两天暂停炮击延长为 7 天。

这份文告发表以后，金门海域炮声沉寂，但台湾海峡风浪依然。

10 月 7 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份措词强硬的声明，声明认为：中共停止 7 天的炮击是一场骗局，对此不予以理会。同时，强调宁可冒继续被炮击封锁的危险，亦不愿美国盟邦退出护航。

10 月 8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逊向新闻界发表谈话，他的谈话一方面对中共停止 7 天的炮击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又歪曲这一文告，将暂停炮击与永久停火混为一谈。

一时间，各种怨声、乞求声、猜测和责难充满了华府和台湾孤岛的上空。

而处于这场“猜不透”游戏主角地位的金门孤岛却是另一番情景。自 10 月 6 日金门前线解放军炮兵停止炮击后，躲在阴暗潮湿的坑道和防炮洞里 40 多天的蒋军官兵畏畏缩缩地走了出来，见到了阳光。但此时他们无暇享受明媚的阳光，他们必须利用停止炮击的 7 天时间抢运各种物资。白天岛内的公路上又出现的奔驰的军车，车后扬起滚滚的灰尘。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看到的炊烟，这时又在蒋军阵地上冉冉升起。入夜后，这些原来一片漆黑的岛屿，如今又能看到像萤火虫似的点点灯火了。

自 10 月 6 日暂停炮击后，蒋军的十几艘运输舰、油轮和战斗舰又开始恢复了对金门岛的海上运输，但因前屡遭解放军炮兵的袭击，由高雄港驶来的运输舰队不敢贸然进料罗湾，只好胆怯地停在距金门 3 海里的公海上。直至 10 月 8 日凌晨大陆解放军炮兵仍没有发出半点炮声，中午才开始由“中字号”和“美字号”登陆舰打头阵分批进港卸载。

在这 7 天中，台湾国民党当局也不敢首先开火，但为了表示仍有一定的军事主动权，于 9 月 10 日“双十节”这一天，出动 44 批共 182 架作战飞机，至大陆沿海岸线上空进行挑衅，其中 6 架窜入福建龙田上空。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十四师立即起飞一个中队进行拦截。在空战中，解放军飞行员杜风瑞击落 F-86 战斗机 2 架，而杜风瑞驾驶的米格-17 型歼击机也被对方击落，跳伞后在空中被另一架蒋军的 F-86 战斗机击中牺牲。战后杜风瑞被授予空军战斗英雄，并追认为烈士。

10 月 12 日午夜，暂停 7 天的炮击的期限已满，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又全部进入坑道和防炮掩体，顿时间金门岛内又变成了一片漆黑，但解放军炮兵一炮未发。次日凌晨，福建前线指挥部广播站又播送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对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命令的全文是：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帝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来说，无损于己，有益于己。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 1000 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 6 亿 5 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暂时可能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么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

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国防部长

1958年10月13日上午1时

从国防部第一个文告发表宣布暂停对金门国民党守军的炮击至10月13日第二个文告的发表，并宣布再次延长两个星期暂停炮击的这段时间里，金门和对岸地区的炮声沉寂，金门岛上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地面活动。由于蒋介石保留了在大陆沿海的最后据点——金门，国共之间地理上的距离由相隔100公里缩小到不足10公里，这个简单的数字关系揭示了这两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对手都有一个共同意愿，在世界的版图上只有一个中国。

然而，双方却是采用不同的手段，通过同一方式即保留一条政治纽带来实现这一意愿。

美蒋双方对中共第二次宣布停止炮击都迅速做出了反应。

10月1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华盛顿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中宣称：“问题是否以目前数目的军队驻在金马比较有效，或是以更多的军队驻在台湾，以便有更大的伸缩性，在某种情况下有更大的活动余地，以及在必要时可以调回金门，比较有效。”

面对中共和平呼吁和美国要其撤退或减少在金马驻军的双重压力，为了维持军心和士气，蒋介石在杜勒斯发表谈话的几小时后接见澳大利亚驻台湾记者并公开发表谈话表示：“……不撤退，不姑息，准备随时以坚强的反击对付武力的攻击。”

这说明，在美国人的眼中，蒋介石不过是一个苟延残喘的半开化的封建君主，完全不是一个符合美国人标准的开明民主的治国之君。美国人迫切需要的不是考虑用军事手段来维系这种毫无意义的地缘联系，而是要彻底割断这种联系，尽快地从这个三角战斗中脱身。但是对蒋介石来说，他首先要挟美国援助于自固，而后利用共产党的统战抵制美国的控制以自重。

于是美蒋之间的利害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再次爆发出来。鉴于美蒋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杜勒斯回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即10月25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再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捐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以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种事情是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么？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寄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炮，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个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列。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10月16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国民党朋友们。……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毛泽东在这篇文告中确定了对金门炮出逢双日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的“四不打”，逢单日也只打非军事目标的新方针。这种单日打，双日停的作战方式，一时间使世界舆论感到惊奇和困惑。

至此，自1958年8月23日开始的长达120多天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由开始时的万炮齐轰、全面封锁的雷霆之势；经过打击要害、封而不死、给予出路的一张一弛阶段；转到了此时的零星炮击、不封不锁、让其固守的悠然状态，终于以众人都未料到的方式结束。不但美、蒋双方未料到，甚至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很多人想不通。有人问为何对国民党提“贵我双方”？为什么不让打敌人的司令部？为什么要帮敌人“以利固守”，甚至答应提供给养？毛泽东解释说，因为我们“要就都拿过来，要不一个也不要”，“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有可能不走，他会说，你看，共产党还打着炮，我们在炮火下

撤退，你美国人多没面子啊！”至于我们给蒋军提供给养的事，毛泽东说：“如果金门的敌人真叫我们供给，那倒是好事，一点兵我们养得起。”

第 12 章 “ 必须援助越南抗美 ”

毛泽东：“胡志明主席，你来自越南，我来自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说。”

“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许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打败胆敢侵略的一切帝国主义者。”

1. 野心勃勃的美国人陷入越战泥沼

1965年，2月10日，中国首都北京举行150万人集会示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反美斗争。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飘扬，标语牌林，10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头醒目标的巨幅标语。天安门城楼前，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片，上面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派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笑吟吟地与大家握手，并与北京市市长彭真、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越南驻中国代办黄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明芳等亲切交谈，同声谴责美国约翰逊政府的强盗行为，表达中越两国人民永远并肩战斗的坚强意志。毛泽东先后与黄北、阮明芳及其他领导相见握手，显得那样的自在，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的笑容饱含着对美国人的不在乎。过去他挥手打败了由美国人支持和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在朝鲜直接与美国人交锋，美国人不得不承认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与一个错误的对象，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你美国人再来，无非是再打一场朝鲜战争。

毛泽东笑得自如、自信。

1964年6月1日，檀香山。

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驻地的会议室俯视当年日本人曾袭击过的珍珠港，一切都显得非常清晰，美丽的港湾躺在太平洋，安详恬静。

会议室里的气氛与风和日丽的珍珠港迥然不同，相当的阴郁、沉重。这里的人们正为美军在越南的处境忐忑不安。他们想从困境中开辟溪径，扭转每况愈下的局势。

越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东侧，这个山地和高原占有全国总面积四分之三的国家似乎一直与灾难和不幸有缘，它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从历史上就遭受到入侵和吞并。

1858年，法帝国主义凭着坚炮利舰对越南进行了入侵。1874年，战败的越南王室被迫和法国签订了和约，把越南南部割让给法国，求得了暂时的和平。1882年，法国贪欲再生，突然进兵越南北部，越南王室在重兵高压之下，被迫于1884年再度与法国签订投降新约，沦为法国所谓的“保护国”。这之后，越南人民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多次进行不同形式的反抗。1930年，阮爱国（即胡志明）创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有组织的向侵略者宣战。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也盯住了这块肉，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法两国侵略者进行了艰难困苦的斗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9日，越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八月革命”，取得

了成功。9月2日，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巴亭广场发布《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1945年9月23日，法国殖民主义者再次对越南南方发动殖民战争。1946年12月19日大举进攻河内，开始了对越南的全面武装入侵。自从法国侵越战争爆发，美国就大力支持法国侵略者，而且在越南极力物色和扶植亲美势力，以图一旦法军被迫撤出印支地区时，把越南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和侵略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军事基地。

1954年5月7日，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战役中取得了全歼法军的辉煌胜利。

同年7月21日，在日内瓦会议上，交战双方就印度支那停战和政治解决达成了协议，协议的最后宣言规定：“军事分界线是临时性的界线，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政治的、领土的边界。”协议还规定：在1956年7月以前，南北两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举行全面自由选举，以实现越南的统一。法国侵略者被迫同意撤出印度支那地区。但是，美国政府却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并宣布其不受日内瓦协议各项规定的约束。这就为最终破坏日内瓦协议，发动侵略战争，埋下了伏笔。

1954年9月，美国拼凑了“东南亚条约组织”，非法地把越南南方列入由美国实际操纵的东南亚集团的“保护”地区之一。

1955年1月以后，美国大量向南越派遣军事人员，将“美驻印支军事援助顾问团”改为“美驻南越军事援助顾问团”，逐步取代了法国殖民主义在南越的地位，并竭力扶植西贡傀儡政权。1955年10月23日至26日，由美国豢养的“内阁总理”吴庭艳组织“公民投票”，成立了“越南共和国”政权。在美国的策划和支持下，吴庭艳傀儡政权很快建立了一支拥有数十万人的伪军。西贡傀儡政权完全秉承其美国主子的旨意，疯狂发动“诉共”、“灭共”运动，残酷镇压和屠杀爱国的南越人民。至1964年，南越人民被美伪集团杀害7万人，被酷刑拷打和打伤近80万人，被监禁40多万人，被赶到“战略村”、“垦荒区”之类的8000多个变相集中营的达500余万人。

在敌人屠刀的逼迫下，越南南方人民于1959年开始了英勇的反抗美伪统治的革命武装斗争。

1960年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开始着手建立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美国为防止吴庭艳集团垮台，1961年5月，100名美国“特种部队”（代号为“绿色贝雷帽”）的官兵进入越南南方，从此开始了历时14年的侵越战争，越南人民也开始了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

从1961年5月至1965年2月，美国人主要是在越南南方进行所谓“特种战争”，这实际是上一种由美国出钱、出枪、出顾问，协助南越伪军进行的“反游击战”。其根本目的是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维护西贡傀儡政权的反动统治，以图顺利地推行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并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的总目标服务。

据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统计，在“特种战争”阶段，人民武装力量共歼敌22万余人，其中美军约3500人，击落敌机约2000架，捣毁“战略村”7659个，拔除敌据点1391处。

“特种战争”既证明了美国的侵略野心，又证明了美国的利己立场。肯尼迪执政期间，美国在南越的军事顾问人数从1000名增加到1600名以上。但肯尼迪仍拒绝把美国军队派往该地区。肯尼迪的某些助手，包括西奥多·索

伦森和阿瑟·施莱辛格，后来坚决认为，肯尼迪曾计划在1964年安然连任以后结束美国在越南的介入。事实上，在他去世前不到两个月，肯尼迪看来确实关死了让美国的介入升级之门。他说：“归根到底，这是他们的战争。战争的输赢都在于他们。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给他们装备，我们可以派我们的人给他们当顾问，但必须赢得战争的是他们——反共的越南人。”

这，就是他们的“特种战争”。

肯尼迪是位很不走运的总统，也可以说是一位倒霉的总统，“特种战争”的屡屡失败，显示了他侵略手段的拙劣，傀儡政权的种种无能之举证实他确实有限无珠。更倒霉的还在后面。1963年11月22日中午，为了弥合得克萨斯州民主党内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肯尼迪总统前往得克萨斯。总统一行在上午11点37分从活思堡飞抵达拉斯爱情广场。总统夫妇和州长约翰·康纳利夫妇接着乘坐一辆敞篷汽车前往市内，准备在达拉斯贸易中心发表预定的午宴演说。当车队穿过达拉斯市中心时，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是热情的。康纳利夫人转身对肯尼迪说：“总统先生，你不能说达拉斯不喜欢你。”总统答道：“这是显而易见的。”几分钟后，当总统的座车驶过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时，响起了枪声。一颗子弹穿透肯尼迪的脖子，第二颗致命的子弹打在他后脑的右侧。下午1点，肯尼迪死了。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于1964年当选为美国第36任总统。同他的前任比，约翰逊的反共色彩更浓并且侵略野心更大，他一上台就决定要扩大越南战争，想“杀鸡吓猴”，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瞧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于1964年6月1日，召开了第10次檀香山会议，讨论如何扩大越南战争及其对策，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美驻西贡大使洛奇、美太平洋总司令费尔特海军上将和即将上任的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

还有一位参与者，他正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

他叫泰勒。

泰勒在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中曾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后担任美陆军参谋长。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从陆军退休。肯尼迪上台后，这位退休者又被召回，充当了白宫军事顾问。他有他的军事见解，他坚持向白宫强调，美国陆军必须准备打小规模战争，反击共产党的“民族解放战争”策略，这给约翰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约翰逊上台后，对他颇为欣赏。眼下，这位一直在军中谋职并占有高位、曾制定和实施美军多次军事行动的泰勒，退休后被召到檀香山专门参加这个研究越南局势的会议，约翰逊不是没有其用意的。

檀香山会议确定了“逐步扩大”侵越战争的计划。

6月20日，威斯特摩兰接替哈金斯的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司令的职务。7月初泰勒被任命为美驻西贡大使。至此，美国完成了将越南战争由“特种战争”转为局部战争的作战方针调整和必要的准备工作。

泰勒走马上任后就咄咄逼人地说：“我要对美国政府在越南的一切行动担负并行使职责，我希望人们清楚地了解，这种全面的职责包括在南越采取的全部军事行动，并视需要可行使军事方面的指挥和控制权。”

正是泰勒，一手泡制了著名的“北部湾事件”。

2. 北部湾事件引发了援越抗美风暴

1964年7月30日，在新任驻西贡美军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指挥下，一小队南越海军突击队驾驶鱼雷艇从岷港出发，到北部湾（又叫东京湾）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海执行一项属于一个代号为“34A 行动计划”内容的作战任务，这个作战任务的目的是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挑衅。与此同时，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也向同一水域进发，为突击队助威，并为突击队搜集北越警戒雷达和海岸防务情报。

午夜，正当威斯特摩兰将军指挥南越海军突击队在北部湾向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驻守的宇岛和湄岛发动两栖袭击时，“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在相距120—130海里的地方，向北驶入北部湾。8月1日平静地过去了。第二天，“马多克斯”号到达了它原定巡逻航线的最北点，并向南转航，距海岸23海里。这时，迎面开来的南越鱼雷艇刚完成“34A 行动计划”的任务，正在返航。岸上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守军判定“马多克斯”是和南越鱼雷艇执行同一任务的，于是，派出3艘鱼雷反过来侦查“马多克斯”号驱逐舰，结果双方发生遭遇战。“马多克斯”号用大炮击沉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一艘鱼雷艇。停泊在该军舰南面的美军“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在接到交战的情报后，马上命令飞机增援，炸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其余两艘鱼雷艇。

华盛顿时间8月2日星期天清早，白宫情报值班官将北部湾海面武装冲突的消息报告了林登·约翰逊总统。第二天，约翰逊下令“腾纳·乔埃”号驱逐舰增援“马多克斯”号，指示两艘驱逐舰重返北部湾巡逻。同时，命令当时正在香港访问的“星座”号航空母舰快速同“提康德罗加”号会合。但他告诉美国公众说，美国船只只在北部湾和平的航行，却遭到来自北越守军的袭击。在讲话中，约翰逊丝毫没有提到“34A 行动计划”和“马多克斯”号的挑衅行为。4日夜晚，北部湾海面一片漆黑。在海面上执行挑衅性巡逻任务的“特纳·乔埃”号和“马多克斯”号，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鱼雷艇又一次发生遭遇战。远离北部湾半个地球的华盛顿，是在华盛顿时间同一天的上午9点20分收到来自北部湾的电报的。3小时后，北部湾上美驱逐舰的指挥官的第二个电报到达了美国国防部电传中心。电报上说：北越鱼雷艇可能不是有意袭击美国军舰的，建议“全面考虑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

约翰逊并不理会第二个电报，当天就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轰炸北越，参谋长联席会议则从5月底就开始拟订好的94个空袭目标名单中，选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鸿基、义安、清化和广溪鱼雷基地，以及荣市附近的一座油库，作为轰炸对象。

下午4点，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要求在檀香山的太平洋第7舰队司令夏普海军上将，弄清第二次北部湾事件的真相。但约翰逊总统并没有等到夏普将军回话的那个时刻，就在4点49分，向檀香山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发出了轰炸北越的正式命令。2个小时后，他会晤了召集到白宫来的16位国会两党领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们，并对他们说，他打算要求国会作出决议，支持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约翰逊讲的这个决议，在6月1日—2日举行的檀香山战会议上就讨论过。

华盛顿时间晚上11点36分，约翰逊总统坐在电视机前，对美国人民说，由于北越鱼雷艇无端袭击美国军舰，我们决定轰炸北越，但这种反应是“有限度的，恰如其分的”，“我们不想扩大战争”。北京时间8月5日，64架轰炸机分批从“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航空母舰起飞，首次轰炸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选定的四个鱼雷基地和那座油库。第二天，全世界得知，北越35艘鱼雷艇和一座油库被炸毁。而在这一天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及麦克纳马拉：“你知道有涉及南越船只和北越的任何事件吗？”这位

曾当过哈佛大学教授的国防部长回答说：“没有，我不知道任何事件。”而在第二天他就宣布了向西太平洋增兵的6点措施：一、把第一舰队的攻击航空母舰特混群调到西太平洋；二、把截击机和战斗机轰炸机调到泰国；三、把战斗轰炸机调到泰国；四、从美国调遣截击机和战斗轰炸机的中队到太平洋前进基地；五、把反潜艇的特种部队调到南中国海；六、使经过挑选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进入警戒状态，准备随时出动。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从这一天起，美国海军的舰艇首次在越南海面集结至28艘，其中包括2艘攻击航母，一艘反潜航母。从这一天开始，美作战飞机大批进驻印度支那半岛。一个F100中队（18架）自克拉克进驻岷港，2个B57中队（40架）自克拉克进驻边和，1个F105中队（18架）自横田进驻柯功。驻印度支那半岛的F102飞机增到3个分遣队（各为10架左右），分驻新山、岷港、廓曼。

在华盛顿，8月6日美参众两院在非党紧急的气氛中，就约翰逊讲的决议举行了秘密的意见听证会，并起草了一项决议案（即《东京湾决议案》）第二天，众议院以400票对零票，参议院以81票对2票通过，授权约翰逊总统在侵越战争中，可采取包括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的一切必要手段。北部湾事件是美国把战火从越南南方扩大到北方，走上直接侵略越南道路的转折点，是美国为了使侵越战争“升级”而制造的挑衅事件。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北部湾”事件。

这就是美国进行越南战争的法律根据。

8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及首都各大报纸都全文广播或登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严正声明，强烈谴责美帝的战争罪行。

美国点起了侵略战火，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力，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力。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坐视它遭受侵略。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

8月8日，北京近百万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民兵、街道居民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8月10日，北京举行10万人的盛大集会，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副主席、总理周恩来，政治局后补委员、副总理陆定一，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等出席了集会。

约翰逊无视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他继续增兵越南。到1965年6月8日，他公然宣布美军直接参战。战争再度升级。后来侵越美军增加到54.3万人。美国在越作战费用开销越来越大，到1969年财政年度达到300亿美元。伤亡人数骤增，到1968年下半年，每周平均死亡200多人，仅这1年美军队死在战场上的就有14592名。

1965年2月7日，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取得波来古大捷，打死打伤美军234名，击毁击伤美机31架，摧毁和严重破坏美军宿舍52所。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火速赶到波来古机场，只见一片飞机残骸，一片破败景色，他面带黄色，不禁叹道：“真糟糕。太糟糕”随后的两天，美国飞机和炮艇，大规模地轰炸扫射越南北方的洞海市和广平省的其他地区以及昏果岛和永灵地区。

1965年春，柳州。

一列火车咣查咣查地向北行使。胡志明这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美，上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法。

胡志明记得，1950年1月秘密访华，后于2月初与周恩来一同访苏。当时毛泽东也在苏联访问。胡志明向斯大林讲述了越南人民正进行的反法斗争，请求苏联提供援助，特别是武器弹药，苏联未予理睬。

1950年至1954年的越南抗法斗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万千余支，火炮429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信和工兵器材等。黄文欢在回忆录中写道：

1950年到1954年抗法战争期间，中国是唯一向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我国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

1956年，中国刚定型生产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在中国军队还未装备的情况下，优先援助越南5万支。1960年，生产了重型舟桥，也首先援助越南。另外，从1953年至1963年，中国还为越南人民军组建六个高炮营、一个工兵团、一个舟桥团、一个坦克团和一个歼击团，补充了轻武器、汽车和通信、工程及观测器材等武器装备。

抗法斗争依靠中国支援，抗美救国斗争还是要依靠中国支援。

中国讲情谊，有求必应。

列车途径柳州，胡志明又想起1954年7月3日到5日在柳州度过的日日夜夜，当时正值日内瓦会议期间。那时的柳州没有这么繁华，市民的衣着没有这么华丽，但人们是那么的真诚和善。那次他与周恩来在这里对日内瓦会议涉及的一些重大总题坦率诚挚地交换了意见。越南处在十字路口，可能和，可能战，争取和准备战，双方取得一致意见。事后，胡志明访问北京，又去苏联、征求苏联老大哥的意见。日内瓦会议期间，越南、中国、苏联为一方，法国、英国、美国为一方。胡志明一直视社会主义阵营为依托，他十分珍惜阵营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提出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时，他对中国领导人说，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怎么办？胡志明1969年去世，他最后看到的仍是中苏争吵，听到的仍是乌苏里江上的枪炮声。

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与胡志明，与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互相商洽，力争主动。会议于7月20日结束，以北纬17度线划分了越南南北方，两年后举行大选。胡志明对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很满意，赫鲁晓夫很满意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即向越南劳动党和政府致电祝贺，但会议期间不和周恩来握手的杜勒斯却对此不满意。

春天的长沙风和日丽。

毛泽东洗漱完毕，走出房间，舒展一下身体。他晚间工作到凌晨的习惯在战争年代养成，到了和平建设国家的岁月里，仍未改变。夜深人静，思维纵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许多重大方针政策，都是他在这静静的深夜里思索决断的。

今天，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要秘密来访，毛主席要在这里会见他。

胡志明要谈什么？胡志明会提出什么要求？毛泽东思索着。越南民主共和国是邻国，友好邻邦。胡志明是位真诚坦率的朋友。早在中国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多年在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道革命，

一道参加抗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胡志明的私人感情很深。

上午 10 点半，两党主席握手拥抱，亲切会见。

毛泽东早已知道了越南局势，开口便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来自湖南，咱们一家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说。”

毛泽东乡音很重，但胡志明听得懂。胡志明会汉语，会广东话，还会一点上海话。他向毛泽东叙说了一些越南情况，就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

胡志明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的是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建 12 条公路的示意图……

1965 年 4 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等领导人，受胡志明委托，率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

4 月 12 日和 21 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发出指示和作出决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4 月 21 日，罗瑞卿总参谋长与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武元甲会谈。

4 月 22 日，杨成武副总长在北京与武元甲举行第二次会谈，就中国援越部队进入越南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洽商。

5 月的北京，繁花似锦。周恩来总理从车上下来，就闻到一股扑鼻的花香，这是米兰郁馨。平时，他喜爱花卉。在中南海办公间隙、国事访问中，他时常鉴赏评说。今天，他顾不上花香袭人。他迈开矫健的步子向会见厅走去，浅灰尘色的中长毛料裤腿呼呼生风。

他走到会见厅时，一位大个子早在门口等候。这位大个子就是毛泽东曾经多次夸奖过的“天塌下来不要紧，有大个子顶着”的罗瑞卿。

站在罗瑞卿身后迎候总理的是杨成武。

罗瑞卿迎上前去。

周恩来握住罗瑞卿的手。

这是 5 月 25 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在这里接见正在举行会谈的中越交通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走进会见厅，全体代表都站了起来。

他用浑厚的淮安普通话招呼大家坐下。

中越两国交通代表团会谈是由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的那张条子引起的。

毛泽东爽朗地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修建河内以北的公路。毛泽东让周恩来尽快落实这件事。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电话，立即与罗瑞卿、杨成武商定，继续由军队承担这项工程。

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会同李天佑副总长等已经拿出了初步方案。他将代表团的准备工作情况简单扼要地向总理作了汇报。他和罗瑞卿总长、李天佑副总长经过研究，拟派大批部队出国，一些重大问题必须请中央、国务院决断。汇报后，杨成武请总理指示。

周恩来向大家分析了国际形势，继而转向要交代的实质性问题：“关于交通问题，范文同总理曾经谈过，由于美帝的封锁轰炸破坏，现在支援南方的海运减少，公路运输也减少。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继续组织海运，同时必须扩大下寮走廊，扩修支援北方的路。”

大家静静地听着，许多人作记录。周恩来呷了一口清茶，继续说：“这

次胡志明主席带来一个公路图，要我们帮他修 12 条公路。”

他稍微停顿，若有所思地说：“这些公路肯定不能同时并举，应该按照经济建设和作战需要综合考虑，但应以作战需要为主，这是轻重的问题，还有因地形地质的不同，好修和不好修这一难易问题。为了应急，有的道路可以先修简易公路，粗通即可，但又不能太简易，以后再逐步加固。总之，是按轻重、难易、快慢、粗固八字方针上来考虑安排计划。交通部等有关部门要用支前精神来办事。由总参谋部来挂帅，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由罗总长和杨成武、李天佑副总长抓总。”

周恩来神情严肃，话语句句敲定，不容半点迟缓和马虎。大家认真严肃地聆听着他的明确分工。

周恩来坐在沙发上，一手弯曲地放在手灰色中山装前，一手指划着：“还有水路，对越方要求，应予满足，敌人总不能都封锁住，不管是陆路、水路，损失都会有，但只要想办法，总是可以送东西过去的。总之，要改变认识，就是支前，一旦决走，就要坚决执行。拿我们的勇敢和智慧学会反对敌人轰炸的新本事。”

坐在一旁的杨成武摊开越南北部拟建公路的示意图，提出两种兵力部署方案：“现在具体现场勘察团还没有去，但目前分析，一种方案是 12 条路展开作业，派兵 10 万，另一种是抢修抢建主要约 5—7 条公路，派兵 8 万，视以后进展情况再增减兵力。”

周恩来、罗瑞卿与杨成武等围在地图上研究起来，最后决定：与越南代表团会谈后再定。我们倾向于后一方案，抓住重要的线路突击抢修。

杨成武向周恩来提议：“总理，能否由中央、国务院出面成立支援越南的一个小组—或什么机构，便统一组织行动？”

周恩来当即决定：为了统一组织支援越南，和统一处理有关援越的涉外事宜，即由中央、国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中央国务院支援越南小组”，负责经常具体组织工作。由杨成武、李天佑任正副组长。

另，由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刘晓、杨成武、李强、李天佑等 7 人组成领导小组，对中央负责，掌握援越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支援任务的决定和新增项目的审批事宜。

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的这张示意图，调动了中国的 8 万大军。

3. 中国人的防空火网

为打击美国对北越空袭的气焰，1965 年 8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609 团所在的高炮 63 支队奉命入越，配属 63 支队的空军高炮 23 团也同时出境作战，担负克夫至友谊关铁路线的防空作战任务。

在半年的观空作战中，63 支队共击落敌机 54 架，击伤 22 架（包括空军高炮 23 团击落 23 架、击伤 8 架）。随后开进越南的 61 支队半年中先后对 77 批 222 架次美机作战 49 次，击落击伤美机各 30 架。628 团 6 连在 1965 年 12 月 1 日的温江战斗中，全连沉着操作，一直压缩至 2200 米才对敌开火，一个点射，28 发炮弹就击落美机一架。

1966 年 2 月 18 日，中国援越高炮部队 67 支队接替了 61 支队，担负起安沛—老街的防空作战、掩护交通的任务。所属 625 团部署在寨湖—铺合地区，626 团于保河—老街地区，607 团、619 团部署在安沛地区。

安沛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西北重镇，省政府所在地，是滇越铁路的一个重要的物资转运站。

1965年1月，越南政府要求在安沛援建一个空军机场，5月，承建这机场的中国援越部队三支队先遣人员抵达安沛，主力部队由中国空军组成，随后进入越南。11月22日开始大规模的作业施工。

新建机场位于安沛市西北4公里处，滨临红河，群山环抱。场地原有50多条山沟，地势起伏坎坷。三支队到达时，安沛这座省城已被美机轰炸成到处瓦砾，弹坑遍地。他们面临的是一场浴血奋战。支队领导提出“血染红河畔，铺出通天道”的战斗口号，激励部队一边修建机场，一边与美军作战。在敌机的扰乱下抢时间、争速度。

推土机、卷扬机、装载机、平路机，一排排、一列列地隆隆作业。机场工地一派繁忙紧张的施工景象。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顶着连绵阴雨，冒着烈日酷暑，很快削平了59座山包，一片开阔的机场雏形展现在群山脚下、红河之滨。

在安沛建设空军机场，对美国侵略者是个巨大的威胁。美军在轰炸安沛市的同时，对机场工地也进行了不停的扫射和轰炸。

67支队将安沛的619团部署在市区以北至牲冠桥的地段上，607团和625团一营共同担负掩护安沛车站和机场工地的防空作战任务。

据越南报刊公布，自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以来，对安沛多次进行轰炸。从1964年8月5日至1966年4月30日，在安沛上空已击落美机34架。

5月6日，美军空军又出动各类飞机11批50架，对安沛进行空前的袭击。67支队驻安沛高炮部队当即迎头痛击，击落3架，击伤1架，活捉美国空军联队参谋长罗伯逊·诺曼尔中校。

3月10日，11日，美军出动了33批107架飞机轰炸太原钢铁基地，中国高炮部队62支队，在两天的战斗中，共击落敌机18架，击伤5架，俘飞行员10名。太原钢铁基地主要设施安然无恙。

自1965年8月1日至1968年3月，前后分五批人越轮战的中国高炮部队，边同配属援越工程支队的高炮部队，共有16个支队，辖63个团及部分对立营、高机连和勤务分队，总计15万余人。

1968年3月31日，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和国际压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开始逐步降级。5月31日，越美两国政府在巴黎开始和平谈判。11月1日起，美军停止轰炸和炮击越南北方。经中、越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1969年3月中旬全部回国。

中国援越高炮部队和各工程支队在越南3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共对敌作战2153次，击落敌机1707架，击伤1603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沉重地打击了美军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4. “解放牌卡车与胡志明小道”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向越南人民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当时，越南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很迅速，美军和南越傀儡政权妄图把蓬勃发展的革命武装扼杀在摇篮里，四处扫荡搜索，围剿封锁，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的给养供应十分困难，中国援助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大批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只好通过海上，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游击队阵营。大米用三层特制塑料包装充气，在大海上漂浮不沉，随着海潮漂向海岸，早已得到通报的游击武装力量就赶到海滨，将一批批大米运回根据地。大批的武器装备通过分散的渔船运到南方各海湾，转运到根据地。

中国在海南岛还提供两个港口作为从北越运送物资到南越的中转站。

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美国侦察到这一情况后，就派船在海岸巡逻，有时派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通过 17 度线附近的边海河顺漂南方的米，许多被美国直升飞机上的机枪扫射，雪白的大米哗哗地倾入河中，米袋沉没。

这时，中国使用大量外汇开辟一条通过柬埔寨境内的西哈努克港的秘密运输线。经南中国海驶向西哈努克港的援越物资的航轮上，高高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美军虽想扰乱阻止，但它毕竟不敢在中国海域大动干戈。中国援助越南南方的装备物资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当时的朗诺集团扣留。中国明知这一点，为了援越之急需，只好默允。物资运到柬埔寨的鹦鹉嘴地区，在转运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部队的各个根据地和游击区。

侵越美军剧增，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越南南方的游击队扩充为正规军，部队扩充急需许多重型设备，加之整团整营的运动战得以发展，消耗很大。这一切，单靠西哈努克港的转运，已无法解决。

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和英勇的越南军民在海上偷运、在西哈努克港转运的同时，开辟了一条通过老挝狭长地区的重山峻岭抵达越南南方各根据地和柬埔寨鹦鹉嘴的羊肠小道——胡志明小道。在这条小道上，开始只能人背肩扛，逐步扩大到能推自行车、牛车、板车和大象运输。1965 年，十多万中国援越部队抵达越南北方，使北方能抽调大批部队和青壮年有组织地开赴老挝和越南南方，拓宽胡志明小道。大批中国援越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大卡车，奔驰在胡志明小道上。

西贡伪政权和侵越美军头目威斯特摩兰对胡志明小道这条漫长幽深的补给走廊——后来也成为大部队运动作战的重要路线——焦虑不安。威斯特摩兰曾召集他的助手们多次研究对策。1964 年春组建的研究和观察大队，对胡志明小道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这支队伍后来发展成为拥有美军 2500 人，南越雇佣兵 7000 人。其中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自特种部队，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他们集中后参加空降训练，再参加特种专业训练，执行研究和观察大队特殊的作战任务。

威斯特摩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研究和观察大队在老挝的第一次军事行动，空投了一些由 5 至 6 名南越人组成的侦察小组，侦察敌军事设施和扰乱胡志明小道的交通运输。最初的老挝的一些伞降以及潜入北越的特务几乎没有成功，绝大部分被打死或被俘，但情况很快有了好转。1965 年，‘草原野火’巡逻队（通常由 9 名南越人和 3 名美国人组成）开始在老挝狭长地带活动，基本任务是收集情报，确定可能的轰炸目标的位置，查明敌部队和补给物资的输送情况，捕捉俘虏获取口供，在敌交通线上设置地雷和传感器。然而，许多巡逻队有时也会遇到敌人，进行战斗；有些巡逻队则担负破坏任务，如袭击警卫森严的指挥部，破坏粮库和弹药库，这些都是空中袭击难以做到的。”

美军在对付胡志明小道上也确实花费了一番心机。他们研究出了一种“星光镜”，通过放大从星星发射出来的光，使值勤巡逻人员能在夜间看清东西，发现目标。还有一种“嗅人器”——主要利用人尿的气味追踪人们的活动。

“标号 36 破坏器”是从飞机上向北越和老挝的胡志明小道投放地雷。它一落地，只要触动它或有什么东西靠近它活动就能引起爆炸。一些受音响和震动影响的地面传感器，也被安置在胡志明小道上，监听这里的活动情况。改装过的 C-130 运输机，装备有照明器材、小口径速射枪、电子器材，在胡志明小道上空接收地面的传感器所发出的信号。

美国空军在泰国那空伯依（隔湄公河与老挝相望的一个城镇）的基地配备了一个通信和计算站，以便从沿胡志明小道上空飞行的飞机上收集数据，以及从地面的传感器上接收信号。

为了把胡志明小道炸成烂泥，阻止北越南运物资，美国空军飞机还曾在老挝狭长地带上空实施人工降雨。

1966年夏，黎笋率代表团访华，主要成员有阮志清、阮文灵、武志公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他们。

会谈自下午3点开至8点，晚饭后又谈到深夜。重点是谈越南南方情况，谈斗争策略，谈斗争的困难和需要中国解决的问题，有许多时间是谈胡志明小道情况。阮文灵、武志公都谈到了胡志明小道上的困难，美军使用化学、电子武器，使用定时炸弹、钢珠子母弹等，不要说白天，就是夜间，车辆行驶的震动也常常引爆敌人撒下的地雷。

越南同志有坚决把反对美帝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气概，和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决心，在周恩来的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阮志清、阮文灵、武志公的印象在日后的几次接待中方援越人员时多次提及。他说：“越南南方的领导很清醒，很有希望！”

周恩来在会谈中向越南同志重申了毛泽东的话：“凡是越南南方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要把援助越南南方的问题，看作我国援外工作中的头等重要事情。”他对运往越南南方战场的武器装备的包装，具体要求有关部门：“要便于运输、便于携带、便于使用、便于隐蔽。”针对越南人的身材和体力，提出：弹药包装每箱最大重量也不能超过25公斤，大米包装各袋50公斤。

越南南方部队身上穿的、携带的基本上都是由中国提供的。

毛泽东在夏日中，还想起蚊虫叮咬，特地嘱咐有关部门：“一定要为越南战士配备蚊帐！”“给他们制作的压缩干粮要分量轻，营养好。”

当时，中国为了满足越南救国战争急需，还专门研究生产了专打直升飞机的20毫米的高射炮、为汽车通过弹坑而铺设的轻便桥、排除磁性炸弹装置、燃烧钢珠手榴弹等。

在越南抗美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数量大、品种多、范围广的武器装备。仅在1970年至1972年间接，中国向越南提供坦克300多辆，为前20年援越坦克的5倍。坦克、大口径火炮，中国一时生产不出来，就从人民解放军部队装备中抽调，还向越南提供了3000公里的输油管全套设备、8万件防弹衣。这些都是在中国国内紧急动员下，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

为一批批援越物资，大多通过胡志明小道，通过穆嘉山口运到了越南南方。

1975年，越南人民在全世界各国朋友和人民的支持下，在南方发动了规模巨大而又凌厉的春季攻势，打垮了美国一手扶植的阮文绍一阮高其傀儡政权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南方，统一了祖国。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之欢欣鼓舞，热烈庆祝越南政府和人民取得的辉煌胜利。

胜利来之不易。

第 13 章 杜勒斯的“和平演变”

从朝鲜战争到 60 年代，毛泽东对美国政策的侵略性、扩张性的忧虑明显地加强，毛泽东最关心的，就是怎样挫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和富有侵略性的干涉政策。

这一时期，是他猛烈抨击美国对外政策的时期。在国际关系上，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和美国最疏远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政治“冷战”和经济遏制。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后，美国就大举出兵朝鲜，封锁台湾海峡，并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这说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还要经历一场与国外敌对势力的武装较量和其他形式的尖锐斗争，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实践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略、干涉和经济封锁，虽然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很难达到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因此，它们在使用“硬”的一手的同时，又采取“软”的一手。

1953 年 1 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突出地强调了“和平演变”的战略。他提出应该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们”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满意，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说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还攻击“中国共产主义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是一种要消失的现象”等。宣称美国及其同盟国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要“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

毛泽东主席十分注意杜勒斯的这些言论，十分注意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策略、方式的变化。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出笼之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刚取得胜利，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封锁和禁运还在继续；社会主义中国国内政治稳定，“一五”计划正在全面展开，经济建设在发展，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毛泽东当时没有马上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后来提出这个问题，是同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引发了国际上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兰、匈牙利事件接连发生。1957 年，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党整风之机，向党发起进攻。1958 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同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并公开反对中共党提出的“三面红旗”，反对中国“炮击金门”的正义行动。这些事件，都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毛泽东曾经说过：向金门打炮也好，停止炮击也好，主要的都是为了支持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守住台湾，而不被外国侵略和并吞。

在这同时，美国积极地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1957 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和平取胜战略”，鼓吹要通过“和平演变”，以促进“苏联世界内部的变化”。

1958 年 10 月 24 日，杜勒斯在接受英国电视公司记者采访时说：共产主义“将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现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

变”。

联系到苏联和国内的情况，毛泽东对杜勒斯的这些言论极为重视。1958年11月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毛泽东历来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密切注视国际形势和国际社会矛盾与斗争的发展，审时度势，见微知著，以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一旦有事，不至于因毫无准备而慌张失措。提出这一要求十分必要。毛泽东是每天都要亲自看《参考资料》。

到1959年，中苏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这年1月，苏联正式通知中国，片面废除帮助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和制造原子弹的协定；9月，在中印边界事件中，苏联公开声明中立，实际上是支持印度一方，随后又公开指责中国；同月，苏美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一方面同美国拉关系，一方面激烈地攻击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所有这些，都促使毛泽东认为苏联领导已经变质，赫鲁晓夫已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事业，变成了修正主义。而在这年7月至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毛泽东错误地认为这是国内外的敌人联合向党进攻在党内的反映。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深深感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性，于是在这年年底把这个问题明确提了出来。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有周总理、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同志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和研究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开会之前，毛泽东要他的秘书林克同志，找一些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讲话送给他看。林克同志选了三篇，即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的证词。以及同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

毛泽东从前看过这几篇讲话。

这次看了之后，同林克同志谈了他的看法。随后让林克同志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的每一篇讲话前拟一个批注。林克同志将批注拟好后，毛泽东便指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的三篇讲话全文印发到会同志。

杜勒斯的这三篇讲话，都贯穿着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思想。根据毛泽东的谈话拟的三个批注，点明了杜勒斯每篇讲话的要害，指出要警惕美国的“和平演变”。

第一个批注中指出：“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第二个批注在指出杜勒斯证词的主旨后认为：“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

第三个批注在引用杜勒斯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的讲话之后指出：“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壮大，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

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11月2日，毛泽东在会上又对杜勒斯的讲话和批注，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3个材料——杜勒斯1958年1959年的3篇演讲。这3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毛泽东在谈到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的演讲时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主要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变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是属于杜勒斯讲的“和平演变”的性质的。我们的方针是：我们现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包括两个方面，对美国还同时要顶住赫鲁晓夫。顶上5年到10年，对美国还是要全力揭露，用事实，要有说服力。我们不说赫鲁晓夫，也不影响赫鲁晓夫，我们只揭穿美国的欺骗，揭穿美国的所谓“和平”。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并深刻论述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

从此以后，他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在一系列会议上一再提醒全党，并逐步展开了所谓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

从1960年起，中苏两党的分歧进一步加剧。4月22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点名批判南斯拉夫的铁托同志，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外部，则明确指出苏联已经变修，要吸取他们的教训，并认为国内也已经有了“修正主义者”，要警惕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在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中，专门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也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2—823页）在这里，毛泽东正式向全党敲响了警钟。1967年2月3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和巴卢库时说：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

从1962年底到1963年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七篇文章，批判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法国的多列士和美国共产党。中苏论战进一步公开化。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苏大战进入高潮。与此同时，国内加紧了反对“修

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毛泽东把防止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196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通知》（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宣传提纲》），决定对全党全民进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运动，从此，全党全民的反修教育迅速展开。

1964年，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4年上半年，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烧向北方，在这种形势下，于1964年5、6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了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性、迫切性，并从反修防修和防止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上布置了各项工作。

从1965年起，毛泽东越来越重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这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并反复强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局省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你们要从实际出发。

这次会议以后，毛泽东途径天津、济南、蚌埠南下，巡视南方各省。12月5日，他不顾71岁高龄和旅途的劳累，重上井冈山，写下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诗句，表达了他与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

接着，毛泽东从组织上采取一系列措施，撤换了他认为有“问题”的领导人。1966年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不顾后果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一书中谈到：“为了防止中国发生‘和平演变’，毛泽东还曾设想请外国党来进行帮助。”1964年1月5日，他在接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说：如果将来中国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你们就要举反修的旗帜。日本和印尼党有这个资格，希望就在日本和印尼党身上。1965年9月17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夸田里见时又说：“要准备中国出修正主义。那时候，你们要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同亿万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

为了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是号召学习解放军，设立政治机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从学习大庆油田开始的，后来中央把它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一条重要措施。二是改革有关制度，缩小三大差别。

对于防止以美国为首的“和平演变”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当年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确有正确的方面和可取之处。由于革命的发展不平衡，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以后，从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竞争来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总是处于“弱势”，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因此，警惕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是一项长期而且重大的战略任务，也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战略策略的转换，及时地提出这个问题，并教育全党同志长期保持应有的警觉，这是很必要的，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深谋远虑。

然而，历史也表明，毛泽东当年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认识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显然是过了头了，使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付出了很大代

价。

第 14 章 “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

毛泽东说：“在同美国人会谈时更应使用劝说的方法，可以对他们讲，……美国何必为了一个仅仅不到 1000 万人口的台湾岛与 6 亿中国人民为敌呢？……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中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周恩来说：“我们不愿谈判破裂，但我们不怕谈判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1. 毛泽东说，我们不急于同美国建交 1954 年春夏，联合国在风景如画的瑞士召开了国际日内瓦会议，这是自板门店谈判以来，中美之间的首次官方接触。为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明，美国同意中国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并不含有对中国的外交承认。在会议期间，盛传周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杜勒斯特地给美国代表团立下了一条纪律，无论谁都不准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

握手事件说明了中美两国之间隔阂之深重，关系之恶化，对立之尖锐。

美国对于共产党中国使它在朝鲜战场上丢失了面子，恨意久久难消，这种仇恨心理，集中地表现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中国代表团的那种极端的态度上。

日内瓦会议是为讨论朝鲜和平与印度支那和平而召开的。主要由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冷战中的对手掌握会议。

其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美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他有他的坚定信念，决不容许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存在。他给中国人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那句名言：“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他很少说话，更是难得有笑意。由于前不久刚做了手术，胃内放进了一支“镭管”，所以脸色苍白，身体非常虚弱。这样他在日内瓦会议上就得了个很有意味的“雷管”的外号。

“雷管”自然就隐含着少碰着他为好。杜勒斯也不喜欢与很多人打交道，更不想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因而开会和散会，美国代表团总和苏、中代表团在不同的门进出，很少相遇。偶尔有几次狭路相逢，周恩来面色庄严，但从容大度；而杜勒斯则立即紧张地绷紧苍白的脸，动作也变得生硬机械起来。

但是，美国官员们不是铁板一块，副团长史密斯副国务卿就有自己的看法。有个美国记者曾当面问过史密斯：“你和杜勒斯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史密斯回答得很风趣：“如果有接触的话，唯一的接触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手巾。”据当时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回忆，当时的情景是：

有一天，我们很多人聚在酒吧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我们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第二天休息时，当王炳南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便赶紧把周恩来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周恩来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和总

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讲了一些友好的话。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动凑上来同周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一直没有拒绝和你们的来往，上一次难道不正是我先向你伸出手的吗？”史密斯拉拉周恩来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定的不准与中国人握手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钦佩。

对如此紧张、恶化的中美关系，毛泽东有他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当时一再说，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我们也不急于要同美国建交，不急于进联合国，我们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还说，我们有一天把事情办好了，美国就会后悔，那时也是悔之晚矣。

美国在朝鲜战场失败以后，国内涌起一股批评政府对华政策的呼声，不少人觉得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美国著名将领布莱德雷将军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可是，美国统治集团仍然执行僵硬的敌视中国的政策，致使中美之间的对立空气十分浓厚。

2. 中国愿意留一条门缝

在杜勒斯看来，握手不握手是个原则，“握手”即表示“和解”，表达“友谊”。他怕因此造成外交上承认新中国的印象，但他并不是不想与新中国接触，因为杜勒斯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交涉。

美国有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尚在中国关押，这个问题使美国政府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公众舆论谴责美国政府拿这些人的命运作为对华政策的牺牲品。盟国也认为，中、美双方如能接近一点，将会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正是在这种内外压力的气氛下，美国同意与中国举行称作中美两国代表的会晤。

日内瓦会议期间 1954 年 5 月 19 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表示，他愿以私人身份就在华美侨问题和在美华侨问题作一个中、美之间的中间人。

宦乡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向宦乡作出指示：“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意愿，开辟新的接触渠道，但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问题。

为了掌握主动，5 月 27 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了关于美国无理扣押我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同时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

宦乡根据总理指示，继续与杜威廉联系。经过 6 月 1 日和 4 日两次接触，最后达成协议：美国代表团指定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约翰逊为代表、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马丁为助手与中国接触；中方由王炳南为代表、柯柏年为助手与美方接触。根据美方的建议，中方同意接触地点在“国联大厦”。由于英国外相艾登指示杜威廉作为中介，参加中美之间的接触，因此，总理也让宦乡参加了首次接触。

6 月 5 日上午 10 点，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国联大厦”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的地点是美方选择的。由于当时美国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约翰逊为避免形成两国政府正式谈判的气氛，有意选择了“国联大厦”里一间没有桌子、只有几套沙发的会客室，给人以会客的感觉，可谓是用心良苦。

第一次的会谈只进行了约半个小时。由于是初次接触，双方不免都有些拘谨。约翰逊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反应也颇敏捷。他提出会谈时双方不作记录，以使会谈的气氛比较轻松，少一些拘束。

会谈开始后，约翰逊提出，在华被扣的美国人共有 83 人，分为四类：在华被监禁的美侨，在华被软禁的美侨，要求离华而得不到出境证的美侨，以及在华被扣留或被监禁的美国军人包括原空军人员和“联合国军”中的美军人员，此外，还有 1953 年 1 月在汕头附近被扣留的美国海军人员。希望中方能让这些美国人早日离华返美。

中方代表王炳南表示，美国方面提出来要商谈的问题，中方一直认为可由双方直接接触。美方今天提出的问题，希望美方提交一份具体名单。关于在美国被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问题，中方将在以后的商谈中提出。

6 月 10 日，双方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地点由我方选择。为了与美国代表团针锋相对，中方在“国联大厦”选了一个房间，有意在房间里摆了一张大长桌子。我方坐一方，美方坐一边，形成两国政府正式谈判的气氛。

会谈一开始，约翰逊提交了一份所谓被中国政府扣留的美国侨民与军人的名单，并要求中方给予这些人早日回国的机会。对此，王炳南作了原则性的答复。他说：

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只要他们是遵守中国法律的，他们是会得到保护的。他们可以在中国境内居留，从事合法的职业。如果他们为了某种原因要离开中国回美国去，只要他们没有未了的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他们随时都可以走。实际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有 1485 名美国侨民离开了中国。至于在中国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极少数美国人，他们被扣押是罪有应得。你方交来的名单，我们将进行研究并在下次会谈中予以答复。关于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问題，我们准备在下次会谈中提出。

在 6 月 15 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王炳南首先答复了美方 6 月 10 日提出的被拘禁在美国的美国人与家属通讯等问题。他说：

中国方面同意因犯罪而被扣押的美国侨民和军事人员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与他们的家属通信，他们的家属也可以邮寄小包裹到中国。中国政府是按他们所犯的罪来量刑的。判刑后，如果表现好，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减刑或提前释放，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政策。至于约翰逊先生于 6 月 10 日交来的名单，中国有关部门正在核查，一经中国代表团收到这些人员的材料，将立即与美方约期会谈。

但当谈到美国政府无理扣留我国留学生问题时，王炳南郑重指出：

中国现有 5000 多名留学生在美国，有不少留学生要求回国，但遭到美国政府的百般刁难，禁止他们申请离境，甚至威胁说，谁要是违反这一命令，将被判处 5000 美元以下罚款或者 5 年以下徒刑，或者同时予以两种处罚。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扣留中国留学生，并恢复他们随时离开美国返回中国的权利。至于居留在美国的中国侨民也同样应享有随时回国的权利。

约翰逊辩解道：“扣留中国的学者完全是按美国的法律行事的。”他是

指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发布过一道命令，规定凡是高级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

对此，王炳南反驳道：“这是无理的规定，应该予以废除。”

6月21日，中美双方举行了第4次会谈。

王炳南首先提出双方起草一个联合公报的建议，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管对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

但美方只想在会谈中得到它想得到的，只想做于它有利的事。因此，约翰逊拒绝了王炳南的建议。他说，“美国政府将单独发表声明，肯定中国侨民依照美国的法律和规章，有完全的自由到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约翰逊又一次强调“美国的法律和规章”，实际上，他们只想片面要求中方无条件释放被扣留在美国的美国人员，而不肯让中国侨民和中国留学生回国。

7月16日和21日，双方派联络员又接触了两次。中方由外交部科长浦山为代表，美方由美国国务院中国司政治事务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为代表。这两次接触，双方审核了各自提交的名单，浦山向美国提出6名已经获准出境的在华美侨的名单，同时要求美方提供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情况，并再次询问美方是否同意中国方面在上几次会谈中提出的请第三国使节代管双方侨民利益的建议。詹金斯用外交辞令对中国批准6名美侨出境表示感谢，但他没有进一步提供有关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新情况，并再次拒绝了我方关于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利益的建议。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结束。从1954年9月2日起到1955年7月15日，有关各自侨民回国事宜，中美双方改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然而，在前面共举行的17次领事级会谈中，美方仍然设置重重障碍，阻挠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同时，美方也拒绝接受中方愿意为那些想到中国探视美犯的家属给予签证的善意，决定不发护照给任何去中国访问的美国公民。领事级会谈也未取得任何成果。

日内瓦会议上的中美会谈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它却是今后15年中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这个前奏一经开始，就连美国的杜勒斯也不愿再关上大门了。中国也愿意留一条门缝，以便于更好地观察美国，与之斗争，并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

3. 中国要回了钱学森

1955年4月18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这是一个没有西方大国参加，而由已独立的绝大多数亚非国家自己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的“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总方针，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有气魄、有远见、诚恳坦率的讲话，整个世界为之震动。周恩来崇高的人品，细致入微的风格，虚怀若谷的谦逊作风以及一个伟大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钦佩和赞扬。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为了扫除一些亚非国家对我国的疑虑，为了真诚地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也为了争取一个对我国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人类进步事业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4月23日，周恩来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

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周恩来的声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许多中立国，特别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都向美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能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

随着新中国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了解、承认和支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陷于日益孤立和被动的地位，甚至美国国内舆论也在美被押人员和间谍案问题上对美国国务院进行指责，称美国政府不能对周恩来的这项声明置若罔闻。为了安抚国内舆论，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美国想找机会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经过磋商，中美双方确定将原在日内瓦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

中国外交部为这次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组长为章汉夫，副组长为乔冠华，秘书长是董越千。由于王炳南在30年代就和美国人打过交道，后又参加了日内瓦会议期间的中美代表谈判，比较了解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因此被任命为首席代表。另外小组成员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是一个人材济济的“智囊团”。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的日内瓦“国联大厦”内开始。中方代表是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恰好是王炳南在日内瓦会议中交锋过的对手、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尤·阿·约翰逊。

为表示中方对这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诚意和所持的积极态度，7月31日，即在会谈开始的前一天，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判决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这个消息使国际新闻界因为中美会谈而激动起来的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个美国记者闻听此讯后不禁脱口而出：“啊！中国又抢了主动。”

由于中方宣布释放美国间谍，因此第一次的会谈气氛较为轻松愉快。双方达成了会谈议程的再议：一是讨论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讨论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8月2日，举行第二次会谈。约翰逊称有36名美国平民仍被扣留，此事影响美国人民及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随即他将36人的名单交给王炳南。

王炳南提出了在美的中国侨民问题。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绝大多数的家属都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和在实际上所造成的困难，他们不能自由返回祖国，无法回到各自的家庭。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所一向非常关心的问题。

为了使居留在双方的两国侨民，首先是关于他们回国的问题，能够获得应有的照顾和协助，使有关问题的实际情况得到改善，中方提出建议：

1. 双方相互通报居留在本方的对方侨民情况。正像中方向美方提交了所有在华的美国人的情况一样，我们也希望美方向我们提交在美华侨（包括留学生）的总数和名单。

2. 美国政府应取消限制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的一切禁令和规定，包括所谓“限期出境”，因为这实际上增加了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困难。

3.美方应向中方补交 1954 年 4 月 8 日已获批准回国的 76 名中国留学生名单。

4.中美两国分别委托它所选择的第三国代理各自的侨民在对方国家中的事务，首先是这些侨民回国的事务。中国将提出委托印度共和国代理在美国的侨民的事务。

王炳南发言以后，约翰逊对美国阻挠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一事做了辩解，声称美国政府绝对没有阻碍中国学生离开美国。

此后，双方又就遣返侨民问题反复进行了多次会谈。约翰逊坚守当时美国政府的一条指令，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凡涉及有关我国主权的问题，约翰逊就故意兜圈子。例如，他始终拒绝同意中方提出的授权印度驻美大使馆照管中国侨民的要求，因他认为，这等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居住在美的侨民负有合法的领事权利，就是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主权国家。单就这样一个问题，双方就经过了无数个回合的斗争。

为了使中美会谈更快地进入关于台湾地区局势的实质性会谈，中国国内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复查和处理。9 月 10 日，王炳南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 12 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出境，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我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达成了两国大使声明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本国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政府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平民返回本国。

这是一份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只好搞了这么一份“协议声明”。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达成的唯一一份正式协议。

50 年代末，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有价值的。”

中美侨民问题达成协议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便进入了第二阶段。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认为，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进入讨论台湾问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杜勒斯举行会谈等其他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只有通过外长级会谈才能解决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等严重问题，并讨论两国建立贸易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但美国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敷衍的态度，不断在第一个阶段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以至会谈拖泥带水，几乎是寸步难行。

1955 年 9 月 20 日，中美会谈再次开始。约翰逊绕开实质性的问题，首先提出要讨论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士兵的问题。

王炳南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关于在朝鲜军事人员问题，应该让板门店停战委员会去谈，我们没有必要谈这个问题。”

于是，约翰逊又提出第二个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双方应保证不诉诸武力。”

王炳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严正地回答约翰逊：美国侵占台湾已经构成了国际争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已影响到远东和东南亚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造成这种局势的，首先是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它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应该放弃对我国使用武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台湾在历史上、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人民愿意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更无权要求我们不使用武力。

于是谈判再次陷入僵局。中方斟酌再三，认为在现阶段我们必须采取主动。于是在10月5日的第19次会议上，中方提出中美会谈的第二项议程可以自由交换意见，不必确定详细议题和排列议题次序。

于是在10月8日举行的第20次会谈上，约翰逊果然先“自由”起来。他连篇累牍地宣读了美国政府对台湾政策的发言稿，大谈特谈中国必须宣布不对台湾使用武力，否则美国不同意举行中美外长级会谈。

王炳南当场驳斥了约翰逊的讲话，并尖锐地指出，“美国要中国宣布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阴谋‘两个中国’。”

为了争取主动，10月27日，中方就美国提出的“双方保证不诉诸武力”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同意，它们应该用和平方式解决它们之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为了实现它们的共同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约翰逊拒绝签署这个协议草案。这样，美方实际上处于了被动的地位。11月10日，经过近半个月后，美国才提出了自己起草的协议草案，声称：

……一般来说，美利坚合众国放弃使用武力。……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使用武力。

中方立即拒绝了美国的这一协议草案并无情地批驳了这种荒谬无理的“协议”，指出美国要求在台湾地区拥用“单独和集体的防御”权利，目的是要中国政府承认美国霸占台湾的合法地位，让我中国放弃解放台湾的权利。

尽管如此，中方仍本着极大的耐心，继续作又一次的努力。12月1日，王炳南提出了一个新的草案。为照顾到美国不愿明确提联合国宪章条款和两国外长会谈的问题，这个草案只提“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武力”。

但美方却毫无诚意，约翰逊只是一味地拖延时间。在这之后的三次会议上，他都拒绝对中方的新草案作任何具体的评论，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直到1956年1月12日，他才提出一个对应方案，继续提出要求中国方面承认美国在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利”。

在1956年4月到5月间，美方和中方均提出了一项新协议草案或议案，但均未通过。会谈仍无丝毫进展。

在此期间，美国还违反了第一个议题中所达成的协议，迟迟不提供在美国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名单及情况，并继续刁难他们回归祖国，使印度作为第三国很难开展工作。

1956年，台湾海峡局势继续紧张。一方面，中美大使级会谈漫无期限地

进行，却毫无进展；另一面，杜勒斯狂妄声称美国在台湾地区将不惜进行原子战争，以此恫吓中国人民放弃对台湾的主权。

会谈虽然仍在继续，但王炳南和约翰逊经常是互相读一通发言稿，中方提出一些美方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抗议，双方交锋几句，然后双方决定下次会谈的日期就散会。

4. 毛泽东决定让美国记者来中国

面对这样的僵局，毛泽东、周恩来运筹帷幄，积极思考如何对美进行新的斗争。1956年8月，犹如夏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新闻界轰动了，国务院被震撼了。要知道，当时美国政府对美国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符合事实的报道。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中国是很不了解的，他们渴望知道真情。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无疑是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而美国新闻界却因此兴奋起来。那些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记者更是激动万分，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谁知狡猾的杜勒斯却按兵不动，他决不愿轻易废除国务院关于不让美国人，不论是一般平民还是记者，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于是一时间美国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一致攻击国务院的这种愚昧和顽固的立场。他们愤怒地说，美国作为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竟对本国人民的旅行自由横加限制，这在宪法上和道义上都是不能容忍的。

差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新闻界一直在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有几名美国记者不顾禁令，勇敢地冲破封锁、成功地访问了中国。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也不理睬国务院的禁令，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集体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接待。他们宁愿回到美国受罚，也要到中国来看一看。

在这种突如其来形势面前，权衡利弊，美国国务院终于沉不住气了。1957年8月，杜勒斯被迫悄悄地同美国一些新闻界代表举行了协商，并作出一些妥协，准许美国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以免引起美国舆论反对它全面孤立中国的政策。在这个事件中，许多美国记者都赞扬说，毛泽东、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毛泽东、周恩来走的这着棋，是希望沟通美国人民与新中国的交往，也让美国记者看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希望他们能把新中国的真实面貌介绍给美国人民。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的这步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

在杜勒斯准许美国记者到中国访问后，在9月的会谈中，王炳南提出了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但遭到美方的拒绝。杜勒斯坚决不同意中国派相等人数的记者去美国访问，他说“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

周恩来对美国记者的主动邀请和杜勒斯对中国记者互访协议草案的生硬拒绝，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坦荡博大的胸怀，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赞赏，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评价。

5. 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就中美会谈和台湾问题作了讲话。周恩来说：

中国方面并不反对同美国发表一个在中美关系中互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声明。事实上，早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就已经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但是，必须指出，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于美国使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而造成的。因此，任何关于中美之间互不使用武力的声明，都必须能够导致这种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消除，而不应该使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得到承认。同时，中国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不容外人过问，因此，中美两国的声明不能以任何方式干涉这个问题。……

周恩来继续说“美国虽然表示，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应该具体地应用到台湾地区，但是却反对确定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来实现这一原则，甚至也不同意在一定的限期之内，寻求和确定和平解决中美两国争端的途径。不仅如此，美国还坚持它在中国的领土台湾有所谓‘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这一切表明，美国的企图是要取得一个对它片面有利的声明：一方面保持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另一方面继续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在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声明的情况下，美国就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中美大使级会谈，以便同样达到冻结台湾地区现状的目的。”美国的这种企图正是中美会谈至今不能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中国不能同意发表一个仅仅对一方有利的声明，也不容许中美会谈被一方利用为达到片面目的的工具。中国认为，任何共同声明都必须是对双方有利的；同时，中美会谈继续，也只有在对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往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着。由于美国对中美会谈采取“拖而不断”的方针，到1957年12月，各种会谈已进行了73次，各种文本已堆积成山，但会谈仍未取得任何结果。12月12日，约翰逊突然对王炳南宣布，他已被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其副手埃德·马丁参赞将接替他的工作。

不难看出，这是杜勒斯耍的又一个花招，他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目的在于想使会谈降级。对此，王炳南当场表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

当王炳南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果断地说：“既然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谈判破裂，但我们不怕谈判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1958年8月23日，国共金门炮战之后，9月3日，美国在新港，发表了一项声明，对中国提出严重的警告，称“中共对中华民国金马外岛发动疯狂炮战后，威胁着中华民国对该岛的运输补给，有赖美国第七舰队的武装护航”。杜勒斯进一步扬言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马等中国沿海岛屿，甚至以原子弹相威胁。“新港声明”一发表，国际间为之瞩目。

为了阻止美国的护航，中国政府在“新港声明”发表的同一天宣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此项规定，运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及岛屿，也包括台湾及其周围的岛群，如澎湖群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及所有属于中国而被公海与大陆分开的各岛屿及其沿海岛屿。

二、任何外国军事用途的船只与航空器，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允许，不得进入中国领海或飞赴中国领海的上空。

其实在“新港声明”发表前，第七舰队就已开始武装护航，除让一批新

闻记者、部分返防官兵成功地登上了金门外，还运送了大量物资到岛上。

9月6日周恩来针对美国的行动发表公开声明，指出：“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解放台、澎、金、马是中国的 sovereignty，任何外国不得干涉。若美国不顾中国的再三警告，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则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周恩来在声明中还特别强调，“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美国一贯企图把两件事混淆起来，以掩盖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在声明的最后，周恩来呼吁，“我们提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限期指派大使，恢复被美国单方面中断了的大使级会谈”。

在摸不到中国底细的情况下，当天，美国政府就表示欢迎周恩来的建议，同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其实早在周恩来发表公开声明的8月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已经在考虑中美大使会谈的事了，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

6. 持续 15 年之久的会谈

为了进一步了解新情况，中共中央特地把中国驻华沙大使王炳南叫回北京，让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前一阶段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当他谈到“我们掌握着真理，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的时候，毛泽东插话道：“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能就无求于美国呢？”

王炳南理直气壮地说：“台湾自古就是咱们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地方，美国无权霸占，他本该交还给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求他。”

毛泽东连连称赞，“讲得好，有骨气。不过，在同美国人会谈时，更应使用劝说的方法，可以对他们讲，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而我们中国也不小嘛，美国何必为了一个仅仅 1000 万人口的台湾岛与 6 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作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毛泽东接着放缓语气说，“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中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再次让驻华沙大使王炳南出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代表。临行前，周恩来特地给王炳南写了一封亲笔信，对会谈的要求、步骤和策略等均作了重要指示。

在国际舆论的关注下，美国政府终于被迫指派了美国驻华沙大使雅各布·比姆作为重开谈判的代表，而且不再坚持会谈地点必须在第三国举行。这是它在鉴于台湾海峡出现危机、对于我方又不摸底的紧急情况下不得不作出的一次让步。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就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开始了。

会场布置得既简单又考究。四张桌子排成一个长方形，双方代表分两边相对而坐，代表团团长坐在中间，两侧分别为各自的顾问和译员：

波兰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请中美代表团入席，双方代表互相点头致意。

比姆是一位有经验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沉着、冷静、头脑清晰。虽缺乏幽默感，不善谈笑，但具有学者风度，颇像个大学教授。在与中国代表会谈

前，他已有过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谈判经历，号称有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经验。

会谈开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王炳南请比姆大使先发言。

比姆毫不客气地提出：“美国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的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为，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他继续用呆板的语调说：“中美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对于美方把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的责任有意推到中国方面的讲话，王炳南早已有所准备。因此，在比姆讲完后，王炳南平静地反驳道：“大使先生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也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和马祖。中国在收复金门和马祖等岛屿后，将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中美之间没有打仗，根本不存在‘停火’问题，消除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关键在于美国军队撤出这个地区。”

比姆对此只能处于尴尬的境地，无法反驳。

后来，中方又提出了双方共同声明保证不诉诸武力威胁或者武力的建议。但是，中方这一和解性方案却被美方无理拒绝。美方在对案中提出要中方放弃对金、马“使用武力与武力威胁”，而美方将设法使金、马“不被使用于对大陆或其他沿海岛屿进行攻击或其他挑衅行动”。这实际上是要在中国大陆和金、马之间划一条永久停火线，以便实现其割裂中国领土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这种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的坚决拒绝。

在经过一段程式化的会谈后，9月30日，在第78次会谈时，比姆提出了一个由杜勒斯亲自精心起草的、也是他在中美会谈中最后的“作品”——中美会谈声明草案。“声明草案”开头用一种平行的格式说明中、美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还写上苏联支持中国。接着，这个草案便进一步提出，中国政府应停止对金门、马祖的军事活动。

同一天，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出金、马。其意仍然是要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永久停火线，所不同的是这次把金、马划在这条线以西。美国以这种“退一步”的办法，使其侵占台、澎的行为合法化，至此美国把台湾海峡两岸割裂开来以利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更加暴露无遗，这不仅是中国政府所绝对不能同意的，就连蒋介石对此也极为不满，大骂美国对不住他。

鉴于此，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部署，决定让金、马暂时在台湾当局手中。10月6日，由毛泽东亲自为国防部长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召开发表，指出，金门战斗属“惩罚性质。”10月13日国防部发布命令，宣告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以利他们固守”，并说明“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

但是美国仍不死心，又派杜勒斯和国防部长麦克尔罗到台湾亲自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为蒋所拒绝。这样，美国无论在中美会谈，还是美台会谈中都未能使其“两个中国”的阴谋得逞。

中美会谈始终在互相提防和压抑的气氛下举行，你谈你的，我谈我的，千篇一律。1959年底，顽固坚持和新中国作对、始终不愿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变的杜勒斯终于离任，但接替他的赫脱国务卿也没有给会谈带来什么起色。在整个华沙会谈期间，美国反复围绕美国在中国的罪犯这一问题作文章

或发难，几乎在每次会上，他们都无理提出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这些罪犯。

1960年9月6日举行的中美会谈是第100次会谈。为了使今后的会谈有所进展，也为了让世人了解会谈所以停滞不前的真相，王炳南大使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在过去五年来的100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方面始终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来和美国进行会谈，而美国方面毫无解决争端的诚意，并且还继续扩大和加强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中美会谈在进入第二项议程后，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作了不懈的努力，先后提出10个合情合理的方案，以谋求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可美国方面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美国一方面曲解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硬要把协议运用于所有在中国犯有严重罪行的美国犯人，要求无条件释放这些犯人，这是无理的，是对中国年政的干涉；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又违反平民回国的协议，继续阻挠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国。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拒绝承诺对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美国政府为了永久霸占台湾，把台湾蒋介石政权说成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硬说美军侵占台湾是根据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条约义务”。这种旨在制造“两个中国”，并把台湾变成美国殖民地的阴谋和手法，已是世人皆知了。

接着，王炳南又列举了大量事实继续揭露美国。他说，“1958年秋季，美国在台湾海峡集结了一支自称是最大的武装力量，对中国人民寻衅挑战；1960年夏季，艾森豪威尔总统还亲自到台湾去从事敌视中国人民的活动。美国的军用飞机和军舰不断侵犯我国的领空和领海。最近，美国又把武装有或者能够武装核武器的巡洋舰、潜水艇和飞机派到远东去，公开对我国进行核威胁。”

比姆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只能故作镇静。王炳南进一步说：“大使先生，你应该知道，玩火者自焚。”

“中美之间的争端能否解决，单凭中国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现在是你们重新认真考虑你们对中美会谈的态度的时候了，特别是认真考虑把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时候，迟考虑不如早考虑，迟走不如早走。早考虑，早走，你们就可以早日得到解脱。”

听着王炳南慷慨激昂、痛快淋漓的发言，比姆除了表示“十分失望”外，无力进行任何反驳。

接着，王炳南又就中美互换记者再次提出一个新的方案。王炳南强调说：“中国的宗旨是，中美记者互换是为了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逐步改善目前两国之间又冷又僵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使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解决美国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的问题。”

当然，这个新方案照例触及了美国政府敏感的神经，因此这项提案照例没有得到通过。

为配合王炳南在第100次会谈上的发言，《人民日报》于9月8日特地发了一篇题为《中美会谈一百次》的社论。中国政府的正确立场赢得了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们的一致赞扬。此后，王炳南与卡伯特大使进行了十几轮会谈。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改由王国权大使在

华沙与美国大使继续进行这时断时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但在中美两国的实质性问题，依然一直没有结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很大震动。我国政府发表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这对美苏两个大国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们都不能也不愿意作出这样的承诺。根据中央的指示，在1964年11月举行的第123次中美会谈中，王国权大使向美方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议声明草案。美方代表毫无思想准备，根本不敢表态。直到1965年2月的第124次会谈时，美方才作出反应，以不能没有监督为借口表示反对，暴露了美国坚持核垄断的用心。

1968年11月26日，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曾就第135次会议的会期问题发表讲话时阐明：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就这两项原则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虽然中美大使会谈进行了15年，除了就中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外，在涉及中美关系的一切实质问题上毫无结果，但这是中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保持联系、进行沟通的唯一正式渠道。每一次重大国际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都可以在大使级会谈中表明自己的观点，提出看法，使一方对对方的态度、做法有所了解，这就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维持了15年之久的意义所在。

第 15 章 令美国人捉摸的“5.20”声明

毛泽东说：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先生允许的话，我还想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

1. 毛泽东想到密西西比河游泳

1970年6月，中国武汉。

6月的武汉，已经热的难耐了，下半夜才凉下来。东湖旁一个静谧的别墅的一间卧室里，在柔和的床头灯下，有一个人靠着高垫的枕头，半躺在床上把卷夜读。这是一本线装书，当他读到魏以40余万兵马据城死守，陈庆之以精兵3000大破之，激起感情上的共鸣，忍不住执卷下床站了起来，在屋里踱了两圈，走到窗前站着。扔掉烟头，又点了一支烟吸着，遥望着星斗满天的夜空。他身材高大，魁梧，只是背有一点驼了。

他就是毛泽东。

这天晚上，他读的是“二十四史”第61卷的列传第51《南史·陈庆之传》。陈庆之是梁武帝时名将，受封武威将军，对魏作战，陈庆之有勇有谋，屡立战功。书中对其作战过程有较详细的记载。从一千多年前叱咤风云鏖战疆场的陈庆之，联想到自己的一生经历过的无数惊心动魄、威武雄壮、艰辛卓绝的战争场面，他忍不住从窗前走至书桌边坐下，执笔在书的天头上写了“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兴奋之中，他又联想起当前的现实来。他刚得到报告，5月底6月上旬，苏联军队又在新疆边境挑衅，引起了流血的冲突。外电又报道，苏联军队在漫长的中苏边境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勃列日涅夫于6月8日在莫斯科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谴责了毛泽东，并且鼓吹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还有消息说，有苏联人在某种外交场合试图与台湾接触；还有苏联外交官暗示，苏联避免恶化同美国的关系，以便孤立中国……

形势当然是严峻的。

不久前，珍宝岛的战斗打起来后，毛泽东曾经同意周恩来的提议，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与聂荣臻四个老师，每星期六在中南海紫光阁五承殿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将意见上报中央供决策参考。在3月份的报告中，四个老师对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苏联会不会大打的分析，吸引了他的注意。四个老师认为，苏联在边境搞点紧张局势、制造点冲突是可能的，但是要跟中国大打，目前还不可能。老师们的理由是去年苏联入侵捷克；就动员了20多个师50万军队。目前苏联在我边境有40个师号称陈兵百万。真要进犯中国打大仗，至少要有100多个师约300万兵力。这又谈何容易！

中苏两国，同以马克思为老祖宗，为什么要刀兵相见？这绝对是马克思老祖宗没有预见到的。但毛泽东却很清楚，中苏两党的分歧，由来已久。

毛泽东心里一直清楚，斯大林一直不相信他，把他当作“农民领袖”，从抗战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夺取胜利，对蒋介石容忍纵容。抗战时期，为了苏联本身战略需要，斯大林只援助蒋介石，而拒绝援助中国共产党，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有力量，它又能得到英美两大盟国的同情和援助；而中国共产党人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上艰苦抗战，正需要援助的时候，斯大林

担心援助它会引起蒋介石和英美盟国的不满。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和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发展，放弃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原则。对此，毛泽东早就在党内讲过，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临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很好，正准备南下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斯大林对此另有看法，1948年5月，派米高扬来到西柏坡，要求我们“停止内战”，搞“南北朝”，南北分治。南京解放前夕，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蒋介石在南京呆不住了，迁都广州，苏联大使罗申奉命随同蒋介石政府迁馆到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则未走，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发展。苏联的作法同他们对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苏联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会谈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人，危及苏联利益。斯大林也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的总出发点是要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的时间。苏联对中共能否解放全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持悲观态度。当时，毛泽东还想到：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同苏联是有分歧的。

1949年底，他率代表团乘专列抵莫斯科的时候，正是中午12点正，专列一停靠月台，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就“当当”地敲响了。除斯大林以外的苏联最高党政军领导人，几乎全部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毛泽东。他记得刚一见面，斯大林不等介绍，就走上前来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年轻和健壮”。还说过：“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在苏联呆了很久，很费了一番力。斯大林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但后来还是同意签订这个条约。在以后好几年，是两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苏联援助中国143项工业项目，还派了大批顾问和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培训新中国的技术干部和接受留学生、进修生。

苏共20大以后，随着中苏大论战的开展，两党之间又有了裂痕，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当面争论过两次。第一次是1958年，赫鲁晓夫来北京强行要求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施加了压力。毛泽东冷冰冰地回答：“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国海岸。”赫鲁晓夫问他，如果真是这样，主席怎么办？他说，他将重新上山打游击。赫鲁晓夫反唇相讥：“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他也回敬说：“如果一定要握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第二次，1959年，赫鲁晓夫在戴维营结束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后，飞来北京。他要求中国释放8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回答说：“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赫鲁晓夫当场就红了脸，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释放，因为在戴维营会谈中，赫鲁晓夫已经答应了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碰了钉子，又接着为尼赫鲁当说客，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说“那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毛泽东回答说，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武装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他本人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觉察，直至边民和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此后，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两国关系就恶化了，以至发展到珍宝岛战斗。

远处隐约传来一声鸡啼，天快亮了。他还没有睡意。他的思绪又回到了4个老帅身上。

最近，5月份的报告中，老师们的建议更引起了他的兴趣。鉴于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陈毅提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打开冰冻已久的中美关系。其他三位老师也一致赞同。这项提议，在毛泽东脑中萦想已久。从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转达的尼克松的正式口讯来看，美国真的想跟中国缓和了。尼克松一定是想从越南脱身。算盘打得很精。

想到美国，毛泽东想起他的美国朋友斯诺，还有斯特朗女士。1959年3月的一天早上，毛泽东在东湖边上又会见了斯特朗。她是跟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一块儿来武昌看望他的。毛泽东跟斯特朗说起，这是自延安那次谈“纸老虎”以来，他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大家坐下之后，谈笑风生。他先问起岁数。那年杜波依斯91岁，斯特朗73岁，而他自己当时66岁。记得他开心地说：“有三代了！”斯特朗说：“只有两代半。”他挥了一下手说：“我们不讨论确切数字问题，可是，杜波依斯的年龄完全可以当我父亲了。”

毛泽东十分钦佩杜波依斯91岁高龄尚如此身轻体健，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水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3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3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他记得，杜波依斯有点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3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泽东笑着回答：“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先生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冷冰冰地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他记得自己回答道：“这远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毛泽东是指杜勒斯作为反面教员的作用。

天已经朦朦亮了，毛泽东才又躺回床上。他把书卷搁在枕头边。当他闭上眼皮时，已经不再想1000千多年前的名将陈庆之，而是想着，他能不能到密西西比河去畅游！

2. 尼克松—墓辛格拍档

1970年5月下旬。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处理当天的事务之前，站在那明亮的长方格子玻璃窗前，欣赏着窗外玫瑰园里盛开的鲜花，茂密的郁金香，清丽的葡萄风信子花……使他胸中回响起一段乐曲的旋律。那是他今早起床时，在林肯起居室放的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唱片。音乐那明朗的情绪，稍带东方色彩而节奏活跃的主旋律此时似乎在玫瑰园里充盈弥漫。而尼克松也似乎因此而陶醉着，陷入了遐思之中。

理查德·尼克松，1913年1月9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一个电车司机的家庭。出身寒微的尼克松完全是依靠个人奋斗而闯进美国政坛，曾先后当选为众议员、参议员、副总统。

在尼克松较早就开始的政治生涯中，他的表现并不为中国人看好。50年代曾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当过8年的副总统。按着那时美国的政治倾向，尼克

松在一场合公开或不公开地对共产主义制度、对中国共产党都作过很激烈的指责。更使中国共产党人气愤的是，他还曾作为美国副总统去台湾作过那种“亲善性”的访问。但尼克松其人却以其特殊的品质和作为一个政治家特有的耐性和敏感，为人所称道。他于196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卧薪尝胆8年之久，这才看准时机，东山再起，一举赢得196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使当时与他角逐竞争共和党候选人的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败在他手下，从而也赢得了这个对手的信服。

当时亨利·基辛格是一心想帮助洛克菲勒坐上总统座椅的，一开始并不把尼克松这样身后还缺少深厚的财团背景的总统竞选人看在眼里。当记者问起基辛格对尼克松竞选总统有何看法时，基辛格只用了4个字来回答：“荒谬可笑。”

记者紧追不舍地再次发问道：“如果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你怎么看？”

基辛格说：“那就更荒谬可笑了。”

但是，共和党人却在不久以后演出一场“荒谬可笑”的选举戏，第一轮投票结果，洛克菲勒就以277票对尼克松的692票败下阵来。

那一阵，基辛格对尼克松简直讨厌透了，甚至连电视新闻都不想看一眼，因为不想看到电视里那个美国总统候选人尼克松的那张脸。

但是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却主动找上门来，要请基辛格当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是一个不次于国务卿的重要职务。尼克松告诉基辛格，他本人一直很器重基辛格的才识和能力，曾认真地读过基辛格所著的几本书，认为在当今美国，他这样十分新鲜而富有独到见地的著述还不多，所以，他希望基辛格能到他的内阁做事。基辛格大为吃惊。他不想去给尼克松做事，为此，基辛格去征询洛克菲勒的意见。而洛克菲勒却竭力鼓励基辛格去与尼克松共事，用出自己的满腹才学和处事能力，干出一番业绩来。基辛格在与尼克松共事以后，才觉出这位不太喜欢夸夸其谈的总统的确有他独到的见识和思维方式。尼克松善于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战术。在对华问题上，他也是走的这样的一条路线。

尼克松这种不因循守旧、敢争天下先的独特风格，在打开对中国关系的僵局上使他赢得一片叫好声，但最后还是被那些不喜欢他的人给拉下了台。当然那是别的话题了。

毫无疑问，作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对中国作出和解姿态并非空穴来风、奇思怪想的结果，而是从美国全球利益的立场出发，经过深思熟虑所作出的战略大转换。这种想法源于他的竞选总统的演讲辞中。

他在选举演说中曾不止一次地说，不管是谁当选今后4年或8年的美国总统，“都必须服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到头来必须同下一个超级大国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谈判。”

他还很明确地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肯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8年内将看到同中国的对话。在今后8年内，中国问题一定要得到解决，不然的话，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

1969年1月，在尼克松上任后对他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所作的第一道指示，就是要他“探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1969年1月，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再次向中国方面发出信息。经过毛泽东批示，尼克松对中国发出的信息，便通过《人民日报》的转载，在更大范围

内传播开来。毛泽东又委托中国的四大元帅，共同探讨调整对美战略的良策。

3. 毛泽东亲自批准同美国恢复会谈

1969年3月，中苏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这件事使得尼克松更加深了过去对于中国问题的新观念。这年夏天，中苏在新疆边境又发生了冲突。基辛格和尼克松对此事作了很细致分析和研究后，尼克松认为时机成熟，即在7月出访亚欧前夕，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在出访过程中，尼克松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希望同中国对话。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尼克松进一步加快步伐，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立即寻找机会同中国驻波兰代办接触。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追着向中国驻波兰使馆人员表达了这一愿望。

中国作出了积极响应。1969年12月，毛泽东亲自批准同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

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举行了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但只谈了两次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而被迫中断。

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次中断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感到这种会谈易受美国国务院的干扰，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经过批准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不解决问题。尼克松决定在恢复华沙会谈的同时另辟渠道，同中国领导人对话。

基辛格在3月20日给国务院发了一个备忘录，建议立即举行华沙会谈，并主张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要反映总统对更高级会谈的积极态度；美方还应该接受雷阳的暗示，即一般的远东问题也可以讨论，而不仅限于传统的中美双边问题。国务院回复说，最早也要到4月8日才能把“经审批”的发言稿拟好。尼克松同意了这个方案。

北京在答复中建议4月15日开会。可是，美国国务院又提出，台湾“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定于4月22日访问华盛顿，因而在访问前两个星期或访问10天内举行华沙会谈是不明智的，建议4月30日或以后的任何一个时间举行华沙会谈。

信息传给中国人以后，过了20来天都没有答复。尼克松曾耽心地问基辛格，是不是中国人又后退了。基辛格苦涩地一笑，答道：“显然，中国人被我们的拖延激怒了。”整整过了4个星期之后，4月28日，华沙才传来中国人的答复，提议5月20日举行第137次会谈。尼克松马上批准同意了。基辛格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在目前，在周恩来支持西哈努克在北京建立了流亡政府与解放军，而我军与南越军队正开进鸚鵡嘴，要踏上柬埔寨领土。在这时，中国还同意进一步会谈，安排头号帝国主义的代表进北京，这已经很不寻常了。”

直至5月18日，美军采取进入柬埔寨的作战行动已将近3个星期的时候，中国政府授命新华通讯社发表了一个简要的声明：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5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和137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

尼克松曾请基辛格分析这个声明。基辛格乐观地认为，中国人认为“不合适”的只是举行会谈的日期，而不是举行会谈这一事实。中国人在声明中还提出了继续会谈的程度。基辛格对尼克松宽慰地说：“总统，这样反而好些。我们开起会来免不了要对骂一通，在柬埔寨的问题他们非严厉谴责我们不可。”

尼克松刚刚放下心来，想不到就又接到了毛泽东谴责美国“入侵柬埔寨”的“5·20声明”。此刻，毛泽东那篇《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的英译本就放在尼克松的桌子上。

想到这里，尼克松转过身，走到那一面以鹰为标志的总统旗帜与另一面星条旗之间的总统转椅坐下，批阅起办公桌上的报告与文件来，他特别拿起了那份毛泽东的“5·20声明”——也就是昨天，这位中共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对着广场上近200万革命群众，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仔细地读了起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持，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治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10天，就得到近20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大洋州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一切走狗！尼克松看完后，下颏都气得扭歪了，脾气变得特别坏。刚才听音乐与看花时的愉悦心情烟消云散。尼克松没有像往常那样，将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召来，对事态作分析；他已经气急败坏地抓起电话颁布命令：

“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全部开进台湾海峡。挫掉毛那种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它们……”

他已经气得不像往常一样要求各部门进行联合研究，不要求作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而直接下达命令了：

“我不想要什么长篇大论的文件。不要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我要你打电话传达，这是总司令的命令。你可以告诉莱尔德（当时的国防部长），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我要舰只在24小时内到达台湾海峡。”

尽管尼克松大发脾气，他的下属们倒是十分清醒的。毛泽东无非是在天安门上又像往常一样大骂“美帝”，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并没有产生异常的攻击美国军舰或是杀害美国人生命，也没有进犯美国盟友台湾，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威胁美国安全的行动。而且，尼克松的亲信们已经追随他多年，熟知他的性格与脾气，早已认识到，像这类命令如果不在24小时内执行是会更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这件事表明了这位偏爱外交事务的美国总统的两种心态：一是焦急，急于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从而在东南亚脱身与制约苏联；二是说明他把握不定。连基辛格也感觉到，每当尼克松说“无可挽回”的时候，正突出地表明了他的把握不定。

20年来形成的疑心是不容易克服的。尼克松暴跳如雷，是由多方面复杂的因素积累至“5·20声明”的导火线上爆发。除了声明中美长期敌对而形成的疑心，及尼克松本人复杂而矛盾的内心性格，还表明了尼克松对国内内部扯皮而耽误了华沙会谈的日期十分恼怒。

1970年2月20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第136次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奥妙和委婉的发言，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一个使节去北京的建议。尼克松受到鼓舞，感到似乎快要突破了。

随着，尼克松又于2月22日收到了叶海亚总统托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转来的一封信。信中，叶海亚有把握地告诉尼克松，美国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行动已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动了”中国人。叶海亚还说，中国人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担心美国与苏联勾结了；但是，要是美国把中国愿意同其进行实质性对话归结于中国实力的虚弱和对苏联的惧怕，将会引起北京十分敏感的反应。叶海亚还说，中国人“认为扩大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他们认为中美交战的可能现在已经变得很小了”。他们“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场涉及两国一切分歧的实质性对话”。还指出，“谈判将是严峻的和艰难的”。

尼克松读了叶海亚的信十分高兴，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良好，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他以前想象的怒气冲天、头脑僵硬的领导人。他感到通往北京的道路已经打开，只要美国准备巧妙地往下走的话。他当即授命基辛格复信给叶海亚，对报界的揣测虽然无法控制，但是白宫将审慎地避免发表任何可能怀疑中国的动机或实力的评论；还通过叶海亚向北京建议，开辟一条比华沙会谈更适于秘密交换意见的渠道，或是直接通向白宫的渠道。不久，传来的回音是中国拒绝了。看来，只好依靠华沙会谈。

4. 基辛格—罗杰斯冲突

下一次华沙会谈该是第137次了。面临中国接受美国要派使节去北京的建议的情况，尼克松觉得恼怒的是，美国政府内部的扯皮再次表面化了。基辛格已经向尼克松提出，在下次华沙会谈中，美国不能仅仅用大家所喜爱的那些常规议程项目（台湾问题、资产问题、权利要求、囚犯问题、记者互访，如此等等）来回避问题了，哪怕是用最巧妙的笔法来拟定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也不能掩盖美国必须回答中国人邀请去北京这个现实。

可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认为，讨论了15年的那些双边问题还未取得

进展就去北京岂不暗含有向中国人让步的意思？况且会使美国的盟国发生误解，更不消说要引起莫斯科敌意了。国务院东亚司的官员与专家主张要中国人对美国所关心的主要亚洲问题作出让步，作为美方代表赴北京的代价。这些官员们更担心派使节去北京这件事可能由白宫执掌，国务院就插不上手了，因而对之进行顽强的抵制。

这场官场争斗是针锋相对的。基辛格向尼克松表明，同现在使中国人感到不安的主要问题比较，双边问题是次要的。只有非常担心苏联的意图，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人愿意坐下来跟一个以前被自己称为头号敌人的国家会谈。罗杰斯国务卿却担心，中国人可能使美方在北京陷入旷日持久的屈辱性谈判中而不能自拔。双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中激烈地争论。

基辛格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想要使我们受辱。只有肯定中国人是在谋求减少他们的敌人，才能说得通为什么北京会发出邀请。光是开始会谈就会使国际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意见的分歧和官场的争斗使基辛格和国务卿罗杰斯结下了宿怨。这已经是人人皆知了。基辛格给人的印象是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甚至公开对人抱怨说：“罗杰斯真蠢！罗杰斯对全世界来说是个危险人物！罗杰斯是外行！对外交一点都不懂！”

罗杰斯为人挺有涵养，对基辛格的抱怨，大都有礼貌地保持沉默。如果基辛格在公开场合把他说得大不像话了，他才会给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打电话。但是，罗杰斯越是克制自己，基辛格也就越是抱怨得厉害。这真给尼克松带来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基辛格更没有少告罗杰斯的状。基辛格经常在尼克松面前充满情绪地长论指责罗杰斯。开始的时候，尼克松容忍了这种指责，他从大处着眼，很欣赏基辛格的学识和才干，特别是其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张很对他的胃口；于是，他认为容忍这种指责是聘任基辛格当顾问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时间一长，尼克松就觉得基辛格太过份了。他私下向霍尔德曼抱怨，基辛格总是让总统浪费大量时间，来听其对罗杰斯提出一些上不了纲的埋怨话。

这次，在对待中美华沙会谈中爆发的基辛格与罗杰斯之间的扯皮，使尼克松考虑过用大调动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他想过要把罗杰斯提升到最高法院去，让同基辛格合得来的埃利奥特·理查森担任国务卿。这个想法，他没有马上付诸实现，他也并不认为罗杰斯是个窝囊废。他的内心十分矛盾。

于是，扯皮现象又延续了下来。

基辛格很快就给尼克松送去一份自己对毛泽东声明的分析：

实质上，……都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声明的中心论点是：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河内看来必定从中得不到什么安慰。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

从策略上，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事宣传。

——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它尖锐地指出，已有20个（别的）国家承认西哈努克（莫斯科没有承认西哈努克，而且始终不承认他）。尼克松经基辛格分析以后再浏览了一遍毛泽东的声明，这才觉得把其中慷慨激昂的词语去掉以后，露出了非常谨慎的实质。尼克松这才豁然开朗，省悟到他要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

良策，而只会把事情搞糟。毛泽东是留着不少口子以待恢复两国互相接近的；在盛怒之下把这些口子都堵死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他觉得自己更离不开这个哈佛教授了。他拿起了电话，想邀基辛格周末去斯坎比岛度假。

1970年6月，美军撤出柬埔寨后，尼克松于10月初先发出要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信号，公开表示：“如果我死以前还有什么事情可做的的话，那就是去中国。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接着尼克松又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去美国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之际，请这两位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

第 16 章 “我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

毛泽东说：“斯诺先生，你替我捎个信给尼克松，他如果愿意来中国，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基辛格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我们敏锐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递过来的信息又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斯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身边庆祝中国国庆节的真实意义。

1. 第一位上天安门的美人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那个时代红卫兵的军装的绿色与标语口号旗帜的红色，构成了天安门广场的主色。

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好一会，按名单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们已经陆续来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和叶群也来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和邱会作四员大将从电梯门里走出来，只是神色不像数月前那样大模大样。天安门城楼上那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接一次地升上来，送上这些举足轻重的角色。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夫人路易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

“斯诺先生，欢迎您。”周恩来伸手跟斯诺握手。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人么？”斯诺问着，棕色的眼睛透露出兴奋的光。

路易斯更是充满了好奇心，喜悦地四处打量。天安门城楼雄浑庄严的建筑造型，富于东方古典的艺术美，使她目不暇接。天安门屋顶四个垂脊，均装饰有一个仙人和九个走兽：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狎鱼、獬、狮，这些雕塑，在阳光下璀璨夺目，使城楼增添了神奇色彩。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激动：“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周恩来说：“我还记得我替您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您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

斯诺望了望眼前的周恩来，该是72岁了。当年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还没满40岁，个子清瘦，骨胳小而结实，下颏上蓄着又黑又茂密的胡子，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具有领袖的自信与迷人的魅力。现在，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很深，斯诺敏锐地感觉出那深邃而机敏的眼神中包含的忧虑与坚毅。斯诺觉得自己常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吸引。

“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马上将话接了过来：“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斯诺当年闯到陕北写了将红军介绍给全世界的《西行漫记》，是独家新闻。可是，斯诺在此时，还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周恩来请其上天安门的独家新闻的重要含义。斯诺此时想得更多、更关心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秋天，“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的时候，斯诺充满了对中国形势的焦虑。内战已经结束，革命者已经取得了政权，但是国家经受了长期动乱的浩劫，被弄得穷困不堪，又面临外国的层层封锁，这个以勤劳勇敢而著称于世界的伟大的民族，正应该为了自己的生存与振兴要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去逾越那些旧社会留下的无穷无尽的障碍，为什么革命者内部又要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当斯诺从西方的报道中得知一批他景仰的革命家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竟然受到冲击和批斗时，他心焦如焚。他对友人说：“从这里所能得到的消息来看，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很难加以理解的。人们只能凭着超感官的感觉来进行工作，而我的这种感觉又不太灵敏。”

斯诺很想再次来华访问，曾用口头与书面的形式反映过自己的愿望。他却一直被拒而不纳。他当然不知道，在中国外交部大院的大字报里，有人将他的名字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往中国的间谍”连在一起。

1968年春天，斯诺在给住在北京的友人爱泼斯坦写信说：

我已经认识到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显然不是我的朋友。有几位我所信得过的知己对我说，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已经不再把我看成中国的朋友了……但是，无论如何，我时中国的态度和言行，都是有目共睹，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不管那里的少数当权派是不是把我看做中国的朋友，但毫无疑问的是，外部世界（反动派除外）都认为我时中国是友好的，而且可以肯定，人们的这种看法还会继续下去的。要是我改变态度，那才不配称为中国的朋友呢。我并不是那种在政治观点上看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作家……

他言辞显出十分痛心，在精神上蒙受的深沉伤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一如既往，襟怀坦白，心直口快，从自己内心深处诚恳地表现出了他的尊严和信念。

中国并没有忘记斯诺。周恩来在动乱中经毛泽东批准又主持外交工作不久，就同意斯诺再次来华访问。斯诺是在1970年8月14日到达中国的，周恩来还同意他和夫人路易斯·惠勒一起来访问。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电梯门开了，一个身材魁伟高大、背脊微驼的人在女秘书的陪同下走了出来。

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迎向毛主席。斯诺觉得毛主席似乎比在陕西窑洞的时代更加高大、魁伟。衬着金光璀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毛主席身上焕发的非凡的气质，确实使他在刹那间感觉到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

斯诺34年前在陕北保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那时的毛泽东面容瘦削，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双眼炯炯有神；他第一个印象就觉得毛泽东像林肯。

满脸笑咪咪的林彪在招呼毛主席。

周恩来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

“主席，您看，谁来了？”

毛泽东一看见斯诺，十分高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后来回忆说：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的一只手已经瘫痪，因而藏在衣袖里，但我却注意到他的握手同往常一样坚毅有力。比我在 1965 年见到之时，他体重是减轻了些，却更加精神矍铄——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那时他正在作出在他作为革命领袖一生中也许是最关键、最需要勇气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清除他的党所选定的接班人、党的副主席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及其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他们的一切走狗），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斯诺夫妇跟毛泽东亲热地握手。斯诺觉得毛泽东的幽默感不减当年。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这是林彪副主席。”

斯诺跟林彪握手：“林彪将军，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是在延安见过的。”

林彪总是笑：“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

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群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旗浪起伏，人海沸腾。“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毛泽东伸出手去，执住斯诺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朝栏杆前走去。毛泽东领着斯诺夫妇来到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广场上的人海，群众狂热到极点。人群上空，汽球拖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有一幅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标语。

毛泽东欣喜陶醉地举起右手臂向群众挥动。群众欣喜若狂。据斯诺《漫长的革命：紫禁城上话中国》记叙：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从我们眼底下通过的游行队伍高声呼喊，许多人眼里迸出了泪花，不仅仅是青年人这样。

“对这些您觉得怎么样，”我指了指怀有崇拜的心情的游行队伍，禁不住问道，“您的感觉如何？”

毛皱了皱眉，摇摇头，又说很好，但并不真正满意。是怎么回事呢？在他未及作答之前，我们的谈话被新的游行队伍打断了。只是几周以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能够重提这一问题时，他才非常坦率地谈到个人崇拜“讨嫌”。我这才发现，国庆节那天，他并未留意成千上· 万的人手里举着的那些为毛语录增色的肖像、旗子和鲜花。他当时思考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恢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却的生产节奏，加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扩大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等问题。他是否也考虑到与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呢？

斯诺在北京住了多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时只有 27 岁，住在煤渣胡同 21 号的一个四合院里的时候，就来天安门城楼下观瞻过。那时，他曾经想象过明清的皇帝们在城楼上大驾光临、大展龙颜，举行领诏、大婚、祭路、祭旗、出征以及献俘等大典的情景，想象过万杆黄旗飘飞、万民长跪叩头的景况。他当时当然没有想象过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革命领袖人物身边聆听广大群众热情洋溢地三呼万岁。他身边的毛泽东，就是那个富于农民的幽默感的革命家。尽管当年这个人穿着打补丁的皱巴巴的布衣服，在窑洞里请他去吃夹红辣椒的馒头或是贺子珍做的酸梅，跟他一起打扑克，一边用手搓着脖子上的污垢，一边叫着佯装自己有大牌，有时还毫不在乎地当着他的面，松开裤腰带伸手进去抓虱子。毛泽东还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身上还没有长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掌握命运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

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其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农民的迫切要求所作的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些使毛泽东成为一个伟大非凡的人物。

“现在美国是不是有着形形色色的反抗？”毛泽东问斯诺。看来毛泽东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颇深——他在“5.20”声明中对之加以赞扬——并想进一步了解美国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分别时，毛泽东告诉斯诺说，我们不久会再次见面的。

2. 基辛格的迟钝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他们身后或是身旁别的人物的身影已经被技术处理了。并且还在《人民日报》每天刊登毛泽东语录的右上角的框子里赫然刊登了这么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遗憾的是，这张毛泽东跟美国人斯诺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应该被当作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松和其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

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

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不过，政治嗅觉很敏锐的尼克松很快就从一些渠道得知了这一最新的讯息，不禁十分高兴。他在1971年2月向国会作外交报告时说在今后的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基辛格曾经形容，如果说毛泽东让斯诺上天安门是拿着一把轻剑来传递信息的话，尼克松却举着一柄大锤来传达他自己的信息。就在斯诺上天安门的前两天，即9月27日，尼克松在对《新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重点谈了刚结束不久的约旦危机。尼克松有意识地在谈话中插进了一段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他自己在这里面的作用的寓意很深的话：

……也许在5年时间里，或甚至10年时间里还不可能起这种作用。但是，在20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接着，在10月间，尼克松又亲自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去开拓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10月下旬，众多的国家的首脑人物到纽约来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10月24日，31位国家首脑或政府领导人应尼克松的

邀请来参加白宫的宴会，叶海亚·汗总统与齐奥塞斯库总统也在其中。10月25日，尼克松在椭圆办公室里和即将访问北京的叶海亚·汗会晤，他告诉叶海亚，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对华关系正常化，而要求叶海亚作为中间人提供帮助。

叶海亚说：

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十分困难的。我去年说过，中美两国积怨太深，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第二天，10月26日，尼克松在白宫南草坪上热情接待齐奥塞斯库，欢迎齐奥塞斯库对美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作为一年前尼克松访问加勒斯特的回访。当天下午，两位总统会谈时讨论了中国问题。据说，他们甚至深入地讨论了中国问题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派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还提到了使节可能的人选，也讨论了台湾问题。据罗马尼亚人私下声称，尼克松告诉齐奥塞斯库说，就尼克松个人来说，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等于说，华盛顿已经赞同了北京关于台湾问题的观点。因为20年来，美国一贯坚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省，而是一个同美国友好的“独立国家”。尽管事后基辛格说这段话“完全不确”，那么认为尼克松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表达了美国有可能转变立场的某种暗示，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当天晚上，尼克松在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白宫晚宴上，在祝酒词中给北京发出了公开的信号：

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同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然而，正如今天早些时候我时总统阁下说的，他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罕见的。

美国现任总统在白宫的公开场合把北京政府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破天荒头一次：使用这一名称实际上意味着一项重大的决策。在这种敏感的外交语言中，它用一定方式表达了对大陆中共政权存在的承认。

当时在场的大多数新闻记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用语的重要性，但是却引起了当时在场的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的不安。白宫的宴会结束后，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要求他解释这个用语的含义。

基辛格富于幽默感地回答说：这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难道俄国人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3.20年来第一次认真的、心平气和的信

1970年11月13日，在北京访问的叶海亚汗总统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他在同周恩来单独会见时传达了尼克松的口信，说尼克松要走向同中国和好，愿意同中国进行有限的贸易；美国希望在高一级进行秘密对话，并准备派一两名高级人士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同中国对话。尼克松还暗示，如果中国要在官方一级会谈，他可以派主要顾问基辛格前往。他迫切等待着中国的答复。

周恩来于11月14日正式答复叶海亚·汗说：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

总统商定。

11月下旬，罗马尼亚副总理勒杜列斯库访华时也转达了美国的口信。周总理也按上述口信作了同样的答复，并表示：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

尼克松的信由这两个渠道传到了中国后，他们认为，中国方面的回答是令人鼓舞的，但还比较含糊。

叶海亚回到伊斯兰堡后，委托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亲自负责美中联系的渠道。舒尔坦曾担任过5年驻北京大使，对周恩来有很浓厚的感情。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密，巴基斯坦渠道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毛泽东、周恩来给尼克松、基辛格的信息是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亲自交给舒尔坦，再由舒尔坦用外交邮袋交给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里，由希拉里亲自送给在白宫的基辛格。美国方面的信息也照此办理。

12月9日，希拉里来到白宫基辛格的办公室里，拿出一个信封。大约是为了保密和万一遇到意外时留有否认的余地，信件不署名，也没有任何抬头，全部内容都是用笔写在一张有蓝杠杠的白纸上。希拉里说，他没有被授权可以把这个文件给白宫留下来，只是被允许由他读给基辛格听。他慢慢念，基辛格把全部内容记下来。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事后才意识到，一个以古宗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的杰出的举止文雅的代言人口念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亚洲革命国家领导人的信息，而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一个代表把它记下来，这是多么不和谐；而且在已经具有无线电及卫星通讯手段的今天，竟然采用19世纪的那种外交方式——由一名信使传递、宣读手写的照会。希拉里带来的信息，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基辛格觉得，这是20年来两国之间第一次认真的、心平气和的写信。

基辛格经尼克松批准，草拟了回信，与此相对应，亦交给希拉里。美国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用的是静电印刷术复制的信笺，上端不印什么字样，没有写签名，也没有打上美国政府的水印图案。回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相互交换信件的办法，成了一种程序，一直进行了好几个月。

4. 毛泽东说，我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

1970年，隆冬，南海昔日碧波粼粼的水面已经结了冰。晶莹洁白的冰面将岸边丰泽园那道蜿蜒的红墙衬得更红。墙内四合院中那七棵古柏的枝头依然苍绿。

1970年12月18日上午，在北屋西头的书房里，毛泽东和老朋友斯诺坐在沙发里谈得正酣。书房的四边都摆满了高大的书架，架上摆满了书，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许多书籍中插有写着注释的纸条。大写字台上高高地堆着书刊和手稿。给斯诺的印象，这儿更像一位大作家的工作室。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和斯诺交谈。烟吸得很厉害，间或有一两声咳嗽。斯诺关切地说：

“主席已经吸了几十年烟了。”

毛泽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润喉，说：“医生劝我戒烟。我戒过。戒不掉。”

“我这次旧地重游，还去了保安一趟。”斯诺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也不讲假话的。”毛泽东仍是十分坦诚。

“是啊。我第一次到保安，还担心村里的农民要‘共我的产’，分掉我带去的东西。当我离开的时候，感觉好像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斯诺说得很真诚。

毛泽东笑了：“怪不得麦卡锡把你当‘赤匪’。”

“我给儿子起了名字叫‘西安’，表示对红军的祝愿和怀念，就更像‘赤匪’了。”斯诺又说。

毛泽东问：“我听说，前两年你想来，有人反对？”

“我写过信来要求的。”斯诺答。“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泽东：怎么是打扰呢，上次，1965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泽东：就是那个时期。1967年7月July和8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5·16”。

斯诺：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泽东：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诺：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泽东：可以嘛。你的那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诺：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泽东：可讨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尔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总要有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的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

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5 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 100 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诺：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泽东：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斯诺：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 10 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泽东：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诺：还是很不错，同 10 年前或 5 年前相比较。

毛泽东：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诺：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泽东：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 45 岁了，只好算了。

斯诺：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毛泽东：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诺：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他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泽东：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第一是亚非拉，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很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

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35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35年啊！

那时落后得很，只有8000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宁才闹了25000人。我说是走了25000里路，剩下25000人。但是比长征前的300000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路线被批判了。

斯诺：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毛泽东：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泽东：那是尼克松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外交部知道，不要通过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不要公开，又是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诺：1972年。

毛泽东：我看，'72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1000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3亿，都在那里造反。

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诺：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15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么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泽东：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190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300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3000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墙角里，噏！噏！噏！从1775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1776年才开了一个13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嘛，只有3万人不到，一块150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

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2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200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诺：你想到了。

毛泽东：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

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 100 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诺：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泽东：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诺：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泽东：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诺：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泽东：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毛泽东：我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斯诺：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段斗争问题。”

毛泽东：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90%以上是工人、农民、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诺：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 100 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 Long Island（长岛）。……

斯诺说：我记得，1965 年 1 月，你同我谈话时，曾说过中国确有人崇拜。

毛泽东说：那时的情况是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 Great Teacher,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泽东：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他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 - Mao！……

毛泽东在谈到个人崇拜时，是动了点情绪的。他很明白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才了解这一切。他让斯诺上天安门看到了个人崇拜，看到了他作为领袖的绝对权威及无上优越，看到了他在亿万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他的手臂

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挥动，人们的情感就会像波浪一样翻腾，甚至不惜在他的指引下赴汤蹈火。他的声音从中南海的书房里发出来，亿万人民会怀着虔诚的激情当作必须绝对服从、甚至超越了法律的最高指示。可是，他的内心却是十分孤独的。在中南海红墙内丰泽园的书屋里，他已经很难单独同什么人促膝谈心，交流感情，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讨论，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辩解，他的副统帅也说得明白，只要是他的话，“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他的内心活动；只有同像斯诺那样的异国朋友，才能披露一点儿。他的心是痛苦的，孤独的。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重复。1965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要搞点个人崇拜，是为了让刘少奇下台；这次，讲“四个伟大”讨嫌，尽管斯诺还没有理解其深意，可是历史学家在今天可以据此断定，毛泽东已经觉察了林彪一伙的用心了。他又在考虑林彪是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在这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上大家同意了。可是，4月份林彪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虚伪地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在林彪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此后半年内，他讲了6次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人家就是不听。林彪还是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他警觉了，还说“一句顶一万句”呐，狗屁！8、9月间，庐山会议上，林彪不打招呼，突然在会上抛出反对所谓有人否定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陈伯达接着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打乱了议程，引起庐山的一场混乱。他识破了这伙人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四个伟大”是林彪的发明，毛泽东对斯诺讲“四个伟大讨嫌”，等于点名说林彪“讨嫌”。

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毛泽东和斯诺谈锋极盛。午饭时分，两人在北屋中间的起居室里，共进午餐，湘菜的辣味和茅台酒的芬芳，使谈话更热烈起来。

毛泽东首先开口说道：

“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

“名符其实的马拉松会谈。”斯诺说。

“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毛泽东说。

斯诺：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泽东：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诺：那是。

毛泽东：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诺：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泽东：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诺：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泽东：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诺：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泽东：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

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来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我说，你说我们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1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1千年，一让就是1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毛泽东：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30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

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35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这次谈话长达5个小时，直到午后一点。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对象来进行敞开肺腑的谈话了，一谈就是5个小时，几乎是他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

第 17 章 毛泽东最后下决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毛泽东在刚刚圈阅了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之后，只一天工夫，又改变了决定。

基辛格：乒乓外交事件，应是周恩来的杰作。

周总理严肃地说：“不。不能那么说。

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外交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靠主席的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1. 美国乒乓球队想来华访问

1971年4月6日深夜。也可以说是4月7日凌晨了。中南海丰泽园北屋西头的书房里还亮着灯。柔和的台灯光洒在大写字台桌面上。已经用得光滑发亮的镇纸下压着一份请示报告。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上，周恩来已经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又在旁边用铅笔添上了一段话：

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时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报告是4月3日打的。此时，在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一天前，他已经在看过后用笔圈阅，把报告批了下去。秘书已经对外交部与体委作了传达：主席已经同意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时，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已经接近了尾声，各个单项的决赛或半决赛正在进行。4月6日下午4点半，住在藤久观光旅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接到了国内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指示还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队领队沃尔登女士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在此次来华。

接到了国内的明确指示，代表团负责人赵正洪和宋中作了商量，决定立即通知沃尔登和女友纽伯格女士。至于美国队访华的事，他们只是口头表达过愿望而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要求，也不必为此专门前去告知，等到了哪儿相遇时打一声招呼即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事已经作罢，划句号了。

可是，毛泽东还将这份报告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并没有让秘书拿走归档。这件事，还是他思维的焦点。夜深人静，他特别容易进入心理学说的脑细胞兴奋状态。这已经是战争年代、戎马生涯中养成的习惯了。长年在深夜守着电台，收听各部队、各地区的汇报，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又绞尽脑汁，运筹帷幄，作出新的部署。久而久之，成了习惯，胜利后进了京城，也经常夜深工作或是开会决策国家大事。

他的思绪在活跃着。20天前，周恩来亲笔写来报告，请示派我国乒乓球代表赴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问题，鉴于这次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日本参加第31届世乒赛，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重新走上世界体坛。周恩来总理为了这次去日本比赛还亲自到乒乓球队做工作，作动员，还为代表团安排怎么坐飞机。出于多种因素，让他们分成两批出发去日本。

才到日本，一切还都不熟悉，开幕式前举行冷餐招待会。运动员们随意

走着，有的中国老运动员就想在各国运动员中找一找以前的老朋友。

突然几名中国运动员与几个陌生的一时还分不清国籍的运动员相遇了，中国运动员就习惯地报之以微笑，而对方则热情地走近来说：

“呵，中国人，好久没见了。你们的乒乓球打得好极了！”

这时翻译过来了，才知道，对方是美国运动员，中国运动员急忙煞车，默默无语了，双方无趣地擦肩而过。

次日，通过国际长途电话，代表团向国内送去了第一个有关美国乒乓球队的讯息：“美国队的一些人对我们比较殷勤。在昨晚的招待会上美国队的人和我们接近，说了很多话。”

3月30日，中国代表团为了柬埔寨问题跟美国代表团起了一些小冲突。这是预料中的事。但是令中国代表团团长宋中十分惊诧的是，当他去会场大厅喝咖啡时，随便地一坐，却发觉对面正好坐着美国代表团的斯廷霍文团长。

既然这样不期而遇，宋中也只好礼节性地点了点头。

“您好，宋先生。”斯廷霍文先讲话了。

“您好。”宋中的回答稍有点拘谨。

“宋先生，我们聊聊天吧。”停顿了一会儿，戴着睛镜的斯廷霍文显然希望打破僵局。

“好呵，我们随便聊聊。”宋中回答。

斯廷霍文说：“你们中国队打得不错，水平之高令人羡慕。”

谈话慢慢就从乒乓球转到了别的事上了。斯廷霍文说：“宋先生，你知道吗？在我们来到日本之前的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宣布取消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限制。声明说，这样做与总统在公开场合表示的同大陆改善交往的意愿是一致的。这意味着……”

宋中是知道那个声明的。他此时便说了一句：“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在北京会面。”

斯廷霍文笑了。

宋中、斯廷霍文离开座位时，突然，斯廷霍文说道：“宋先生，你们中国人不是挺和气的吗？您刚才怎么那么凶？”

宋中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顿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是在名古屋中美双方官员的首次接触。

就在这天晚上9点多钟，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向北京汇报：美国代表团与我接触，表示“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友好的……”并说出了美方的潜在意思，“美国乒乓球队想来华访问。”

在北京，名古屋来的报告每天被整理成简报。其中两份一送周恩来，一送毛泽东。毛泽东指示：与名古屋每天通话3次还不够，要增加到5次！

4月1日那天，中国男队夺得了冠军。

这天，美国国务院向尼克松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基辛格仔细地看了它。只见备忘录里重点提到了一句：“北京已派出了它的乒乓球队去日本参加国际比赛，几年来它参加这类体育比赛还是第一次。”

几天后，基辛格才全部了解了这句话的重大意义。

次日，奇妙的事情又发生了。组委会安排各国运动员去游览三重半岛海湾。在小小的游艇上，中美两国选手竟站在一起了。热情爽朗的美国青年毫无顾忌地开口了：“嗨，你们的球打行真漂亮。找个机会，也和我们打上几盘吧？”

在随意的交谈中，美国青年笑着问：“听说你们已经邀请了我们的朋友（指加拿大和英国队），去你们的国家访问了，什么时候轮到我们？”

于是，中国代表团的信息又一次到了北京：“美国队想访华。”

而后，又出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一个美国队的选手，科恩，是个很活泼的小伙子，有一头长发，穿一条在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爱玩，也不大守纪律。这天走下楼时，他发觉来时的汽车没了。正在此时，一辆带有乒乓标志的大轿车开来，他也不管，看看车停下，就一步跨了上去。

可是等他刚长吐一口气后，却发觉车上全是中国人！

吃惊的不仅仅是科恩，车上的中国运动员也都认出来了，上车的是美国人，而且是这个一头长发的“嬉皮士”科恩！一开始没有人跟科恩搭话。

科恩高声问道：“你们谁能讲英语？”

在座的翻译朝他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的帽子，我的头发，还有我的衣裳让你们看了好笑。”科恩冲着中国运动员说：“在我们美国还有好多人也像我一样的……”

在科恩说话时，中国运动员们没人起来应答，突然，在大轿车后面坐着的庄则栋站起来走向科恩。那个美国小伙子马上认出来了：“你是庄先生。”

庄则栋点点头，伸手往挎包里掏东西。他身后响起一连串的轻语：“小庄，小庄，可别……”还有人拉了拉他的后摆。

因为来名古屋之前，有过约定，中国选手不宜主动向美国人打招呼。可是庄则栋还是从挎包里掏出一块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递给了科恩：“这个给你。”

科恩高兴极了，一边慌乱地在自己的挎包里搜寻：“天哪，我什么也没带呢，连把梳子也找不出来。可是我一定要送你一件什么正说着，大轿车到达目的地，门口正好有一群记者，见庄则栋和科恩一起下车，都飞奔过来，照相机闪光灯亮成一片。

很快，科恩搭乘中国队大轿车的新闻在名古屋当天报纸上登出来了。新华社编辑的《参考消息》很快也转载这一条消息。

一个中国运动员与一个美国运动员的来往，竟然引起西方新闻界如此关注，纷纷花了篇幅详加报道。连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24次代表大会的新闻都比不上这两个运动员交往的新闻引人注目。

2. 毛泽东最后下了决心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过。毛泽东想起周恩来刚才提到的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消息及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待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这一重大政策调整。毛泽东还注意到：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注意这个决定，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联系到2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毛泽东和周恩来感到，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周恩来并不认为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是正确的。美国人想到中国来，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在一年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是总统说想来，就是乒乓球队也想来，中国将作出什么反应？首先该让谁到中国，让尼克松总统？那个犹太教授基辛格？还是让这伙已经到了门口的球

员？

毛泽东面临决策。

这是名古屋乒乓球赛的最后一天，明天，各代表团就要离开日本了。

时光在流失，时光带来机会，也带走机会。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转折点。美国人想来中国已经不必怀疑了。但我方请不请，毛泽东正面临决策。那份关于拒绝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不正确，为什么说“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不，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呵！

毛泽东最后下了决心，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4月7日上午10时，中国乒乓球队正在下榻的旅馆开招待会，一个工作人员急匆匆地向宋中走来，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话：“重要电话，重要电话。”

在屋内，代表团负责人赵正洪递过来一张纸，是国内来的电话记录：

……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事，考虑到该队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年来我国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及时报回。

事不宜迟，宋中赶紧往外走，去找美国队的住处。10时30分，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哈里森走出饭店大门，正要举手招呼出租车，忽然一辆小汽车在他身边戛然而止，走出来的竟是中国代表团的宋中：“哈里森先生，斯廷霍文先生在吗？”“不，他不在。”

“那就跟你说了。”宋中和不知其来意的哈里森一同回到休息厅里，一坐下，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代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发出邀请，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这消息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太突然了。

下午3时，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人员聚到一起，听哈里森讲述上午发生的事。他问大家：“去不去中国？”

寂静。这些美国年轻人忽然觉得这个问题变得很严重了，好像他们去的是另一个星球。

可是这种沉寂没有多久，年轻人的声音一下子又响了起来：“去！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去？”

美国青年们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七嘴八舌地都说要去。科恩猛地跳出去，要给远在美国的妈妈打电话，边跑边嚷：“要去，一定要去，我太高兴了！”

一阵激动过后，这些从未去过中国的美国年青人，把神秘的中国之行看得悲壮起来了。于是就形成了第二个决议：未成年的孩子立即给家里打电话，征求父母的同意。其余的人，如果没有夫人相随的，也给家里打电话。

大家便急忙去打电话。其中以年龄40岁的博根的电话最为“悲壮”。他在电话中对妻子说：“万一我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请你把我写下的未及发表的文稿收藏好。日后传给斯科特和埃里克两个孩子。”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尼克松在深夜里得知了中国方面对美国乒乓球队的邀请，立即发出指示以加急电报通知美国驻日本大使迈那，白宫的意见是，运动员务必去北京。事后他说：“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形式求得实现。”3.现在，门已经打开了

1971年4月10日上午，美国乒乓球队一行15人走过广东罗湖桥，踏上

了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他们身后又增加了4名美国记者。其中的约翰·罗德里克于40年代长驻中国，曾采访过国共两党的谈判，和周恩来很熟。

美国队来到北京，参观了故宫，游览了颐和园，又登上了长城，还和中国乒乓球队举行了友谊赛。赛前，周恩来指示要进行电视转播，还亲自审阅了事先拟好的广播稿。

稿子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黄际臣、朱世雄拟就的。周恩来在稿子里3次加上“应邀”这个词，使这句话的完整意思是“美国队……应邀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很重要的。

4月14日下午，周恩来身着银灰色中山装，带着笑容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了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尼日利亚等国乒乓球代表团。罗德里克实在按捺不住自己了，当周恩来和加拿大队员握手时，他跑过去，手里拿出笔记本，以一种奇怪的半蹲姿势，希望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他果然成功了。周恩来马上认出她来，走过去和他握手，说：“啊，是罗德里克先生，我们好久不见了。”

罗德里克笑了，“是啊，我们在延安见过面，后来是在南京，然后在20多年后的今天。”

“你看到了吧，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周恩来的话语中充满了感慨。

“我亲眼看到了……”罗德里克深深地点了点头，紧接着说：“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关心着美中关系。”

“哦，”周恩来应声说：“现在门已经开了。”接着，他又加重语气重复一遍：“现在，门已经打开了。”

与别的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员谈了话后，周恩来走向美国队围坐的地方。他愉快地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割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大门。”

斯廷霍文马上说：“我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

周恩来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可以去。”

像以前会见外国运动员一样，周恩来在美国运动员中间坐下来，向他们每一个队员问候，诚恳地请他们对中国提出意见。科恩倏地站起来，大声说：“我很想知道周总理怎么看待今天美国青年中的嬉皮士？”

周恩来关注地听了科恩的提问，坦然地说：“首先我对此了解得不多，所以，我只能谈一点并不深入的意见。”

他接着说：“现在世界上的青年对现实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他们的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形式之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事物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式都不能称为最后的，在寻求真理的时候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科恩眨眨眼睛说：“我认为嬉皮士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只有少数人熟悉它，了解它。”

周恩来回答说：“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人类一定会找到普遍真理的。这也是一种自然法则。我们同意青年人应该尝试各种不同方法，以求得真理。但是有一点，你应该经常设法找到和人类大多数的一些共同点，使大多数人获得进步和幸福。同样，如果经过自己做了之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这也是寻求真理的途径。”

科恩静静地听着，美国代表团成员也都在静静地听着。周恩来站起来，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

民的赞成和支持！”

周恩来的话，被电波传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两天后，一束红玫瑰花被送到周恩来的办公室。玫瑰花是科恩远在美国加州的母亲辗转送来的。那位母亲感谢中国总理对她儿子讲了一席语重心长的话。

那一是束深红色的玫瑰花。

在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当天，尼克松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采取五点对华新步骤……基辛格把自己对“乒乓外交”的看法写了下来：“这个事情，应是周恩来的杰作……”

其实，更准确地讲，是毛泽东的杰作。第 18 章

毛泽东不同意美国提出的方案

毛泽东：“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打仗，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们来访问。”

周恩来：“吵架是正常的，我们两国打了许多日子的仗，相互隔绝了 20 多年，分歧是必然的嘛！关键是如何对待这些分歧。”

1.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

作为试探对方诚意最佳形式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获得成功后，中国方面立即抓住良机，及时于 1971 年 4 月 21 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美方发出邀请：

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最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尼克松获悉中国政府的这一消息后，极为高兴，除了在 4 月 29 日口头表示同意外，并于 5 月 17 日请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说：

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

尼克松还建议：

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 6 月 15 日以后来中国。

中国原是主张公开的。毛泽东曾说既然要来，就公开来嘛，何必藏头露尾呢？周恩来也认为，我们很难保住秘密。但美国回信坚持要秘密来。中方只好说在中国境内可以保密，在中国境外就没办法了。

中国于 5 月 31 日请叶海亚·汗总统转告尼克松：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 1971 年 4 月 29 日、5 月 17 日和 5 月 22 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 6 月 15 日到 20 日。6 月 2 日晚，基辛格把上述备忘录交给尼克松时，他们十分激动，

尼克松看后兴高采烈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他马上取来陈年白兰地，破例在晚饭后同基辛格干杯祝贺。

1971年6月4日，尼克松向中国方面回信表示，感谢欢迎他访华，并说由于时间短促，以及须为基辛格的旅行找个借口，建议基辛格于7月9日到北京，11日离开。基辛格将乘坐波音707飞机由伊斯兰堡直飞北京。

6月11日，周思来回信，表示同意这样的安排。

在叶海亚·汗总统的热情帮助下，基辛格经过精心安排，于7月1日开始了他的“波罗”行动。

取名为“波罗”，是借用了几百年前的那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中国探险的故事，暗喻基辛格的这次中国之行充满着神秘、惊险和意义重大。

尼克松还对基辛格说，如果此行顺利，就给他发一个电码回来。

这个电码是：“Eureka”。

这个词的中文意思就是：发表！

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白宫新闻秘书在例会上宣布：

尼克松总统即将派基辛格博士于7月2日至5日到越南南方去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即到巴黎同戴维·布

罗斯磋商。在基辛格赴巴黎途中，他将同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们会谈。

基辛格按照他的“波罗”行动开始了这次真真假假的旅行。他于7月1日离开华盛顿，活动了3天，在曼谷停留了1天，6日到新德里，8日到达伊斯兰堡。为不使印度不高兴，宣布在巴基斯坦也只呆两天。

基辛格和叶海亚·汗总统合演了一场很有意思的戏。

在晚上巴基斯坦为基辛格到来而举行的晚宴开始时，美国的尊贵客人一脸倦色地出现在宴会厅上。

叶海亚·汗总统轻声跟来宾交谈了几句，即起身对大厅内的其他客人说：“对不起，基辛格博士偶有不适，肚子有些痛，想早点退席。很抱歉，伊斯兰堡天气太糟了。我想让我们尊贵的客人到我的私人别墅去休息几天。希望博士早日康复。”

基辛格有气无力地摇摇手：“这太麻烦了，我看就免了吧。”

但是总统却很固执，坚持要让美国客人好好休息一下，“在我们国家里，是由主人的意愿决定客人行动的。您必须听从我的安排。”

基辛格作出一副无奈的神态，耸耸肩。

叶海亚·汗总统把客人送走了，并下令把有些想跟着去采访的新闻记者拦住了，强调为了使基辛格早日康复，谢绝一切记者采访活动。

基辛格当然不会真去总统别墅。他摆脱了新闻媒介的跟踪后，即于9日凌晨4时半由中国的章文晋等陪同乘巴基斯坦民航的707飞机直飞北京。

当天12时15分到达北京南苑机场。中国方面到机场迎接的是叶剑英、黄华、熊向晖和韩叙。

基辛格在北京的时间只有48小时。这是他这个新闻界追踪的热门人物可以容忍暂时失踪的最大时限了。

所以他必须在这短短的48小时中做出有效的事情来，就得不停顿地工作。他先后和周恩来会谈了17个多小时，除此之外，他还得商谈公告，参观故宫等中国的名胜古迹。

9日下午4时，周恩来去钓鱼台5号楼同基辛格会谈。到达那里时，基

辛格已经率领美方全体人员在会议室屏风前迎候了。

基辛格见到周恩来时有点紧张、拘束。周恩来的随同人员有叶剑英、黄华、熊向晖和章文晋等；美方参加会谈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等。

基辛格首先表示感谢对他们的热情招待，说：“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周恩来大方地说：“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他答得自然得体，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继而又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基辛格这个在外交场面一向是潇洒大方的政治家，此时却很拘谨呆板地念起了稿子。等念了开场白后，他才稍稍放松了一些，放开稿子说道：“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这时，周恩来打断了他的话说：“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基辛格的话开始转向了正题。他说此次来中国，尼克松总统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他谈了7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他谈了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建议：

- 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在台湾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而逐步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
- 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
- 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 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解决；
- 五、美国不再指责中国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他还谈到了印支等问题。

基辛格发言结束后，已到晚餐时间。这时气氛才变得有些宽松起来。周恩来对基辛格说：“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

基辛格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来没有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

晚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作了回答。他坦率他说出了中国的立场和原则，阐明了对台湾问题的一贯原则和主张。那就是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回，一个不剩，这才是你们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第一次会谈到11点20分结束。中国代表随即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边听汇报时边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还留着尾巴，它已经不是猴子，是猿，发展不长。”又说：“美国应当重新作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语比我好，让那些多米诺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仗打，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

毛泽东又对周恩来等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

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第二天基辛格由黄华、熊向晖等陪同参观了故宫三大殿和出土文物，随后到人民大会堂同周恩来总理会谈。

基辛格认为这次改在人民大会堂是周恩来对他的礼貌安排，很高兴。会谈时周恩来就对他讲天下大乱的世界形势，中国准备打仗，准备着美国、苏联来瓜分中国。基辛格说，请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进攻中国。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勾结对付中国。又说，中国对美国的军队可以摆开，摆在别的地方。

最后周恩来建议，尼克松访华可以安排在 1972 年夏天，并表示尼克松访华前可以先同苏联领导人会晤，这样更慎重些。

基辛格说，还是按照已安排好的程序进行，先北京，再莫斯科。如果总统夏天来访，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选票之嫌。周恩来说，那就 1972 年春天来访。基辛格表示同意。

当天晚上，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谈了两点意见：

一、对基辛格说美国不会进攻中国、让中国把军队开到北方去的话，毛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二、当汇报说双方商定以巴黎为联络渠道时，毛说，你基辛格说不经官僚机构，华沙是官僚机构，那我们驻巴黎使馆是不是官僚机构？你们不想派一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一个临时的，就靠你基辛格。现在只好听他的了，我们怎么能强迫人家呢？那就通过巴黎吧。

这时候，周恩来匆匆赶来了，他和毛泽东谈到发布公告之事。毛立即表示，对公告内容中有关尼克松来访，谁也不说主动，是双方都主动；并说在公告中，也不提毛要见尼克松，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说完之后，周恩来还想再留一会儿。毛泽东说，你不是约好了 10 点去吗？还是去吧，不然基辛格会感到奇怪的。于是周恩来又同叶剑英、熊向晖一起去见基辛格。黄华和章文晋则把拟成的公告稿交给王海容、唐闻生送毛泽东审阅。

大约 10 点 15 分，周恩来见到基辛格。对于仅两百多字的公告，双方有争议的地方就有三处地方：一是尼克松访华是谁主动提出来的；二是会谈中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原稿中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

周恩来考虑如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面子难看，于是改成“获悉”他要来访我们邀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正常化”之后，加上了“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关于来访日期改为 5 月以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翌日，毛泽东看过改过的公告觉得很满意，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 5 月就要来了，早点来也好嘛。基辛格看到改动后的这一稿，也觉得中方设身处地地考虑了美方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很接近，马上表示同意了，只是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地”一词。

最后商定完，正好离基辛格要离去的时限还剩下吃中午饭的一点时间。

用完中午饭，基辛格一行就悄悄地乘原飞机回巴基斯坦，重新又作为一

个“病后初愈”的形象出现在新闻媒介中。他的这次特殊使命的秘密一直保持到几天后公告发表为止。1971年7月15日晚上，尼克松面带微笑地出现在美国的电视屏幕上，发表了如下电视讲话：

我要占用今晚的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做的一件大事。

正如我在过去3年里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7亿5千万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稳定而持久的和平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好几个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为两国的比较正常的关系敞开门户。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接着，尼克松宣读了那份让全世界感到震惊的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轻松地读完公告，便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了。几乎在同一时刻，中国方面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首都的各大报纸都发布了这一公告。

这一消息震动了美国，也震动了世界。

2. “热恋中的情人”

1971年7月20日深夜。法国巴黎。

一个紧急通知把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叫醒了。

根据周总理和基辛格在北京会谈时商定的，基辛格要来中国驻法国使馆跟他商量有关事项。通知要黄镇明天接待基辛格博士等人，并与之交谈。

黄镇急忙把手下两个助手韦东和曹桂生叫醒，然后，他在自己房间外面贴了一张“昨晚加班请勿打扰”的纸条，呆在里面认真地准备着怎么跟那位美国博士谈话。

7月25日，基辛格先在华盛顿露了面，然后乘坐打着训练幌子的“空军一号”总统座机，从法国的邻国进入了巴黎。次日清晨，基辛格和两个助手就出发到中国大使馆去了。小心翼翼的基辛格戴了一副大墨镜和一顶普通的法国帽，有意把帽沿拉得很低，遮住了大半个脸，很有点大侦探的意味。黄镇在约定的时间站在门口等着。

进了使馆里面以后，主客在会客厅坐下，喝茶，吃荔枝，寒暄着，黄镇看着基辛格的大鼻子和大墨镜，忽然说：“我们是不是在戴高乐将军的葬礼上见过面？”

基辛格说：“是的，那时我就想跟中国大使馆说几句话，但又怕这会引来轩然大波。”

“是啊。那时时机还不成熟嘛。”

“现在不同了，美国决定把中美关系建立在新基础上了。”

黄镇提议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干杯。基辛格拿起酒杯，嗅了一下，一口就把酒喝到底，咂咂舌道：“又喝到茅台酒了。我真是非常喜欢茅台酒和中国

菜。”

接着就谈到了正题。黄镇告诉基辛格，“周总理已同意这么办：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基辛格博士在10月下旬先到中国访问。如果基辛格博士要访华，我们建议你先到阿拉斯加，再从那里飞上海。”

基辛格说：“我准备访华，并建议在巴黎主持越南和平谈判的布鲁斯大使陪我一起去。”

黄镇对于基辛格的这一想法并不赞赏。对于这一人选，中国政府已经有过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此时他只能很婉转地说了一句：“请原谅，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恐怕难以接受。”

基辛格是知道中国在这个人选问题上的想法的，但他还不想放弃：“布鲁斯大使得到总统的充分信任。”

黄镇没有反驳基辛格，只是点点头。他早已被告知，在那些重大的问题上，他最好多听少说。他的主要任务是传递和解决一些细节上的事情。

基辛格又说：“如果万一我们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谈，美国将随时通知你们，请将这一点转告周恩来。”

黄镇对这句话感到很高兴。美国作这样的表示，就意味着美国已把中国看作是个可以相通一些讯息的友好国家了。正如西方记者所言，此时的美国与中国，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在相互吸引、相互追求中享受着甜蜜和忧虑，对未来既怀着希望，又怀着恐惧……3. 美国人企图离开主题

在巴黎的这条中美秘密渠道交往中，黄镇和美国武官沃尔特斯接触交涉的次数最多，有时候竟然每天都要见面。

在8月的某一天，黄镇又是一早就准备着跟美国武官见面。

这一天他们要谈的是中美双方的一个敏感的问题。这天，一

向守时的美国武官迟到了15分钟。沃尔特斯走进门以后的步履

也比往要慢，但似乎更踏实了。黄镇心里明白了，今天两人也许会

有一点小小的较量。

两人坐下后，黄镇把中国政府最近一项决定告诉沃尔特斯。

在前一次与沃尔特斯见面时，对方提出基辛格访华的新闻预告问题。美方提出的日期是9月22日、23日或者10月5日，但明确倾向于前面那个日期。中国政府考虑，美将在联合国大会开幕时提出“两个中国”的提案，所以我方坚决不能同意在9月22日或23日公布基辛格访华的预报消息，而只同意美国提出的后面那个时间，即10月5日。

黄镇说：“按我国习惯作法，一般是在基辛格到达中国发布消息，不另发预告。为了照顾美方需要，中方同意在10月5日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预报。”

“大使先生，既然中方同意发预报，早一些时候不是更能产生持久效应吗？为何不提前至9月23日呢？”沃尔特斯用一种带有疑惑的目光看着黄镇。

“请你注意9月23日这个日子。”黄镇对沃尔特斯说。他稍稍欠了欠身子，以示对对方的尊敬：9月23日前后，美国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被我国政府坚决反对的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在这个时候发表基辛格访华的预报意味着什么？”

“也许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沃尔特斯故意把话说得很轻。

“不管是不是巧合，中国政府也不能同意在这种时候发布基辛格访华的

消息。关于这一点我方有必要重申：关于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

随后，黄镇递给沃尔特斯一份书面材料。沃尔特斯也给了黄镇一份美国方面的材料，这次的材料上是基辛格拟在与周恩来会谈时要交谈的几个问题。

- 一、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间、路线、会谈形式等问题；
- 二、除台湾问题外，还要谈远东和国际问题；
- 三、双方高级人员互访，包括文化、科技交流等问题。

“很遗憾，我不知道贵国为什么把第三方面的问题提出来呢？”黄镇凝视着沃尔特斯问道。

他在这个问题上看出了美国方面的某种有意图的做法。因为在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访华后发表的公告中提到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里为什么又扯出一个第三个问题呢？

“依我看，这是在两国关系还没有正式建立之前，一条扩大联系的途径。”沃尔特斯把眼光朝黄镇瞄了一下。

黄镇即用较为严峻的目光回敬了对方，说：“这是不必要的。基辛格博士访华不应该为枝节问题分散精力，台湾问题不解决，高级人员互访以及种种交流等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

坐在一旁的韦东和曹桂生立即分别用英语和法语把黄镇的话意转达给那位美国武官。沃尔特斯认真地听完，不由地点了点头。

“我可以向基辛格博士转达你们的意思。”他以一种低声说话，但明显地带着一丝警觉。“大使先生，对此并没需要我们决定什么，我们的重要任务是传递。”

黄镇这时也有意识地让变得有些紧张的空气轻松起来。“是呵，我们把主要工作谈过以后，接下去才是可以由我们自作主张的事情。”他说着，用手指了指一边柜子上摆着的茅台酒和小吃，朝对面的那位美国将军微微一笑。

4. 基辛格虚惊一场

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后，时隔3个月，即1971年10月中旬，这位博士又一次踏上了中国的领土。

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来，是大大方方地预先于10月5日发了预告，而后再神气活现地乘坐了美国总统的专机直接从美国飞抵中国。

基辛格把他的这次北京之行定名为“波罗二号”。10月16日他率领他的全部人马从美国出发，作为尼克松总统将来的飞行路线的一次试航。基辛格一行乘坐着总统专用的“空军一号”专机，按总统访问的预定路线大兜其风。

这条预定的路线飞经太平洋，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稍息，然后再飞上海。以免由于时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使总统一行在到达中国后过分疲劳，而影响健康和访问。基辛格这位号称世界上消息最灵通人士的博士，却不知道他们此次去的中国，与他上次去时，已有了一种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极微妙也是很令人吃惊的变化了。

就在他去北京的前一个月，即9月13日，毛泽东的那位副统帅接班人林彪乘坐一架三叉戟飞机逃往苏联途中，在蒙古的大沙漠中摔死了。中国在一

个时期一直在为处理林彪事件而忙碌着。

作为主持全国所有重大事情的总理，周恩来在此期间无疑是最为辛劳的人物。除了处理林彪事件，他还要为即将召开的第四届人大会议作准备，加上身体不好，所以周恩来总理一直到 10 月中旬才着手进行接待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准备工作。

这些基辛格是不知道的。中国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林彪事件一直还没有为国外新闻界所知晓。所以当基辛格等人高高兴兴地到达中国时，却发现到上海机场迎接他们的仅有上次去巴基斯坦迎接他们的章文晋等 4 人和上海外办的两位代表。

敏感的基辛格顿然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

当天下午飞抵北京机场时，也仍如上次一样的规格，迎接他们的是叶剑英等几个中国领导人，再加上一个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

让美国客人更为不安的还是后来。他们的车队从北京机场到钓鱼台宾馆的途中，不仅断绝了交通，布满了警卫，而且还心惊胆战地发觉好几处写着醒目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大幅标语。

特别是他们到达钓鱼台六号楼时，发觉每个房间里都放有一份英文的电讯稿，上面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

基辛格那敏感的神经快受不了了。他强作笑脸，让众人把那些英文电讯都收起来，交还中方的一位礼宾官员，并故作玩笑他说：“这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

他的幽默话并未得到对方的善意道歉。

周恩来听到此事的汇报后很生气，即询问礼宾司的负责人：为什么要摆放这些东西？回答说这是新华社历来的规矩。此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说，他们这是“放空炮”。

第二天，姬鹏飞代理外交部长在陪同基辛格去人民大会堂的途中，特意向他解释说，每个国家都有它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办法，你们用报纸和电视，我们中国则用墙上的标语。姬指了指昨天还贴着反对美帝国主义大幅标语的墙上说，你看现在是不是变了？

基辛格看了看外边，那墙上果然已经换了了欢迎亚非乒乓球赛的英文标语了。

紧张的空气似乎因这标语的变化而轻松起来。

5. 基辛格差点完不成使命

10 月 20 日下午，基辛格一行经过一点小小的虚惊后，见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眼里看去，3 个月过后，周恩来的脸色不如上次那么好，可是精神气质依然如故。

周恩来如上次那样热情大方，跟每一个来访者握手寒暄，向每个人表示欢迎和问候，而且能像老朋友一样说出他们各自的学历和经历。在基辛格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个美国国务院的代表弗莱德·詹金斯，早在 22 年前就在中国居住过，对中国很熟悉和了解。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表示对他的情况很了解，说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使詹金斯很感动。

这天的第一次会议就在这种开始显得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了。

在接下去欢迎基辛格一行的宴会上，周恩来说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话。他说中美在中断联系 22 年后，现在又将揭开中美关系新的一页，这应当归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

格博士。

接着，周恩来又说道：基辛格上次秘密访华时说到的那个“哲学”含义，跟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观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有 16 年了，但一直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来北京讨论这个重大问题，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都希望这些讨论能取得积极的成果。

第一次会谈后，基辛格等一行美国客人对周恩来的谈吐风度，以及他那种既不失原则、又让话语中充满着令人信服的力量口才，感到由衷的敬佩。在会谈前的那种紧张空气早已一扫而尽。但是，基辛格此次来华却差点完不成使命。

不知美方是出于何种考虑，没有完全按照双方既定的议程进行研究讨论。基辛格到了北京后，才告诉中国方面他此次来北京，一是为了妥善安排好尼克松访华时的一切准备工作，另外还有一项重要事项，就是预先拟定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要发表的一个联合公报。

因为在此之前，美中双方没有说到此事，所以中国方面没有准备。当基辛格提出这个建议时，再三表示，这是出于美国国内及国际上有不少人想看到尼克松访华失败，故此得早作这方面的准备。

周恩来总理对此认为可以理解，同意美国先拿出草案来。

美国方面是有所准备的，就在 10 月 22 日的会谈中拿出了他们已拟定的草案让中方过目，提出修改意见。基辛格还特别强调，此公报草案已经尼克松的批准了。

美国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是按老一套的格式起草的，其中强调了一些含糊其词的共同点，而用一些陈词滥调掩盖着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避而不谈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周恩来总理看了美方草案后，很不满意。他说这个草案不能接受。周总理又指示章文晋起草方案，周恩来对章文晋说，就按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

10 月 23 日晚，毛泽东主席把周恩来、姬鹏飞、熊向辉和章文晋等人叫去。他先表示不赞成搞公报。周总理说明这是美国方面提出来的，他们需要，不搞不好。

毛泽东主席说：“那个东西我只看了一遍，发言权不大，只有一点点，不满意，一点神气也没有。”

周恩来忙解释说：“这个草案我们还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先送主席审阅，然后按主席的指示修改。”

毛主席立即说：“国际形势我讲过多次，天下大乱嘛！各说各的可以，这个办法好。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不突出这个，我看不那么妥当。”接着说，“我们是放空炮……要尼克松同意解放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那也难。他也是讲空话，什么维护老朋友啊，不干涉内政啊，不争霸啊，那怎么行！”“但是他也不好讲大国应该欺负小国嘛。语言上接受，行动上自由，他们是自由国家，自由。说什么不谋霸权，你美国由 13 个州到 50 个州，还不是扩张、争霸的结果？后来还把手伸向全世界。”第二

天，原是由姬鹏飞与基辛格会谈有关公报问题的，临时改为周总理跟基辛格谈了。

这一回，基辛格发现一向和蔼的周恩来脸色显得很严肃。他心里便猜出，一定是公报之事有了一些麻烦。

周恩来总理立即对他说：“毛泽东主席看了你们的公报草案，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公报我们不能接受。”

周恩来的最后一句话说得异常坚决，不容反驳。

基辛格当然也不肯相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他此行的一个最难办也是非办成不可的事。他认为他们起草的公报有一个基本的含义，和平是中美双方的目的。

周恩来便立即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来反驳他的美国对手，“和平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我们的意见是摆明双方的根本分歧。如果用外交语言把分歧掩盖起来，在公报上看起来像是观点一致，而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有什么意义？”

基辛格半步不退让：“总理阁下，我们起草的公报是按照国际惯例的，如果在公报上写明中美双方的分歧，那不等于告诉世界，中国和美国正在吵架么？”

周恩来对此不那么理解，他认为：“吵架是正常的，我们两国打了许多日子的仗，相互隔绝了20多年，分歧是必然的嘛！关键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分歧。”

谈判于是陷入了僵局。谁也不肯从自己的原则立场上后退一步。

还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缓解的办法，说：“我们也拿出一个方案的初稿，你们先看看。”

这样，就暂时不再谈不去了，休会，让美方去研究中国方面提出的方案。

中国人有中国的思路，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思路。毛泽东想到的问题，未必就是尼克松想到的。双方的分歧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了。

基辛格的他的助手们详细地研究了代表毛泽东、周恩来意图的中国方案。这个别具一格的方案把中国和美国的主要分歧全写进去了。

北京的秋夜原本是该睡觉的好时节，可是从美国来的基辛格等人却未能入睡。还是基辛格突然转过弯来了：把分歧公开出来，西方盟国、东方的朋友不就都放心了吗？这不也是一种很好的坦诚布公的做法吗？

在接着进行的会谈中，基辛格表了态，说：“你们的方案，从大的方面讲可以接受，但是你们的某些提法太僵硬，我们难以接受。这种在你们的报纸、电台常用的词，放在美中联合公报里面，就好像是在辱骂美国似的，我们接受不了。”基辛格这么说，他就是从原先的立场上让了一大步。

周恩来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说：“有了大前提，事情就好商量着办了。你们再看看想要在哪些地方作些调整修改的。”

基辛格答应隔天拿出修改方案来。

但是美国修改后的方案在台湾问题上又卡壳了。

中国方面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这样的：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 二、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 三、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

而基辛格所拟定的美国对台方针则总在一个基点上：我们不能背弃我们

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的。

这样看起来，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完全是对立和不可调和的。

气氛在不知不觉之中又紧张起来了。在场的双方人员脸上的表情也都一个比一个严肃，就连译员的声调也变得生硬起来了。

基辛格反复地说着这句美国人常说的话：“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你们中国人也会瞧不起我们的。”

周恩来在此刻倒依然是不温不火，脸上看不出多少严峻之色。他很有耐心地对美国人说：“什么叫背弃朋友？首先要弄清一个前提：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现占有着我们的领土台湾，这样做本身就是不对的。你们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就应该撤走你们的军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我们则对尼克松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了。”

基辛格听出周恩来话中有着一种很严正的立场。这种立场就是中国人对台湾问题毫不让步的根本原则：如果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不能作出新的灵活姿态，美国总统来又有何益呢？

基辛格心里着急了，但嘴里却还是在硬咬着不肯放松：“总理阁下，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参议院、众议院对总统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还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退一步说，总理阁下所提的问题，总统如能在下一届连任的活，也许就能较为从容妥善地解决了。”

话说到这里，周恩来也能体会到作为美方代表的为难之处。他知道尼克松的确受到了美国国内一些保守势力的攻击。尼克松这个一心想搞出一点新鲜花样的美国总统最近的日子确实不太好

过。

周恩来放缓了语气说：“对于你们的处境，我们是略知一些的。你们为了所谓的老朋友，可以使自己陷入不可脱身的地步吗？尼克松总统在堪萨斯城说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总不能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吧？”

周总理这一番以守为攻、以柔克刚的话，终于使基辛格无以回复了。

台湾问题一直拖到最后一天。后来基辛格想出一句有意思的话：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

周恩来听完翻译，笑了。他觉得基辛格这个博士还真能在文字上玩出花样来，就说：“这个意思可以接受，但有的词句还需要推敲。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而不应用一‘部分’。”

基辛格也笑了，但坚持说：“部分比省更通用一些。”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这个说法在英语中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在汉语中却有一些差别。最后周恩来说：“看来我们基本上是趋向一致了，有些问题等到尼克松来了以后再谈吧。”

因为这个公报草案的事，结果把基辛格的回程拖后了一天，直到 10 月 26 日晨，才算把一些基本的原则问题谈清楚了。

这样，基辛格终于较圆满地完成了他的第二次“波罗行动”计划，于这天上午 9 时乘飞机离开了中国。第 19 章

“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尼克松：“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毛泽东：“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

到北京来。”

1. 毛泽东想尽快与尼克松谈谈

毛泽东和尼克松。

一个是最革命的左派，一个是最反动的右派；

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师，一个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

他们曾经用极端的语言，相互敌视，隔绝对峙了 20 多年互不来往。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他们的思想信仰是各不相容的，它们的价值观念是绝不一致的，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各不相同的。

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说明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开放，理解，沟通，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高级神经活动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应该不断地比以前理智。尽管地球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造成的十分深刻的信仰冲突和思想鸿沟，但是，历史也证明了，目前和将来谁也不能用战争消灭谁，给别人掘墓也要毁坏自己生存的家园。自从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真正的世界是宇宙。尽管人类还存在敌视和对抗，但是一种生存在全球观念会使不同信仰的人们意识到，失去理智的疯狂会毁坏人类共同生存的这个球体。

以今天的现代意识来重新审视 15 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块来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超世纪的事件。尽管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两位先驱者，以惊人的胆略打开冰冻 20 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离不开当时历史的因素。但是，毛泽东和尼克松会晤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事件，随着岁月的流逝，益发显示出其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已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超出了当时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一般含义。就是今天，我们也很难说清楚它的深远意义。

为了使去中国的这一特殊的访问获得成功，尼克松在行前作了多方面的准备。

首先他作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他认真研究了美国人所写的，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著的有关毛泽东的书。

他本来还想亲自去拜访一下不久前在《生浩》周刊上发表毛泽东访问记的斯诺老人。在去之前先给斯诺写了一封信，但那位老人已经病得很重，而且对尼克松没有多少好感。尼克松这才作罢。

他听说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拍了一部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记录产片《中国），他就赶紧把此片弄来，认真地看了又看。

就在他临要出访的前几天，尼克松还把当过法国部长的马尔罗请到白宫，听他讲讲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那位马尔罗是个健谈的老人。他把当年和毛泽会见时的情景描述了一番。他告诉尼克松：“你将面对的是一个巨人，但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巨人。你知道吗？毛见到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他会想，你比我年轻得多！”

马尔罗还告诉尼克松，毛泽东的身边有一种神秘的气氛……听了半天，尼克松只是想到一个问题：毛泽东毕竟是一个统治共产党大国几十年的领袖！

1972 年 2 月 21 日上午 11 时 30 分，尼克松乘坐着美国总统的“空军一

号”专机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徐徐降落。

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时刻到了。

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身为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治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早就设想好了该如何做好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决意要以一个很显眼的行动纠正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下令不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的傲慢失礼之举，并突出他本人在此时非同凡响的举止，因而特意对下飞机的程序刻意地作了安排。

飞机一停定，尼克松便先行出舱，而所有随行人员则缓走一步。虽然此举早已通知过了，尼克松仍派了一个高大的警卫守在机舱口，以防其他人紧随其后也下机去，干扰尼克松的行动。

尼克松和夫人走下舷梯后，在还没到尽头时，尼克松就在欢迎他的掌声中急切地伸出了手，向周恩来微笑着走去，主动同周恩来热烈握手。

这一历史性镜头无疑就被许许多多的摄影镜头所摄下了。尼克松为了这一时刻而做出了许多努力，终于在这一次壮观的握手中得以完美地勾出了最妙的一笔。他在后来自己所著的书中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总理在陪同尼克松一起检阅了仪仗队，然后和尼克松一同登上中国的红旗牌轿车往宾馆去的路途中，与尼克松亲切交谈，说：“你的手伸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25年没有交往了呵！”

中国方面对于如何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是作了很细致的考虑和准备的。因为这是一种毫无先例的事：两国过去多年敌对不和，又无外交关系，而尼克松又是一个大国的在职元首。

考虑定下的接待方针是“以礼相待，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的原则。决定在机场悬挂两国国旗，在北京检阅三军仪仗队、军乐团，但不采用分列式，不鸣礼炮，不请外交使团，不搞群众欢迎，只由周总理等领导人前去迎送。

为了创造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和气氛，周总理还布置客人拟去的各地方刷去了街上的反帝标语，恢复了一些店铺的老字号名称。甚至在欢迎会上要演奏的中美民间乐曲都进行了精心安排。

中国方面这样的安排，让美国方面没有一点可挑剔的地方，尽管他们原先还想象着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盛大规模的欢迎场面：几十万乃至更多的群众夹道绵延几十里，举着美国旗和花束，叫喊着，跳跃着，向美国总统表示势热烈欢迎。

最令美国人最担心的是与毛泽东相见。

在行前，即刚走上飞机时，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便有些担忧地对尼克松说，我们应该很快就同毛泽东会面，不然就会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就好像一个朝圣者似的，让毛高高在上，而美国总统则眼巴巴地翘首仰望着那个中国圣人毛的降福……

尼克松虽然对罗杰斯的提醒未作过分响应，但他倒也真是有些担心，万一毛不见他，那么他的这次访问就会大大丧失意义，而又必然会给他的那些明里暗处的敌手一个非常有用的攻击借口了。

他的担忧在他们一行到达北京后仅两个小时，就可以释然了。

在美国人才用完午饭不久，毛泽东便表示要跟美国总统谈谈。

于是在下午2点左右，周恩来急忙去找基辛格，对他说，毛泽东主席想

很快就和美国总统会面，并问美国方面谁一同去。

基辛格回答说他去，让洛德去作记录。他还特意关照说此事不能告诉美国国务院的人，特别是洛德参加会见之事更不能告诉他人，而且在新闻、照片、电视上都不能出现洛德，不然国务院的意见会很大的。

下午2点40分，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书房会见了尼克松。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总理、翻译唐闻生、记录王海容；美方在场的有基辛格、记录洛德。

尼克松不可能知道，在他与毛泽东的这次会见前一个多月，毛的身体很差，曾经突然休克，经过一番抢救才重新醒了过来。此后毛泽东便一直身体状况不好，有时整夜整夜地咳嗽。

但这位历史巨人却一直记挂着美国总统来访这件大事，在尼克松预定到达中国的这天早晨，他一醒来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尼克松到了没有？”

工作人员急忙向他汇报情况。到中午时，毛泽东忽然说：“我今天见他吧。”

他的话就是命令。机要秘书立即通知周恩来总理；而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则开始忙碌起来，有的为他理发、刮脸，也有的忙着打扫整理客厅。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丰泽园。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的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主席的书房。基辛格对毛主席书房的描述，要比斯诺更细致：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回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大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右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20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毛泽东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

在尼克松以后写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病中的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而且毛虽然此时说话有些困难，思绪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使这位美国总统油然而生起了敬重之意。

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显得很精神，也很健谈。原定会见一会儿就结束的，但他兴致很高地一直跟客人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在会见中，毛谈笑风生，寓意深刻。

他对尼克松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于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要我的学生读主席的书。”

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书算不了什么。”

尼克松则称赞道：“主席的书推动了一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可毛泽东却说：“我没能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接着谈话转到了另一面。毛泽东主席风趣地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会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话时作了一个手势，表示指尼克松总统的这次访华行动，也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现在在全世界日益提高的威望。

“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到过没有？”

尼克松有意转了话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听了翻译译出尼克松的提问后，毛泽东笑了。周恩来回答了这个问题：“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接上一句：“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要长得多。”

然后，他又把话头转向了基辛格，笑着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头一次来发表了公告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

基辛格在此时便很得体地称赞了他的总统先生。

毛主席接着引出了一段开心的话题，指着基辛格对尼克松笑着说：“他不像个特务。”言下之意是称赞基辛格的秘密中国之行做得很巧妙，毫无破绽。

尼克松便接着话头开玩笑说：“但也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趟，来北京1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姑娘。”

基辛格忙作必要解释：“她们不知道，我只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毛泽东故意问：“是在巴黎吗？”

尼克松说：“凡是能用漂亮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毛泽东反问道：“这么说，你们是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罗？”

尼克松得赶紧为自己作申辩了：“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周恩来总理点上一句：“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

这话引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接着谈到了美国大选的问题。毛主席说：“讲老实话，如果民主党上台，我们也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

尼克松说：“这个我们懂得，但我们希望不会使你们遇上这个问题。”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上次选举时，我是投了你一票的。”尼克松开玩笑地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家伙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我比较喜欢右派当权。”

尼克松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这样。”

随后在谈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主席说：“是巴基斯坦总统把你们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接触，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不过我们是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这几位总统的。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然而那段时间你们没有想通。”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哲学，主要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尼克松接着想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跟你谈的事。”他用手指了指周总理。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了，所以就打乒乓球。”

尼克松这时看出毛泽东已经很疲劳了，周总理也一再地看表，他就赶紧把自己想说的说出几句来：“在结束的时候，我还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毛泽东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尼克松笑笑说：“像我这种人，还有蒋匪帮。”

毛泽东说：“就个人来说，你也许不在打倒之列。”他又指指基辛格：“他可能也不在此列。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尼克松等美国客人告辞的时候，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你的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笑着说：“你读的书太多了。”

毛泽东却说：“读得太少，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懂。要请你们派教员来，特别是历史和地理教员。”

尼克松对毛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最后双方一起站起来，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中间，问题是我们不能够做出突破，在今后的年月里，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这里来的理由。我们在

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泽东对他的这句话未置可否，只是说：“我不送你了。”

2. 谈判中的斗争

晚7点，周恩来总理设国宴招待全体美国客人。席间军乐队演奏中美两国国歌。尼克松听到演奏《美丽的阿美利加》时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最喜欢并指定在就任总统的典礼上演奏的乐曲。敬酒时，他特地到乐队前表示感谢，并说一定要给他们发奖。尼克松在北京期间，无疑是与周恩来总理相处的最多，也谈的最多。他们在原则问题上互不相让，而在这种争执与商讨之中也建立起了很真诚的友谊。

他们一共进行了5轮的秘密会议。

尼克松用信服的口吻赞同了在1971年10月间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时提出的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

周恩来也兴奋起来，说：“正像你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当年杜勒斯不想这样做。”

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同意和他握手呵。”

周恩来笑着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和他握手的。”“那好，就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向周恩来伸过手去。于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隔着谈判的长条桌，又一次把手握在了一起。

尼克松还很有感触地跟周恩来谈起了他参加总统选举的失败和胜利的感受。周恩来说：“我常常觉得，逆境是一个好教员。”尼克松深有感触地说：“在选举中失败真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而前者伤的是精神。”

周恩来于是提起了令中国共产党骄傲的长征：“我们当年的长征，就是战胜逆境走向胜利，新中国就是从逆境中建立起来的。”尼克松颇有同感地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可是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周恩来听了此话，不禁哈哈大笑，说：“我希望总统在今天的大选中能够取得胜利。”

在两人面对面的会谈中，尼克松不禁对周恩来高度敏锐的思维和高超的谈判艺术十分钦佩，也对他年过70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也注意到，在会谈之中，秘书会定时送来几片白色的小药片给周恩来。

在周恩来前往拜会尼克松时，握手之后，尼克松面带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主动为周恩来伸手脱掉了呢子大衣。周恩来对这位美国总统微笑着。这一镜头以后在电视中连续播放好多次。美国的电视观众十分赞赏尼克松表示出的热情举动。一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这样做，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罗杰斯国务卿是美国方面的主要谈判人物。他负责和中国外长姬鹏飞谈双边关系中的其他一些非主要的事项。

因为在对华问题上，尼克松同意基辛格的提议，不愿让国务院插手主要问题的研究和商谈，所以罗杰斯在与中国方面谈判时难免会说错，或闹出一点小笑话。

姬鹏飞外长与罗杰斯一共谈了5次。中方有总理助理熊向晖等；美方有助理国务卿格林等。

两个谈判对手首先对关系正常化这个词的意思发生了意见分歧。罗杰斯

认为关系正常化就是改善关系，就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改善关系。

而姬鹏飞则认为，关系正常化是指建立外交关系。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可以改善关系，走向正常化。

双方对设立常设联络机构看法也有分歧。姬鹏飞认为最重要的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都会受影响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还有代表，要我们派代表去美国，就使我们为难了。

罗杰斯就提议在第三国大使馆内设办公室，并一再地强调电话联系也很必要。在增进往来方面，罗杰斯只是着重提到了文化、体育、医学等方面。熊向晖忽然提出一个问题：美国还要不要入境的人按手印了？罗杰斯因为是才担任国务卿，不大熟悉这些情况，赶紧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询问，然后回答说，这个规定已经取消了。中国访美人员不需要按手印。

罗杰斯在中美贸易问题上的说法显然跟尼克松的意图有很大的差异。他认为中美开展贸易的经济意义不大，可有可无。美方不急于与中闷开展贸易，如果中国觉得有利，可以搞一点。姬鹏飞感到美国国务卿的说法有问题，便指出，贸易是上次美方提出来的。我们的政策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中美贸易可以不搞，问题是许多美国商人向中国外贸部门提出了做生意的要求。熊向晖把这一问题跟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总理便问基辛格是怎么回事：你们说要搞贸易，而你们的国务卿却不感兴趣呵。基辛格听了很生气，马上冲出去把此事报告了尼克松。3.在台湾问题上没有让步的余地当尼克松、罗杰斯一行兴致勃勃地参观游览时，基辛格和乔冠华则躲在钓鱼台的一栋楼里，讨论着台湾问题。

关于联合公报的大部分问题已经在基辛格的第二次访华期间得到了解决，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双方的分歧仍然十分巨大，针锋相对。双方共谈了20个小时。

在基辛格和乔冠华之间开始了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个人反应迅速，急吵激烈，他们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学者风度，而谈判风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逻辑性强，富于哲理；乔冠华则是在雄辩中思路清楚，思辩性强，原则当中豪爽豁达。

两个人的谈判犀利尖锐，经常相持不下，但也仍然不失那种学者风度。终于，经过几天的争论分辩，他们的努力有了成果，公报终于全文落实了。

2月26日，他们两人将已经谈定的公报稿本送达正在杭州游览的尼克松和周恩来分别审阅。

却没想到，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提出，这公报不理想，要求再修改。基辛格心情很糟，面色阴沉地对尼克松说：“罗杰斯他们提出那么多意见，几乎是全部推翻了。他们说向中国让了步……”

尼克松急得直嚷嚷：“我已经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现在我们单方面又提出修改，还有没有信誉？”

基辛格气恼地说：“而且，全世界都等着看明天的联合公报呢。”

尼克松的火气也压不住了，咬着牙说：“看我回去怎么收拾国务院那些家伙的！”

杭州宴会上的南方菜格外精美，而基辛格却食之无味，心里忐忑不安，想不好如何跟乔冠华开口谈修改公报这件麻烦事。

当这天晚上，基辛格婉转提出此要求后，乔冠华脸上的微笑消失了：“这是怎么说的？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做出

了许多让步。现在离发表公报的时间还不到 24 小时，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基辛格诚恳地说出了他和尼克松的为难之处。乔冠华觉得这事非同小可，即停止会晤，跟周恩来去谈这事了。

周恩来也觉得这事棘手，马上拨了红色的直通电话，向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主席请示。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用十分坚决的口气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他停顿了片刻，然后又严厉地加上了一句：“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告的可能性。”

于是，又是一宵未睡，基辛格和乔冠华终于在凌晨 2 时将公报草案完成了。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2 月 27 日下午 5 时，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是在上海公布的，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故称为《上海公报》。

这大是星期天。中国政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举行了最后的宴会，尼克松显得兴高采烈，茅台酒使他脸上的笑容泛着红光。他激动不已地端着酒杯走到麦克风前面，作了这次访问的唯一的一次即席讲话。

尼克松说，我们要建立一座跨越 16000 英里和 25 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这位美国总统在激动中又说：“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握在手中。”

这是一句过于敏感的话，基辛格听着，不免有些忧虑，觉得总统今天高兴得有点忘形了。幸好平时爱挑毛病钻字眼的记者们也是让茅台酒的香气熏得迷迷糊糊，对尼克松这句话没有太大反应。

尼克松而后还说了一句：“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2 月 28 日早晨，漆着蓝、白、银三色的总统座机飞离了上海。乘坐在“空军一号”之中，望着下边那无边无际的深蓝色海洋，还沉浸在兴奋之中的尼克松，又一次想起了临行前法国那位大作家马尔罗对他说的一段话：

“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我联想到 16 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往往发现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你要做的事情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局。”

此时尼克松想，那位大作家说的也对，也不对。他这次的中国之行，是既找到了原本想看到的東西，又得到了原先没想到能够得到的东西。

而在另一方面，周恩来这个中国政府最忙碌的人又回到了北京。他当即驱车去了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毛泽东听到说尼克松曾用“改变世界的一周”之说，不禁哑然失笑道：“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出来，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周恩来默然无语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有点喘，咳了两声。女秘书为他拍了几下背。他缓过气来，又深吸了一口烟，盯着手中的雪茄烟卷，自嘲地说：

“还说改变世界哪，我几次要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不了。”

参考书目

- 《中美关系资料选编》冬梅著，时事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版。
- 《中美关系史》陶文剑著，重庆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
- 《中美关系史论文集》重庆出版社 1985 年 9 月版。
- 《中国百年外交风云录》连生等编著，沈阳出版社 1995 年 5 月版。
- 《大洋季风》席来旺等编著，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年版。
- 《钓鱼台国事风云》李健编著，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
- 《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美）谢勒著，三联书店 1985 年 2 月版。
- 《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美）卡恩著，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
-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美）谢勒著，商务印书馆 1989 年 9 月版。
- 《美国与中国》（美）费正清著，商务印书馆 1971 年版。
- 《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新华出版社。
-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美）包瑞德著。
- 《胜利与抉择——美、英对共产党中国胜利的反应》（美）孔华润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司徒雷登对华回忆录》
- 《朝鲜战争》解力夫著，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 《越南战争》同上
- 《台湾祸福》倪健中等编，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年版。
- 《中美较量大写真》陈锋等编，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5 年版。
- 《中美关系二百年》李长久等编，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
- 《毛泽东和世界风云人物》董保存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神秘之门：共和国外交实录》曹英编，团结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
- 《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1978 年 12 月版。
- 《乒乓外交始末》钱江著，东方出版社。
- 《真正的和平》尼克松著，新华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版。
- 《中共外交史》王绍坊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 《中南海外交见闻录》韩漳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